回望鲁迅
十年携手共艰危
——许广平忆鲁迅
许广平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回望鲁迅

十年携手共艰危

——许广平忆鲁迅

许广平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许广平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7
（回望鲁迅丛书/孙郁，黄乔生主编）
ISBN 7-5434-4012-1

Ⅰ.十… Ⅱ.许… Ⅲ.鲁迅（1881～1936）-生平事迹 Ⅳ.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6735 号

回望鲁迅

十年携手共艰危

——许广平忆鲁迅

许广平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河 北 新 华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1/32 16.375 印张 269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3500 定价：23.50 元
ISBN 7－5434－4012－1/K·138

总　序

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没有谁像鲁迅这样给后世造成这样大的影响，留下这么多的话题。他的著作，至今拥有广大的读者。

然而鲁迅又是一个难以描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

在鲁迅生前和身后，由他引发的文化论战和思想交锋，从未停止，一直延续到今天。在鲁迅的遗产中，不仅有对文明社会的渴望，也有对现代社会变态的质疑；不仅有对传统的反省和抵抗，也有对新文化运动中不谐和性的抨击。鲁迅表达了反抗奴役、走向自我解放的文化命题。他将一个贫穷、落后、灾难深重的社会中人的不屈不挠的生命之迹深刻地昭示给世人。他的丰富的思想映现着灵魂的纯净和高贵。鲁迅思想不但在中国，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有其巨大的价值。

鲁迅深刻而又长远地启示着民族的自省，而且不断地被看成精神超越的资源，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动荡和变迁，鲁迅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今，他一方面被当成一个经典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也成为当代思想者队伍中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存在，而且是一个榜样，一个导师。无论在学院派那里还是在民间，都有鲁迅意识的生长点。

聆听鲁迅同时代人以及后人与鲁迅灵魂的对话，我们也许会隐约地感受到一些沉重。鲁迅在被接受中的扭曲和变形，是一个值得探讨

的问题。我们在各种回忆录、传记、论文中，看到鲁迅的面貌的多样化。实际上，不必讳言，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可以与其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交流者，十分有限。更不要说后来者。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鲁迅不断地吸引着后世的人们。鲁迅的思想具有开放性、不可复制性和常新性，其中包含着对人类一些恒定的主题的探索：存在与虚无、有限与无限、奴役与叛逆，……。有人崇拜他，有人谩骂他，有人诋毁他，有人利用他，各种人以各自的立场来解读他。虽然并不是每种人都得到了他的思想的真谛，但自鲁迅逝世到今天，对鲁迅的评价和研究的轰轰烈烈和众说纷纭，也足以说明了鲁迅的确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能回避的存在。鲁迅用他的如椽巨笔，揭示了现代社会一系列隐痛：非人道、奴性、罪恶、苦难、背叛，……，他使人看到了存在的无理性。人日甚一日地消失在"我"的迷津里，不仅成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和物质的仆役，而且也成为外在于己身的社会结构的囚徒。鲁迅思想的闪光点之一就是揭示了传统社会和现时代的"吃人"本质。鲁迅在当今世界中不仅没有隐没，相反，却日益清晰地凸现出不朽的价值。我们时时会感到鲁迅思想的现实意义。

因此，鲁迅的文本不仅是一种历史，更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中国人将近一个世纪的对鲁迅文本的解读，也成为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鲁迅世界"或"鲁迅传统"。在这个世界中，记录着百年中国的深刻的精神潜流。这个传统已经并且将会继续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将差不多一个世纪里东西方文化人士描述和研究鲁迅的文字有选择地汇编在一套丛书里，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鲁迅在文化史上的巨大意义。我们借此走进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对鲁迅的批评研究，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标本的性质。

这套《回望鲁迅丛书》汇集了国内外有关鲁迅的回忆录和研究文字，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研究的一次较为全面和规模较大的文献汇编。鲁迅学早已成为一门显学。而且这门学问将要继续"显"下去。

首先说回忆文字。可以这样说，人们对鲁迅作品和思想的研究将会长久地持续下去，但对鲁迅生平事迹的回忆，基本上已经写得差不多了。与鲁迅同时代的人，或笼统地说，与鲁迅有过交往的人，该写回忆

文章的都已写过，甚至有的人写了多篇。回忆文字已不可能出新出奇，除非无中生有地编造。对历来的回忆文字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很必要而且条件已经成熟。当然，因为回忆文字卷帙浩繁，把每篇每部都收进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而且，从回忆录的内容来看，也应该加以选择。因为不少篇章有重复，往往是许多个作者回忆同一个事件，其间大同小异；加之回忆者因为年代久远，或记忆能力弱化，有的回忆录与当时实情不相符合，或者与其他回忆录相矛盾；特别因为鲁迅逝世后几十年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常有大的变化，回忆者在历次运动斗争中，对鲁迅的回忆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有时竟或有自相矛盾之处。这看起来是颇为滑稽的，但也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历史和特殊国情使然，我们只好在阅读这些文字时加以认真鉴别。在选编过程中，编者努力将这些不谐和之处删除掉，但因为要保持每篇文字的基本完整，也不可能做得彻底。至于因为每个回忆者立场和视角不同，所描绘出来的鲁迅形象有差异，对鲁迅的评论甚或大相径庭，那也是正常的，不必也不能强求他们统一。

回忆鲁迅的文字，有多种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对写过专著特别是多种专著的作者，我们一般为其编了专集。例如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就出版过《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等专著或文集。我们从中选出若干篇，编成一本《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其特点是偏重讲述鲁迅的日常生活，而尽量少选她对鲁迅的作品和思想进行评价的文字。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有回忆专著出版，周作人的是《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青年时代》，周建人著有《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和《回忆鲁迅》，后者写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以他的名义出版，实则由别人代笔，所写的鲁迅是一个歪曲了的形象。我们将两兄弟的回忆文字集合起来，编为两本，一本主要选了两个弟弟回忆长兄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篇什，另一本是以《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为主的对鲁迅作品和思想的来源和发展进行解说的文字。鲁迅的老友许寿裳，写过《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向来得到鲁迅研究界的好评，也编为一卷。与晚年鲁迅接触得较多的冯雪峰，除专著外，还有大量散篇文章，也收集起来，编为一卷。那些只写有一本专著的作者，我们将这些专著汇集成卷，例如将王志之的《鲁迅印

象记》，孙伏园的《鲁迅先生二三事》、许钦文的《鲁迅日记中的我》和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断片》编为一卷，这些人都是鲁迅在北京时期接触比较多的学生。鲁迅晚年，周围聚集了一些文艺界人士，如胡风、萧军、聂绀弩、黄源、周文、唐弢等等，他们中有些人，在鲁迅逝世后的文坛斗争中，命运十分悲惨，将他们的回忆和评论文字汇编在一起，称之为"弟子忆鲁迅"，是较为恰当也是很有意义的。

回忆文字的很大部分是散篇文章，我们将其编为两卷，一卷重点收录文艺界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另一卷收录其他各界人士的文字。散篇文章很多，限于篇幅，丛书中不可能每篇都收，但大致上将比较重要的篇目都包括在这两卷中了。当然，由于寻找资料的艰难和编者水平的限制，一定有遗珠之憾。这是要请回忆录作者和广大读者鉴谅的。希望今后有机会弥补缺憾。

鲁迅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很称职的编辑。他不但写书，而且还办杂志、出书。他一生中与他有过交往的编辑有好多位都写了回忆文字，记述他在编辑方面的言行和业绩，有可读性，也有参考价值，对今天的编辑工作颇具指导意义。因此，将这些文字汇集起来，成《编辑生涯忆鲁迅》一卷。

以文字类别汇集成卷的还有《无限沧桑怀遗简》。鲁迅一生来往书信甚多，许多书信后面都有值得记录的事件。鲁迅逝世后，一些与他通过信的人，就通信过程和内容做了说明，这些文字提供不少背景资料，对研究鲁迅生平和思想不无帮助。

此外，与鲁迅有过交往的女性特别是女作家，在回忆文字中对鲁迅的描绘和评论，笔触往往比较细腻，观察也自有其独到之处。因此，将她们的文章和小册子汇集成一卷，也是很有意思的。

海外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编为一卷，其中以日本作者居多。这类回忆文字也不可能再有新的出现，只是因为我们只能编入已经有中译文的篇什，一定也有遗漏。期望翻译家们勉力多译，使海外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成为全璧。

鲁迅逝世已经六十多年，在鲁迅生前，从他发表小说开始，针对他的评论文字就已经出现。对鲁迅的评价，历来有不同意见，甚至有截然相反的意见。这类文章和论著相当多，我们进行了分类挑选，大致分为

一般评论和研究论著两种。两种的分别有时并不是很明显的。关于前者,按类编辑成两卷,一卷是对鲁迅的攻击性文字。鲁迅一生屡遭围攻,连他自己生前都想将各种围攻他的文字编为一集,而且已经定了名目叫《围剿集》,可惜因为早逝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本丛书里这一卷也就用这个书名。另一卷比较起来是对鲁迅的正面评价,大多是共产党人纪念和论述鲁迅的文字,其中有多篇是领袖人物对鲁迅的称赞。这样的编法,使两条线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以使读者从正反两个方面的评价中更深入地了解鲁迅。

对鲁迅生平史料的考证和研究是鲁迅研究这门学问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即如收在本丛书里的这些回忆鲁迅的文字,我们就不能说都绝对准确无误。研究史料的学者发挥了考证的专长,对回忆录中的种种错误说法加以辨证,虽然有的是很小的问题,但表现了做学问的认真态度。这类文字汇集起来,编为一卷。

研究鲁迅的论著可以说汗牛充栋,选择为难。征得原著者同意,我们编发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几种专著。此外,编了几卷论文集。

我们多年来喜爱读鲁迅的著作,也都写过一些学习心得。虽然学识浅薄,学术水平有限,但对鲁迅研究这门学问的感情却是相当深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王亚民等同志对这门学问十分关注,愿意出版有关的论著,毅然将这套丛书列入出版计划,并把这项工作委托了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大工程,我们一开始惶恐不已,生怕做得不好,愧对鲁迅,愧对师友,愧对作者和读者,但最终,对这门学问的感情使我们鼓起了勇气,终于勉力将这套丛书编出来。

我们进行了这样的分工:《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由马会芹编辑,《吃人与礼教——论鲁迅(一)》由张梦阳、孙郁编辑,回忆录的大部分由黄乔生编辑,其余由孙郁负责编辑。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许多朋友的热诚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我们知道,由于水平的限制,这套丛书一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盼望各方面人士批评指正。

孙　郁　黄乔生

1999年6月9日

回望鲁迅

孙郁 黄乔生 主编

散文部分

无限沧桑怀遗简 孙伏园等著
永在的温情 钟敬文 林语堂等著
——文化名人忆鲁迅
年少沧桑 周作人 周建人 著
——兄弟忆鲁迅（一）
书里人生 周作人 周建人 著
——兄弟忆鲁迅（二）
高山仰止 柳亚子等著
——社会名流忆鲁迅
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萧红 俞芳等著
——女性笔下的鲁迅
十年携手共艰危 许广平 著
——许广平忆鲁迅
编辑生涯忆鲁迅 赵家璧等著
海外回响 史沫特莱等著
——国际友人忆鲁迅
鲁迅先生二三事 孙伏园 许钦文等著
——前期弟子忆鲁迅
如果现在他还活着 胡风 萧军等著
——后期弟子忆鲁迅
冯雪峰忆鲁迅 冯雪峰 著
挚友的怀念 许寿裳 著 马会芹 编
——许寿裳忆鲁迅

论文专著部分

吃人与礼教 李长之 艾芜等著 孙郁 张梦阳 编
——论鲁迅（一）
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 汪晖 钱理群等著
——论鲁迅（二）
鲁迅史料考证 朱正 陈漱渝等著
围剿集 梁实秋等著
红色光环下的鲁迅 瞿秋白等著
鲁迅与日本人 伊藤虎丸 著 李冬木 译
——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
心灵的探寻 钱理群 著
铁屋中的呐喊 李欧梵 著 尹慧珉 译
反抗绝望 汪晖 著
——鲁迅及其文学世界

目　　录

片段的记录

鲁迅先生平常举动和谈话，有许多精到的地方，我想：随时把我记录的摘写出来，久而久之，把这种材料选择编辑一下，或者也可使人对于他的文字有更清楚的了解。可惜记录了不几天，他就病了。病中一直没有功夫继续记下他的谈话，所以这一片段，是很不完备的。而且初意满以为编辑成帙时，可以由他校正，想不到会要在现时的情况下发表，那么，不妥之处，自然应当由我负责了。

五 月 八 日

晚间我拿起笔来预备写些字，他问我写什么，我把意思告诉了。他表示不愿意，这我懂得的：他以为不值得如此做。但歇一下他又说："要写，就坏处也得写。"

他处置自己的时间，与其说是为我的，无宁说是为人。只要对于别人的希望可以满足，有时就是极不认识者的通信，他也并不吝惜自己的精神而置之不理，如一些名流们一样；虽然仍有许多人觉得他的信欠详细或竟不覆，因而招致无聊的不了解的讽刺函件，使他痛心。

他对自己的文稿并不爱惜，每一书出版，亲笔稿即行弃掉。有时他见我把弃掉的保存起来，另一回我就见他把原稿撕碎，又更加以讽刺，说没有这么多的地方好放。其实有许多不大要紧的书，倒堆在那里，区区文稿会没有地方放？不过他不愿意保留起来就是了。曾经有一次他

的《表》的原稿给卖油条的人拿来包油条给买客,刚好那张稿子落在一个朋友手里,我听见好像身上受了刀割那么痛伤我的心,然而我时常眼巴巴地看他把原稿弄掉,我是无法防止的。

今天上午吴朗西先生亲自把《死魂灵百图》精装本送来。是那么精致的一本图,我们看了都很觉满意。照目前社会情形,尤其书业情形,是很难做到的:购买力薄弱,知识程度低下。但他是不管的,为了读者,有时印刷些讲究的书籍,虽然也有人讥笑他。他的深意却另外存在着,他说:"我的印好书,是为将来的,别人不注意将来,所以就没有把现在的东西好好保存起来,留给将来的人做粮食的心意。那里是为的满足我自己。"

每一种新出版物到手时的高兴,是没法子形容的。吴先生一走,就兴匆匆地一本一本包起来,要使得朋友们赶快收到。这种替人设想的一种忘我心情,我是时常体会到的。他的精神感动了我,自然不由得我也在旁给拿包裹纸啦,绳啦,浆糊啦等等,共同把书包扎起来,眼看着一包包的书摆在案头,这才靠在躺椅上发出满足的微笑,有时且计算朋友们收到的日子。

这种包裹捆扎的琐事,虽是委之别人比较自己省力,然而他是不肯的。非如此做他不觉得满意。并且时常说:"做这种事就是我的休息。"真的,他从没有好好休息过,总是手、口、脑轮流使用。每当嘴谈天时,手算休息了;执笔写字时,手脑并用,口休息了;此外,斜靠在躺椅上,不是在看书就是在那里构思。有时我想:他磨练成机器一样了。别人看得实在太苦了,而他并不在意。自然修理机器也是第一要紧的事,否则要损失它的生产力的,但至今没有好好地修理一下,真令人难过。

五月十日

下午《中流》编辑来,谈起有些刊物要求老作家每期投稿之类。他以为:

(一)每种刊物应有其个性,不必雷同。目前各种刊物,总是这几个人投稿,是不好的。

(二)新产生一刊物,由老作家稍为帮助一下,三两期后,便能自己

办起来，像《译文》初时情形一样，那是对的。如果每期都需要帮助，好像背着一个人走钢索，不但走不动，而且会有使背的人跌下去的危险。

（三）办刊物应多量吸收新作家，范围要放大，不可老驮在几个人身上，否则要拖死的。

晚间和C先生谈话，说起“中国将来如要往好的方面走，必须老的烧掉，从灰烬里产生新的萌芽出来。”更加重地说：“老的非烧掉不可。”他是对于旧的渣滓毫不爱惜地割弃的，这是他执着不放松的确信。他太爱新生的进步产物，同时更太讨厌旧有的污秽。

他又说：“中国人所谓没有出路，不是替大多数人着想，他是为自己没有出路而嚷嚷。譬如杨邨人等之找出路就是这样。”

五月十一日

同C先生谈起中国人的极端性，他说：“中国人对于某人的观察，因其偶有错误，缺点，就把他的一切言语行动全盘推翻，譬如有人找出高尔基一点‘坏处’，就连他的全部著作都不看。又如吴稚晖不坐人力车，走路，于是崇拜他，反而把他的另外行为，比损害一个人的体力更不止的一切，都可宽待。又如孙传芳晚年吃素，人们就把他的杀人凶暴，都给以原谅了。”

讲起小孩子的难对付。他（小孩）知识稍微有一点，首先问天上面有什么东西？若说空气，再问空气之外有什么东西……。看见了桃子，问那里来的？说核种出来的，又问没有核的时候，最早最早，桃子是什么东西生出来的？第一个是宇宙学问题；第二个是物种原始论。这种题目到如今还是在研究，而小孩子首先注意到。怪不得野蛮时代的人要归之于神，大概是无可解答时的答复了。

他以为中国人写文章较别国难，因中国文字实在太不够用。所以写作时几乎个个字在创造起来。如果要照文法第几条，那是不可能的。外国字则每个字有单独意义，中国是分不出来的，有时加上形容字，也觉得不妥当。

对于当时一些中国人做事情的没有持久性，他也很不以为然的。他说：“中国没有肯下死功夫的人。无论什么事，如果继续收集材料，积

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即如最简便而微小的旧有花纸之搜集，也可以观测一时的风尚习惯，和社会情形的一般。”

他本身拿文学做武器，和一切恶势力奋斗。可是他时常感慨于文学力量的薄弱，不切实，他希望文学从实生活中产生出来，所以对人谈到这问题，他就说：“文学以后不能算它职业。——教书吃饭例外，专门学者例外——科学家……无论什么人，于自己职业之外，对文学有趣味，工作剩下来的时光，把从实际得来的写出来，各人经验不同，表现的当然五花八门。可是向来一般人对于科学、算学……不愿意努力的，都投向文学这一条路来，或美术上来，这是很不对的。不过这种情形是畸形的。而近来女工，劳动者，每一篇文章出来，容易引人注意，因为他们的生活充实，自然有一种力量存在着。”

谈到在上海做文章的人，他有一个很有趣的比譬。他说：“上海文人，各有各的本领，我们不可轻看他。你看见他表面上笑嘻嘻，一动也不动，静得很，一点真意也得不出来。我时常想：他们好像非洲 Jungle①里的动物，在树林里，看过去极平常，毫不可怕。可是社果真接触到时，就各有各的本领。”

（1936 年 10 月上海《中流》）

① 原始森林。

最后的一天

今年的一整个夏天，正是鲁迅先生被病缠绕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光，许多爱护他的人，都为了这个消息着急。然而病状有些好起来了。在那个时候，他说出一个梦：他走出去，看见两旁埋伏着两个人，打算给他攻击。他想：他们要当着我生病的时候攻击我吗？不要紧！我身边还有匕首呢，投出去掷在敌人身上。

梦后不久，病更减轻了。一切恶的征候都逐渐消灭了。他可以稍稍散步些时，可以有力气拔出身边的匕首投向敌人，——用笔端冲倒一切，——还可以看看电影，生活生活。我们战胜"死神"。在讴歌，在欢愉。生的欣喜布在每一个友朋的心坎中，每一个惠临的爱护他的人的颜面上。

他仍然可以工作，和病前一样。他与我们同在一起奋斗，向一切恶势力。

直至十七日的上午，他还续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以前有《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似尚未发表。）一文的中段。（他没有料到这是最后的工作，他原稿压在桌子上，预备稍缓再执笔。）午后，他愿意出去散步，我因有些事在楼下，见他穿好了袍子下扶梯。那时外面正有些风，但他已决心外出，衣服穿好之后，是很难劝止的。不过我姑且留难他，我说："衣裳穿够了吗？"他探手摩摩，里面穿了绒线背心。说："够了。"我又说："车钱带了没有？"他理也不理就自己走去了。

回来天已不早了，随便谈谈，傍晚时建人先生也来了。精神甚好，谈至十一时，建人先生才走。

到十二时，我急急整理卧具。催促他，警告他，时候不早了。他靠在躺椅上，说："我再抽一支烟，你先睡吧。"

等他到床上来，看看钟，已经一时了。二时他曾起来小解，人还好好的。再睡下，三时半，见他坐起来，我也坐起来。细察他呼吸有些异常，似气喘初发的样子。后来继以咳呛，咳嗽困难，兼之气喘更加厉害。他告诉我："两点起来过就觉睡眠不好，做噩梦。"那时正在深夜，请医生是不方便的，而且这回气喘是第三次了，也不觉得比前二次厉害。为了减轻痛苦起见，我把自己购置在家里的"忽苏尔"气喘药拿出来看：说明书上病肺的也可以服，心脏性气喘也可以服。并且说明急病每隔一二时可连服三次，所以三点四十分，我给他服药一包。至五点四十分，服第三次药，但病态并不见减轻。

从三时半病势急变起，他就不能安寝，连斜靠休息也不可能。终夜屈曲着身子，双手抱腿而坐。那种苦状，我看了难过极了。在精神上虽然我分担他的病苦，但在肉体上，是他独自担受一切的磨难。他的心脏跳动得很快，咚咚的声响，我在旁也听得十分清澈。那时天正在放亮，我见他拿左手按右手的脉门。脉跳得太快了，他是晓得的。

他叫我早上七点钟去托内山先生打电话请医生。我等到六点钟就匆匆地盥洗起来，六点半左右就预备去。他坐到写字桌前，要了纸笔，戴起眼镜预备写便条。我见他气喘太苦了，我要求不要写了，由我亲口托请内山先生好了，他不答应。无论什么事他都不肯马虎的。就是在最困苦的关头，他也支撑起来，仍旧执笔，但是写不成字，勉强写起来，每个字改正又改正。写至中途，我又要求不要写了，其余的由我口说好了。他听了很不高兴，放下笔，叹一口气，又拿起笔来续写，许久才凑成了那条子。那最后执笔的可珍贵的遗墨，现时由他的最好的老友留作纪念了。

清晨书店还没有开门，走到内山先生的寓所前，先生已走出来了，匆匆地托了他打电话，我就急急地回家了。

不久内山先生也亲自到来，亲手给他药吃，并且替他按摩背脊很久。他告诉内山先生说苦得很，我们听了都非常难受。

须藤医生来了，给他注射。那时双足冰冷，医生命给他热水袋暖脚，再包裹起来。两手指甲发紫色大约是血压变态的缘故。我见医生很注意看他的手指，心想这回是很不平常而更严重了。但仍然坐在写

字桌前椅子上。

后来换到躺椅上坐。八点多钟日报(十八日)到了。他问我:"报上有什么事体?"我说:"没有什么,只有《译文》的广告。"我知道他要晓得更多些,我又说:"你的翻译《死魂灵》登出来了,在头一篇上。《作家》和《中流》的广告还没有。"

我为什么提起《作家》和《中流》呢?这也是他的脾气。在往常,晚间撕日历时,如果有什么和他有关系的书出版时——但敌人骂他的文章,他倒不急于要看,——他就爱提起:"明天什么书的广告要出来了。"他怀着自己印好了一本好书出版时一样的欢情,熬至第二天早晨,等待报纸到手,就急急地披览。如果报纸到得迟些,或者报纸上没有照预定的登出广告,那么,他很失望。虚拟出种种变故,直至广告出来或刊物到手才放心。

当我告诉他《译文》广告出来了,《死魂灵》也登出了,别的也连带知道,我以为可以使他安心了。然而不!他说:"报纸给我,眼镜拿来。"我把那有广告的一张报给他,他一面喘息一面细看《译文》广告,看了好久才放下。原来他是在关心别人的文字,虽然在这样的苦恼状况底下,他还记挂着别人。这,我没有了解他,我不配崇仰他。这是他最后一次和文字接触,也是他最后一次和大众接触。那一颗可爱可敬的心呀!让他埋葬在大家伙儿的心之深处罢。

在躺椅上仍旧不能靠下来,我拿一张小桌子垫起枕头给他伏着,还是在那里喘息。医生又给他注射,但病状并不轻减,后来躺到床上了。

中午吃了大半杯牛奶,一直在那里喘息不止,见了医生似乎也在诉苦。

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给他注射和吸入酸素,氧气。

七点半钟我送牛奶给他,他说:"不要吃。"过了些时,他又问:"是不是牛奶来了?"我说:"来了。"他说:"给我吃一些。"饮了小半杯就不要了。其实是吃不下去,不过他恐怕太衰弱了支持不住,所以才勉强吃的。到此刻为止,我推测他还是希望好起来。他并不希望轻易放下他的奋斗力的。

晚饭后,内山先生通知我(内山先生为他的病从早上忙至夜里,一天没有停止):希望建人先生来。我说:"日里我问过他,要不要见见建人先生,他说不要。所以没有来。"内山先生说:"还是请他来好。"后来

建人先生来了。

喘息一直使他苦恼,连说话也不方便。看护和我在旁照料,给他揩汗。腿以上不时地出汗,腿以下是冰冷的。用两个热水袋温他。每隔两小时注强心针,另外吸入氧气。

十二点那一次注射后,我怕看护熬一夜受不住,我叫她困一下,到两点钟注射时叫醒她。这时由我看护他,给他揩汗。不过汗有些粘冷,不像平常。揩他手,他就紧握我的手,而且好几次如此。陪在旁边,他就说:"时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我说:"我不瞌睡。"为了使他满意,我就对面地斜靠在床脚上。好几次,他抬起头来看我,我也照样看他。有时我还陪笑地告诉他病似乎轻松些了。但他不说什么又躺下了。也许这时他有什么预感吗?他没有说。我是没有想到问。后来连揩手汗时,他紧握我的手,我也没有勇气紧握回他了。我怕刺激他难过,我装做不知道。轻轻地放松他的手,给他盖好棉被,后来回想:我不知道,应不应该也紧握他的手,甚至紧紧地拥抱住他。在死神的手里把我的敬爱的人夺回来。如今是迟了!死神奏凯歌了。我那追不回的后悔呀。

从十二时至四时,中间饮过三次茶,起来解一次小手。人似乎有些烦躁,有好多次推开棉被,我们怕他受冷,连忙盖好。他一刻又推开,看护没法子,大约告诉他心脏十分贫弱,不可乱动,他往后就不大推开了。

五时,喘息看来似乎轻减,然而看护妇不等到六时就又给他注射,心想情形必不大好。同时她叫我托人请医生,那时内山先生的店员终夜在客室守候,(内山先生和他的店员,这回是全体动员,营救鲁迅先生的急病的。)我匆匆嘱托他,建人先生也到楼上,看见他已头稍朝内,呼吸轻微了。连打了几针也不见好转。

他们要我呼唤他,我千呼百唤也不见他应一声。天是那么黑暗,黎明之前的乌黑呀,把他卷走了。黑暗是那么大的力量,连战斗了几十年的他也抵抗不住。医生说: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没有危险了。他就来不及等待到明天,那光明的白昼呀。而黑夜,那可诅咒的黑夜,我现在天天睁着眼睛瞪它,我将诅咒它直到我的末日来临。十一月五日,记于先生死后的二星期又四天。

(1936年11月15日《作家》第2卷第2期)

我　　怕

每当夜里,我就不敢走到我们昔日的显室里去。即因事要走进去,也急急地把事情办了走出来。

我是疑心有幽灵么?胆子小么?一直从前,我有一个好朋友死去,我就热烈地希望有幽灵,可以和生前一样来往。

然而现在,我当夜里,就不敢走进我们昔日的卧室里去。

我怕那明晃晃的灯光,把每一个角度的印象都浮显出来。

靠门的方桌子,那桌布上面的许多书,每一本,每一堆,每一叠,都经过他的手摩挲。大的书应该怎样搁,小的书应该怎样放,他都有一定的处置。书堆上还有那一匣散开的线装书,中间夹了许多值得注意的签条,我怕看它,我没有正视它的勇气。

书堆下面,拿掉了桌布,那旧式的红漆木桌子,是他生病前特地从别的地方搬来的。为的好方便他,省些力气,在房间里取点炉火温暖,吃起饭来舒服些。这里也曾招待了不少次朋友同吃。我怕看见这桌子,想起了一切的一切。我是多么脆弱呀!唉,没有本领的人。

那衣橱,仍旧挂着那最后出门的一件破旧黑哔叽的袍子。那我们二人挂衣服的橱柜呀,我不晓得为什么觉得也空空洞洞,好似我的心头一样!安放他夜饭后时常喜欢吃些糖果点心的那衣橱的另一角呀!我怕看到它。它会招引我他要东西吃时的神气。他叫我"忘记我。"这叫我如何忘记起?难道这些经过就真是烟云一般消散,捉也捉不住!

哭是弱者的行径,是他不愿意看的,然而写到这里我禁制不住了……

尤其是那藤躺椅。破了的椅子,我私心打算等搬了家(如果他不死,我们是预备在十月廿五以前搬家的)时偷偷地买一张西式棉软的来。已经买来了,多花些钱他也不再响了。这计划我没有能够实现。直到现在作为他花费了大部光阴的休息所在,还是这破藤椅子。岂真是没福消受比较舒适的物质生活呢?还是我的错失呢?我没有法子再去问他,这疑问将埋葬在我的心坎里,直至与我生而俱去。

藤躺椅左方的镜台,那安放他新收到的书报杂志的一角,是准备随手取阅的方便的。也安放他最后服用的药品食物。还有他喜欢的《夏娃木刻图》,和苏俄木刻展览会闭幕后苏俄大使送的那一张木刻女像。这张像,本来是他选购的,后来作为赠品托史沫特莱女士带来的时候,史女士曾问他为什么选这一张?他说:"这一张是代表一种新的,以前所没有过的女性姿态,同时刻者的刀触,全黑与全白,也是大胆的独创。"

右方,靠在藤躺椅可以鉴赏着的一缸"苏州鱼",是夏天病重的辰光,内山先生特地送来的,共十尾。在病中,看看那鱼的活泼姿态,给与他不少的欢喜。那缸,为了对于鱼的爱重,——对于送鱼的那朋友的好意的爱重——他特地从远地方亲自购买捧回来的。那晶莹的鱼缸呀!我见着它,想到和他一同铺沙,灌水,安放水草,再把鱼慢慢放下去。他顾虑到缸面水苔铺密了,致妨碍了鱼的呼吸空气,就时常亲手把它去掉。现在鱼的呼吸好好的,还是那么活泼泼游泳。而那朝夕亲爱它的人,那么爱护它的,倒停止了呼吸……鱼假使也有灵魂,恐怕它的泪要和缸里的水一样深罢。然而我,既不是鱼,也没有停止了呼吸。我走入房中,无名的空虚袭击我,我只觉得一切和我都生疏了。这不是我常日境遇,这情景我不熟识!我那房中是要有他存在的。他却去了……这房间我滞留不住。

昨夜(六日)我做了一个梦:他要我做杏仁糕给他吃。又特别嘱咐我:杏仁粉可到东洋店里去买,——其实东洋店没有这粉的——我答应了。并且我也想到,光是杏仁粉是做不来糕的,要添加米粉,糖要精致,还可添些鸡蛋,牛奶。我很高兴,因为他平时不大肯想出些什么,要我做给他吃的。我正要着手做,可恶的另一世界把我唤醒。我受到实现计划被打破时的痛苦。假如是十九世纪的头脑,我还可以勉强做出糕

点来，供在灵前，希望他的“魂兮归来”，享受一切。然而我明明看着他没有了知觉，我不相信有天堂。所以这一点点的安慰也使我做不到！没法填补的缺憾呀！

还是回到现实去吧。那书桌，他到上海以来消磨了十年光阴的书桌；桌上那未完成的稿子，那日用的文具，和每天不离的香烟用具，茶杯之类，都摆在眼前了，一堆堆的书札，什物，哪一件不是经过他的手择呢。那个办公用的桌灯，是一个前进的老朋友，节衣缩食特地买好送来的。说是不伤害眼力，便于夜里写作，尤其预约他能在这亮光之下，好好地写出一本东西来。而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当桌上的灯亮起来时，使我想起日常他的生活的大部分所在。夜里，周遭被黑暗所吞噬，不过偶然一两声狗吠或叫卖的声音，孩子却睡熟了。这时候，一灯在前，他，据案写作；我则旁坐阅读书报或做手工。倦了，大家放下工作，饮些茶，谈点天，或者吃些零食。彼此欣然，觉得是一天中的黄金时代，不胜满足了。有时他正忙于工作或翻译，那么，一桌子都被他铺满了书，就连我放一些东西的地位都没有了。嗜好的茶也不大记得吃了，即使倒出在杯子里，放在旁边也给冷掉了。也不晓得倦，更不引起闲吃的心情了。左手拿着烟，右手执了笔，聚精会神地工作，其紧张程度是可怕的，不等到相当机会是不肯歇手的。所以，我以为消耗他的生命最厉害的就在这种辰光。然而，一切作家的生命，不都是这样地耗掉了的吗？

有时，夜饭过后，并不忙着工作，我们就欢喜不开电灯，在那里休息，尤其在夏季，差不多天天如此。窗外的路灯相隔不远，映射到室里来的光度颇够探视一切，在这微明之下，另有一番风趣。也许就是他所称道的“惯于长夜度春时”罢。是的，他时常不做什么的时候是高兴让那电灯熄掉的，遇到月夜，那月光和室外的灯光交映着来临，他，就时常欢喜说一句：“今天月亮真好呀。”他的称赞月亮，似乎在厦门写文章自比于黑夜之后。但是，以后的月亮，只能跑到他墓前，发出凄清的寒光，却没有法子和他见面了！

（1937年1月1日《热风》1卷1期）

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和宋庆龄先生的来信

鲁迅先生于去年三月间气喘患病，之后并没有多大休养，仍旧继续工作。除最主要的翻译《死魂灵》第二部之外，就在三月十日，为了白莽的《孩儿塔》有人写信来索序，也“便力疾写了一点短文”。

自后仍然支撑住那骨瘦如柴的身体，照样写作。那大众所熟知的《写于深夜里》，《三月的租界》，《“出关”的“关”》，都是四月里写的。

到了五月的前半月，还是在那里翻译《死魂灵》第二部，不过已经极度表现出支持不下去的样子了。我劝他休息，找医生看，同时好几位国外友人，亲自带了鲜花来看他，又替宋庆龄先生带来茶叶，糖食多种，代致探候之意。这时先生自己行走食息，还可敷衍，终于表面领受了许多热情友好的盛意，而实际仍不肯毅然舍脱一切而易地休养，仍贯彻其一年前拒绝那些爱护他的友人，劝他往南欧的意见。他说：环境瞬息万变，他不应独自远行，还应该留在国内做工，病也可就地医治的。

到五月半，实在支持不下了，才去看医生。那时的日记，就是我抄在上面的了[①]。

从五月十八日以后，已经病状并不轻减，看热度可知。但日记中生活仍不改常态，且急于排好《述林》[②]，把样本整理好，仍须亲自送往内山先生处托其寄东京付印，自然我也请求过代劳，但是他说：“还有许多细节须要面谈的。”而径自力疾去接洽了。他对于《述林》，不辞劳苦的抄，

---

① 即 1936 年 5 月 15 日迄逝世前的日记。此处从略。

② 即《海上述林》。

排,编,校,设计务求其精。待有成时,很宽怀地说:“这一本书,中国书没有像这样的讲究的出过,虽则是纪念‘何苦’——瞿氏别名——其实也是纪念我。”我觉得这句话总似乎不大悦耳,虽然我并不迷信什么征兆之类,但是我终于表示了一句:“为什么?”大约我说话的神气不大宁静之故吧,他立刻解释地说:“一面给逝者纪念,同时也纪念我的许多精神用在这里。”

我们再看他病更深时继续的日记——其中所说的“注射”,乃是用“荷尔蒙”一类的东西,每天注射的。但是人倒更难看了,成天靠着藤躺椅,不言不食,随便什么东西,勉强呷一两口就不要了,这就是所谓“无欲望状态”的时期罢。铁青的肉色,一动也不愿意动,看了真叫人难受。二十九那天,须藤先生来给他注射强心针时,其情状更不佳,无论牛奶,橘子水等通通不要食,真是危急万状的样子,但他仍然每天支持住不断他的日记。

说也奇怪,自从强心剂一针之后,有了转机了,食东西也有些少味道了。然而接近些的朋友,总不大放心,大家互商之后,由史沫特黎女士请了一位医生来,医生先诊断说已经无可设法,后来经史女士再三恳商,才说最好赶紧入医院,医三个星期,然后离开上海养病一年,什么也不做。当时史女士即请先生决断一下,但是他说:“现在已好些了。”终于不相信自己病状危急,答应考虑之后再回覆离沪及入医院事。

六月开头的几天,较之上月末五六天算是稍为好转些了,但是周围的朋友陆续有信来问病。其中更感谢宋庆龄先生的好意,扶病写信来探问,并以自己为例,劝其早日入院医治,“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我现在把宋先生的信抄录出来①,以示这位具有伟大的同情,处处为中国,为革命爱惜人才的宋先生的恳挚。

宋先生那么恳切的一封信,同样不能变动他的心,他觉得若果“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就更不应该自己轻易舍去。另外的一个致命伤,就是他向来不晓得休息和娱乐,一提起医院的静静躺倒,不言不动,不看书,不思想,不写作,凡这些,他都是不愿意的。这样坚强的意志的人,肺病实在不适宜于他。此外较小的原因,自然也在打算养病费的巨

① 附于本文后。

大而迟疑，虽然我再三解说了，有生命才能发展生活，然而他的意志总是那么坚定，许多朋友都觉得想尽方法，终于没奈何，仍由他在寓所医病。五日以后，即连日记也不能继续了。感谢一些朋友，指示我要镇静，否则不能支持自己的，所以后来我一直留心把自己坚强起来，尽我应尽的职务，在先生面前能够克制不引起伤感。

七月一日起，先生果然按日写日记了，直至十月十八日为止。而且七月就开始写了一篇《捷克译本》[①]的序。自此继续写作，九月成绩超于八月，十月亦有好几篇，虽然文章的命题和内容有些可怕，如《死》、《女吊》，但横溢奔放，仍不减平素泼辣之气，孰料转瞬之间，一病不起！值兹一周，回忆昔者，如在目前，对于中国，革命需要的先生，舍我们而长逝了，不过遗教仍存，先生有时自己也想到，说："其实我也无须多说了，我的三十年工作，和三十多本写作文字，足够说明一切了。"我们要看见活的先生吗？请从他的著作中去体认，去实行罢。

(1937年10月上海《宇宙风》)

促鲁迅先生就医信

周同志：

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十分耽心你的病状！我恨不能立刻来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今尚未复原，仍不能够起床行走，迫得写这封信给你。

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 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 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个病人，往往是不自知自己的病状的，当我得盲肠炎的时候，因我厌恶入病院，竟拖延了数月之久，直至不能不割治之时，才迫着入院了，然而，这已是很危险的时期，而且因

① 现改题作《〈呐喊〉捷克译本序言》。

此,还多住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假如我是早进去了,两星期便可以痊愈出院的。因此,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耽忧着,感觉着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入医院医治。假如你是怕在院内得不着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断的供给你外面的消息等等……

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 祝你

痊安

宋庆龄

六月五日

鲁迅先生大病时的重要意见

在此全面抗战中我们来纪念鲁迅先生的周年，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鲁迅先生，并非如一般文人的，做些咿咿唔唔，不痛不痒的文章了事。对于批评社会，他总像海洋中的灯塔，做探照，指示途程的工作。在去年六月间大病的时候，还关心到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存问题，因而发表了几篇重要文辞，对于抗日统一战线上有所论列。这宝贵的意见，在这一年间，我们全国人士，已经遵循前进，大家正手牵着手，结成一条"赤练蛇"般的长线，以统一的步伐，朝向敌人迈进，誓必把它们盘绞噬灭而后已了。

对于"托派"，因为侵略者，惟以达到侵略为目的，他们无不利用的。所以，战争发生以来，日本当局对托派的优容，每使人们惊讶，其实，去年六月九日，先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里面就说："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这里先生早已明明看到，说破了此刻的现实了。在中国，舍抗战无以图存，现时各党各派联合一致，统一御侮之下，我们希望中国的"托派"，翻然醒悟，不要堕入日本侵略者的毒计中。

对于民众，先生《病中答访者问》里面谈到："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

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惟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现时还没有去满洲和华北的便利,不过这次上海战事,确切地证实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大有关系了。战区的同胞,有整批屠杀,或只身逃出而一切的不动产都给侵略的强贼搬运净尽,烧炸灭迹了。其余各水陆上同胞,任意被轰击残杀,没有一处可以安枕,我们已经到了没有了一切,生命不晓得甚么时候被突击,财产不晓得甚么时候被消灭,我们若不把强贼打退,绝对没有安全保障的可能。我们"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这总流里去"吧。

对于文艺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有几句很重要的"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不错,现在我们救亡协会等团体,已经在短期间有坚强的统一了;妇女界也萃聚了二十余团体和大部分家庭妇女,成为巩固的慰劳抗战将士会;而我们政府,也在这一年间,真诚团结起来,一切内争早已消灭了,政治犯释放了,朱德将军和各地重要首领,民众领袖,在统一的政府领导之下,实行艰苦的抗战工作,而且平型关大捷,奠下了收复北方的基础。谁还敢说我们是"一盘散沙"?我们是一心一德的逐驱侵略者的全面抗战。

去年,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哭先生的辞句:"我们已经从你那里懂得了'集体的力',我们已经铁般地组织起来了!我们将大家一齐与敌搏斗,我们再不怕屠夫的凶险,我们再不怕虎狼的残暴;我们将把你那'越战越硬'的灵魂收做遗产。"此刻,这誓辞在每个人身上实践了。

先生,我们损失了你这伟大的导师一年了,诚然是可悲痛的。不过,大家目前正在领受着你的遗产,在做你所希望着的工作,而且将要很快就完成了,或者这似乎可以告慰一下的罢。

(1937年10月18日《文摘战时旬刊》第3期)

《鲁迅全集》编校后记

鲁迅先生禀赋超卓，强记敏感，热爱群伦，而遇多拂逆。毕生心血，寄诸楮墨，喜怒哀乐，达于文辞，率直淋漓，不假掩饰，渊博纯正，光芒四射，而一以振励民族精神为依归。决不同于屈原之徒发牢骚，司马迁之止于孤愤。先生著译宏博，仅就著述而言，达二十九种。先生遗稿中，即有手定的著述目录二纸：

其　一

人海杂言：

1.《坟》300《野草》100《呐喊》250　　260,000

2.《彷徨》250《故事新编》130《朝花夕拾》140《热风》120　　255,000

3.《华盖集》190《华盖集续编》263《而已集》215　　250,000

荆天丛草：

4.《三闲集》210《二心集》304《南腔北调集》251　　280,000

5.《伪自由书》218《准风月谈》265《集外集》160　　240,000

6.《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二集》

说林偶得：

7.《中国小说史略》372《古小说钩沉》上

8.《古小说钩沉》下

9.《唐宋传奇集》400《小说旧闻钞》160

230,000

10.《两地书》

其 二

一、《坟》300《呐喊》250

二、《彷徨》250《野草》100《朝花夕拾》140《故事新编》130

三、《热风》120《华盖集》190《华盖集续编》260

四、《而已集》215《三闲集》210《二心集》304

五、《南腔北调集》250《伪自由书》218《准风月谈》265

六、《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

七、《两地书》《集外集》《集外集拾遗》

八、《中国小说史略》400《小说旧闻钞》160

九、《古小说钩沉》

十、《起信三书》《唐宋传奇集》

以上每书名下数字,是表书的页数;第一书目每行下数字,则表字数。前一书目中,还没有把《集外集拾遗》预算成书;《且介亭杂文》的书名,亦似未定。后一书目,大约是一九三五年以后修正的,就比较完备了。

记得先生大病前,曾经说到过:他自从一九〇六年二十六岁中止学医而在东京从事文艺起,迄今刚刚三十年。只是著述方面,已有二百五十余万言,拟将截至最近的辑成十大本,作一记念,名曰《三十年集》。当时出版界闻讯,不胜欣忭,纷请发行。使先生不病且死,必能亲自整理,力臻美善。无奈愿与事违,先生竟病且死,死后行将二年,始将全集印行,捧诵遗著,弥念往昔,不胜痛悼。

先生每出一书,编校皆极谨严;广平襄助左右,多承指导,凡有疑难请益,片言立决。现在全集出版,彷徨疑似,指引无从。所有愆误,追悔莫及。所幸文化界同人,热心协办,卒底于成。谨就经过,略陈一二。

溯自先生逝后,举世哀悼。舆情所趋,对于全集出版,几成一致要求。函札纷至,荷蒙启迪,举其大要,则一望早日出版;二希收集完备;三冀售价低廉。窃思先生著述,其已印行者,整理较易。其未印行如

《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汉碑帖》,《汉画像》等,非专家竟难措手,整理最为困难。幸蒙先生老友许寿裳、画室两先生对纪念逝者,援助家属,向不辞劳苦。关于全集进行,亦不断惠函指示,始终给予许多宝贵帮助。一九三七年春,台静农先生亲临凭吊,承于全集,粗加整理。并约同许寿裳先生商请蔡元培、马裕藻、沈兼士、茅盾、周作人诸先生同意,任全集编辑委员。是时广平正拟在沪先行整理,俟得蔡元培、茅盾两先生指示之后,乘去夏暑假之便,赴平就教于马、许、沈、周诸先生暨台静农、魏建功、曹靖华、李霁野诸君子,冀集群思,使臻完善,然后携回沪上,设法印行。不料"七七"芦沟桥事起,一切计划,俱告停顿。去秋先生周年逝世纪念会席上,沪上文化界又复以全集出版事相督促。良以敌人亡我,首及文化。开战以来,国内文化机关,图籍古物,被毁灭者,不知凡几。出版先生全集,保卫祖国文化,实为急不容缓之事。然庐墓为墟,救死不暇;百业凋敝,谋生日拙;虽有大心,终无善策。而先生以一生心血,从事于民族解放的业绩,又岂忍其久久搁置,失所楷模。语云:纸张寿于金石。自维无力为此,每一念及,怒焉心伤。幸胡愈之先生本其一向从事文化工作之热忱,积极计划全集出版事宜,经几许困难,粗具规模。且拟以其手创之复社,担当斯责;广平亦即欣然承诺。复社诸君子,尽海上知名之士,董其事者,为胡愈之、张宗麟、黄幼雄、胡仲持、郑振铎、王任叔诸先生。约定以编辑责任,归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复社则主持出版,代理发行。惟纪念委员会同人,散处四方;集中编辑,势所难能。虽函件往还,指示实多,而实际责任,不得不集于少数人身上。所幸复社同人,措施得宜。工作皆有秩序,进行亦极顺利。六百余万言之全集,竟得于三个月中短期完成,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其各部工作概况,大略如次:

1.编辑部工作:分集稿,抄写,编辑,校对各项:

a.集稿　先生著译,已有专书行世者固多,但散佚者,亦复不少。其已印成书而久经绝版者,有《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域外小说集》,《艺术论》两种,《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文艺与批评》,《文艺政策》,《会稽郡故书杂集》等。《月界旅行》承杨霁云先生见借。《地底旅行》亦由杨先生从《浙江潮》第十期上抄录见寄,惟仅开首二章;阿英先生闻全集付排,即从其藏书中觅得全书见借,使成完璧。《域外小说集》,原有

初版上集一册，且已封面烂坏，可资编印者，仅赖中华新出版本。幸蒯斯曛先生应邀参加编校事宜，知家藏有《域外小说集》下册初版本，即以见赠。封面完好如初，作淡蓝色，上署《域外小说集》篆字，“会稽周氏兄弟纂译”等字。毛边精装。虽穿线之铁丝已坏，而书式仍极美观。得此一书，其于校对时，启迪实多。《艺术论》两种及《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文艺与批评》，《文艺政策》等书，则早由周文、胡愈之两先生辛苦搜得。《会稽郡故书杂集》，本已雕板印行，但手写本则存作人先生处，托魏建功先生借得，亲从北平运出，保存于昆明。此次全集出版，魏先生将此航寄至港，托茅盾先生请人带沪。全集编目之初，即将此书列入。然犹不知书在何处。辗转电询，凡阅一月有余，而犹无消息，心殊惴惴。迨一见稿本，如获至宝，欣喜之情，无言可喻。魏先生来书有云：“先师手泽，得安抵尊处，私怀释然。自去年十一月装箱交运，浮沉港上凡五月，几至散失，于心惴惴也，今竟得如愿刻入全集，幸甚幸甚。”即此可知一书之成，殊非易易。其他未经付印，由先生编定辑录者，有《古小说钩沉》，《嵇康集》，《山民牧唱》及《集外集拾遗》。由广平辑录散佚译文而成书者有《译丛补》。《古小说钩沉》，《嵇康集》，《山民牧唱》写本完整，只要重行抄写付印即可。《集外集拾遗》一部分由先生亲自编定，一部分有广平续编。其中许多序文后记，借助于王冶秋先生所编之《鲁迅序跋文集》的稿本者不少，《城与年插图本小引》，则为先生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日扶病所记，原拟将此书付印，“以供读者的赏鉴，以尽自己的责任，以作我们的尼古拉·亚历克舍夫君的纪念”的。但先生的计划没有实现而“亡故”了。我们的“悲哀”的“纪念”，要超过先生之于尼古拉·亚历克舍夫！本已计划个大概，拟印成与《引玉集》同样精美，不料也为“八一三”炮火所粉碎，说来真不胜悲愤。现在先将《小引》收在《集外集拾遗》中，以资提示，使他日得完成先生遗志。至《译丛补》一书，谢澹如先生帮助最多。谢先生曾将先生全部翻译佚文，分类抄成目录，用功极勤，全集集稿时并见借《前哨》，《萌芽》，《十字街头》，《在沙漠上》，《奇剑及其他》，《朝花周刊》等书，然搜录之后，与谢先生所编译文目录对照，尚缺不少。谢先生于先生译文，本皆保存，徒因家在南京，旧藏皆毁于火，无法补足。幸文化界同人，闻讯之下，尽皆以各书见借。先后给予不少便利者，有柳亚子、阿英、徐川、唐弢、席涤尘、蒯斯曛诸先生。此中

因缘已于《〈译丛补〉编后记》中稍及一二，这里不再详说。

最后关于集稿方面，犹须提及者，即为周建人先生将《药用植物》亲由日文校正一通，且把原书见赠，使制图更加清晰。又由郑振铎先生从美术专门学校，借得《近代美术史潮论》原书制版。因原书日本业已绝版，无从购得。而北新中译本，插图类多模糊，无法翻印。得此一书制版，使全集更加灿烂；中心感激，已非笔墨所能形容。

b.抄写　此项工作，较为细碎。因原书或为借来孤本，或属先生手写，俱不宜于污染。《集外集拾遗》，《月界旅行》，《山民牧唱》等书，早由王贤桢先生抄录。《古小说钩沉》原分订十册，由王贤桢、单亚庐、周玉兰、吴观周、王厂青诸先生分抄。《嵇康集》则为先生老友邵文镕先生之长女公子景渊所抄。《地底旅行》全部和《译丛补》的大部分亦为邵先生之次女公子景濂、三女公子景洛、四女公子景渭等协力抄成。其关于辑录书籍的标点方面，同人中有拟不采用者，有主张应加标点者，兹为统一书例并使初学易解起见，特商请冯都良先生标点《嵇康集》及《古小说钩沉》。郑振铎、吴文祺两先生标点《会稽郡故书杂集》。冯、郑、吴三先生于国学极有研究，想可稍免于错误。

c.编辑　此项工作最为繁难，既须顾及作者年代，又须适合每册字数。过厚则装订为难；过薄则书式不一。几经煞费苦心，使成今日的排次，但亦不甚惬意。例如《药用植物》一书，翻译之时间较后，今则因十八卷字数太多，移至十四卷。第八、第九、第十各卷，著作年代较早，以其性质类似，则参照先生《三十年集》编排之初意，列于著述之部之最后。此一工作，以郑振铎、王任叔两先生用力为多。至字数方面原计共约五百万字，不意陆续搜寻，《集外集拾遗》超过先生预定约三分之二。而《地底旅行》亦补成全书。《竖琴》，《一天的工作》，原定只收先生翻译部分；及动手编排时，因序文与各篇皆互有关联，《一天的工作》一篇本非先生所翻译，但既以篇名作书名，删去更不相宜。继思两书皆费先生无数心血，亲手编定，为免割裂，自应一并附入。至《译丛补》，样本豫告并未列入。盖以为未能搜集如此齐备，附于别一书后即可。今承文化界同人协助，使卓然得成巨帙。而全集字数遂超过六百万以上。

最后编辑方面，尚有一事足述。先生文章其单行问世者，每有重出。如蒲氏《艺术论》序文，既列原书，又收于《二心集》中。编辑时遇有

此种困难，则将此文保存于原书中，而另一书之目录上列入篇名，下注“文略见某某卷本书”字样，以资识别。此虽创例，但为节省篇幅，免却重出，不得不尔。

d.校对　此项工作，亦极困难。先生著译，发行者不止一家，且以时间先后，格式颇不一律。既出全集，最好能求统一。故于事先由负出版全责之黄幼雄先生，拟就“鲁迅全集排式”如下：

(一)每面十三行，每行三十五字。

(二)篇名上角，页码下角。

(三)题目占五行，连著者具名占六行。

(四)题目三号仿宋，空铅分开，上空五格。

(五)题目下具名四号长仿宋。

(六)题目下名字，下空三格，名字二字，中空一格。名字下空三格。

(七)译者具名，四号长仿宋。

(八)节目占二行，四号仿宋。

(九)节目上空六格。

(十)双面装：人名书名线排左旁，圈点排右旁。

(十一)人名，地名____(在左方)。

(十二)书名用~~~~。

(十三)每段起行空二格。

(十四)引用号：用双钩股，单双并用时，外双内单。

(十五)引用文，题目空七格。

(十六)引用文每段起行空五格，第二行以后空四格。

(十七)单字成行时，应将上行移下一字，上行加空铅分开。

(十八)批注排面末，细线隔开，上下空五格，用六号字。

(十九)题目上下不排篇名页码。

(二十)每篇文末月日用括弧，下空三格，用小五号字。

(二十一)另页另面，另加批注。

但在工作进行之间，校对同人认为尚应修订或增加者，有如下几点：

题目，右空二行半，左空一行半。

节目数字用四号方头，数字用旧式，上空八格，原用罗马字者仍其旧。

题记序文下附注年月日移上，上空二格，用五号字。

文下年月日改用六号，下空二格，加圈加括弧。

每篇另面排。

集名独占一页，不加框。

题下引用文用新五号，不用仿宋。

目录下不排页码目次，但页数仍算入。

序文，题记以下文字另页起排。

同时于用字方面，同人为存真起见，凡为先生爱用字眼，皆予以保存。如：蝴蝶作胡蝶；模糊作模胡；彷彿，有时作仿彿，仿佛，或髣髴；这裏，那裏的裏一律作里；枪作铊；锈作銹；於作于(引用他人文字时仍作於)；鬪作鬭等。字，为求统一，而改正者：脚却作脚卻；这才作这纔，伶俐作伶俐。但《域外小说集》等书，以其为先生早年译作，亦未必尽如前例，即如于字仍作於字。其中有许多古字，新出版本，虽予改去，兹为保存彼时先生习好，一仍其旧。又有《怀旧》一篇，为先生第一篇创作，圈点亦与全书不同。先生编《海上述林》时曾云："对于文辞，只改正了几个显然的笔误，和补上若干脱字，……以存其真。"同人为体察先生之本意，故有此举。惟因此格式用字，颇有不统一之处。读者只能从不统一处见统一了。

至于工作之分配，约略如下。最初由朱础成先生负责校对三次，然后再由我们校对二次，改正后，再看清样一次。我们的初校者，为林珏、金性尧、王厂青、周玉兰诸先生，二校者又担任校对为唐弢、柯灵、吴观周诸先生和广平。吴观周先生对担任校对之收发分配接洽事宜，几等于我们校对部主任。最后一次清样，则由王任叔、蒯斯曛两先生担任。校对时，大都极为谨慎，一遇疑似之处，其有手写本或初版本可查者，则必一一查出改正。力求没有错误，但因时间匆促，错误一定难免，深望读者予以曲谅。

2.出版部

此项工作为黄幼雄、胡仲持两先生所主持。书本的式样，纸张的良窳，制图的设计，印刷成本的计算，俱惟两先生之赖。两先生学识丰富，经验宏博，故能处理得有条不紊。同时承揽排字印刷工作者，一为大丰制版所，一为作者出版事务所。前者主持人为徐寿生先生，后者主持人为朱础成先生，皆不惜减低成本，为文化界服务。朱先生复精制象牙书签千枚，随书附送，用意更可感佩。至制图方面，为科学照相制版公司

独立负责。较之原单行本，更为精美。

3.发行部

复社工作，总揽其成者，为胡愈之、张宗麟两先生。在全集出版时，张先生全部精力，几尽放在发行方面。吴子良、施从祥两先生又复不辞劳瘁，热心奔走，积极推销全集。使人感佩无地。推销方法，分社友与非社友两种。凡愿为复社会员，得由本埠各社会团体介绍，廉价定购。其用意无非使鲁迅精神得以深入购买力较弱之各阶层。非会员则由通易信托公司，远东图书杂志公司，新新公司等代为预约。结果出乎意料之外，出版千五百部几大部分为本埠读者定购净尽。至外埠推销情形，虽不甚详，但华南方面得茅盾、巴金、王纪元等先生热心号召，成绩亦斐然可观。汉口方面得邵力子、沈钧儒诸先生特予介绍，定购亦极踊跃。国外方面，美国由陶行知先生推动，购者踊跃，南洋方面，索书巨数，致成供不应求之势，则王纪元等先生之力也。此中一切擘画策动，则全赖胡愈之先生。

又纪念委员会编印全集的意义，曾在启事中说明："目的在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以唤醒国魂，争取光明。所以定价力求低廉，只够作纸张印费。但为纪念鲁迅先生不朽功业起见，特另印纪念本，以备各界人士珍藏。"所以本会主席蔡元培先生，副主席宋庆龄先生，曾通函海内外人士，募集纪念本，原函如下：

敬启者鲁迅先生为一代文宗毕生著述承清季朴之绪余奠现代文坛之础石此次敝会同人特为编印全集欲以唤醒国魂砥励士气谅为台端所赞许惟因全集篇幅浩繁印刷费用甚巨端赖各界协力襄助以底于成除普通刊本廉价发行预约外另印精制纪念本一种以备各界人士定购每部收价国币一百元将来除印刷成本外如有溢利一概拨充鲁迅先生纪念基金素仰台端爱护文化兹特附呈鲁迅全集样本一册倘荷赐购并介绍友人定购则不仅敝会之幸而已顺颂

著祺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主　席　蔡元培

副主席　宋庆龄

蔡先生对全集出版方面，曾再三赐予援助，计划久远，费去不少精神。且曾向商务印书馆设法订立契约；只以烽火弥漫，商业停顿，欲即速进行，势有不可；而全集出版，众望殊殷，事不宜迟。此中隐衷，幸蒙商务负责人王云五先生同情谅解，来函允先出版，不胜感激。至于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内传颂，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知所崇尚，鲁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岂徒私人的感幸。

总计此次编印全集经过，个人虽承友朋指导，有若干预备；但实由复社同人暨各界人士合力而成。历时四月，动员百数十学者文人以及工友，为全集而挥笔，排校；以齐赴文化保卫的目的，我个人的感谢，实无法形容。然此亦可见中国已团结如铁石，任何外力，不能侵略了。

鲁迅先生昔曾说过："其实我也不必多说了，我所要说的，都在几十本著作里面了。"他不自己承认有天才，又说："那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他实在是不断学习，不断努力。当他抱病时，朋友劝他休息。他就说："什么是休息，我是不懂得的，怎样娱乐，我也全不会的。"但还有人说他"有闲"！现在全集出版，就作一次总答复吧！一九三六年夏间，当先生病重时，适世界大文豪高尔基逝世，以高氏毕生的文化功绩，和对革命的贡献，人们是应该痛惜的，而且甚至不禁叹息说："为什么鲁迅不死，死了高尔基？"这为什么，是没有人能解答的。但鲁迅先生自知很清楚，他说："我那里比得上高尔基？"如果先生一死，的确可以替代高尔基的话，那真是"如可赎兮，人百其身！"鲁迅先生是不会吝于一死的。但奇怪的是，他真个死了之后，却又有不少人说："中国的高尔基死了。……他的死，在中国，比苏联损失一个高尔基还要大。"

现在全集终于出版了，我们仿佛喘了口气，放下一重心事；但一想到全集达到读者手中时，我们的责任，也更重了，会不会因我们工作之粗率，妨害先生精神的传达呢？我们惭愧着，惴惴着，愿受一切爱好鲁迅著作的人士的指教和裁判。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写于芦沟桥纪念周年

（1938年8月5日《上海妇女》1卷8期）

鲁迅和青年们

一 我的升学

让我站在作为一个青年的立场,——从这一角度,来观测鲁迅先生,是这样的:

"五四"潮流的音波,从北京延展开去,青年的思想一变,求知欲刺激每一个弱小的灵魂。那时的我,虽则初级师范已经毕业,且已担任了教职,而仍多方设法达到升学的野心。可是经济条件不容许我进那较近理想的学校,在几度考量这下,我投入了女高师。

校长是许寿裳先生,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是同乡而又是知交,这给了我校以许多便利。北大每有学术讲演,总时常容许我校同学参加听讲。记得那时正宣传着爱因斯坦来华讲演相对论,自己虽则不是理科生,但觉得多听些总有好处。也就常常跑去听讲。这兄妹一样的学校,虽然小妹妹比起大哥哥来,实在太过弱小了,然而文科的教师,因许校长热心的计画,我那班里,几乎全是北大的教授和讲师。校舍虽不同,所受的教课,讲义却是一样的。尤其马裕藻、周树人、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诸先生,都是为学生们所景仰不置的。女师大有那么多名教授,这是使同学们非常欣慰的事。

二 许多导师

那时是一九二三年,开学之始,三沈之中,惟士远先生未来授课,但

人后也终于来了。鲁迅先生，则是一开学即给我们以不少教益。有一位马先生，因为并非研究文学，自然无从领教。而幼渔——即裕藻——先生，不但于授课之际“诲人不倦”，且于课余纵论一切，亲切、诚恳、坦率，真不似严师，转令人有如面慈父之感。

三 鲁迅先生

当鲁迅先生来上课的瞬间，人们震于他的声名，每个学生都怀着研究这新先生的一种好奇心。在钟声还没收住余音，同学照往常积习还没就案坐定之际，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一向以为这句话有点夸大，看到了这，也就恍然大悟了。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的许多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掩盖不住了。一句话说完：一团的黑。那补钉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别熠耀人眼。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也许有人这么想。讲授功课，在迅速地进行。当那笑声还没有停止的一刹那，人们不知为什么全都肃然了。没有一个人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做。钟声刚止，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许久，同学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地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一致爱护的鲁迅先生，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也曾经有过一次辞职的事，大家一个也不缺的，挤到教务处，包围他，使得他团团地转，满都是人的城墙，肉身做的堡垒。这城堡不是预备做来攻击他，正相反，是卫护他的铁壁铜墙。接受了这一批青年热诚的先生，终于重又执掌教务。

四 力的浸透

一天天的薰陶熔冶，可亲可敬的灌溉着每一株小草，许多青年想尽

千方百计去接近他，希望从他那里多少得点杨枝雨露。他不自私！正义感蕴蓄在他的心中；扶助被压迫者，揭发并剥露那些卑鄙的虫豸们，正是他的任务。这一种信念的力量浸透在每一个接近过他的青年的纯朴胸怀，而我也就是其中的一个。

五　和我们站在一条战线里

环境的黑暗，教育界一部分人的卑污，使得青年们终日遑遑，四处寻找出路，如黑暗茫茫的大海中寻求灯塔一般。这终于使我冒昧地向先生通信请教了（参看《两地书》第一集）。积极地正面着人生，希望将来比现在好一点，韧的战斗，随时用质直的方法对付，凡这一切教诲，不但我一个人用得着，也是所有青年们的金玉良言吧。

遏阻民族觉醒，借外力压迫，假手于正人君子和章士钊们而给青年学子以暴力的镇压，这"黑暗的闸门"，先生独力肩住着。而又一面以文字教育那时的青年，指点应走的路，一面自己加入青年群里，集合群力开会反抗，直至黑暗的血手，制造"三一八"的大屠杀，先生于是愤劳成疾，眠食俱废了。

六　革命的爱在大众

先生病时，据他的同乡说：他房里有两把刀，一把就放在床褥下面。他很孝顺他的母亲，如果他的母亲不在，在这可悲愤的环境里，他可能会自杀。但这毕竟是一种传说，在这一时期里，先生还是积极地奋斗着，他一面当好几个学校的教师，一面在教育部当佥事。如果真是老于世故的人，那时候是早已默默无声了，但先生却公正无私地给予教育当局很多批评，这博得了许多青年的信任，来请教他的，自然多起来了。虽则往常不喜出入教师之门的我，这时也因为校务时常到他家里请教。但每次去时，总见他在寓所里仍然极其忙碌。或者给青年看稿子，或者编副刊，校对书籍，他没有一刻让自己好好休息过。有时，我也从旁学习一二，替他校对什么，或者代抄点《坟》之类的材料。可是他总是不大肯叫人替他做事，一切大小琐碎，都愿意自己动手。就是他嗜好的茶，

也不劳人代泡。房间预备好一只痰盂，经常容纳他杯子里的茶滓。他把茶滓倾倒在这里之后，就在书架罐子里取些茶叶，自己再到厨房去倒开水。寂寞的家，孤独凄凉的他，未能禁制心头炽热的烈火，“革命的爱在大众”，我看到先生全心力是寄托在大众身上了。自奉的俭省，衣着食用的简朴，接待客人的坦直，都可看出先生人格的一面。在北京时几乎整天有客人来拜访他。人们总是为了接近他得些正确的指引而来的。而每一个到过他寓所的青年总也觉得欣幸而满足。一次得到指引以后总希望再有同样的幸运，再见一次这样的一位慈蔼博学的指引导师！

七 消 极？

在我呢，看他那寂寞如古寺僧人的生活，听他那看透一切黑暗面但以“希望”来安慰后生的议论，总处处在诱发我关于他那同乡所说的悲观自杀的话，在某一天，我顽皮地搜索书架和床褥，果然发现两把刀。或者正确地说：是两把匕首。我实行“缴械”了，先生笑了笑也就完事。他是不肯拿青年做敌人的。在许久的另一机会里，他对我解释说：“刀是防外来不测的，那里是要自杀。”我把他的同乡的话反问他，先生大笑起来，说：“你真是个傻孩子！”

八 积 极！

不过事实的压迫（参看《华盖集》等），章士钊们的代表黑暗的反动力，正人君子的卑劣诬陷，真使先生痛愤成疾了。不眠不食之外，长时期在纵酒。经医生诊看之后，也开不出好药方，要他先禁烟，禁酒。但细察先生，似乎禁酒还可，禁烟则万万做不到。那时有一位住在他家里的同乡，和我商量一同去劝他，用了整一夜反覆申辩的功夫，总算意思转过来了，答应照医生的话，好好地把病医好。而且对朋友也的确有这表示：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给李秉中先生的信就这样说：“酒也想喝的，可是不能。因为我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为什么呢？说起来或者有些可笑。一，是世上还有几个人希望我活下去。二，是自己还要

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这就是先生那时真实的心境。

九 团体和自我

先生确是时常在各种刊物上发议论的。他除了为《语丝》撰文之外，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语丝》是几位文学负有声名的先生们所创办的，先生在那里以泼剌的姿态，领导着一大批青年，走向与恶势力战斗的路上去，先生曾写了一篇《我和〈语丝〉的始终》，已说明了一个大概，这里无须细说。《国民新报》是代表国民党方面一部分人的意见。那时北方对于国民党是很压迫的。先生认为应予合作，就和几位朋友一同负起编副刊的职务了。那《莽原》杂志呢，本来是《莽原》周刊，为了几位爱好文学的青年的文章不能在副刊尽量发表，所以另外成立一个周刊，也附在《京报》上。其后有几位青年愿意负责独立出版，先生就帮助他们，出点翻译和创作之类的书，名曰未名社。在这一时期，先生因为实行推动文化的工作，和许多青年有交往，有时因为青年的经济窘迫，先生也常常借口是应付稿费由自己拿出钱来，解决他们一些生活。但先生自己是并非充裕的。我们知道他，当一九一九年买了北京公用库八道湾的屋之后，到一九二三年就迁出了。为了安慰母亲，也曾向许寿裳、齐宗颐两位先生各借四百元，买下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一九二五年，我们到先生寓所访谒时，他的客厅里只有一张桌子，客人来了，才临时由女仆从卧室里搬两三张凳来。直至一九二六年离北京向厦门之际，始从厦门大学的薪水中陆续筹还那买屋的借款。

一〇 不因一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人

以一个热情认真的人，每易在虚伪、奸诈百出的现实里碰壁。这真费了先生无数不必要费的力气。先生病了，这犹如兵士在战斗中遇着毒气弹，是猝不及防的。不过先生一面战斗，一面还给北新、未名社计划着出书，一面编副刊，给青年看文稿，并不像消极。就我所见的，就有

一位作家[1] 把他的小说请先生编定，出书之后，销路很好，他立刻成了一位有名作家。于是商人投机心理，向他劝进，不久又把落选的集成一本问世。先生看见了这，摇头叹气说："我的选择很费不少心血，把每一种的代表作都有了，其余那些，实在不能算很成功，应该再修养，不怕删削才会有成就呢！"其实在先生自己，正如告诉人们写作方法中所说的，也是不惜尽量删掉那不大要紧的东西的。其后这一位作家，还出了不少的书。有时也请先生看稿，但是先生总给他搁起来，似乎不敢做第二次的删削了。我记得还有一位作家[2]，先生辛辛苦苦给他选定作品，校字成书之后，那位青年向人说："他把我好的都选掉了，却留下坏的。"以后这位青年有没有把先生选掉的那好的作品出成书，有没有从选掉而出的书获得了更大的声名，我可不大清楚了。还有一位青年[3]，先生也替他选定了一本创作，且逐一地校正了用字。那青年，先生一直爱护着他，看重他，且给他介绍稿子和职业，就是在编良友公司出版的那《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部中也极力夸奖他。而他呢，据说因为先生斥骂了某一位青年[4]，也就像得罪了一切青年似的，使他不满，竟从此和先生绝交了。像这样莫名其妙、去如飘风式的绝交，先生是也无可如何，只好由他去吧！谁知积之日久，"鲁迅爱发脾气"啰，"鲁迅是青年的绊脚石"啰，真像聚蚊成雷，将一切的恶声，都袭向先生而来了。平心而论：先生有分明的是非，一面固爱才若渴，一面也疾恶如仇。在一般人总以常情揆度事理，然先生之所以为先生，岂常情所能概论？先生对于青年，尽有半途分手，或为敌人，或加构陷，但也有始终不二者。而先生有似长江大河，或留或逝，无所容于中，仍以至诚至正之忱，继续接待着一切新来者。或有劝其稍节精力，"不亦可以已乎？"而先生的答覆是："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这是多么坦直的态度。人家总批评他多疑，据我观察所得，由他无故和人闹的总不大有，多是根据许多事实，没有法子容忍，才表示些决绝的态度。他这种不肯随便疑人的

---

① 指许钦文。
② 指高长虹。
③ 指向培良。
④ 指高长虹。

心,这从他有感于人家矮墙上所插的碎玻璃的议论中,可见一斑。他说:“这就好比把一切过路人都当强盗看待了,是很不好的。”

十一　青年的吸铁石来了

一九二六年八月,先生往厦门大学任教职。如果不是和段、章之流大斗,致列于几十位被捕者之林,和另外的原因,大约未必会离开北京的。北京已经住了十五年了,可以静下来研究学问,有好图书馆,这是先生时常所怀念的。政治的压迫,个人生活的出发,驱使着他。尤其是没有半年可以支持的生活费,一旦遇到打击,那是很危险的。我们约好:希望在比较清明的情境之下,分头苦干两年,一方面为人,一方面自己也稍可支持,不至于饿着肚皮战斗,减低了锐气。然而厦门大学的实际,并不如先生去时所想像。一般连伙食也时常需要自己动手,在特别优待的藉口下,几乎处处被人作弄。对学校设施,先生又深深感到难有所作为。幸而他好像是青年的吸铁石,自他到后,厦门大学研究文艺之风盛行起来了,冷清清的大房间里时常有学生的足迹不断来往。就在他离校之际,还引起青年的觉悟,改革学校运动于是发生。虽则不久平息,但是跟着他同往广州的青年,也不在少数。其间有一位姓谢的,是湖南人,以前且曾做过教员,人很活动,文学造诣也相当的深。他到广东不久,就离去了,似乎是回到他的故乡去的,但去后信息杳然,他好像是个做社会运动的人物,先生几乎时常记念着他,且疑心他已被黑暗卷去。这真像一个谜。如今,却须我为他祝福了。如果他还在人间,那么,总应该和我们一同肩起这大时代的艰难的工作吧!另有一位厦大来的。那就是人们曾经谈起过的那位“义子”。从厦门到广州,一直追随在先生左右,在旁人看来,怕没有不当他是先生的忠实信徒的。他很能体谅先生的忙碌。除因事或领取学费等来到先生跟前稍坐一刻,其余总是不大向先生吵扰。他真是那么一个洁身自好的青年呢。

一二　故事的开始

记得我们旅居于上海后不久,一天,大雨连天,由旅馆茶役送来了

一封信。正是那位学生的,他通知他已经到沪,人地生疏,急待照料,先生立刻和他的三弟冒着大雨上旅馆去。那是一家用堂皇名字招徕旅客而又颇不名符其实的旅馆。从船上移至旅馆仅有一些简单行李,可是那旅馆除开了一笔行李费之外,又横七竖八地不知开些什么账目,半天功夫要花二十余元的开销。那学生的经济本不宽裕,先生早已晓得。如果在这种类似敲竹杠的地方多停留下来,这一切费用义不容辞将要由先生张罗。为人也是为己,先生就急忙忙把他们接到景云里的寓所来了。

一三 故事的演进

开了门,先生带来了三位远客,其一是从厦门跟到广东,此刻到上海来的学生,另外还有一男一女,很年轻,都像不满二十岁。据说是兄妹。起先似乎听说那兄妹俩家里很有钱,打算来沪读书。后来又听说那妹妹是那青年的爱人,为逃避家里的父母主婚,跟他一同出走。那妹妹的胞兄呢,则看透家里重男轻女的风习,如果女儿单独出走,怕会置之不理,但儿子也一同出走,就一定要设法追寻了。所以兄妹一同出来。这计划很周到,可惜的是一天天过去,没听见家里的表示,反而把先生当作家长了,供给膳宿,津贴零用,一切由先生负担。先生住在楼上,楼下就让给他们住。每逢步下扶梯,则书声琅琅,不绝于耳。但稍一走远,则又戛然中止。久而久之,先生才悟到这书声是读给他听的,后来就怕敢出入了。继之他们又要求读书,要先生供给这三个人的学费。先生说:"我赋闲在家,给书店做点杂务,那能有这大力量呢?"这是实在情形。先生离京时还欠上一身的债,好容易把厦门大学的薪水给偿还。从厦门到广州又带了一批学生,旅费之类,也借用不少。在广州做了不到半年的工,就又失业了。原先我们预备做两年工的计划,既限于事实所迫,只得中途放弃。及至沪上,一切生活,俱未入于轨道,平添三个人的生活,已非先生力所能支了,那还说得到供给学费。后来那学生把他的文章送来,请先生介绍发表。但文章太过幼稚,实在不能送出去,没能满足他的心愿。又请托找事,但有什么事情好设法呢? 先生也是失业住在家里,又不认识达官阔人,富商大贾,平时来往的,都没有这

力量,就是认识三两家书店,偶然介绍点稿子,也往往要自己也有稿子陪去,才能成功,说不到找事情了。于万不得已的情形下,先生跟某书店说定,让他去做个练习生,再由先生每月拿出三十元,托书店转一转手给他,算是薪水。先生满以为如此则对书店也不为难,对这青年也可以得一学习机会。总以为这一份苦心,他是能够接受的,谁知通知他以后,他竟说:"我不去。"是嫌薪水少,还是嫌工作低微呢?我们不晓得。但他怕还不知道这是特别设法,才能如此通融办理,在上海是学徒三年义务期满出师,也不过数元一月呢。

一四 送往迎来

那时创造社诸君子正在围剿先生,先生也正在应战。一天,那学生突然来对先生说:"他们因为我住在你这里,就把我都看不起了。"这叫先生怎么办法,他们能够不住在这里,能够有法子生活,先生又何必苦苦地挽留呢,真个是"实逼处此"。

后来那女孩子的哥哥要回乡了,理由是家里既不寄款来,且回去筹措,坚定地非走不可。但要走,先须有旅费,这责任又落在先生身上了。可是那位"哥哥"走不多时,又有远客来了,这回是那学生的哥哥。出身是木匠,来找事做。先生纵使交游广阔,接待这一类远客,怕还是初次。这如何动手?但既来了,第一是食住总得给他安排。楼下已经住了那学生和他的爱人,没法再搭床位,只好为他另在附近租间房子。饭食呢,自然不再为他另开火仓,顺便在家里腾出一份,托他送去。这总该可以了的罢,可是结果还是不成。拿饭篮不体面!仿佛还须先生亲自送去似的,没有法子,又要托人代劳了。这样繁琐的人事纠缠,使得先生困恼万分。好容易托建人先生辗转请托,总算给那木匠哥哥找到了事,以为总可以吐一口气,解决了吧,结果又不成,不愿意去。那么再住下去。住下去,厌倦了,木匠哥哥要回乡了,再由先生来筹旅费。

一五 原来是"儿子"

这回剩下学生和他的爱人了,已经来了好几个月,他的爱人已能和

别人稍微谈几句普通话，才从她的口中得知：那青年学生原来是来给先生做“儿子”的，她呢，不消说是媳妇儿了。他们满以为来享福，那里知道会这样。而先生竟一点也不晓得这个中原委，没好好地招待这现成的家族，弄得“怨气腾腾”，“烦言啧啧”，从这看来，先生真也太不会做人了。

在看透了对先生已无可希望，不能享福之后，“儿子”告辞要回去了。一天的晚上，他来同先生磋商：要两个人回去的旅费。先生想：这里到汕头，转到×县，至多一百元就足够了罢，然而不成。他说：“我们是卖了田地出来的，现在回去，要生活，还得买田地，你得给我××元。”这个数目，先生实在做不到的，还是忍住气和他磋商罢。“我没有这许多钱，而且，你想想看，我负了债筹钱给你买田地，这可说得过去？”他可也回答得干脆：“错是不错，不过你总比我好想法，筹借的地方也比我多，你一定得给我筹××款子才可以。”说来说去，他还坚持这数目，自然咯，他是来做儿子的，儿子同老子要钱，律以“为儿孙做牛马”的义务，先生是无论如何不应拒却的。可惜先生不知道这就是儿子！而且先生实际的困迫他那能了解？老实说，自他们来后，起居服用，再加以送往迎来，整批整批的路费筹措，已经觉得非常吃力了。但先生从来脾气是有苦自家知，一声不响的，而人们却以为他已成富翁，如果这虚名也可以卖钱，或者先生会是富翁罢，然而卖虚名的就不是先生，所以到头来往往弄成不谅解，不欢而散。那“儿子”终于也不满所欲气匆匆地走了。几年以后，“儿子”突然从广州来了封信。大意说：“原来你还没有倒掉，那么，再来帮助我吧。”这使我们猛然地想到，当初他的回去，怕为的是避免被牵连了倒掉吧。

谁说先生老于“世故”，我只觉得他是“其愚不可及”。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呆子吗？可是这呆气，先生却十分珍贵着。他总是说：“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

一六　另一个学生

从厦门来的另一个学生——我就在这里称他是A[1]吧——来见先生了。他说："上海学校没有好的，打算自己研究，读点书，不在乎文凭，愿意在先生旁边住，家里也可以放心，否则我父亲不会允许的。"于是就住在附近了。另外陆续来了他的朋友——柔石——和又一位也是厦门来的学生——我就称他为B[2]——，他们三个人住一幢房子，早晚搭饭同吃。时常见面，谈起文化界的寂寞，出版界的欠充实，A就提议大家来出点书，他说，他哥哥开教育用品之类的店，可以赊点纸，或者还可向拍卖行买些便宜货，用不着大本钱。而且他哥哥的店，也可以代卖书籍，省得另开门面，有批发的，他也可以代收账，很靠得住。大家同意了，用朝花社名义出了种周刊，印些近代木刻画选，也出些近代小说集，颇有点基础了。选木刻，制图，选材料等，离不了先生的苦心经营。而跑腿往来于印刷局等苦差使，则往往落到柔石身上。资本是A、B、柔石、先生四人出的，但因经费不足(每人数百元)，又不便叫学生们多负担，于是把我也算作一股。其中最失败的是《近代木刻选集》之类的木刻印本。纸张是A经手的，从他哥哥的店里或拍卖而来，各种纸都有，很多是粗糙的，不宜于印图。而且油墨也恶劣，往往把细的线条遮抹掉，有时墨太浓，反映出闪光，很不好看，然而还有读者。书和刊物，渐渐被人注意了，那时的A似乎别有所忙，时常往来于上海、宁波之间，有时急待他接洽什么，总老等他不来，责任几乎全落到柔石一个人身上。他很愿尽力，无奈那位A的哥哥店里的关系，柔石去接洽总弄不恰当，结果诸多棘手。卖出去的书，据说一个钱也收不回，几次的添本钱，柔石甚至一面跑印刷所，一面赶译书卖钱去充股本，有时真太来不及了，先生就转借些给他。总计起来，大约先生和我及借给柔石的，至少占股本之半。这时A对于译书事忽然不热心了，颇有十问九不理的样子。在某天，他宣布不能继续了，他哥哥的店不肯再代设法，书也多卖不出

---

① 指王方仁。

② 指崔真吾。

去，后来就把剩下的书由柔石托别的书店去卖，款不但收不到，还要每人筹款填亏空。先生担负了巨额的损失之后，得到朝花社遗留下来的黄色包书纸一束，从此关门大吉。先生想替青年们打下一个文学园地的基础，终成泡影，而先生也在这整整的一年中费去不少精力了。

一七 同 情 者

和朝花社差不多同时，还有一个××书局[①]，主持的是C君[②]。记得他头一次来见的时候，说明他的姊姊是在北京做社会活动遇害的，家里很困难，想印些书，请先生帮忙。为正义，为文化运动，为同情心所驱使，于是先生又有所忙了，义务地写稿，经常给刊物帮忙。C君人很精明。有一回大感叹于经费困难，不易支持之后，由他负责，向先生筹借了五百元，仍然未能打开僵局，又关门了。随后C君离开了上海，这书店的股东是谁，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

一八 忠厚待人

对于某某书店[③]，先生和它的历史关系最为深厚。先生为它尽力，为它打定了良好基础，总不想使它受到损害。创办者原也是个青年[④]，赖几位朋友之助，才打出这天下来。其时做新文化事业的真可说凤毛麟角，而出版的书，又很受读者欢迎，像这样有历史基础的书店，先生不愿意随便给它打击。在别人看来，先生对它仿佛有点偏私。记得在厦门、广州时，曾有另一书店托人和先生磋商，许以优待条件，要先生把在某某书店发行的全部著作移出，交给那家书店出版，先生也未为所动。其后到沪，复为它编辑两种刊物[⑤]，替它另一刊物[⑥] 长期译稿。先生所

---

① 指春潮书局。

② 指张友松。

③ 指北新书局。

④ 指李小峰。

⑤ 指《语丝》和《奔流》。

⑥ 指《北新》半月刊。

编的刊物，一种是同人性质的，没有稿费，一切是尽义务。另一种由先生编校，每月不过由我们拿回少数校对费，其实大半还是尽义务的。其间征稿、还稿、写回信、校稿等，先生全部精神几乎用在这里了。又初到沪上，正人事纷繁，先生且病（到沪大病一场）且工作，无时或息，并无对书店有疏懒之意。且正在围剿中，许多人以为他就要没落了，聪明的人，都远远地离开。又兼那时出教科书的风气甚盛，谁个书店不想赚钱？风帆一转，文学书就置之脑后了，先生以为这是大大的失着。如果它坚持早先立场，倒是一个为文化服务令人敬佩的书店。然所以转帆之故，又归因于在沪之扩大组织，变店铺为家庭，外间给以批评为"胡涂"。然"胡涂"者，不精明之反也，水清则无鱼，太精明的店，也同样难以合作。先生所以时常说："某某书店乱七八糟，真气人，许多人固然受了他胡涂之累，可是他也时常胡里胡涂地吃人家的亏（如几次封门）。比起精明的来，不无可爱之处。"的确，先生仍不无有些偏爱，或甚至溺爱的，每当他封门受压迫时，先生从不肯在这时期去索一回版税。然而他自己呢，每越遇压迫袭来，则收入之路越穷。胡涂者，自然也有精明之处，亡命之徒，还能出头露面向法庭控诉吗？那是不足为虑的。

先生往常总不断指导我，说我太率直，不懂事。甚至有时发恼，质问我一个人将怎样生活？固然，在他庇护之下，我是暖室中之小草，丝毫受不到风吹雪暴。可是我一个人在北方读书时，自己也生活了十年之久，不是还好好地活下去吗？有时我因此不禁偷笑！至于他，到处陪小心扶助别人，也难免吃力不讨好，会招来莫名其妙的怨怼，或无故的绝交，这在先生，又将何以自解呢？

一九 编者态度

先生每编一种刊物，即留心发见投稿者中间可造之才，不惜奖掖备至，稍可录用，无不从宽。其后投稿较多，或觉少进境，也许会受到严厉的批评，以致为人不满。这怕就是和青年来往难得持久之故吧。先生初到沪时编《奔流》、《语丝》。投来的稿子，真是缤纷万状：有写了一次即不愿覆看一遍，叫先生细改的；有翻译而错误很多，不能登载，致招怨尤的；有一稿油印多份，分投各刊物的；有字甚小，模糊难辨的；自然还

有不少稍加修改，即可采用的。这些，如果是那原文先生能自己对照的，多给改正。其为从英文译来，遇有疑难，亦必多方向人打听，修改妥善。或长短诗，音韵、体裁、结构、思想俱优，则必多方设法登载，凡是先生手编刊物，读者怕很少不满意的吧。

二〇 “鲁 迅 派”

这时有人[①] 从东京寄稿来，且时和先生通信，先生也照例覆信、看稿。信与稿一多，即成立友谊。有时蝇头小字，连篇累牍地写着信，费去先生大半天功夫。可惜这些信现时我没有借到一封。我知道在那些信中可算是知无不谈，谈无不尽，天下治乱，个人生活，都历述无遗了。有时信中飞来一张当票，先生也会亲自带往北京替他取赎，再小心翼翼地给送到他的家里。孙伏园先生说过：先生给他再四打铺盖，比之于耶稣为门徒洗脚。其实不但对门徒，对未见过面的朋友，先生也一样毕忠至敬地尽力服务的。后来这位朋友回到中国来了，希望先生为他向北京教育界谋点事做，这在先生当然愿意尽力的。于是写介绍信以外，并亲自面恳。事情颇有眉目了，突然，一个风声传来，说他是鲁迅派，不能容他插足。鲁迅居然有“派”，放这风声的北京教育界中的某权威，实在是最懂得鲁迅精神的。

自然这位东京朋友的饭碗是立刻打破了。他转来上海，从此和先生过往甚密。不幸先生因加入“自由大同盟”、“左联”等而遭遇了严重的压迫。那位东京朋友，虽然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但拂去衣上的尘沙，依然是翩翩年少，将“危险”的责任一推到别人的身上，自己也就从“为鲁迅带坏的圈中”爬了出去，飞黄腾达起来了。

二一 谜

还有一位年青的人[②]，时常在刊物中出现，也时常到寓所来请教翻

---

① 指韩侍桁。

② 指杨骚。

译的文字，谈得投机了，也就一同吃饭。他曾为了爱人的病需要物质援助而又不要给爱人知道。先生满足了这希望，且恪守了约言。忽然，有一天他的另一位至友[1] 来向先生借款，且举前事为例。其时先生正因迫压，预备出走避难，困于经济，苦无以应。这位“诗人的至友”不免怨言，而诗人从此也绝迹不来了。而后来几经碰面，也不招呼，这可见绝交的决绝了。

传说，早先拳师，授术弟子，必留一套自用，以免自己被弟子袭击。这青年自和先生交往已久，仿佛颇偷了些先生的拳经，决绝以后，他竟应用起来，朝向先生脸上打来。例如先生早预备翻译一本什么书[2]，被他晓得，他就赶速译出付印，以为如此可断先生生路。但先生看这种做法，不免有些好笑，仍照预定译出。先生本常说过：“中国之大，一种书有三四个译本也不要紧。要紧的是译得要忠实，不欺骗读者。”所以那诗人虽然对先生用了拳经，但终究经不起读者眼睛的鉴别。没落与兴起，是决难侥幸的。自从先生死后，那诗人忽然又在追悼文中备致哀忱，忘交谊于生日，洒清泪于死后，人间何世，我实在不能理解这矛盾的现象。

二二　通缉来源的滑稽

先生是负了密令通缉的罪名，带到坟墓里去的。说来自然滑稽，但也痛心。首先呈请通缉的，是××省党部[3]。而主其事者则为×××[4]。先生是生长在那一省份的，这一来，则是他自己的故乡最先把他斥逐了。为了这一纸文书，使先生从此自弃于故乡，也使故乡负斥逐先生之恶名。先生何罪？曰：“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堕落”而已。堕落有罪，则市井之徒皆得而诛。堕落文人而有罪，则文网之禁过苛。至于先生是否为堕落文人，稍有常识者，怕只有嗤之以鼻吧！此其所以为滑稽也。

---

① 指林语堂之侄。

② 指《十月》。

③ 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

④ 指许绍棣。

但这事不是没有缘故的，正和先生编刊物有关，当先生初到上海主编《语丝》的时候，有署名××[1] 的一位青年，投文指责他们学校[2] 的黑幕，意在促使反省。凡有志于改革的，先生总尽力援助，所以把它刊登在《语丝》上了。这一反响真不算小，原来某校毕业生，革命以后多成显贵，×××就是其中之一。挟私嫌于心，诛天下人以称快，本是“老爷们”的拿手好戏，何况一个鲁迅。“自由大同盟”的事一起，借故追因，呈请通缉，通缉而又批准，那是非常自然的了。先生遭此厄运，气愤填胸，发为文辞，自亦激越。然被压迫者的呼声，正是国家民族的心声，先生岂徒为一己的私愤？

二三 意见相左

这位不识的投稿青年，嗣后也时送稿来，先生或见或不见，随后终于到德国留学了。他天赋极高，旧学甚博，能作古诗、短评，能翻译，钦慕尼采，颇效其风度。留学时，常和先生通信，请益人事得失。先生也常托他买木刻书籍。同时也搜罗些中国画本寄去，托他转送德国朋友。兴之所至，这位青年仿佛也学起木刻来了。然而结果似无所成。回国以后，他带来些大书箱，寄存在我们寓所里。他有一次，为找积木送给海婴，偶然开箱则先生托他转给德国朋友的中国画本，赫然尚存行箧。据说，那些画太好了，不忍送出去；不怕携带困难，终于给带回来了。而先生特意到书坊寻选，辛苦寄出，冀于彼邦人士有足观摩，此意遂归虚耗。先生于叹息之余，终不明白那青年用意所在。

他在上海行踪甚秘，住处也无人知道。时或一来寓所，但有事时总是我们没有法去寻的。也因为这样的青年朋友不少，所以并不怪异。那时，《申报·自由谈》已加改革，由黎烈文先生担任编辑，先生时常为它写些短稿。他也时常寄稿给先生，托先生介绍。有时就给送到《自由谈》去。但条件很奇特：不能将原稿寄出发表。据问他什么缘故，却说他仿佛觉得处处有人在监视他，稍一不慎，即有丧身之虞。这么一来，

---

① 指徐诗荃。

② 指复旦大学。

先生只好设法给他抄录副稿寄去。起头先生是嘱我抄的，抄好之后，先生附一函寄给编者，有云："有一友人，无派而不属于任何翼，能作短评，颇似尼采，今为绍介三则，倘能用，当然续作，但必仍由我转也。"（一九三四，一月二十四夜，给黎烈文先生信。）后来这位青年研究佛理起来，每见先生，也多道及。先生初亦淡然置之。其后因为他对先生颇有所讽劝，以为先生如能参禅悟道，即可少争闲气，于是意见渐渐相左了。先生岂不知佛经，但他并不愿出家。在最危难的国度里，以佛学麻醉自己的灵魂，希图置身世外，痛痒不关，这岂先生所能忍？不但出家，即出国也未被先生所许，他不能恝置这古老的祖国，他要同被压迫的同胞一同生活，一同奋斗。那位青年虽未必逃禅，但已经参禅了，而且先生观察他既久，知之更谂，颇觉其无一当意，而自处复老气横秋，殊少青年凌厉之态。先生觉得这样的人，是未可亲近了。来时也常婉辞不见。但仍一面替他介绍文章。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夜，给黎烈文先生信云："'此公'稿二篇呈上，颇有佛气，但《自由谈》本不拘一格，或无妨乎？"可是我们自己工作有时很忙，如果我没有功夫，那么先生也得替他抄好寄去。但这对他还是不满意。有一次，他竟要求每篇换一个抄写者。我们是躲起来，不大交际的，那里来这许多抄写者。这命令实在难于办到，而且连我也未必有功夫专门为他抄写文章。先生很懂得人情，偶然叫我做些事，也斟酌情形才开口。见到我忙了，他也会来帮我一手，所以他自己更不大肯差遣人。如今我们都要腾出功夫来做抄写工作，而且做了还不合意，这有什么法子呢？先生的精神就是这样多方面被磨掉的。后来他的稿子越来越多，让它积压太久又不大好，没有法子，请《自由谈》编者设法了："'此公'脾气颇不平常，不许我以原稿径寄，其实又有什么关系，而今则需人抄录，既费力，又费时，忙时殊以为苦。不知馆中有人抄写否？倘有，则以抄本付排，而以原稿还我，我又可以还'此公'。此后即不必我抄，但以原稿寄出，稍可省事矣。如何？便中希示及。"

二四　为社会造材

那么先生为什么这样不辞劳苦，愿为他"抄录"呢？这因为凡有可

造之才，不忍其埋没；且其人颇深世故，能言人所未言；孑然介立，还不失其纯洁。若或稍加移易，积极为人，即社会的栋梁。故不惜辛勤设法，并非特有所私。但因其文时多不平之语，或间略带讽刺，人又疑是先生所执笔。在同年四月间，先生有给《自由谈》黎烈文先生函云："'此公'盖甚雄于文，今日送来短评十篇，今先寄二分之一，余当续寄；但颇善虑，必欲我索回原稿，故希先生于排印后，陆续见还，俾我得以交代为幸。""其实，'此公'文体，与我殊不同，思想亦不一致，而杨公[1]，又疑是拙作，闻在《时事新报》(?)上讲冷话，自以为善嗅，而又不确，此其所以为吧儿狗欤。"文章发表愈多，研究好奇的也多，如果真是先生一个人，诚然"思想亦不一致"。但先生并不做统制思想的工作，自己尽管有所不同，而他人另有所见，也未便埋没，故仍予介绍文稿。此种苦衷，就是作者恐怕也甚不了解的吧。编辑者也终于弄不明白，好像还来打听，先生回信告诉："'此公'是先生之同乡，年未'而立'，看文章，虽若世故颇深，实则多从书本或推想而得，于实际上之各种困难，亲历者不多。对于投稿之偶有删改，已曾加以解释，想不至有所误解也。"

二五　最后一面

文稿尽在为他介绍，但他来访的次数渐渐减少了，因为先生不大和他多所谈论。即有所谈，也觉到微妙地相左。如此陪客，确也很苦。况且后来先生身体多病，又没有许多时候接见。这时我的处境就很为难，客来总得先由我招待，接见与否，则禀承先生之意。如果不打算见，我是很难为之说辞的，因为我晓得他的脾气，强见会不欢而散。最后一次，"此公"来了，我告以先生病不见客，他一句不说就走了。一刹那买一束鲜花直冲到楼上，令我来不及拦阻，他终于进来了。先生似理不理地躺在藤躺椅上，这时我真无地自容，对先生，对来客，没有能够打开这僵局。谁知这又是最后一次的相见呢。他敬爱先生，先生是晓得的。见面时无话可谈，原是思想的距离太远。先生于他，已力穷无可解劝，这是先生方面的苦处。这苦处，明知说了出来未必有效，就只好哑默无

[1] 鲁迅信作杨公邨人。

声，绝不敷衍。这是先生的坦率。然如真能了解先生，豁然贯通，无所执迷，则先生亦必能和他友好如故。先生死后，停在殡仪馆的小房间里的大清早，我遇到他，他悲怆万分。他告诉我先生给他的许多信，可以集成厚厚的一本，希望将来能够印出来。现在，这位青年的友人，也不知走到那里去了。他保存着的书信，不知有没有遗失在烽火之中。我们祷祝他的前途！并希望他善体先生通信中的拳拳至意。

二六 相当限度

先生无论对任何人，绝不出难题目给他做。他清楚某方面的长处，同时也明白某部分的短处。譬如某某社①，先生和青年一同努力，一同计划出书，甚至有时设法代筹印刷费，诚或有之。然彼此之间，仍保存相当限度，不能以此而叫先生强人所难也。某某社的成立，主持的几位，大都是同乡而又同学，他们友谊甚深，其中只有一位是不同省份的。先生在那社里，也是异省人，他们当然没有话说，但不能因先生而对一切人随便，这是某某社一向脾气，先生是了解的。所以那时另外有几个人要求先生对某某社如何如何，先生也不能作左右袒，只好听其自然。结果另一部分青年不满，向先生进攻了。

二七 原 稿

某某社② 之认真不苟，每个人多洁身自好（除却有一个做官的不算），这一切是先生所信服的。至于虽勤谨而气魄甚小，不能有大作为，则为先生所惜。他们的认真，举一例便可知道。先生平常原稿寄出，即多不过问底稿之如何保存。此次先生逝世，该社李君③ 把他积存的《小约翰》、《朝华夕拾》等六七种原稿，毫不污损地装订起来见赠。我们想想，这三数位青年，一面在求学，一面在做译著、校对、出书等繁忙工作，

---

① 指未名社。
② 仍指未名社。
③ 指李霁野。

仍留心保存先生手迹,一点一滴地抄出副稿付印。以视别人,把先生原稿随便丢弃,终于落到包油条的境遇,对于一代文化宗匠之敬爱与歧视,在这里可以窥测了。自然,我们不能希望人人把先生当孔夫子一样的敬重,他也一样的拿稿费换米饭,书店对于作家的平等待遇,本不足怪。可是某某社的苦心,则更是难能可感了。

二八 一位朋友

和某某社[1] 保持相当友谊,曾在北平旁听过先生讲书的青年 F[2],后来在闸北和先生住在同里,而对门即见,每天夜饭后,他在晒台一看,如果先生处没有客人,他就过来谈天。他为人颇硬气,主见甚深,很活动,也很用功,研究社会科学,时向先生质疑问难,甚为相得。后来在左联等处,他也时露头角。对先生感情很好,但对解决社会进步的热忱更深。自奉很刻苦,早晚奔走,辄不辞劳。曾有一时住在我们比邻,他大约每天下午十时才能回家,时常见他的太太手抱小孩在门外伫候,饿久了,小孩手拿干面包充饥。他不管家里人的心焦,非到相当时间不回。回来饭后已十一时了。敲门声响,他来了。一来就忙得很,《萌芽》、《十字街头》、《前哨》等刊物的封面,内容固然要和先生商讨,要先生帮忙。甚至题目也常是出好指定,非做不可的。有时接受了,有时则加以拒绝。走出了,往往在晨二三时。然后先生再打起精神,做预约好的工作,直到东方发亮,还不能休息。这工作多超过先生个人能力以上,接近的人进忠告了。先生说:"有什么法子呢? 人手又少,无可推委。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先生是这样谦虚,接待一个赋有正义感的青年。这青年有过多的热血,有勇猛的锐气,几乎样样事都想来一下,行不通了,立刻改变,重新再做,从来好像没见他灰心过。有时听听他们谈话,觉得真有趣。F 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 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

---

① 系指未名社。
② 指冯雪峰。

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 目的达到了。对庄严工作努力的人们，为了整个未来的光明，连自己的生命也置之度外的，先生除了尽其力所能及之外，还有什么需要坚持？这时候见到的先生，在青年跟前，不是以导师出现，正像一位很要好，意气极相投的挚友一般。

二九　爱护战友

××先生[①] 从东洋回来了，添一枝生力军，多么可喜呢！那时候，压迫并不稍宽，××先生当即被注意了。先生和他以前在某文学团体里[②] 本有友情，这回手挽手地做民族解放运动工作，在艰难环境之下，是极可珍视的。有时遇到国外友人，询及中国知识界的前驱，先生必举××先生以告，总不肯自专自是，且时常挂念及××先生的身体太弱，还不及他自己。如今先生不幸逝去二周年了，希望××先生为国珍摄。或对××先生颇有异议时，先生辄不惜唇焦舌敝，再三晓说："对外对内，急需人才，正宜互相爱护，不可减轻实力，为识者笑而仇者快。"现在则团结益坚，先生当可瞑目了。

三〇　倡导木刻

木刻之在中国流行，不能不归于先生的号召，其始朝花社出木刻选集五册，使社会一新耳目，《奔流》等刊物亦时予介绍，一时风起云涌，几乎每种刊物，非有木刻不显进步了。先生又举行过几次木刻展览会，开办过夏期木刻讲演会，一时人才辈出，大有可观。其最露头角的，如罗清桢、陈铁耕、李桦、陈烟桥（即李雾城）、赖少其、张慧等先生，俱能自成一格，前途无量。可惜人体构图，多欠正确，为美中不足，是则先生所时常道及并惋惜的。而比较成功的木刻家，以及习木刻者的籍贯，多为粤人，先生常以为异。

---

① 指茅盾。

② 指文学研究会。

先生对于美术向极留心，在北京时，常见他案上放有不少外国美术书，供随便翻阅。一问起他总说："那是消遣的时候看看的。"他是怎样利用每一刻的光阴！就是从消闲中也得教育之益，无怪他和木刻朋友通信时，观察之精确，句句说出来都是内行话。如一九三四年写给张慧先生的信云："蒙赐函及木刻，甚感。拜观各幅，部分尽有佳处，但以全体而言，却均不免有未能一律者。如《乞丐》，树及狗皆与全图不相称，且又不见道路，以致难云完全。弟非画家，不敢妄说，惟以意度之，木刻当亦与绘画无异，基本仍在素描，且画面必须统一也。"先生的率直批评，博得青年们的正义拥护，投函寄木刻请批评的，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张先生再寄木刻来，先生又报之书云："顷收到十八日信并木刻三幅，甚感谢；上月二十八日的信，也收到的。先生知道我并非美术批评家，所以要我一一指出好坏来，我实在没有这本领。闻广州新近有一个木刻家团体，大家互相切磋，先生何不和他们研究研究呢？""就大体而论，中国的木刻家，大抵有两个共通的缺点：一，人物总刻不好，常常错；二，是避重就轻，如先生所作的《船夫》，我就见了类似的作法好几张，因为只见人，不见船，构图比较的容易，而单刻一点屋顶、屋脊，其实是也有这倾向的。先生先前的作品上，还有颓废色彩，和所作的诗一致，但这回却没有。"同年给木刻家李雾城先生函云："三日的信并木刻一幅，今天收到了。这一幅构图很稳妥，浪费的刀也几乎没有。但我觉得烟囱太多了一点，平常的工厂恐怕没有这许多；又《汽笛响了》，那是开工的时候，为什么烟囱上没有烟呢？又，刻劳动者而头小臂粗，务须十分留心，勿使看者有'畸形'之感，一有，便成为讽刺他只有暴力而无知识了。但这一幅里还不至此，现在不过偶然想起，顺便说说而已。"这观察多么周到、深刻。像这样的通讯，每个木刻家寄赠作品来时，先生都一样地给以正确的批评的。而木刻青年对先生爱护之诚，并不因交住深浅而异，在他们沉痛的哀感，在他们踊跃的每人都极力把保存的遗札寄来之充分，我是多么感动到震抖。我想：最好能够把先生每封批评木刻的信，插以原图，刊印出来，不是很好的木刻示范吗？曾经把这意思贡献给某书局，大约制图费过巨罢，没有成功。但是我总以为值得一做的，我时常想念到这样做或者不是没有意义的。鲁迅先生说："希望在将来！"木刻是有将来的前途的。

三一 先生与出版界

先生对文学有爱好的，帮助他们出些书，有关系的书店真不少。从北新、未名社、朝花社、春潮书局、大江书铺以至《译文》、《作家》、《中流》、《海燕》、《奴隶丛书》等，到如今，虽然北新仍健在，而从事文学运动之锐气已消，其余则又先后消灭，真令人有风流云散之感。尤以未名社一向对出版业是那么认真，精选，卓有信用，乃忽停顿，为先生所可惜不置。又因同情被压迫者之故，先生不惜助之者，如联华书局。主持人某君①，本为某书局② 职员，多年做工，月入不过数金，要求先生给他一二本书出版，以济困急。乃以《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与之。又陆续以瞿秋白（用乐雯笔名）编校的《萧伯纳在上海》，和他（用易嘉笔名）译的《解放了的唐·吉诃德》，及曹靖华译的《不走正路的安德伦》等与之；有时且为之垫付排工等费。因其困迫，不但先生自己不肯开口讨版税（只在后来病时及先生死后陆续收些版税），就是替朋友介绍的也是约在半年前曹先生才收到版税二十元。先生宁可自己过刻苦生活，而从井救人，绝口不肯言穷，愈是困难，愈是如此。而人们还有计划地造他的谣，说他逃难时也把账目带走。其实就算有账目罢！资本家的账目，还不是他自己有数？而先生的朋友，也从来不因先生介绍出书收不到版税，过问一下，这种相知、相信、相互了解，是超物质的。

三二 误 解

先生不但帮朋友出书，也帮朋友的儿子送入医院医病。有一位南京同学，后来在教育部同事的张君③，他的儿子患病，好几个医院都说严重，找到先生，他立刻托朋友介绍入一医院，自己时常去探病，替他们付出千多元的医药费。出院之后，又替他们请全院的医生吃饭，表示谢

---

① 指费慎祥。

② 指北新书局。

③ 指张邦华。

意。他的慷慨，真叫人奇怪。有时人们以平常上海洋场心理推测先生：以为先生能那样替人花钱，一定是个富翁了。谁知先生却用钱之所要用，什么留底都不存了。还有一位老朋友，是老革命党，留学时的老同学①，他们在上海相见了。先生不会对一切朋友隐藏什么，这位老友自然也晓得先生肯随便拿钱给人。有一天，这位老友来了，向先生借支五百元，说明不久就还。先生以忠厚待人，决不疑心有他，立刻向别人转借给他。因为是老友，相互之间，自然相信得过，别人也相信他们，把千余元的存折，连图章托他去取五百。谁知这一来真是天晓得！变了"黄鹤"了。他写信去催，图章寄回来了，折子已被乾没，……从此一概不理。后来从另外的朋友处听到，那位老友在说："人家说他收卢布，恐怕是真的罢！"卢布，是"收来"的，人人可得而用之，无怪他敢于这么做了。然而这是他亲眼看见先生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造谣者的心理，却原来为自己的丑行找遮盖，此外还有什么！先生死了，那"债主"也曾写信去讨，他可连信也不回，尽管在乡下做他体面的绅士！以儿子的缘故，接收到继承的遗产十几万的富翁，对朋友是这样的。先生的血绞出来的金钱，如果用在这样的人的身上，那真是有点冤枉了。

三三　为社会服务

不管先生如何以物质济人之困，而被接济的还说这东西来路不清，这是很使他痛心的。在他的著作里也曾说过，用了妓女卖身的钱，还骂妓女卑污。……先生指的就是这批人。至于先生以精神帮助青年，那更不必说了，逐字逐页地批改文稿，逐字逐句地校勘译稿，几乎费去先生半生功夫。大病稍愈的时候，许多函稿送来了，说："听说你的病好些了，该可以替我看些稿，介绍出去了罢？"有时寄来的稿字是那么小，复写的铅笔字是那么模糊，先生就夹心衬一张硬白纸，一看三叹，终于也给整本看完了。在他的遗物中，有人② 拿初版的书请先生修改，先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给改好了。死后我遇到作者，告诉他："先生给你的书

① 指陈子英。

② 指王志之。

改好了。"他说："让他去罢，我不打算印了。"他的悼文是那么沉痛，一见到遗容就那么嚎啕大哭，而先生千辛万苦给改过的书，曾不值一顾，我一想到先生一点点磨去的生命，真是欲哭无泪！然而这是少数人，这是我的小。以先生伟大的人格，数十年所遇的朋友，生前死后，了解他的几乎无间敌友。先生的工作，求其尽心，而从不想到对方的态度。他认为他的工作不是对个人是为社会服务。辛勤的农夫，会因为孺子弃饭满地而不耕作的吗？先生就是这样的。

三四　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

人们的判断力是正确的，对先生的爱护就是一个明证。殡葬之际，无间亲疏老幼，同声悲哭，这就是先生苦难一生的判词。当苏联木刻开展览会于八仙桥青年会时，先生莅临了。一切的观众，一切的眼光，随着先生亦步亦趋，有拿展览目录请先生题字的，先生就把带在手边的《引玉集》签了字给他们了。这时候先生多么兴奋，多么感慨。他时常说："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他真是为我吗？一切如我的青年，如我一样殷注先生的青年，先生知道应该怎样感动，怎样益加奋发。太感奋了，我心伤痛。我说："门徒害夫子。"先生谦虚，不肯承认这话。

三五　多几个呆子

先生爱一切人，爱一切有专长之人，就是肯印书的人①，他也极力夸奖鼓励，他说："他是老实的，还肯印书。"又说："在唯利是图的社会里，多几个呆子是好的。"先生自己亦明知是呆子而时常做去。他说："青年多几个像我一样做的，中国就好得多，不是这样了。"自他死后，继他这样做去的仿佛已大有其人，先生如果还健在，一定很安慰的罢。

(1938 年 10 月《文艺阵地》第 2 卷第 1 期)

① 指郑振铎。

青年人与鲁迅

小朋友:鲁迅先生死了整整的二周年了。我知道,你们和我一样的记得他。因为在他死的时候,许多许多小朋友挟着书包到殡仪馆去公祭,有的哭了,有的徘徊不忍离去;甚至有些人说,比死了自己爸爸还要伤心。出殡那天,好几里远的路,小朋友也一个个走去送葬,排成一条长阵,一路唱歌,唱到入墓,唱到回去,喉咙都哑了,没有一些勉强,每个人不自觉地要这样做。而且这样做了自己还似乎不大满意,没能够尽量发挥心头的悲哀。这声音,到如今,时常好像还在我的耳朵边,每逢有人唱到那个调子时,我心头就不禁乱跳。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有谁死了博得你们像对鲁迅先生的哀痛呢?你们最明白不过了,因为他也一样地爱你们。

他自己年纪小的时候,没有你们现在的幸福:有许多增加知识、适合儿童看的刊物,像现在的《少年读物》哪,少年丛书之类,他没有。很可怜,只宝贝着一部古里古怪的《山海经》。他要看图画,没有现在的《儿童画报》,只不过从表兄那里借来一册《荡寇志》的绣像,买了些"毛太纸"来,一张张地影描。

这些自己经历过的苦处他总记住,时常提起,不像一些大人们自己成长了就忘记了小孩时代了。他时时刻刻在留心,而且自己努力去做。他的几本翻译如:《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小约翰》,《小彼得》,《表》,《俄罗斯的童话》等,都是小朋友很值得一读的。尤其《小约翰》和《表》,是他最卖力气翻译,认为很有修养,教育意义的。《小彼得》那本书,原来是他拿来教我学日文的,每天学过就叫我试试翻译。意思是懂

了，就总是翻不妥当，改而又改，因为还是他的心血多，已经是他的译品了。在试译的时候，他也说："开手就让你翻译童话，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而且这小小的一部书，如果懂得原文的拿来比较一下，就晓得他是怎样地费了力气，一面译一面他老是说："唉，这本书实在不容易翻。"也可以见得：就是这样小小的一本童话，他也一样地认真，绝没有骗骗孩子的心思。所以现在就收在全集里。

提起学日文，他先把《ニール河ノ草》（《尼罗河的草》）教我读，后来加入一部口语文法，每天一小时，无论怎样忙，也不肯停止的。第三本才是《小彼得》，第四本是简单的社会科学书，刚开头，读不下去了，共总不过一年。不是他不肯教，是我怀孕了海婴好几个月，精神支不住刻苦用功了，到现在想起还可惜。他的学外国语方法是要口耳并用的。闲起来，日常简单对语他就用日文教，又教我用日文答。太熟识了，时常不免窘起来，问答也学不好了，愈怕错就越会错。在他那里学至毕了业的学生，自己也料不到，这回学日文不行了，连丁等的也不如。

他很喜欢青年人学科学，他以为科学并不是没有用的。他给颜黎民先生的信说："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胡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他的话很不错。这是文学，像他造诣的深，学识的博，文章的所向无敌，就是处处随手拿科学的方法，解剖，分析，综合，证明的。

他欢喜青年，不论识与不识，写信去请教他，没有不详详细细地回覆的，他每星期的光阴，用在写回信大约有两天。他在上海，躲起来，不能被允许去教书，去演讲，去和青年们接触，因此时常感到寂寞，烦躁不安。有敲门声了，他就赶紧伏在窗口看看，是不是他的客人。一面躲藏，一面希望有人来。他内心寂寞，他要和青年在一起，寂寞驱使他冒一切危难，同时千万的危害之矢向他射来。他自己知道，朋友也替他耽心，就这样的临死前一天还出来访友。

在北京，他自己没有孩子，到店里看见有些玩具真好，欢喜了，买下来了。怎么办？一只不算小的假马，后来拿去送给朋友的儿子了。他书柜的抽斗里，偶然一抽开来，真有意思，小小的磁水桶，磁蟾蜍等等一大批。有的是放牙签的，有的是装清水写字用的，我们做学生的那里肯

放过：一，二，三，抢。大家不客气动手了，五六个人竞赛，结果我抢到了一半，有些朋友得不到，几乎哭起来了。"太难为情，分她些罢！"有人在劝了。到如今，我只剩得一只绿色蟾蜍，一只紫色水桶，一只黄色喇叭花形的牙签筒。

还有一件可惜的事：在鲁迅先生北京寓所的园子里捉到两只小刺猬，他的母亲珍重爱护地养起来了。我们去到也拿出来玩，两只手一去碰它，缩做了一团了，大大的毛栗子，那么圆滚滚的可爱相。走起来，那么细手细脚的，大家都欢喜逗这小动物。不知怎么一来它逃脱了，无论怎样也找不着。偶然看见一个小小的洞，人们说："一定是逃到这里了，因为它喜欢钻洞。"有一天，落雨了，我撑着伞到了鲁迅先生寓所。后来他给我写信，里面附了一张图，一只小刺猬拿着伞走，真神气。出北京时这张图还保存着，后来找来找去也没有，记得从广州到上海，书箱在香港被检查的大敲竹杠而又乱翻了一通，都散乱在外了（先生也时常记起这张图，希望能够发见它），不知是否这时失掉。如果还有，那就不让他手写的"无常"① 专美了。

先生喜欢吃糖，但是经济不充裕，——不，他对自己刻苦——时常买一种三四角钱一磅的质地轻松的来吃。这种糖因为价钱低廉，淀粉多，不大甜，手碰它就好像碰着石灰一样。我很反对，叫它乌贼糖，因为质地似乌贼鱼的骨。有一天，先生忽然用稿费买了一大批咖啡糖，留着请客。我们一批学生到了，每人一包：一大块扁平的，里面隔开许多方格。在上海，这东西大家毫不希奇，但那时的北京，外国货很贵的，先生得钱也真不容易，他有时还在举债度日，要买这些糖请客，真不经常。一个朋友争起来了，她迟到，疑心人家比她多得些，同别人抢起糖来，洒得满地都是糖，又不便拾起来吃，这样艰难苦心买来的糖，那样子糟蹋掉，先生是不高兴的。

小朋友，你们有到过北京的吗？北京的春天真可爱呢！气候交春了，本来冷冰冰的世界，骤然暖起来，昨天是棉袍，今天可以是单衣；昨天树木还是稀疏的枝条，今天吐绿抽芽了；压不住心头的活跃。这时，骑驴游春的青年，到处都是。然而我们还在上课，我们受不住！

---

① 鲁迅先生亲手所画的插图，见《朝华夕拾》。

鲁迅先生授课时很认真,不过绝不会随便骂学生,这一层我们很有把握。有一天,趁新的讲义还没有印出来,先生正预备讲书时,姑且和他闹一下罢,如果成功,就有得玩了。课室前排的几个人最爱捣乱:"周先生,天气真好哪!"先生不理。"周先生,树枝吐芽哪!"还是不理。"周先生,课堂空气没有外面好哪!"先生笑了笑。"书听不下去哪!""那么下课!""不要下课,要去参观。""还没有到快毕业的时候呢,不可以的。""提前办理不可以吗。""到什么地方去?""随便先生指定罢!""你们是不是全体都去?"测验是否少数人捣乱,全体起立,大家都笑了:"先生,一致通过。"先生想了想,在黑板上写出"历史博物馆"几个字,又告诉我们在午门——是皇宫的一部——聚齐,各人分头去,在那里聚齐。大家都去了。原来这个博物馆是教育部直辖的,不大能够走进去,那时先生在教育部当佥事,所以那面的管事人都很客气地招待我们参观各种陈列:有大鲸鱼的全副骨胳,各种标本,和古时用的石刀石斧,泥人,泥屋,有从外国飞到中国来的飞机,也保存在一间大房子里。有各种铜器,有一个还是鲁迅先生用周豫材名捐出的。其他平常看不到的东西真不少,胜过我们读多少书,因为有先生随处给我们很简明的指示。现在,这博物馆的东西不知有没有把保存的一部分运到南边去,还是通通仍留在北地?回想起我们能够去参观,真是幸运。

海婴出世了,先生十分欢喜他,每逢朋友到就抱给他们看。生后十六天,就照相给他母亲寄去。夜里,十二时以前,照管海婴是我负责,十二时后,先生每天必从书房兼客室的客堂间跑到楼上来,抱着海婴在房里一面走一面唱催眠歌,或陪着弄玩具给他看,至二时才睡。为的是不令我太劳苦,致影响小孩的乳量不足。他处处都替别人设想,自己辛苦是不管的。回想起来,我和海婴,真教他操不小的心,尤其生病的时候,他的焦躁,坐立不安,眠食失常,真令他吃苦。有时叹一口气,说:"唉!没有法子,自己养的。"这句话不是懊悔,是真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心情的。

(1938年10月10日上海《少年读物》)

纪念还不是时候

和黑暗奋斗了一生，终于在黑暗中逝去的鲁迅先生，到如今刚刚二周年了。

先生，你毕生竭忠尽诚爱护着的国家，为了它，你叫出了“无声的中国”的惨痛的呼号。但，现在他们已经发声了，已经继续不断地发了十五个月的声了。也许有些“声嘶”了罢，那是因为只有廿七岁的年青，还没有成长好。然而绝不至于“力竭”。因为新的力在继续增长，“不宽容”的意志，因压迫者的凶残而更发荣。

去年周年纪念，曾经开过好几个纪念会，报章大量地登载纪念文字，预想今年能够好好地在祝捷中纪念。又是一年过去了！时间在飞逝，可容我来回念一下。

诚然，也许今年有些地方不能大量登载纪念文字和开会。可是，遍地用血写出来的字，一批批出发的群众，不是每天在实地做纪念吗？这种纪念，就是你所需要，所祈祷着的，我们如果要对得起你——你那不忍见强健的国人，不明不白去送死的，愤而弃医，终生做那以文字振励民族精神的工作——就得一直这样做，直至达到民族的自由解放，和世界的真正和平合流。

现在，白血球还在赶做，脓疮毒疽还没有离身。要纪念你，还不是时候！就是我，先生，我向你请罪：

我怎能不记得？音容笑貌，闭着眼睛也摹拟出来的你；言辞训导，逾十年长相厮守的你。将是有生之日，即长忆之年。不但我，就是你的爱子海婴，当他翻开《少年读物》第四号看到你的照片时，他也泪水汪汪

地说："妈妈，不晓得为什么我看到爸爸的照片就想哭。"然而，我们没有很多的机会来哭你。先生，要真个痛惜你，就是哭死了，我也补不过来，你太伟大了！没有可以补偿你的损失的。

你曾经说过："我有一个担挑，一边是老母，一边是稚子。"自你死后，不自量力然而也逼于无奈的我，硬担起来了。稚子在旁，体弱多病；提携抚育，废寝忘餐。老母在平，年高体衰，生活之需，虽由我勉强筹措，然而亲友无多，相见且难，遑论照料。则其悲戚，谅不待言。所谓事姑育子，诚有未尽。倘精灵不泯，尚荷督我助我，先生先生，我向你伸手了！

所差堪告慰的，就是你的《全集》，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中，战胜了物质与劳力，由各方人士给予支持之下，三数月内完成，现已再版了。时间急促，容有未尽妥善之处，好在大致已具，将来不难就而改进的。

先生，一抔黄土，长埋战士精灵，墓草凄凄，未能亲临凭吊者又一年了。那面情形是什么样？不敢想到，不能不想到。万无法想之下，幻想着你的"神灵呵护"了。先生，我浸在沉痛里……

（1938年10月25日《文艺》半月刊2卷2期）

鲁迅先生的日记

鲁迅先生的日记有两种。除了本期所刊载的一种之外，还有一种是《马上日记》或《马上支日记》（见《华盖集续编》）。从宽泛些说，也可以说日记有三种：《日记》，《马上日记》，《夜记》。可惜《夜记》一直没有写就，所以还是说两种来得恰当些。

先说《马上日记》等三篇，是在一九二六年预备投到副刊去写的。里面写些身边琐事，或读书心得。虽然也是日记体裁，然而总不免一看就晓得是故意造出来的，颇活泼，很能引人入胜，和他正式写的日记就大大地不同。用他自己的解释，日记是这样的：

> 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
>
> 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

据保存所得的检查一下，鲁迅先生的日记是从民国元年五月初到北京时写起的，一直没有间断。偶尔因为特别事故，如“一·二八”战事发生，只身出走，中间经历了一个多月，待到市面稍稍平静，重回旧寓之后，他才能拿笔补记。记虽简略，但奇怪，他就有本事逐天地排列回忆起来，一些不错，看了真令人惊服的。

他的日记的确写给自己看的，所以一点也不文饰。从民元到十四年的日记，离北京往厦门时并未带走，锁存北京客室里面。曾经有过一个使他不满意的客人，迳自挖开锁来偷看了，事后给他晓得，可真气愤得很，足见他并非预备给人看的了，这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所保持

的态度。但是假如作为从此可以看出一部分真的面目，那么这日记是最真不过的了，在研究一位在民族文化史上很关重要的人物，对这是不应忽视的。况且以他自己一生的坦率，日记并没有不可告人之处，我们无须保持珍秘。但倘使说从这里可以窥知一切，那也恐怕未必尽然。

所以日记虽然“写的是信札往来”，有时也不全写。例如很托熟时常来往的人，和他通信，日记里是不大找得到的，《两地书》的信札往来，日记就不尽写出。又如有关政治的人物和他通信或见面时，他也不一定写在日记里。这理由很简单，自然是防到文字狱发生时的不便。至于“银钱收付”，据我观察所得，付出方面，倒不一定记载，而收入以及别人归还的，就比较不大肯遗漏。这缘故大约是付给人的，并没有以债主自居的态度，不必斤斤于账目。所以有时同是一人，并不见写出付款年月数目，而等到归还，就会写出的了。

因此我们可以得一概念，他的日记写的大约是不大不小的事。太大了，太有关系了，不愿意写出；太小了，没什么关系了，也不愿意写出。其间写作的大部生活，整天的忙碌非常，也不过在工作的某时期偶然说起就是了。

日记里有时写出“夜失眠”三字，别人看看很简单，不大理会的，其实里面包含许多辛酸处。有时为了赶写文稿，期限急迫，没有法子，整夜工作了。但是有时并不因为工作忙，而是琐屑之事，或者别人家一不留心，片言之间，毫不觉到的，就会引起不快，可能使他眠食俱废。在平常人看来，或者以为这是大可不必的，而对于他就觉得难堪了，这在热情非常之盛的人，是会这样的。然而这是于他的病体很不相宜的，或者也可以说，他的病体促成这急激的脾性。可惜这一切的解释，知道得太迟了，没有好好珍惜他的身体，这是我每一想到都好像犯了终身不可告人的罪恶一样地惭疚痛悔。有时，他太忙了，或者因了什么不痛快的事刺激他，因此也许不免焦躁，容易动气，这是我了解得到的，我应该加倍小心，体谅他。然而彼此都是感情的动物呢，一面体谅，一面就含有勉强的克制性，待到勉强不来，自我的个性起来，大家就缄默一时。缄默之后，他也常常抱歉似地说：“做文学家的女人真不容易呢，讲书时老早通知过了，你不相

信。”“世间会有百听百从的好人的吗？我得反抗一下，实地研究研究看。”这有时是我的答复，时常就这样地和气起来了，我们从没有吵闹过。

（1939年2月8日上海《鲁迅风》）



鲁迅先生与海婴

一

鲁迅先生的生平，承蒙许多知己朋友的督教，要我写些什么出来，——随便什么都好。每逢听到这，我是不胜其惭恐之至的。

论时间，我和他相处不过十多年，真如白驹之过隙，短短的一刹那而已。譬如一朵花，我碰到他的时候正在盛开但同时也正一点点走向凋零，其间的哀乐休戚，真是那样的骤忽，不可捉摸，这在我确是一种不可挽回的伤恸。倘为了纪念他，为了对这一位中国甚至世界的文豪，思想领导者追怀一切，贡献一些从我这方面观察所得，那是义不容辞的。无奈一执起笔，就踟蹰惶恐：会不会因为我那无意中的疏误，或下笔时辞句的不妥，使人们对于他的了解因之歪曲，或反而模糊了呢。果如此，则诚不如无书！而且医师从来不给自己人诊治疾病，怕的是太关切太熟悉，易为感情先入之见所蒙蔽，这大概不是无理的吧。站在太关切熟悉上的我，对于他，能否趋重于理智的观察，还是不敢自信的；那么我的记载也只能作研究鲁迅的人们的一种参考，依然是我自己的鲁迅观罢了。

我自己之于他，与其说是夫妇的关系来的深切，倒不如说不自觉地还时刻保持着一种师生之谊。这说法，在我以为是更妥切的。我自己不明白为什么如此，总时常提出来询问他："我为什么总觉得你还像是我的先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他总是笑笑地说："你这傻孩子！"

现在我是明白了，因为他太伟大，他的崇高，时常引起我不期然的景仰。他也亲切、慈蔼，和他接近较多的朋友一定觉得的。他是具有潜在的吸引力，能够令人不知不觉总想和他多汰留一下。他也热爱人们，稍微谈得来的朋友，总被他挽留长谈。他的光和热力，就像太阳的吸引万物，万物的欢迎太阳一样。所以，再进一步说，我下意识地时常觉得他是我的先生，还是不切当的，我那里配做他的学生。以我那浅薄无知，——那愚騃，那无所贡献于社会的生命，应该是在太阳之下消灭的。然而应该消灭的倒还顽健，而我们所爱戴的却已消灭，我因此时常诅咒自己的存在，时常痛恨自己的愚騃，没有在他生前尽我最大的力量，向他学习，从消灭之路把他领回来。因着我的活，更加添我的痛苦。

关于结婚请酒，鲁迅先生曾有一个诙谐的卓见，他说："人们做事，总是做了才通知别人。譬如养了小孩，满月了才请吃喜酒，这是不错的。却是为什么，两性还没有同居，就先请吃结婚酒呢？这是否算是贿赂，请了客就不会反对。"

我们什么时候都没有特别请过客。方便了，就和朋友一起聚会一下。海婴生下来了，每个朋友来到，他总抱给他们看，有时小孩子在楼上睡熟了，也会叫人抱他下来的。他平常对海婴的欢喜爱惜，总会不期然地和朋友谈到他的一切。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五夜，鲁迅先生因为工作过度之后有些发热，但是仍然照常工作。到睡的时候已经不算早，他刚睡熟不久，正是二十六晨三时，那腹中的小生命不安静起来了，有规律地阵痛，预示了他的将要"来到人间"。我忍耐着痛楚，咬住牙齿不使他惊醒，直至上午十时才告诉他，事情是再不能拖延下去了，冒着发热，他同我去办妥住医院的一切手续。

从护士的通知他马上要产生了，预备好了小床、浴盆、热水；一次又一次，除了回家吃饭，他没有片刻离开过我。二十六一整夜，他扶着我那过度疲劳支持不住而还要支持起来的一条腿，而另一条腿，被另一个看护扶着。不，那看护是把她的头枕着我的腿在困觉，使我更加困苦地支持着腿，在每次摇她一下之后，她动了动又困熟了，我没有力气再叫她醒。

九月二十七大清早，经过了二十七八小时的阵痛，狼狈不堪的我，

看到医生来了,觉得似乎有些严重,但是他们的话都听不懂。决定之后,由他那轻松的解决问题之后的爽快,安慰似地告诉我:“不要紧,拿出来就好了。”

钳子由医生的手,把小孩的头拔出来,如同在地母的怀抱中拔去一棵大树。这像那树根一条条紧抓住地母的神经,从彼此的神经中切断开来的难受。终于赤红的小身体出来了,呱呱的哭声向这人间报了到。之后,鲁迅先生带着欣慰的口吻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

但从这一刻起,他把父亲的爱给与了他。后来从他告诉我,才晓得孩子如果不是在医院里待产,也许活不过来。在钳出之前,他的心音,听起来只有十六下,已经逐渐减少下去了。而且濒死前的污便也早已下来,真是千钧一发的了。当医生看到我难产的情形的时候,是曾经征询过他的意见:“留小孩还是留大人?”他不待思索地说:“留大人。”这倒使两条生命终于都得保存下来了。也许在他以为这孩子是意外的收获,为了他生命的不幸的遭难,然而却又倔强,就更值得宝爱了罢。

随着而需要解决的是小孩的给养问题。照医生的意思,是希望雇一位奶娘,大约诊断后料定是母乳不足的了,再三地催促,而且善意地劝告,说是住在医院找奶娘验身体更为方便些。但是鲁迅先生一定不同意,定要自己来照料。可是我们两个人既没有育儿的经验,而别人的经验他也未必一定相信,最认为可靠的,除了医生的话之外,就请教于育儿法之类的书籍。这么一来,真是闹了许多笑话,而又吃足了苦头。首先是哺乳的时间,按照书上是每三小时一次,每次若干分钟。有的说是每次五分钟,有的说是每次哺一只奶,留一只第二次,交换哺乳,较为丰足。然而人究竟不是机器,不会这样规律化的。小孩也真难对付:有时吃了几口就睡熟了,推也推不醒;有时他醒了,未到时间也不许吃,一任他啼哭。而自己呢,起先不等到两小时就觉得奶涨潮了,毛巾也几乎湿透。如是之后,再到喂奶时,已经是低潮期了,还是让小孩饿了肚皮照时间吃,于是就时常发觉小嘴巴左转右动,做出觅吃状态。这使我不安起来,和他研究一下,他说瘦些不要紧,没有病就好了。到了两个多月,患些感冒,去看医生,量了量体重,医生说这不对,孩子的重量只够两三个星期的;于是研究生活状况,由医生教我们在新鲜牛奶里面加粥汤、滋养糖等,分量照月份增加;这之后,才逐渐肥胖起来。其次是洗

浴，在医院时，每天由护士小姐抱来抱去，怎样洗浴，我们从未参观过。待到十二天后回到家里，我稍稍能够起床了，于是两人商量给孩子洗浴。他真是特别小心，不许用未曾开过的水，更不愿意假手别人。在一只小面盆里，盛了半盆温水，由我托住小孩的身体，由他来洗。水既不大热，经过空气一吹，小孩受冷到面孔发青，小身体发抖，我们也狼狈不堪，草草了事。但小孩立刻有了反应，发寒热感冒了。好容易医好之后，从此就几十天不敢给他洗浴。而且因为几次伤风，天气逐渐冷了，又怕他再感冒，连打开他的衣服都不敢了。据鲁迅先生的意思，叫我每小时看一次孩子的尿布。他总算学过医的，我自然不好反对，但结果小屁股被湿污所浸而脱皮了。没法子只得又去看医生。由医生介绍看护每天来给小孩洗浴，这才知道应该把小孩卧在温水里，并且在水中放有温度表，时常留心水的冷下去，再添热水。这样，小孩在水里就一声也不响，看来像蛮舒服的样子。以后就每天如此。

看护小姐也时常提议叫我们自己学习自己动手。但是我们吓怕了，有点气馁。鲁迅先生说："还是让她洗罢，我们洗病了，不是还要花更多的钱吗？我多写两篇文章就好了。"以后，小孩还是每天请看护洗浴，一直洗到他七个多月。这是我应当惭愧的，对于育儿实在没有研究，弄到自己不知如何是好。他也和我一样过于当心，反而处处吃力不讨好。如果我多少懂些看护以及照料小孩的常识，总可以贡献一点意见；就因为自己不懂，没有理由纠正他的过分当心，就是别人看来，我们养小孩也不是在养，而是给自己吃苦头。本来做女学生如果教授育儿法，在"五四"之后的女青年是认为不大适合的。就算听过些儿童心理学，那是预备做教师用的，和养小孩不生关系，因之我急时抱佛脚来看育儿法也来不及了。所以我想，结了婚的女性，总有做母亲的一天，最好还是有这样的研究所或指导所，对于小孩，那惠福真不浅呢。

二

女人除了在进行恋爱的时候享受异性的体贴温存之外，到了做母亲，如果是合理的丈夫，看到自己爱人为生产所受到的磨难，没有不加倍同情、爱惜的。这时候的体贴温存，也是女人最幸福的生活的再现。

但这风味稍不同于初恋时，那时是比较生疏，女性多少矜持着的。一到做了母亲，躺在床上，身体一点点在复原起来，眼前看到一个竭尽忠诚的男人在旁照料她的生活服食，起居一切，就会把不久前生产的苦痛看作是幸福，是足以回味，真是苦尽甘来的满心舒畅的一日。

那时我们的寓所在北四川路东横浜路景云里。从寓所到福民医院不过百数十步，在小孩生下来之后，鲁迅先生每天至少有两三次到医院里来，有时还领着一批批的朋友来慰问，而且带便或特意手里总拿些食用物品给我，每当静静坐下来之后，更欢喜慈祥地看着小孩的脸孔，承认是很像他自己。却又谦虚地在表示："我没有他漂亮。"这句称赞，是很满意的，后来也一直地时常提起。

在小孩子出世的第二天，他非常高兴地走到医院的房间里，手里捧着一盘小巧玲珑的松树，翠绿，苍劲，孤傲，沉郁，有似他的个性，轻轻地放在我床边的小桌子上。以前他赠送过我许多的东西，都是书，和赠送其他朋友一样。这回他才算很费心想到给我买些花来了，但也并非送那悦目的有香有色的花朵，而是针叶像刺一样的松树，也可见他小小的好尚了。

十月一日的早晨，往常这时候鲁迅先生多未起床的，但是自从小孩生下来之后，每天九时左右他就来了。很悠闲地谈话，问到我有没有想起给他起个名字，我说没有。他说："想倒想起两个字，你看怎样？因为是在上海生的，是个婴儿，就叫他海婴。这名字读起来颇悦耳，字也通俗，但却绝不会雷同。译成外国名字也简便，而且古时候的男人也有用婴字的。如果他大起来不高兴这个名字，自己随便改过也可以，横竖我也是自己在另起名字的，这个暂时用用也还好。"他是这样不肯自专自是，对我和小孩。我自然十分佩叹于他的精细周到，同意了的。从此这就算是孩子的命名了。

然而海婴的名字多是在朋友面前才叫出的。依照上海人的习惯，不知谁何，也许是从护士小姐的口里叫起的罢，"弟弟，弟弟，"就成了他日常的称呼。不过他还有许多小名，那是我们私下叫的。譬如林语堂先生似乎有一篇文章写过鲁迅先生在中国的难能可贵，誉之为"白象"。因为象多是灰色，遇到一只白的，就为一些国家所宝贵珍视了。这个典故，我曾经偷用过，叫他是"小白象"，在《两地书》中的替以外国字称呼

的其中之一就是。这时他拿来赠送海婴,叫他"小红象"。

十二天之后,得到医生的允许,我们可以回家了。自然多住几天更好,在他心里是希望我多休息几天的。不过他不时地奔走于医院与寓所之间,我晓得他静不下来工作,不大妥当,于是回去了。走到楼上卧室里,哈!清洁齐整,床边也一样摆起小桌子,桌子上安放些茶杯、硼酸水之类的常用品,此外更有一盘精致的文竹。每一件家具,尽可能地排换过位置,比较以前我在的时候调整得多了。平时他从不留心过问这些琐碎的,现在安排起来也很合式,给我一种惊奇和满心的喜悦,默颂那爱力的伟大。

他更是一个好父亲。每天工作,他搬到楼下去,把客堂的会客所改为书房,在工作的时候他可以静心,更可以免得在小孩跟前轻手轻脚,不自如,和怕用烟熏了小孩不好。在会客的时候,也省得吵闹我的休养。但一到夜里十二时,他必然上楼,自动地担任到二时的值班。而十二时以前的数小时,就由女工招呼,以便我能得充分休息。二时后至六时,才是我的值夜,每天如此,留心海婴的服食眠息。大约鲁迅先生值班的时候多是他睡足之后罢,总时常见他抱着他坐在床口,手里搬弄一些香烟盒盖之类,弄出锵锵的响声,引得小孩高兴了,小身子就立在他大腿上乱跳。倦了,他也有别的方法,把海婴横困在他的两只弯起来的手弯上,在小房间里从门口走到窗前,再来回走着,唱那平平仄仄平平仄的诗歌调子:

小红,小象,小红象,
小象,红红,小象红;
小象,小红,小红象,
小红,小象,小红红。

有时又改口唱仄仄平平平仄仄调:

吱咕,吱咕,吱咕咕呀!
吱咕,吱咕,吱吱咕。
吱咕,吱咕,……吱咕咕,

吱咕，吱咕，吱咕咕。

一遍又一遍，十遍二十遍地，孩子在他两手造成的小摇篮里安静地睡熟了。有时听见他也很吃力，但是总不肯变换他的定规，好像那雄鸽，为了哺喂小雏，就是嘴角被啄破也不肯放开它的责任似的，他是尽了很大的力量，尽在努力分担那在可能范围里尽些为父之责的了。

最怕的是小孩子生病，本来提心吊胆在招呼他，如果一看到发热伤风就会影响他的工作。在日记里，不是时常提起海婴的病吗？遇到了真使他几乎"眠食俱废"，至少也得坐立不安，精神格外兴奋。后来小孩大到几岁，也还是如此。除了自己带着看医生之外，白天，小孩病了，一定多放在我们旁边，到了夜里，才交给佣人照应，一定也由我们不时到她们卧室去打听。小孩有些咳嗽，不管在另一间房子或另一层楼，最先听到的是他。为了省得他操心，我每每忍耐着不理会，但是他更敏感，时常叫我留心听，督促我去看，有时听错了也会的，不过被他猜中的机会更多。遇着我睡熟了，如果不是咳得太厉害，他总是不叫醒我，自己去留心照料的。一个孩子他就费这许多心血，无怪他在日译《〈中国小说史略〉序》里说："一妻一子也将为累了。"的确是的，他时常说：有了我和海婴的牵累，使他做事时候比较地细心，时常有更多的顾虑。不过我是不大明白的，莫非他在上海晚年的生活，比以前更稳当些吗？或者只是在遇到风声不大好，他比较地肯躲起来一下罢。在我是担心他意外或意中地遇难，对于这，我们有时也起少许的波澜。每逢遇到他应友人邀请外出而没有依时回来，那我在家中遭遇的煎熬，凡是个中生活的人都体会得到的罢。尤其是这种操心，不能向在左右的人们说出，而在夜里，虽然绝不愿意想到什么万一的意外，却是首先总会想到的，甚至在脑中描出一件意外：一个人浴血躺在地上，但我是安坐在家里，让血在沸腾着，焦躁地对着灯儿，等待那人不来，坐也不是，睡也不是，看书也不是，做事也不是的时候，真是闻足音则喜，竖起耳朵，在等待听到那钥匙触到门锁的响声，就赶紧去开电灯，把满心的疑虑变成自觉是多余的庸人自扰了。这时，一面喜悦的埋怨声，一面抱歉的在说明。像闪电的瞬息，遇到了，在互相拥抱的欢慰的眼光中。

如果不是时常念兹在兹地想到工作，鲁迅先生也许会成天陪着小

海婴玩的。即使工作很忙，每天至少有两个预定的时间必定是和海婴在一起。这就是两餐之后，女工在用膳时，一面为了不使小孩打扰她们吃饭的便利，一面借此饭后休息的时间，海婴和我们一同在房里。有时鲁迅是欢喜饭后吃少许糖果或饼干点心之类的，他会拣几块放在桌子角上，自己慢慢地吃。海婴跑来了，第一眼看见先冲到他跟前，毫不客气地抢光，有时还嫌不够。如果还有，当然再拿些出来给补充，若是一点也没有了，吃了他的也并不怎样，反而似乎很心甘情愿的。这时鲁迅先生多是靠在藤躺椅上，海婴不是和他挤着一张椅子在并排躺下，就更喜欢骑马式地坐在他的身上，边吃边谈天，许多幼稚的问题就总爱提出来：

"爸爸，侬是谁养出来的呢？"

"是我的爸爸、妈妈养出来的。"

"侬的爸爸、妈妈是谁养出来的？"

"是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养出来的。"

"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一直从前，最早的时候，人是哪里来的？"

这样子追寻到物种原始来了。告诉他是从子——单细胞——来的，但是海婴还要问：

"没有子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问题不是几句话可以了，而且也不是五六岁的幼小心灵所能了解，在盘问了许久之后，回答不清了，就只好说：

"等你大一点读书了，先生会告诉你的。"

有时觉得在一张藤椅子上两个人挤着太不舒服，就会到眠床上去，尤其夏天夜里熄了电灯，这时海婴夹在两个人当中，听讲故事。高兴了，他会两面转来转去地吻我们，而且很公平地轮流吻着。在有一天的夜里，大约是鲁迅先生还没有生病的前一年，照例地躺在床上，海婴发问了：

"爸爸，人人是那能死脱的呢？"

"是老了，生病医不好死了的。"

"是不是侬先死，妈妈第二，我最后呢？"

"是的。"

"那么侬死了这些书那能办呢？"

"送给你好吗？要不要呢？"

"不过这许多书那能看得完呢？如果有些我不要看的怎么办呢？"

"那么你随便送给别人好吗？"

"好的。"

"爸爸，你如果死了，那些衣裳怎么办呢？"

"留给你大起来穿好吗？"

"好的。"

就这样子，谈笑而道之的。听的时候，觉着小孩的过于深谋远虑，以为说笑话般的，小孩子的问话，不料不久就像成了豫立的遗嘱而实现了。

鲁迅反对小学教师的鞭打儿童，但有时对海婴也会加以体罚，那是遇到他太执拗顽皮，说不清的时候。但直至他死，也不过寥寥可数的不多几次。要打的时候，他总是临时抓起几张报纸，卷成一个圆筒，照海婴身上轻轻打去，但样子是严肃的，海婴赶快就喊：

"爸爸，我下回不敢了。"

这时做父亲的看到儿子的楚楚可怜之状，心软下来，面纹也放宽了。跟着这宽容，小孩子最会体察得到，立刻胆子大了，过来抢住那卷纸筒问：

"看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他是要研究纸里面包藏些什么东西用来打他。看到是空的，这种研究的迫切心情，引得鲁迅先生笑起来了。紧跟着父子之间的融融洽洽的聚会，海婴会比较地小心拘谨一些时。

在别的时候，海婴也会来一个发表意见的机会，他说：

"我做爸爸的时候不要打儿子的。"

"如果坏得很，你怎么办呢？"鲁迅问。

"好好地教伊，买点东西给他吃。"

鲁迅笑了，他以为他自己最爱孩子，但是他儿子的意见比他更和善，能够送东西给不听话的孩子来做感化工作，这不是近于耶稣的打了右脸再送左脸去的忍耐吗？实际却未必能真做得到罢。

我也会打海婴的。小孩子最聪明不过，他看到女工们的迁就他会格外泼辣；看到我怕他吵闹，尤其在鲁迅睡熟或做工的时候，他会更吵

些。或者也许是我更神经过敏些，这就引起我的禁制和他的反抗，以至于打。但做父亲的，打完之后，小孩走开可以不理，做母亲的，遇到的机会一多，看到小孩的被打后惶惑之状可掬，有时是不自知其过犯的，能不心回意转，给以慈爱的抚慰吗？这样子，母子之间的威严总不会建立起来。有过连鲁迅先生也不会了解这，他总觉得他对付小孩是对的。也真晦气，海婴对于我虽不怕，但对于他的打却怕，有时候问他：

"爸爸打你痛不痛?"

"不痛。"

"打起来怕不怕?"

"怕的。"

"妈妈打你怕不怕?"

"不怕。"

在有一次我责备他之后向鲁迅先生谈起，我说，每次在责骂过海婴之后，他总是要我加以抚慰才算了事的呢。鲁迅先生很率然地说：

"那里只是海婴这样呢?"

我才像彻悟过来似地说：

"啊！原来你也是要这样的吗？我晓得了。你无意中说出心底的秘密来了。"

这可见他的性情和小孩子多么像，人们说的"赤子心肠"，正可以给他做天真的写照。其实我并不会怎样责骂过他，只是两个人相处惯了，大大小小、内内外外的不平、委郁，丛集到他的身上，在正没好气的时候，如果我再一言不慎，这火山立刻会爆发，而且熔岩就在浇到我头顶上来。的确，如果不是我温静地相慰，是不易了事的呢。

有些时候我也很为难，譬如在饭后的其他时间，海婴也会走到房里来的，以他特别对海婴的慈爱，和小孩的善于揣测成人，自然走到比较欢喜他的人跟前，而欢欣亲切地跑到他面前了。他能板起脸孔叫他出去吗？不能的，就是在最忙，也会放下笔来敷衍几句，然后再叫我领他去玩。有一回，他的稿纸正写到一半，海婴来了，看到他还未放下笔，出乎意外地，突然，他的小手在笔头上一拍，纸上立刻一大块墨，他虽则爱惜他的心血铸出来的东西，但并不像发怒，放下笔，说："唔，你真可恶。"海婴飞快地逃开了。

我是经常在旁的，除了有事情走开之外；尤其海婴来了，就是他和他玩，我也要陪在旁边，到小孩六七岁还如此。这不是他的命令，而是我自动地认为要这样做才好。女工是更不了解他的脾气和小孩的心情的，小孩在我们房间，女工来了也会不知所措。在写字台上，海婴欢喜立在椅子上拿起笔来乱涂。鲁迅是很珍惜一切用具，不肯随便抛弃小小一张纸，即便是包裹东西回来的纸张，也必摊平摺好积存起来。包扎的绳子也一样，一束一束地卷好，放起，遇到需要的时候应用。但对于海婴索取纸张时，就是他最欢喜的，给他乱涂，也是满心愿意的。有时倒反而是我可惜起来了，我以为小孩子无知，应该晓谕，不好随便糟蹋。但他更珍惜儿童时代求得的心情，以他小时候的经验，教训过他，总多方给他满足。我不便过分制止他对小孩的依顺，然而因此海婴也许到如今有时还不大会爱惜物件。

在他身边玩得看看差不多的时候了，我会提议叫海婴走开，省得误了他做工，遇着他高兴，会说：

"不要紧的，让他多玩一歇罢。"

或者说：

"他玩得正高兴，不肯走的，让他在那里，横竖我不做什么。"

那么我要察言观色，看看他是否急要做事，再看海婴是否到了适可而止的机会；如果错过了机会，或者不晓得他在忙于工作，或者以为他们父子间正欢畅地谈天，不好蓦然叫开，等之又等，才由他开口叫海婴到别处玩的时候，等他去后，也许会感慨地说：

"把小孩交给我领了几个钟头了。"

在同小孩玩的时候他是高兴的，我又不敢打断他们兴致——再把小孩叫开，但是走后他马上又珍惜时间的浪费，他是这样地克制着，为了和爱子周旋都觉得太过长久了。这更使得我在彷徨无主中度着日常的生活。

不过自从有了海婴，我们的生活比较复杂讲究些了，第一是用人方面，以前两个人是没有请人的，衣服的洗净和房屋打扫，是每天托建人先生的女工来一次，再早晚给我们拿些开水来，煮茶是我自己动手的，到了吃饭时候，来通知了，我们就到建人先生的住房里，五六个人一同吃。四五样普通的小菜，吃到后来不大有了，也还是对付着，至多不过

偶然买些叉烧之类助助餐。这种生活，比较起一般小家庭还要简单，差不多如是者有二年之久。海婴生下之后，首先尿布每天要洗许多次，再要帮忙照料小孩，非添一个人不可，于是才雇了一位女工。

第二是住室方面，总是拣最风凉的给小孩睡。冬天，也生起火炉来了，海婴卧室一只，鲁迅也叨光有一只。不过火炉之于海婴，总不能算是“恩物”。前面说过，我的值夜是从二时到晨六时，六时一到，马上去叫醒女工，一面给海婴喂奶，一面让女工去把楼下鲁迅的书室生起火，然后叫女工在下面招呼孩子，让我可以再歇息一会儿，照例到早上九时才再喂奶。那里晓得我们的苦心，给女工通通推到河里去了，房间生了火炉，热度颇高，在晨间的低温之下，她就经常抱着小孩开了临街的小窗和男朋友聊天，可怜这初生至六七个月的婴孩，在半冷半热中受着磨炼。抵抗不住了，就时常伤风，但我们那里料想得到？待到小孩七个月，我们搬家了，才把她谢绝，之后，才有人说到如此这般的情形。

一九三〇年三月，鲁迅因参加“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等集会，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同时也呈请通缉，鲁迅第一次避难在外，寄寓在内山先生家里的假三层楼上。每隔三两天，我抱了海婴去探望一次，这时海婴已经有半岁了，很肥胖可爱。为了避难在外，使他不能够每天看见他的爱子，相见了，在这种环境中，心情是相当说不出的难受。到了海婴六足月的一天，他还冒着侦缉者的嗅觉之下，走出来同海婴到照相馆去拍照，这时海婴还不会站立，由他蹲在桌子后面扶持住，才成一张立像。

压迫的波澜似乎有些低下，重又回转寓所。但寓所位在闸北，随时有可能被拘捕的一个极恶劣环境之下，迫使我们另觅新居于北四川路，杂在全是外国人住居的洋房里。刚刚安顿不久，就遇到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柔石被逮事件，他和冯铿都曾经到过我们住所，而且传出来的消息，也从柔石探问过鲁迅，这直接的追求，可能无辜被逮的。只是他一个人出走也不大妥当，我们在患难中也不能共生死在一处吗？还是把我们留在原处实在不好，这回是三个人连同女工一位，租了一间外国旅馆，住下来了。这时海婴不过一岁零三个月，刚学走路，在窄窄的一小间房里，较暖好的大床，让给海婴和女工睡，我们是在靠门口的一张比较小的床上。避难是不能带书籍和写作的工具，更难得有写作的心情

的，除了烤烤火，和同住的邻客谈谈天之外，唯一的慰籍，就恐怕是海婴的天真，博得他几许的欢笑。

然而举家避难，负担实在不轻，所以后来简直对于时常传来的危机，是由他去了。而且海婴也逐渐长大，会找爸爸，同了他去，也会说出在什么地方，不使父子相见，事实也难做得到，因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听其自然了。最后的一次避难，在一九三三年八月，那是因为两位熟识的朋友被捕之故，但已经不大像避难，白天仍然回到家里，只是夜饭后住在外面就是了。

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炮火在将次停止的时候，夹住在难民堆中的海婴，染了疹子，为了清静和取暖的方便，鲁迅急忙向旅店找到两间房子住了十天。疹子退净，我们就搬回北四川路寓所，因着生活的动荡，女工的告退，战后物质购置的困难，劳瘁之后，三个人都先后生病了。海婴是疹后赤痢，接连几个月都没有好，每天下痢许多次，急起来，就抱着下在白洋磁罐上。每次的便痢，鲁迅一定要亲自看过，是否好些了，看完之后，就自己去倒在抽水马桶内，劝他交给女工，他是不大肯的，是否怕不当心传染开去呢？有时因了龌龊而加以劝告，但他的答覆是："医生眼里的清洁，不是看表面，是看有否消毒过，平常人所说的龌龊是靠不住的。"这种不问大小亲力亲为的态度，有些朋友暗地批评他太过分心了。但不晓得他一向是自己动手惯，自然会有这样的脾气，而况对于他的爱子，他能不留心吗？平时海婴生病了，生病期中的粪便，一定要留给他看过才可以倒去，比较严重的赤痢，自然更不放心了。他是深晓得医学上的从粪便诊察病情的，既然如此留心小孩的生病，照料和陪着去看病等的繁琐任务之下，因之每次海婴生病，就是给他的一种重累，甚至也妨害到写作，这是我所看了不忍的。如果再多添几个小孩，真会把他累死。

每年至少有一次，在海婴生日那天，我们留给他作为纪念的礼物，就是同他到照相馆去拍照，有时是他单独拍，有时是三个人同拍。值得纪念的照相有三张，一张是海婴半周岁时，鲁迅先生特从逃难处走到外面，一同到照相馆，由他蹲着，以双手支持海婴的立像，另一张是他五十岁，海婴周岁时，他抱着海婴照了之后，亲自题了两句诗："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他题好之后，自己说："这两句译成外国文，读起来也很好

的。"再一张是在海婴四周岁时，冒着暗沉沉的将要暴雨的天气，我们跑到上海最有名的一家外国照相馆去了。如果是迷信，这一天真像预示我们的否运到来，走到照相馆的门口，不久就是决了堤一样的大雨从天上倒下来，几乎连回家也不容易。以后就更没有三个人一同拍过照了。而这一张，就是流传在外面最容易见到的。另外的礼物，有时也买些糖果、点心、玩具做赠品。在临到海婴六周岁，他逝世的前一年，就更加郑重地做了一次生日，先是带着到大光明去看电影，出来又到南京路的新雅晚餐，在海婴是满高兴的，他也为他的高兴而高兴。但总排遣不掉他那种急迫的情绪，有时会忽然呆起来，或坐立不安，急于要回家照常工作之状可掬。

至于他自己的生日，活着的时候，我们共同生活以来，每年这一天，我多少总预备些他喜欢吃的菜肴之类，算作庆祝。

今天在执笔的时候，正是阴历的八月初三日，很巧合的，是鲁迅先生的，也是我母亲的生日，母亲死得很早，生日怎样做，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死了之后，每年这一天，家里一定做些菜，烧点纸钱，祭奠一番。自他逝世之后，也度过了两次生辰了，固然我没有做过菜来祭奠，连到坟头去走一趟纪念一下也不可能！就是买些鲜花贡献在照片跟前也没有做。不是忘记，不是俭省，而是我心头的迷惘，只要蓦然想到他，随着忆念，我会突然地禁不住下泪。这无可补偿的损失，尤其对于我，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动作可以弥补，或慰藉一下的。至如无论什么举动，加之于他，我总觉得不称意。想到今天他活着时候，我的欣快，彼此间的融洽，是给我现在更深刻的痛苦的对照，直至永远。

实在因为体力之故，在马路上海婴多由我带领，或抱在手里。如果在这时候，我手里拿的东西，他一定抢过来自己拿，也是一种分担责任之意罢。遇到坐在车子里，总是叫海婴在当中，两旁的我们，由他招呼着，一定要把脚拦阻住，有时更加用手扶持，防他跌倒。一句话，小孩在他旁边任何时候，都是用全副精神留心着他的起居动定的，太费神了，往往在走开之后，这才舒一口气。如其夹坐在我们当中的海婴指东画西地鉴赏马路，提出疑问，他就会和我作会心的一笑，对海婴真是"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把人家兄弟之爱易作父子之爱的。

在炎夏的夜里，晚餐之后照例是海婴在我们旁边，遇到他高兴了，

会约同出去散步，或者到朋友那里闲坐。更多的机会是到内山书店，这时海婴首先把放在书架旁的梯子抢到手，一定爬到顶层，睥睨一切，自得之至。然后从内山先生那里得到糖果点心或书籍之类，时常是满载而归的。有一天，照例散步回来，至附近吃过冰结淋之后，海婴还不肯回家，而且对坐汽车有特别兴趣，他也就特从其好，三个人坐着车子，由北四川路底向江湾兜风，一直开到体育会才转回来。那里路宽人静，真是畅所欲行，在上海的特坐汽车兜风，这算是唯一的一次闲情逸致，也可以说是有了海婴之后生活的变化，以前我们整天是书呆子，那里想到会去兜风的呢。

从前这书呆子的他，除了到书店去，其他的什物店是头也不回地走过的。有了海婴之后，他到稍远的地方，一定要到大公司的玩具摊上，留心给小孩拣选玩具。最欢喜买回来的，是那用丝线旋紧再放下来急转的洋铁做的一种陀螺。点心罐头之类有时也会买来。遇到朋友请吃点心，倘使新出品，他会留起一两件带回，尤其到外面时间比较长久了，海婴就会说："爸爸还不回来，一定有好东西带来的罢。"所以他一回来，在门口等待的他，一定夺取他手中的包裹检查一下，要是投其所好呢，就欢跃而去。如果带来的是书，失望了，他一定抱歉而又预期答应好，须一定给他买。为了这新的需要，迫使他不能专注意于书，别的店铺也留心到了。

对于孩子的性教育，他是极平凡的，就是绝对没有神秘性。赤裸的身体，在洗浴的时候，是并不禁止海婴的走出走进的。实体的观察，实物的研究，遇有疑问，随时解答，见惯了双亲，也就对于一切人体都了解，没有什么惊奇了。他时常谈到中国留学生跑到日本的男女共浴场所，往往不敢跑出水面，给日本女人见笑的故事，作为没有习惯训练所致的资料。这也正足以针对中国一些士大夫阶级的绅士们，满口道学，而偶尔见到异性极普通的用物，也会涉遐想的讽刺，这种变态心理的亟须矫正，必须从孩子时代开始。

普通知识的灌输，他并不斤斤于书本的研究。随时随地常识的晓谕譬解；便中有时对于电影的教育，也在娱乐中采得学识的一种办法，他是尽着机会做的。他自己对旧式的背诵似乎很深恶痛绝。对一般学校的教育的制度也未必满意。如果他较年轻，有了孩子，我想也许自己

给以教育的。可惜海婴生下之后，人事的匆促，他未能照顾到他的求学方面。然而在现时的学校，读到大学毕业，甚至留学回来，是否个个都成器了呢？还是疑问。因此孩子入校读书情形，可以说在他是并不怎样注意的，而且他自己所学和所用的也并不一致，还是自修要紧，在他想来或者如此。看看海婴，的确在他旁边，时常问东问西的，增加了不少常识。

到了现在十足岁了，离他死已三周年了，海婴还不过读到小学的三年级，有些常识，却超过五六年级的儿童所晓得的。但海婴并不满足，他时常说起："爸爸如果现在还没有死多好，我有许多许多不明白的都可以问问他。"我听了除了惭愧自己的学力低浅而外，对孩子是没法填补这缺憾的了，然而社会像海底的宝藏一样繁复、灿烂、深潜、可喜、可怖，我将把孩子推到这人海茫茫中，叫他自己去学习。"只要他自己学好，父母的好坏是不在乎的。中国社会向来只看本人的成就，所谓英雄不问出处，父母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有时谈到孩子的将来，鲁迅先生往往就这样说。他没有一处不是从现实着想，实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他可以算是拿到这秘密的锁钥了。因之我也不是打算把海婴送到海里一让他给淹没。他应该训练自己，他的周围要有有形无形的泅泳衣来自卫，有透视镜来观察一切，知道怎样抵抗，怎样生存，怎样发展，怎样建设。鲁迅先生活的时候，给予他的教育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多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他自己生长于大家庭中，一切戕贼儿童天真的待遇，受得最深，记得最真，绝对不肯让第二代的孩子再尝到他所受的一切。尤其是普通所谓礼仪，把小孩子教成木头人一样，见了人都不敢声响的拘拘为仁，他是绝不肯令海婴如此。要他"敢说、敢笑、敢骂、敢打"。如果我们错了，海婴来反驳，他是笑笑地领受的。因此，海婴直到如今，和普通小孩在一起，总觉得他太好动，太好研究一切，太不像守规矩的样子，就这样罢，我们的孩子。

(1939 年 8 月上海《鲁迅风》)

鲁迅先生的娱乐

在北京或更早期的鲁迅先生，他是怎样娱乐的，我不大清楚。只晓得也独自去看电影，但是一定不怎么多，因为那时的学校和教育部都是欠薪，他一直负债，到将离开北京的时候。比较做得到的娱乐是到中央公园去，有时是去个半天，但是在那里做什么？我不知道，也许到公园里的图书馆罢，不过一定不会赶人多的热闹场所，那是可以肯定的。

倘若说环境可以移人，或者这环境的确没有什么可资消遣，稍息一下疲劳的话，则有时的从俗一下是未始不可的。在广州，我们也时常到专门的茶室去吃茶点，那些点心真精致，小巧，并不太饱，茶又清香，都很合口味。而生活除了教书之外，着实单调，遇到朋友，就不期然地也会相约去饮茶了。

初到上海的时候，他经常给《北新》半月刊写稿及译《近代美术史潮论》，自己又编《奔流》和《语丝》，后来《语丝》请柔石先生代劳，他就给朝花社计划一切出版事业：除了选择译稿的材料，计画书面装帧，或自己执笔之外，做锌版也是要他选材料，跑制版所的，有些制版所因为他的生意相当忙，而且样子又质素，认为是跑街之流的人物，特别给他一个九折。他意外地得到的优遇，有时为了顺便，就会多做几个锌版预存起来，总计大大小小的不下一千多个，都是他自掏腰包，自去奔走得来的，现在却不晓得流向什么地方，无从查究了。

他外表的质素，在另一个地方，也被优待着，那就是福民医院。因为日语的流畅，许多朋友看病都请他同去任翻译，这些地方是有求必应，从不拒绝的，于是医院里面原雇的译员以为是来抢生意了，对他是

面子客气，心里不大乐意的。而那账房先生呢，看到病人有自己雇用的译员，看作是阔人了，价钱格外不便宜。这情形好久才知道，因此我们自己在看病的时候，也并不上算，倒是吃他那翻译员资格的苦头，待到晓得了之后，给他作为谈助之资的笑柄好些时。

工作的过分忙碌，是没有余暇想到娱乐的。在初到上海的时候，看到别人的急急忙忙赶去看电影，有时恰巧鲁迅先生去访问不遇怅然而返的时候，他往往会含着迷惘不解的疑问说出一句："为什么这样欢喜去看电影呢？"

那时他常去的地方，是书店或图画展览会。有一次，到南京路去看一位外国人炭笔或铅笔画的中国题材的图画，很新颖别致，他买了两三幅回来，预备做印书时的插图。但偶然也去看电影，却不多，比较多的时候，是后来的几年。

开初我们看电影，也是坐在"正厅"的位置的。后来因为再三的避难，怕杂在人丛中时常遇到识与不识，善意或恶意的难堪的研究，索性每次看电影都跑到"花楼"上去了。同样的理由，我们一同出去的时候也很少是坐电车的，黄包车尤其绝对不肯坐，因为遇着意外逃躲不方便，要不是步行，比较远的就坐汽车。这是他尽可能的戒备了，却并没有因此不出去。正相反，愈是空气紧，他愈是在家里坐不住，几乎每天都到外面走一次，这个脾气，也许可以说是人类的冒险性，不甘压迫性罢。譬如平常人，在家里十天八天不出去是很不足为奇的，但到被拘留了片刻，就羡慕起外面走过的人们，甚至冒了生命的危险走去求得到自由的人们也不少。鲁迅先生那时的心情也许如此的罢，愈是压迫，愈要出去，宁可多花费些，坐汽车，坐"花楼"。

如果作为挥霍或浪费的话，鲁迅先生一生最奢华的生活怕是坐汽车，看电影。

而一些书店老板，或迎合老板讨好的人们，在纷纷互相告语，说："鲁迅真阔气，出入汽车，时常看电影。"他们自以为"给予"了鲁迅若干版税，每月从百谣传，扩张为几千，上万，再拿鲁迅的实生活证明他们的恩惠和宽容，而不问他们拿着著作人辛勤的血汗所得，来作自己一切活动的基础，甚而悖入悖出地各自竞相攘夺，而独对于著作人拿他自己所应得的权利，自己自由支配到仅有的娱乐上，却期期然以为不可。希望他最好像老

僧人定般不眠不食，光是做工才觉满意似地，甚至死后看到他的日记，时常写出看电影，也失望了，以为鲁迅的生活应该更苦些才是，意思仿佛很不应该似的。我们从这里看到社会对于他的残酷冷遇，而对于一些从文人转到做官了，做书店老板了的人们，倒从不说一句话，而看看电影，却义形于色了，这真是叫做“岂有此理”。

我是不忍也不肯劝阻，有时他提议去看电影，却总是首先赞成的。真是人生几何，他苦磨了一世，历尽饥寒交迫，穷愁潦倒到头发白了，去看看电影，来苏息一下，苏息之后，加倍工作的补偿，所贡献于社会的，难道不能说是好成绩，难道这也算是越分之举？老实说，他不但看电影，而且每次的座位都是最高价的呢，如果这也合该给一些不满意的人们做材料，我现在就更老实说出来罢，他的意思是：看电影是要高高兴兴，不是去寻不痛快的，如果坐到看不清楚的远角落里，倒不如不去了。所以我们多是坐在楼上的第一排，除非人满了，是很少坐到别处去的。另外一点小原因我想是，总和我一起去，我是多少有些近视的，为了方便我，更为了我的满足而引为满足，他一定这样做。这样做了他更高兴，所以我也为了他的高兴而愿意依从他，从没有拒却过，这是我们间的私事了。但也可见他虽则娱乐之微，也不全凭一己的成见。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愿意费许多时间去空等，普通座位，容易客满，早去竞争，他是不肯的，只得花较大的价钱坐对号位子了。

看过的电影很多，有时甚至接连地去，任何影院，不管远近，我们都到的，着重在片子，因为汽车走得便捷，没有什么困难。他选择片子并不苛刻，是多少带着到实地参观的情绪去的，譬如北极爱斯基摩的实生活映演，非洲内地情形的片子等等，是当作看风土记的心情去的，因为自己总不见得会到那些地方去。侦探片子如陈查礼的探案，也几乎每映必去，那是因为这一位主角的模拟中国人颇有酷肖之处，而材料的穿插也还不讨厌之故。历史的片子，可以和各国史实相印证，还可以看到那一时代活的社会相，也是欢喜去看的。击剑之类的片子，如《三剑客》等，偶然也去看，但并不十分追求。五彩卡通集及彩色片，虽然没甚意义，却也可以窥见艺术家的心灵的表现，是把人事和动物联系起来，也架空，也颇合理想，是很值得看的。滑稽片如劳莱哈台的《从军乐》、《玩意世界》，以及贾波林的《城市之光》，都还好。有时一些儿童片是为了

带海婴而去看的，结果他看了也蛮高兴，他是随时都保存着天真的童心的。《仲夏夜之梦》，刚开映于国泰时，真是口碑载道，场场客满，甚至我们信了宣传，特意跑去，也买不到票子，再赶看下一场，然而结果却使他失望，虽然有些新奇，似乎别开生面，却并不能说好的意义在那里。代表时代的新事物如《科学怪人》之类，也曾经去看，而且有时虽不十分满意也看完续集，不过总不见得怎样佩服。似乎有一张片子，名字记不清楚了，或者是《未来世界》罢，房子通是水晶状透明的，电梯可以通到天顶那么远，但是眼底一览无余了，使人类生活复入于太单调化，也许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呢。战争片子或航海、航空演习片，也喜欢去看，原因觉得自己未必亲自参战，或难得机会去看实际的飞机、兵舰之类罢。至于苏联片子，是每张都不肯错过的，比较上最使他满意的了。最后看的一次《复仇艳遇》，是在他逝世的前十天去看的，最令他快意，遇到朋友就介绍，是永不能忘怀的一次，也是他最大慰藉，最深喜爱，最足纪念的临死前的快意了。国产映片，在广州看过《诗人挖目记》，使他几乎不能终场而去。那时的国产片子，的确还幼稚，保持着不少文明戏作风，难以和欧美片竞争，实在也难得合意的选材。从此之后，对于国产片无论如何劝不动他的兴趣。后来《姊妹花》之类轰动一时的片子，他也绝对不肯去看了。

晚间，小孩子睡静了，客人也没有，工作也比较放得下的时候，像突击一下似的，叫一辆车子，我们就会很快地溜到影院里坐下来，我们多是穿的不大注目的深色朴素衣衫，在影院里极力不往周围观看，或回头研究；因为我们不须研究别人，同时别人看不出是我们更好。有时也会约朋友一起去，多起来是七八个人一道。有些时候，如果时间早，就会弯些路，走到建人先生家里，约他们同去的。有一回，向茅盾先生要求，借他的儿子一下，茅盾先生莫名其妙地答应了，之后说明是请他儿子看电影。他们也住在大陆新村，隔得不远，他的小孩正每天发热休养在家，鲁迅同情他儿子的沉闷地养病，特别约他出去，那时茅盾先生的儿子大约已经有十二岁了，但是走在路上他还不放心，一定要拖着他，弄得那十二岁的孩子窘了，他回去对他的母亲似乎诉说他的疑惑，为什么这样大还要人拖呢，他平常到学校里读书，早已是自己走来走去，没有接送的了。

他有时娱乐，更欢喜和别人一同领受这仅有的娱乐机会。

更阔气的一次看电影，在一九三五年，时间似乎是初秋，由一位熟朋友通知：有一个地方请看电影，家属也可以同去，是晚上七时到那里。同去的人，有茅盾先生，来约的时候，刚巧黎烈文先生也在我家，于是带着海婴，五个人坐在预备好的汽车，开到一个停车处，遇到宋庆龄先生和史沫特黎女士，再一同转弯抹角了一通，然后停在一个大厦的前面。走了进去，出来招待的是苏联大使夫妇和驻沪领事，先是开映电影，《夏伯阳》那一张片子在电影院还没有开映之前先看到了。房间的结构很精致，座位十多个，正好看得清楚，招待的人还随时加以口头解释，有几位讲得一口流畅的北京话，所以言语上也还方便。看完电影，差不多九时了。正要告辞，却被招待到另一个修整的房间里，盛宴款待，却是还不过算作点心而已。席上各式名酒，每人酒杯大小有六七只之多，鱼的种类很多，光是鱼子，除了普通见到红色的之外，还有一种黑色的，据说最名贵。点心也真多，其实各种各式的菜更多，末了各种难得的水果和茶、可可，真是应接不暇。可惜那一天我们都吃了饭去，鲁迅先生又正发热，吃不下多少，但在他，恐怕是毕生最讲究的宴会了。这时苏联国内一般物质生活还未十分完善，然而就在这一宴会的招待上，可见人们所想到革命后的苏联，以为满脚泥污的人们，走到豪华的所在的万不适称的不相符合，正相反，他们在一切周旋上都很能体会得到，席间并且特别开起在苏联新获奖的《渔光曲》以娱宾客。后来大家都到下临苏州河的凉台上乘凉，这时集中的谈话就是邀请鲁迅先生到苏联观光。旁边赞助最力的是史沫特黎女士等。她们已经看到他憔悴的颜容，不堪重压的躯体，为了中国，希望这一位哲人多活些时，善意真可感激。在鲁迅先生自己呢，经过长久的考虑，第一，他以为那时正在迫压最严重，许多敢说敢行的人，都先后消沉，消灭，或者不能公开做他们应做的工作，自己这时还有一枝笔可用，不能洁身远去。第二，他自己检讨，对社会人类的贡献，还不值得要友邦如此优待，万一回来之后仍是和未出国前一样的做不出什么，是很对不起的，一定要做出什么来呢，环境是否可能也难说。第三，照他自己耿介的脾气，旅费之类是自己出最好，自己既然没有这能力，就是给一般造谣者的机会，不是并不一动，就已经说他拿卢布吗？固然为了谣言而气馁，鲁迅不至于如此的乏。不过自

量权利义务不相当，他惭愧，因而绝不肯孟浪，还不如仍旧住在中国随时做些于人有益于己安心的工作。这结论，他坚决执行到死。中间不断的几次三番，直接间接地有朋友劝他出国，还是没有实行。但有一次在苏联似乎是开世界作家大会，中国方面预备鲁迅和茅盾先生出席的，后因时间匆促，临时他又患病，不能成行。如果真个动身了，以苏联医学的进步，设备的完善，或能消灭他一九三六年的大病致死于事前，然而这是回想的事了，当时也许骤然吸着新鲜空气，使肺量不胜容纳也难说的。总之，那次苏联领事馆为了他们不方便在大庭广众中出现而特别举行的招待，是给予他很深刻的感动和良好的印象的。

（1939 年 10 月《文艺阵地》第 4 卷第 1 期）

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
——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

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只不过占其全生涯的五分之一强，比较起许多他的老朋友，还是知道得不算多，写起来未必能周到。不过承好些朋友的督促，以为研究这时代的中国思想者，就是一饮一食，也可资参考的。为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拿起笔来了。然而每回谈到关于他的一切，却使我伤恸，时常眼睛被水蒸气蒙住了，以致搁起笔来。我愿意追述他，又怕追述他，更怕追述得歪曲了，丧失了我对于他的敬意。我诚然做过他的门徒，但离了学生生活之后，还是一样敬重的我的导师，我将能怎样描写我心中所愿意说的话？

"囚首垢面而谈诗书"，这是古人的一句成语，拿来转赠给鲁迅先生，是很恰当的。我推测他的所以"囚首垢面"，不是故意惊世骇俗，老实说，还是浮奢之风，不期引起他的不重皮相，不以外貌评衡一般事态，对人如此，对自己也一样。

做学生的时候，我曾正如一般顽童，边听讲边把这位满身补钉，不，满天星斗，一团漆黑，长发直竖的先生速写起来。我更很快就研究他的为什么？后来比较熟识了，我问他是不是特意做成这样的"保护色"，使人家不注意？他好像默认地笑了，这时我以为探寻到什么似的喜悦，给我猜中了罢。

其实，沉迷于自己的理想生活的人们，对于物质的注意是很相反的。有谁见过那些发明家在沉浸于学问的研求时，还时刻想到他的生活。拿表当做鸡蛋煮，和为了医学上的研究，甚至把有害生命的细菌也

吞到自己肚子里做实际试验的精神贯注,不顾一切的人,不是也听到过的吗?所以鲁迅的一种寒伧之状,正不足为奇的。

另外的原因,他对于衣服极不讲究,也许是一种反感使然。据他自己说,小的时候,家人叫他穿新衣,又怕新衣弄污,势必时常监视警告,于是坐立都不自由了,是一件最不舒服的事。因此他宁可穿得坏些,布制的更好。方便的时候,譬如吃完点心糖果之类,他手边如果没有揩布,也可以很随便地往身上一揩。初到上海的时候,穿久了的蓝布夹袄破了,我买到蓝色的毛葛换做一件,做好之后,他无论如何不肯穿上身,说是滑溜溜不舒服的。没有法子,这件衣服转赠别人,从此不敢做这一类质地的衣料。直到他最后的一年,身体瘦弱得很,经不起重压,特做一件丝绵的棕色湖绉长袍,但是穿不到几次,就变成临终穿在身上的尸衣,这恐怕是成人以后最讲究的一件了。

他对于幼年穿新衣的不自由给予深刻的印象,所以对于海婴的衣着,穿了之后,是不愿意叫他当心的。如果他的小手也揩在身上,那算是和父亲学样,满不在乎的,就是我在旁边看到的不舒服,也不好干涉,这时完全孤立了。

孔子的“栖栖遑遑”,是为的周游列国,想做官,来达到他改革社会的理想。而鲁迅也终日“栖栖遑遑”地“席不暇暖”,却为的是人手少,要急着做的事情正多,他以一当百还嫌不够,时常说:“中国多几个像我一样的傻子就好了。”“有一百个,中国不是这样了。”所以一面自己加紧工作,一面寻求精神的战士。

有些青年是那么热切地登门求教。在北京,我所见到的他的寓所,是时常川流不息地一批去了又来一批,甚至错过了吃饭的时间来陪客的。自然这其中也许有些不过是来听听他的幽默谈话,博得轻松的一笑而去。这当然对于他是一种损害,但更不乏至诚至正地来求教。他绝不忍为了宝爱自己的光阴而拒却过。有时谈兴正浓,他反而会留你多坐一会。诚挚而又沉潜,久之意气相投,和他共鸣的精神战士,以他做轴心,而放散到四面八方的不知凡几。

因为工作繁忙和来客的不限制,鲁迅生活是起居无时的。大概在北京时平均每天到夜里十——十二时始客散。之后,如果没有什么急待准备的工作,稍稍休息,看看书,二时左右就入睡了。他并不以睡眠

而以工作做主体，譬如倦了，倒在床上睡两三小时，衣裳不脱，甚至盖被不用。就这样，像兵士伏在战壕休息一下一样，又像北京话的“打一个盹”，翻个身醒了，抽一枝烟，起来泡杯浓清茶，有糖果点心呢，也许多少吃些，又写作了。《野草》，大部分是在这个时候产生出来的。

有时写兴正浓，放不下笔，直至东方发白，是常有的事。在《彷徨》中的《伤逝》，他是一口气写成功的。劝他休息，他就说：“写小说是不能够休息的，过了一夜，那个创造的人脾气也许会两样，写出来就不像预料的一样，甚至会相反的了。”又说：“写文章的人，生活是无法调整的，我真佩服外国作家的定出时间来，到时候了，立刻停笔做别的事，我却没有这本领。”

但是他的脾气也并非一成不变。在上海，头发也不那么长了，衣服也不一定补钉了，差不多的时候也肯抽出时间做清洁运动了。他并不过分孤行己意，有时也体谅到和他一同生活的别人。尤其留心的是不要因为他而使别人多受苦。所以，他很能觉察到我的疲倦，会催促快去休息，更抱歉他的不断工作的匆忙没有多聚谈的机会，每每赎罪似地在我睡前陪几分钟。临到我要睡下了，他总是说：“我陪你抽一枝烟好吗？”“好的。”那么他会躺在旁边，很从容地谈些国家大事或友朋往来，或小孩子与家务，或文坛情形，谈得起劲，他就要求说：“我再抽一枝烟好吗？”同意了他会谈得更高兴，但不争气的多是我，没有振作精神领受他的谈话，有时当作是催眠歌般不到一枝烟完了，立刻睡熟了，他这时会轻轻地走开，自己去做他急待动笔的译作。

偶然也会例外，那是因为我不加检点地不知什么时候说了话，使他听到不以为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么不痛快，在白天，人事纷繁，和友朋来往，是毫不觉得，但到夜里，两人相对的时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最厉害的时候，会茶烟也不吃，像大病一样，一切不闻不应，那时候我真痛苦万状。为了我的过失吗？打我骂我都可以，为什么弄到无言！如果真是轻蔑之极了，那我们可以走开，不是谁都没有勉强过谁吗？我不是伤痛我自己的遭遇，而是焦急他的自弃。他不高兴时，会半夜里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莱谟斯一样（用何凝先生的譬语），跑到空地去躺下。至少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像受伤了的羊，跑到草地去舔干自己的伤口，走到没有人的空

地方蹲着或睡倒。这些情形,我见过不止一次,我能这时候把他丢下不理吗?有一次夜饭之后,睡到黑黑的凉台地上,给三四岁的海婴寻到了,也一声不响地并排睡下,我不禁转悲为笑,而他这时倒爬起身来了。他决不是故意和我过不去,他时常说:"我们的感情算好的。"我明白他的天真。他对一切人可以不在意,但对爱人或者会更苛求。后来看到海婴的对我时常多方刁难,更懂得了为什么对最关切的人如此相待。受到社会上许多磨难的他,一有感触,会千百倍于常人的看法的。我同情他,但不知此时如何自处,向他发怒吗?那不是我所能够。向他讨饶吗?有时实在莫名其妙,而且自尊心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不知道要饶什么。抑郁,怅惘,彷徨,真想痛哭一场,然而这是弱者的行径,不愿意。就这样,沉默对沉默,至多不过一天半天,慢慢雨散云消,阳光出来了。他会解释似地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这是我的答话。但他马上会说:"这我知道。"

他处理他的书籍文具,似乎是比生命还着重,看看他的衣身,是不会想到这样一个相反的对照的。比如书龌龊了,急起来他会把衣袖去揩拭,手不干净,也一定洗好才翻看。书架的书,是非常之整齐,一切的文具用品,是他经手的,都有一定的位置,不许放乱。他常说:"东西要有一定的位置,拿起来便当,譬如医药瓶子,换了地方,药剂师是会犯配错药的危险的。"他处理用品,就像药房的整然有序,无论怎样忙,写完字之后,一定把桌面收理好,然后才做别的事。他的抽屉,也一样的有秩序,是不愿意人搬弄的。在北京时,他小小的寝室,经常也是会客室,怕人家随手翻乱他的书,所以爱好欣赏些的,总是藏在较不注意的地方。他更不愿意借书给人,除非万不得已,遇到来借,倒不如另买一本赠送较妥。有时送给他的丛书,为了急于把同类的包藏起来,就是我预备看时也会嫌等得太久而包起的。曹禺先生的《日出》,我就没有看完,给划然中止,好像电影正开到一半停止住了的不舒服。但是如果海婴来抢他看开的书,或翻弄他的图画书,他却从未阻止过,至多叫我在旁边帮忙照料,让他看完才收好。他对于幼小者的同情,不肯拂逆他的意志,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一样,甚至对于他酷爱的书也如此。

他对于书的看重,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人像他这样。比如人家送他

的《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的定期刊物，他看完了之后，总是每五六册做一包，扎好，写上书名和第几期至第几期，以便检查。凡是他包过的书，那方正紧凑，拆开之后，我是再也不能照样包好的。他不但包得好，对于扎的绳子也很留意，如果是好些的书，或线装本，扎时一定拣那些有浆质棉线做的绳子，免得扎的地方日久留一条线痕。就是这扁平的棉绳，扎时也要摊平，线头的结，一定要打在书的边缘，省得将来压着一个结的痕迹。有时人们送给他的定期刊物如《文学》之类，偶然收到一本装订不大齐正的，他一定另外托人再买一本较好的换过。自己印好的书，也首先拣出两部，包好起来。这爱惜的书，我很对不起，自他死后，未能好好地整理妥存起来，不免有些污损的了。

对于线装书，他也能够拆散修理，装订完好。像《北平笺谱》的线装之外，更布包角头，遇有缺页时，都是他自己拆添完善，和原来一样齐正。而且订的双线也一定使它平行，绝不肯让其绞缠一起。有时对于太旧的古书，两头都被尘埃染黑了，他也会一手紧压，一手用浮水石把它磨干净，使之焕然一新。

洋装书如果是时常用到的，他就先包一张书皮，省得龌龊。送给我的好些新书，他更欢喜把蜡光纸给包一张封面。在北京，有时到他那里，他会把四五本自己写作和别人的著作，每本都用雪白的纸包好见赠，接到手真不知如何从心底感谢呢。

他不但书包装得好，信封也做得好，大约一些老朋友还记得收到过他亲手做的信封的。在北京时，常常看见他把寄来的比较大而质厚的信封翻转面，更有时是把一张长方纸做成一只信封，非常之齐整匀称，绝不歪斜，大小异形，用一定的方法、技巧，纯熟而又敏捷，一下子做出一批来了。既能把包裹纸改成信封，真所谓化无用为有用，更于他那时的经济条件适合。但我还不了解他的苦心，反而向他恶作剧似地讽刺，把见到的纸张都叠起来请他做信封。然而他何必多作辩解呢，只笑一笑，就是了。想起来都难过，我太肤浅，类似这样的捣乱真可恶。

说到废纸做信封，我更忆起他日常生活之一的惜物。每于包裹的东西拆开之后，不但纸张摊平，放好，留待应用，而且更把绳子卷好，集在一起，预备要用的时候，可以选择其长短粗细，适当地用。自然这些无关大体的琐屑细微之极的枝叶问题，或者是毫不足道的。在一些大

人先生们或洋博士之流，何尝会把这戋戋放在眼里。而他则正惟其如此，日积月累地，随时随地可省则省，留有用的金钱，做些于人于社会有益的事。不然，不管他如何大心助人，以区区收入，再不处之俭省，怎能做到他当时所愿做的呢。

有些地方他却不愿意节省，例如住房子。我们初到上海，不过两个人，平常租一层楼就够用了，而他却要独幢的三层楼，宁可让他空出些地方来，比较舒服，虽然女工倒是不用。吃的东西虽随便，但隔夜的菜是不大欢喜吃的，只有火腿他还爱吃，预备出来不一定一餐用完，那么连用几次也可以。素的菜蔬他是不大吃的，鱼也懒得吃，因为细骨头多，时间不经济，也觉得把时间用在这种地方是可惜的。照例日常以鱼肉菜蔬做主体，但这里已经有一大部分不爱用了。爱用的还有辣椒，说起来也有一段可悲的生活在里面。据他时常说起的是：当他领受他母亲的八块钱到南京求学，到了之后，款就用完了。入学之后，再没有多余的钱可以给他做御寒的棉衣，而冬天来了，砭人肌骨的寒威是那么严酷，没有法子，就开始吃辣椒取热，以至成了习惯，进而变为嗜好，因之更是损害到胃的健康的要素之一。糖也欢喜吃，但是总爱买三四角钱一磅的廉价品。在北京时，东城有一家法国点心铺，算是那时首屈一指的了，很难得的机会，他才从收到的有限的稿费里买两块钱蛋糕来吃，而且也欢喜请我们。有时我怪问他为什么刚才不拿出来请客，他却叹息地说："你不晓得的，有些少爷真难弄，吃了有时反而会说我阔气，经常吃这样点心，不会相信我是偶然的。"这可见他的随处小心，一面我也疑心到他的过虑。但事实是：有时他知道某一位的艰困，请他们吃便饭，结果会说是他用酒食贿赂的呢，有的人就能够这样出奇，也难怪他的过虑。即使如此过虑，也还不免于谤毁的到来，所以有时他的举动，如果不是在社会上身受到多方的经验，是不大容易了解的，至少我自己觉得越过一天越加深地了解他。

人们对于他的饮酒，因为是绍兴人，有些论敌甚至画出很大的酒坛旁边就是他。其实他并不至于像刘伶一样，如果有职务要做，他第一个守时刻，绝不多饮的。他的尊人很爱吃酒，吃后时常会发酒脾气，这个印象给他很深刻，所以饮到差不多的时候，他自己就紧缩起来，无论如何劝进是无效的。但是在不高兴的时候，也会放任多饮些，例如在厦门

大学,看到办教育的当局对资本家捧场,甚至认出钱办学校的人好像是父亲,教职员就像儿子的怪论,真使他气愤难平,当场给予打击。同时也豪饮起来,大约有些醉了,回到寝室,靠在躺椅上,抽着烟睡熟了,醒转来觉得热烘烘的,一看眼前一团火,身上腹部的棉袍被香烟头引着了,救熄之后,烧了七八寸直径的一大块。后来我晓得了,就作为一个根据,不放心他一个人独自跑到别的地方。

茶饮得很多的,而且一定要清茶。在北京时,他独用一只有盖的旧式茶杯,每饮一次泡一次,很浓,是我们用起来觉得有苦味的,还可以再泡一次。到了上海,改用小壶泡茶,但是稍久之后,茶的香气会失去的,如果不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细细品茶,他就会要求另换一壶,等到新鲜的茶来了,恰到好处的时候,他一面称赏,一面就劝我也饮一杯,因此也学会吃浓茶了。

他更爱吸烟,每天总在五十枝左右。工作越忙,越是手不停烟,这时候一半吸掉,一半是烧掉的。在北京和章士钊之流的正人君子斗争,医生曾经通知过他,服药同时吸烟病不会好的,我们几个学生那时就经常做监视的工作,结果仍然未能停止,从此之后,只不过劝告减少而已。他用的烟是廉价品,遇到朋友送些好的,也不肯独用,一定分赠些给别人,共同欣赏。黑猫牌的香烟他最爱好,可惜价钱贵,难得买来吸。还有一种似香烟粗细,用烟叶做成的廉价品,吸起来似雪茄烟气味,他也爱好,但气味不好,我不欢喜,他也就不买了。偶然也吸雪茄烟,似乎并不很爱。烟灰缸却一定要深而且大,放些水,省得灰随风乱飞。烟嘴是在上海以后才经常用的,又俭省,吸到半寸长,手都拿不住才弃掉,如果那些拾香烟头的遇到他,一定没有好处,因为那一部分已经给烟油弄潮湿,不好再用了。

记不清有谁说过:鲁迅的生活,是精神胜于物质。的确的,他日常起来迟了,多在十一时许,那么午饭就吃不下了,这样一起床就开始工作,有时直至吃夜饭才用膳,也不过两三种饭菜,半杯薄酒而已。想起来却是我的罪过,不会好好地注意他的营养,到后来,好像灯油耗尽,那火光还能支持吗?

我很直白地把他的生活写出来,但并不希望我们的文坛志士因热爱他而全盘模仿。譬如因为我是他的学生,有朋友看到我对于他的一

切，恰好他的爱人也是学生，于是很神气地说："我是你的先生，我应该教你，你应当像某某一样。"又有一位听到我说过鲁迅不肯借书给人，于是他对他的爱人也如此。这未免太"那个"了。我想该大可不必的，写这篇短文的本意毫不在此。

（1939年10月《中苏文化》第4卷第3期）

鲁迅的生活之一

简单一句,鲁迅的日常生活是平民化的。

燕窝,银耳等食品,他是并不如一般人那样看重的。还有一种食品他讨厌,那就是“莲子羹”。绍兴人的老例,过新年做媳妇的是要拿莲子羹奉献给一切亲属朋友的,因之媳妇儿就只会做这一手。这些毫无意义的陋习,使他见了莲子羹就摇头。因之绝对不要吃。有时起得迟了,或者因事耽搁了正当用膳的时间,他愿意简单地吃碗蛋炒饭。“蟹壳黄”之类的烧饼,更是他的爱好品,也时常买一些来请客吃。嫩的黄瓜,也是他当水果吃的嗜好品,他爱那爽脆夹些泥土气味的农民食物。他欢喜吃新鲜的东西,不赞成绍兴人的腌菜,干菜,鱼干等等的制品。他说:“干菜和腌制的东西,都是代表农村产品,而罐头之类,是外来的文明,却是工业品。中国大部分保存食物的方法,还没有脱出农业时代。”但是他对于绍兴的臭豆腐,臭千张(豆腐的薄片)等这些臭东西却又爱吃,而且我也学会了。

衣服他是绝对要穿布制的,破的补一大块也一样地穿出来。为了衣着的随便,于是乎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他到医院给朋友当翻译,医院里面的人就当他是吃翻译饭的,大敲其病人的竹杠;到印刷所接洽印件,或到制版公司去制锌版,人家当他是商店里的跑街或伙计;到外国人的公寓去拜访,电梯司机人就当他是Boy,不准他乘电梯,要他一步步跑到九层的楼上。这些待遇,他并不恼怒,有时却把它当作笑话的资料。

在学生时代,他最高兴回忆到的是十多岁在南京,大约那时学生和警察的制服相仿,而又都是吃的官饷罢,每逢他们走到外面,路见不平因而

出来干涉的时候，警察总是站在学生这一面的。后来见到学生们请愿的时候，警察把学生当敌人一样看待，真使鲁迅感慨之至，这也是“一代不如一代”罢！那时他最得意的是骑马，据说程度还不错，敢于和旗人子弟竞赛（清朝时旗人子弟是以善于骑射自豪的，对于汉人善骑马的不很满意）。有一回就因竞赛而吃旗人暗算（他们把腿搁到马颈上，很快地奔驰过来，用马鞍来迅速地刮别人的腿脚，有时甚至可以刮断的），几乎跌下马来。由于好奇心胜，他会注意人们所忽略的，有一回在南京看到墙上贴有类似广告的一个纸印茶壶，接连地看到了好多次，他就沿着茶壶嘴的方向走，每逢到十字路口，茶壶就像示路牌似地安放在那里，照着这指示，愈走愈远，愈远愈荒僻，有些可怕，不敢再寻究竟了。过后细想，他以为一定是秘密组织者的符号，如果孟浪走到，是很危险的。

从南京回绍兴去省亲，通常坐的“长江船”，做学生时，他经济并不充裕，铺盖行李，照例是自己拿，绝对不肯花些钱，叫脚夫代劳的。在船舱里，一向的积习是有人先到，一件破衣，一条绳子，或一支担杆，各占一个床位。他一任那些强横者的恐吓，决不肯出钱来买床位，宁可守住行李，坐在行李上装打盹，毫不理睬。等到船快开了，那些强横者赶他也不动，到最后，强横者没法子，只好拿着绳担和衣服，愤愤而去，任凭他从容地拣选最好的床位，打开铺盖，舒舒服服地休息。这里他也利用“韧”的战略，他始终不畏强暴地和恶势力争斗，从做学生起就如此的。

在旅途上，他的生活比平常较闲些。大约这时他不执笔写字，暂时可以休息，所以路上食量较在家好，而且也不晕船。如果能够利用旅行来调剂他的生活，对于身心一定都有益处，可惜他没法子打破上海生活时期天罗地网似地密密重重的密令通缉，因之到了临死前，还没法离沪休养去。他的行李，在出门前是自己检点，预备，甚至卷铺盖，捆绳子，都是自己动手，都捆得坚实，紧凑，齐整，像他的包扎书籍一样。最后两次的回京省亲，年纪虽然大了，也还是如此。亲力亲为，无分大细，也不骄，也不馁。一九三一年，避难住在旅馆的时候，有一位叫老杨的工友，当他是老教书先生，天天跟他围炉子谈天，叫他代写家书，简直不晓得他是鲁迅，这就是十足的鲁迅。

（1939年10月25日上海《职业生活》）

鲁迅的生活之二[①]

鲁迅的生活，后期的十多年，我稍为知道一点，现在就把记起来的说一下。

凡认识先生的人，没有不晓得他的特点的。他无论对什么人，都不摆架子，尤其对青年，即使是初次通信和见面，也绝无俨然可畏之状，反觉蔼然可亲。他的谈风，实在可佩，记忆力又好，又善于比方，给他一引一譬，听的人自然心悦诚服。他的口才，不下于他的文章，听过的人大约相信我的话。我有时对他说："你近十年来不教书是很可惜的，因为教书，直接听教的每班数十人，直接受了熏陶，再出去到社会上，其效力不下于写文章。"他也默认，不过后来因了环境关系，有时连登台说几句话的可能都被剥夺了，这是我们的一种损失。

有一些人，总说他爱发脾气，爱骂人。据我看来，他是最不爱发脾气，最不爱骂人的。以前，他做文章，攻击社会的黑暗面，借了小说的体裁，却不专指某人，所以容易令人不留意。其后，直接批评社会，有时为了批评的真切，简直借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来给某一群以掊击，于是这一群与之仇恨，或只攻击某人，而全群起而攻之了。

平常，他一切都很简单，没有特别嗜好。偶尔欢喜搜寻木刻，如果有国外新寄到的，有时可赏玩好几个星期。闲时也看看电影（这是上海旅居以来的事情，以前不的），算是唯一的娱乐了。他选择电影，偏重于大自然的，如野兽片等。儿童片和历史片，他也要看，最讨厌的是带着

---

① 本篇发表的报刊未详，系据作者底稿编入。

世纪末气味的堕落无聊片子。对于中国电影，在广州，我们曾经看过一张叫《诗人挖目记》的，内容的荒唐和表演的不进步，使他没有看完就走，以后对于中国片，就没有再看了。苏联影片，以其伟大，看了使人振奋，他差不多一有新片就要去看。最后一次，去年（一九三六年）双十节，在上海大戏院看《复仇艳遇》[①]，使他高兴良久，见朋友就推荐。那张片子中，农奴最后给地主的一击（从前俄国的农奴，实在过着非人生活的待遇的），最使他快意。

他对于未来的憧憬的热切，立刻就产生了他的果决的实践。在北京时，人们对奉直等军阀不满意，那时在南方革命势力影响下的冯玉祥先生，在西北也颇有整顿，颇有朝气，先生即与之合作，帮忙主编《国民新报》副刊。后来先生即离开生活了十五年的北京，来到南方，先到厦门，后又转到广州，一到广州，先生就说："我们应该同创造社的人联合，对文化有所贡献。"所以到不几天，怀着大量的高兴，就到创造社去访问，刚巧那时北伐正在发展，军事和政治的重心，陆续移向武汉，先生的希望没有能够实现。而广州，在"四一五"之后，突然来了一种紧急的政变。由于政见不同而这一部分青年把另一部分青年逮捕、格杀的事件出现了。先生的希望又幻灭了，他说："以前我以为老的死掉，中国就会好起来，如今看看不然了。"这一个打击，使他对于青年分两种看法。到了上海，为了同情改革者，接受了一个××大学[②]的青年攻击学校腐败的信，登在他所编的《语丝》上，那时大约是一九三〇年。后来在那学校毕业的权贵不满于先生，跟着就在他出生的省，首先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通过了；后来似乎另外又有一个通缉；这使先生不得不直面黑暗而反抗了。同时另一部分被压迫的群众，天天在被送进牢狱，或在送进之前后被毁灭。这其中，有多少具有才能的有为的青年！先生愤激了，于是领导了左翼作家联盟，向黑暗势力反攻。又尽力绍介理论书籍。这个联盟在一九三〇年成立，但先生立刻就过着地下生活。一九三三年，先生和蔡元培、宋庆龄等发起"民权保障同盟"，未几该会亦被迫停止进行工作，此后先生不能在公众场所讲演；先生的书，时被禁售；

① 这是当时上演时的译名。系根据普希金的小说《杜勃洛夫斯基》改编。
② 指复旦大学。

先生的行踪，时被探询，再经几次战友的逮捕死难，先生的自由是没有了！



鲁迅先生与家庭

孙伏园先生在《哭鲁迅先生》里，曾经这样写过：

> 鲁迅先生的房中总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什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远在奋斗的途中，从来不梦想什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是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在北京时代鲁迅先生的生活，上面几句话真可以概括无余了。"永远在奋斗的途中"，这是我们孙师兄最的确的评语。惟其如此，对于家庭多少较一般人冷淡，奋斗的结果难免牺牲，预料到会牺牲了，还有什么看不透，忍不住，舍不掉的么？一个社会的战士，对于家庭的注意自然相当淡薄，人的精力究竟有限，各方面周到是很难得的。

随手举一个简单的例：我们初到上海的时候，住在景云里的最末一幢房子里。有一天，差不多是深秋，天快暗了，他还在那里迷头迷脑，聚精会神，拿着笔在写不完地尽写尽写。我偶然双手放在他的肩上，打算劝他休息一下，那晓得他笔是放下了，却满脸的不高兴。我那时是很孩子气，满心好意，遇到这么一来，真像在北方极暖的温室骤然走到冰天雪地一样，感觉到气也透不过来地难过。稍后，他给我解释："写开东西的时候，什么旁的事情是顾不到的，这时最好不理他，甚至吃饭也是多余的事。"这个印象给我是非常之深刻的，从此处处更加小心，听其自然

了。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他总勉强着自己，从来没有因为写作忙急而不和我在一起吃饭的，也可见他尽可能地在迁就别人。

在北京，他房子的北面像倒放的品字，他就在倒下的口字中作为卧室兼书室，三个口字当中的地方，东北角放着日常用的吃饭桌椅，西北角是一只木橱，西面放一衣架和柳条箱，经常打开着，这里放些他日用的衬衣裤，什么时候高兴换了，就自己去拿。东南角还摆一只面盆架、水桶，要洗面了，也是自己随便什么时候都方便的。后来在上海，因为工作的忙迫，这些琐碎的照料随时我可以效劳了，他就时常向人感叹似地说："现在换件衣服也不晓得向什么地方拿了。"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旧时代的官僚亲戚，他每回到家里来，就像一只猫走到一个鼠窝里一样，立刻声息全无。偶不小心，就听到训斥的告诫说："我是掌舵的，船怎样走要依我。你们是坐船的，没有我不行，你们不许做声！"坐船的人会能过问或配懂得开船的吗？这真是专制家长的自白。我有时跑到他的家里探望一下，遇到的时候，也是坐他船的了，一样的不好做声，然而心里却十二分的不舒服。鲁迅先生却相反，不但不像掌舵，倒像坐船的，一任我们意思。自己能动手的就做，没有空我帮他也可以，但绝不勉强，总要看我的能力而定。对于女工，后来是没有呼喊责备过一声的。遇到我不在家，要泡茶了，就自己捧着茶壶走下楼梯，到厨房去，自己动手烧水也可以，如果不是女工见到接过来代劳的话。就是这样的，尽自己动手，绝对不肯从楼上高声喊叫人来的。

在家庭里，有三样东西是他最恨的：猫，蟑螂，苍蝇。在《朝华夕拾〈狗·猫·鼠〉》里，说明他的仇猫，"在十岁上下的时候，……吃了我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到后来，他书桌旁那玻璃缸养着的十尾"苏州鱼"，忽然短少了，没有尸体，周围也看不到跳出的痕迹。几次的疑案，忽然在一天夜饭后回到房里，电灯一亮，一只猫从玻璃缸旁窜逃，于是疑团顿息似地，见到猫就赶去打。有时我先睡熟了，听到楼下客堂冲击的声响，莫名其妙地赶紧跑下去一看，原来关起门窗，他拿着棒在打猫，猫南北地跳，朝着两头的窗，是困兽，却不善斗。他则追奔逐北地两头跟着去打，见到我来了，也招呼加入战线，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给它得间脱逃，准会死在乱棒之下的。蟑螂是夜里才出来，要消灭它，这时候比较便当；苍蝇呢，夜里却喜欢钉在屋顶上，最便于扑灭。这两种动

物栖息的大本营却是厨房，在最多的时候，是夜静，他往往拿着杀虫喷射药水，跑到厨房，骤然开亮电灯，朝着见到的蟑螂喷射。苍蝇夜里不大会动的，就留在找不着蟑螂之后，爬到桌子上向天花板喷，每天数十只，积久了数目也很可观的。这样一方面除害，一方面在他也算是最活用肢体运动的机会了。他为什么对这两种小动物如此仇恨呢，苍蝇是传染病的媒介，消灭它不用多说。至于蟑螂，却最是他的对头，他爱书如命，是人所尽知的，他说："蟑螂最可恶，什么书都吃。撒了些污，又给书都弄脏了。身子又扁又滑，逃得真快，随便什么缝子都钻得进去，真可恶。"所以一见到，正是仇人眼里格外分明，就立刻脱了一只鞋子握在手里，连忙地打，逃了就赤着一只脚去追，追的机会一多，来不及洗脚，黑着脚底的事就时常有了。这种绝不放过的态度，如果不是了解他对于书的爱护，一定要批评是徒费精神的，然而这正是他彻头彻尾毫不宽容之处。

日常生活用度的支出，他绝不过问，然而他的买书账自己是记下来的，当他想要买《四部丛刊》之类做文学史的准备材料时，曾经为了要花去几百块钱而游移不定了好久，还是我劝了才决定买的。至于我自己衣着的不讲究等，是一面不愿意和他做太相反的对比，更不愿意在不必要的地方花去他绞脑汁换来的金钱，而他却时常笑笑地说："看你这样落拓，去买一些新的来吧！"我说："要讲究，你这点钱不够我花呢。"彼此一笑也就罢了。

（1939年10月20日《上海妇女》）

鲁迅先生的写作生活

一个作家对于他的写作生活是严肃的，如其这位作家是认真地对他的工作忠实的话。随随便便一挥而就的态度，不是一个好的作家所应有的。至少，他应该很谨慎地从事他的工作，我对于鲁迅，所见到的就是这样。

他是时常被许多识与不识的人们邀请写稿的。在被限定的时间已经很急促，没有功夫多加思索的余裕，或者他自己正在没有预算到的中间，一定要临时赶交文稿，那么，他宁可找些短篇来翻译，却绝不肯潦草从事，许多的短篇译文，大约就是这样来的。然而在未动笔之先，选择材料之际，是很经过一番苦心的，甚至为了没有适当的材料，连找几天，看了几许的原作，也是常有的事。到这时候，他会感慨地说："唉，翻书也不容易。"为了这方面的苦恼，所以他是时常留心买新书的，遇到有可以做翻译的准备的材料时，他就有时先买妥在那里。

约一九三三至三四年，在遭遇到无比的压迫的时候，文章不能用鲁迅两个字投稿，因为检查者看到会没有理由地就给抽掉。已经出版多时了的，逢到邮递的检查时，也会因为封面是红色而被禁止通递，如《呐喊》就是。一些书店，也在这个时候停止支付版税，他们是最聪明不过的，讲什么良心！落井下石是中国的老成语。然而人总得生活，不能束手待毙的，因此他曾经想翻译法布尔的《昆虫记》，他以为这部著作值得介绍，虽然太偏于文学些了，还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对于科学的贡献，对于中国人学问的增进都很有帮助的。不晓得为什么到如今似乎还只有简单的节录给儿童作读物的片段译出。他把那部《昆虫记》陆续买来

了，约好建人先生替他担任校正，并托他向某大书局[①] 接洽，预定每月交出若干译稿，把收入来维持那半地下生活的支撑。然而也没有成为事实，只留得未译的原书作纪念品而已。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鲁迅当时虽然志在谋解决生活，仍不忘记读者方面的需要，并不是只为自己着想，做那投机事业一样，专门投读者所好，迎合观众心情的轻松读物取材的。

至于创作，更是加倍地当心的，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评，也不是摊开纸就动手。那张躺椅，是他构思的好所在，那早晚饭前饭后的休息，就是他一语不发，在躺椅上先把所要写的大纲起腹稿的时候。每每文债愈多，腹稿愈忙，饭前饭后脑筋愈不得休息，更影响到他的胃纳不佳，食欲不振，这都是互有关系的。就这样磨掉了他的生命。

他有一本短评《花边文学》，是因为有些文豪讥讽他的短文而得优厚的稿费，特别借编者的用花边围绕而作双关解释的。但是鲁迅自己知道他的短评产生也不容易，他说："人家说这些短文就值得如许花边，殊不知我这些文章虽然短，是绞了许多脑汁，把他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又看过了许多书，这些购置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这几句话，就可以了解他一切执笔行文的经过。

在豫备写比较长一些的文章，或者如《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的后记，几乎是头也不回，连夜编写完成的万言书。当他准备动笔写比较长文的时候，他会很委婉地劝我先睡，等我睡了之后，可以静心一意地写作。因为几十年的孤灯独对，潜心工作的习惯，忽然有个人在旁走动，多少是觉得打扰的，我原也不过这样了解，只当作是他的脾气，姑且听之而已。到现在，自己工作起来，也一定要等待到更深人静，然后才觉得一心一意不被外物纷扰，没有做到那一步，是不晓得那些人的苦的，我现在更了解他，可惜就是不能在这时告诉他我的了解了！但是一切写文章的人大约多是如此的罢，如果文人也算有职业，这职业实也不下于夜班生活的工友。

到了早晨六时左右，经过了一夜写作完成之后，有时他会把我叫醒，给他泡茶，在饮茶的时候，很高兴地叫我先看他的文章。每次文章

① 指当时的商务印书馆。

写完尽给我先看的，偶然贡献些修改的字句或意见，他也绝不孤行己意，很愿意地把它涂改的，或者预备些东西吃，有时午夜也曾这样要求，如果能够再有半杯酒，更觉满意。但是有什么好预备的呢！最方便的，就是鸡蛋炒饭，放些葱，蛋是要炒得老的，照绍兴农家的吃法，这种蛋炒饭他最喜欢。他欢喜吃硬的东西，饭炒起来也是要焦硬些，软绵绵的有些不大爱吃，好像丝绸的衣服不爱穿一样，他是彻头彻尾从内至外都是农民化的。譬如生黄瓜、脆花生、沙炒豆之类，对于他也还是爱好品。

他对写作的修养是很注意的，闲空的大部分都用在看书，更多的是外国书。除了社会科学的书是细细地阅读之外，普通杂志，他只是选几篇或一部分看看就完了。国内出版的杂志，不过翻翻就算了，如果没有什么好作品，是不肯浪费许多光阴的。有时寄来了，拆开之后，看看目录就算了。我拿过来看，也会劝告似地说："不如拿这些功夫做别的事。"对于报纸，也不过花费十来分钟略略过目一下就完了，有时见到我总在看报，他偶然也会不耐烦地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他虽然这样马虎地过目，但是过了几天忽然要找某一材料，叫我向旧报翻时，我往往久翻不到，还是由他指示我约在某天某一个角头处找，这才找到。可见他处理学问的经济，而我是白费了，等于没有看过。他不承认有天才，然而这不是天才之异乎寻常吗？他说：他也是用功得来的，这明明是告诉人以他的天才还是一样的要用功，要善于用功。

别人批评他的文章，他或看或不看，却是不赞成依照批评而改变自己意志的。骂他的文章，就是寄到手头，他却未必就看，总把它堆在一旁，等到用作材料的时候才去翻它，这时是比较客观的研究了，人家以为他暴跳十丈高，其实更多的是炉火纯青的时候。

（1939年《文艺新潮》第2卷第1期）

琐　谈

似乎类于八股式的命题了，每有纪念鲁迅特辑的刊物的时候，就很荣幸地直接间接得到通知，许我也参加一分说几句话。其实这是很窘苦的事，我们生活太密切了，遇到的都是很平凡的经过，有什么可记述的呢？没有法子，还是琐谈几句，至于有系统的研究，只得敬候专门学者了。

鲁迅先生死了快四周年了，还值得许多人们纪念，我想就是他的平凡之可取罢了。第一，他没有一般阔人，学者，教授，名流的架子，他道道地地是一个普通人，随便什么陌生人的通信和见面，在他那里比较算最容易通过的了。第二，他绝对不要有一般阔人，学者，教授，名流的门面的神气活现，宁可闷在一间极简单的小房子里埋头工作。第三，他对青年看成小兄弟一样地爱护指导，除非万不得已的不能容忍，是不肯轻易回击的。第四，他最肯学习，一切新思想，新学识，他随时都在向书本和现实社会寻求，在没有把握真切时，他是冷静地研究，在已经认识确当时，就热烈地争取，一静一动之间，人们以为他变了，其实正是他的平凡可取处。第五，是不辞繁琐的苦干，不管是替人家做事或者自己工作，都是孳孳不息的，这是一种革命者忘我的精神。以上是他平凡的长处。然而他还是人，他自己更不承认有天才，是超人，所以也有他平凡的“短处”，那就是他太热情太老实了，有时老实到根据某些理由，即使明知要受苦或来不及细察也会始终参加进去的。即如女师大问题，许多教授，名流看作是“臭毛厕”了，一些在教育部任职的教师们不是跟着教育部长走，就是远远躲起来了，而他却以皇皇部员，参加学校的反对

部长举动，直至被免职，受谣言诬陷，仍然毫不动摇他的意见。他还有一个“短处”就是太天真质朴了，所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每有遇到不管大细的事，是不肯随便过去的。初到上海住在景云里的时候，为了抱不平事，他会向邻居争论，甚至引起恶棍胡闹，也有为着某女工受家庭压迫的报告，引起同情而设法替人离婚的事。总之，他不像什么学者名流之类的高不可攀，他彻头彻尾是一个日常见到的普通的平凡人，然而一切普通的平凡人为什么及不到他的万一呢？他说：“我不玩，我把我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他真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学习，研究，实践，工作所得的成果。他是不是真不玩的呢？不是的，有时也会去看看电影，更多的时候是把工作方式变换来作休息。他绝不是清教徒，叫人家板起面孔来过日子。偶然的休息是需要的，不过却不要占的比例太多了，成天东家跑跑，西家坐坐，说长道短，是他所最怕的。如果有朋友在他工作的时候来谈天了，就是很要好的老朋友，他会豪不客气地说：“唉，你又来了，没有别的事好做吗？”有些人是来传播谣言之类的，他更不要听，时常是不等到讲三两句就想法子岔开了。有时背后会说，那些人真吃得闲空，倒不如在家多读些书呢，这可见得他的生活又很严肃的了。

（1940 年 8 月 1 日上海《学习》）

《鲁迅年谱》的经过

看到《宇宙风》第二十七期“鲁诞特辑”中有一篇周黎庵先生的《关于鲁迅年谱》,那意见都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周先生希望年谱要详细些,要留心到“生前与死后”,“时代背景”,以及“同时代人的关系”。凡这些宝贵的意见,我们都应该记住,希望再有一个更详确的年谱,这是许多爱好文化的人以及史家们都一样的说。而且编这年谱的许寿裳先生自己也承认太简的。我们相信将来一定有人能够弥补这一缺憾。现在让我把年谱的经过介绍一下,或者也是有些人所愿意明白的罢。

一 时间匆促

《鲁迅年谱》并不是许寿裳先生“应《鲁迅全集》的附录而作的”。在二十六年十月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里面已经登载过。更早些,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校刊《新苗》上第一次登载,那时许先生是该校校长,所以有这机会尽先介绍。

因为自从鲁迅先生逝世之后,许多海内外人士,都很关心到他的生平,而除了从《自传》中略知一二之外,实在有无从探讨之感。恰好在鲁迅先生逝世两三个月之后,一部分文化同人希望出一本纪念集,商量编辑大纲的时候,一致认为应该有一个年谱,而预算是在半周年纪念就刊印成书。于是一面急请许先生设法就商于北平作人先生,一面在上海整理逝世后一切报章杂志所搜集的纪念文字,这就是后来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之下印出来的那本《鲁迅先生纪念集》。

在二十六年二月三日收到许先生从嘉兴寄函,关于年谱有这样的几句:

> 年谱事,裳意最好仍由岂明兄起草,君与乔峰兄及裳补充,请乔兄复函一商,何如?倘岂兄仍以病不能述作,则届时由裳起草亦可,惟总须返平后方能动手耳。

在同月的二十二日,许先生已经回到北平,寄来的信是这样说的:

> 岂明昨始晤到,年谱决由他起草,裳分任一部分,将来或一同列名。

当整理报章杂志搜集纪念文字的时候,另外有朋友表示不赞成,他的理由根据鲁迅先生自己的意思,是不愿意人有什么追悼会或纪念册的,在一九三四年写的《病后杂谈》,就曾经表示过很沉痛的意见:

> ……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纪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也不过挽联做得好而已。

因此有一个时期的确停止了预定的计划。后来又觉得不妨编出来,作为一般人对鲁迅先生的观察——不管好坏——也许于将来研究鲁迅有些补助,所以最后终于印行的。但是年谱还是要快些写出才好,既然岂明先生肯执笔是最好不过的,许多朋友多不知道的家庭状况,差不多幼年时代一同生活过的,除了是兄弟家属,别人没有更清楚的了。那时等着刊载年谱的是日本改造社出版的《大鲁迅全集》,虽说是“全”,其实是选的,据说许多别的全集都是这样子。既然是急着付印,于是又

麻烦许先生去催请了,同年三月三十日得许先生通知:

年谱事已催岂明,尚未脱稿,大约字数不多。

四月二十九日的来信知道快脱稿了,不但岂明先生要赶着写,许先生也实在很费了些"催"的功夫:

年谱事,又催起孟,渠云本星期内可以脱稿,收到后,即当续补寄奉。

二 执笔者非一人

岂明先生担任了第一期,即民元以前用阴历记载的一部分。除了记忆所及,岂明先生还有自己的日记可查,是很方便的。从民元到十四年,是鲁迅先生在南京、北京教育部就职的时候,不久许先生也在同部办公,以后生活,都时常见面,中间女师大掌教,也是因许先生做该校校长而以友谊关系入校相助的,所以这一期的年谱,许先生担任是最适合的了。而且这时按年都有日记,存在北平,许先生参考执笔,也帮助不少。至于十五年以后的日记,则在上海,所以许先生叫我可先写草稿,请他改正,在五月三日来信就谈到这经过:

年谱第一段(自一岁至二十八岁即至一九〇九年)已由岂明兄编来,裳觉得太简,第二段(一九〇九——一九二二)由裳动手,现正赶阅留平日记(自民元年至民十四止),续编并补充起孟所阙,日内即当用快函寄上,至于民十五(一九二六——一九三六)至逝世之十年间,则请弟代续,将来署名仍用裳名可也。(年谱上与朱女士结婚一层,不可不提,希弟谅察。)

对于年谱,显然三个人执笔,许先生是总其成的,也许因为早期生活比较简单,没什么可以记载,而末期的生活,对于民族解放思想的努

力，各方面的人事关系，是没法太简单化的，所以第一次我的草稿拿来和许先生寄下的对照一下，为了体裁一律，就删去了一大半，后来又删了不止一次。关于实际参加工作方面，还请了和他一同参加过的F君订正了不少，然后再寄给许先生改正。所以结果虽然通体似乎一律，细看还是后来较繁的。

三 年谱的内容

五月七日许先生寄来了一封信，有所声明：

> 年谱一部分(民十四止)已脱稿，特抄奉。(连凡例共七页，附以起孟原稿两纸。)有数点应声明者：(一)豫兄有一篇试作小说载在民元二年之《小说月报》，篇名及月报号数尚未查出，如弟处已查得，应请补入。(二)关于弟个人婚事，裳拟依照事实，直书为"以爱情相结合……"，并于民七特标"爱情之意见"一条，以示豫兄前此所感之痛苦，言隐而显，想荷谅解。如尊意以为未妥，仍可修改，务请明示为盼。至民十五以后请弟主稿，寄我一读。

另外寄来凡例六条，又两份年谱，一份是岂明先生亲笔写的，又一份是许先生添补了而又续编好的。为了省篇幅起见，把岂明先生的钞录并把许先生加的字句用括弧一同表出。圈点也是许先生加的。

民国前三十一年(清光绪七年，辛巳，西历一八八一年)〔先生一岁〕

八月初三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

前二十年(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年)〔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前十九年(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年)〔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前十六年(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年)〔十六岁〕

九月十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

前十四年（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前十三年（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年）〔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

前十一年（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年）〔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前十年（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年）〔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

前八年（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年）〔二十四岁〕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前六年（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年）〔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

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前五年（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年）〔二十七岁〕

〔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前四年（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年）〔二十八岁〕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前三年（宣统元年，己酉，一九〇九年）〔二十九岁〕

〔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

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前二年（二年，庚戌，一九一〇年）〔三十岁〕

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前一年（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年）〔三十一岁〕

九月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以上月份均系阴历

许先生最初续编的年谱也是依着前例，而比较详细的：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三十二岁〕

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员。

五月航海抵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

是月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二年(一九一三年)〔三十三岁〕

六月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八月由海道返京。

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三年(一九一四年)〔三十四岁〕

是年公余研究佛经。

四年(一九一五年)〔三十五岁〕

一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

同月刻《百喻经》，成。

是年公余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五年(一九一六年)〔三十六岁〕

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

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

是年仍搜集研究造像及墓志拓本。

六年(一九一七年)〔三十七岁〕

一月初，返北京。

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

是年仍搜集研究拓本。

七年(一九一八年)〔三十八岁〕

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之急先锋。

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八年(一九一九年)〔三十九岁〕

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

第六卷第一号，后收入随感集《热风》。

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产成，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迁入。

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

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归省，奉母偕三弟来京。

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九年（一九二〇年）〔四十岁〕

一月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

十月译成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十年（一九二一年）〔四十一岁〕

二、三两月又校《嵇康集》。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四十二岁〕

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

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四十三岁〕

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

十二月买阜城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

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四十四岁〕

五月迁居西三条胡同新屋。

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

同月又校《嵇康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

七月往西安任暑期讲演，八月返京。

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四十五岁〕

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先生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

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

十二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

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四十六岁〕

〇月复教育部佥事职。

〇月出京任厦门大学教授。

〇〇年

〇月与〇〇许广平女士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

收到了上面的两部分年谱之后,我马上把自己写的一份寄出。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所以在寄给许先生的后十年年谱里,在十六年十月我是写着"……与许广平同居"这六个字简单明了的记载,把许先生那两句的好意而其实是当然的事实不要记在纸上了。但是经不起许先生的仔细,把"番禺"和"女士"两字加上了,这就是现在所刊载的。至于朱女士的写出,许先生再三声明,其实我绝不会那么小气量,难道历史家的眼光,会把陈迹洗去吗?

我起草的后十年年谱寄给许先生之后,承他改正了好几处,又把前期的也有修正,在五月二十一日的通讯云:

后十年年谱，裳略增减数字：(一)《桃色的云》系民十二印行，记已述及。(二)十九年十月与内山合开版展，内山下应否增完造？(三)二十二年五月至德领馆递抗议书似应于至字之上，加一句“为”以明理由。起孟与裳分编之部分，实嫌太简，但裳近日太忙，无法执笔，而改造社又急待译印，增订之事只好俟诸异日。惟一九〇三为《浙江潮》撰文，一九〇七为《河南》杂志撰文(已见前)以及民十三起为《语丝》撰文，民十四编《莽原》及为《国民新报》副刊任编辑，均可即时添入，希弟代为增加可也。

四　限于“立场”

许先生对于年谱增订了，还是简略，深抱不安，想尽方法，欲得些材料。因而第二次想到向太夫人请其口授实情，真可谓苦心孤诣，无所不至了。五月二十五日来信云：

年谱前期叙述太略，裳因于星期日特往谒太夫人，新得若干材料，加入后，送岂明核定，不料回信云：“尊稿奉还，唯为添注一处，乞察收。鄙意此谱还以由兄单独出名为宜，已擅将凡例涂改矣。盖弟所写者本只百分之二三，只算供给材料，不必列名，且赞扬涂饰之辞，系世俗通套，弟意以家族立场，措辞殊苦不称，如改为外人口气，则不可笑也。”(我不知其何所见而云然。哭妹及均赢及胡羊尾巴，均得之于太夫人口授材料，非我之私言也。)裳意不欲勉强，径由个人出名亦可。兹附上四纸(第四纸后面并请察阅)，弟意如何？乞示。

岂明先生所谓“赞扬涂饰”，大约是指的八岁到十二岁增添的幼小情形。在许先生以为是得之太夫人的确实史料，而岂明先生以为在他的地位不便“赞扬涂饰”，所以后来是依着岂明先生的意思，由许先生具名，把凡例的第一节“本谱系周作人、许寿裳二人合编，以民国成立为界，作人任前半部，寿裳任后半部”删去，而依次改为五节，在“第四纸后面”是有些更改如下：

凡例 删第一节,原第六节改为第五节,"三弟建人"上添"二弟作人"四字。

十三年 "仍兼任北京大学……"后增一行:"是年冬起,为《语丝》周刊撰文。"

十四年 "十二月译成日本厨川……"后增一行:"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

十六年 "三月主持北新书屋,供给未名、北新文艺……","未名"下应添一"社"字,"北新"下应添"书屋"。

第二次增订的年谱前期(阴历部分)就是后来采用的。在六月三日,许先生顾虑到因"小事生意见",能仍用第一次增订过的也不妨。即上面钞录的。原信是这样的:

年谱前一段第二次增订稿四页(岂明不以为然者)谅早到。岂明所编我一次增订者,曾经岂明许可,如弟意以为可用,不妨仍用第一次,免得此次小事生意见。如弟意用第二次,则我亦无异议,统请从速酌定示知。(《新苗》十八期即将付印,拟将年谱稿登入也。)

在上海朋友们磋商的结果,大家以为都是宝贵材料,乃研究鲁迅者所不易得的,不便删去,仍以第二次增添的好。至于不用岂明先生具名,也就不致于使他有什么"不称"和"可笑"了。最后决定,所以也只得如此。到了六月五日左右,许先生来信对年谱还有修改,就是:

年谱前期增订本,尚有数字须修改,录于别纸(附上),并登《新苗》十八册(《地底旅行》一文,因未完之作,年谱中可以不提,且因"为《浙江潮》撰文"一言中已可包括,《月界旅行》已增入)。此次修改,似可不必通知日本改造社,恐彼都已付印,不及追改,且大体无甚出入也。惟望他日纪念刊内,照此刊行耳。

最后的修改，就是六月十日通信的一处：

年谱，一岁生于绍兴东昌坊口条下增"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二十四字。

从这几封通信里，可见就是大家觉得简略的年谱，也经过不少的波折，安排，增删和订正，并不是一挥而就，随随便便算了的。将来一定还是要有更详细的年谱，如果有许多种更好。假使客观一点，不要家族观念太重，站在中国文化史实上，我想岂明先生和乔峰先生以及他的朋友们，一定在比较安定的生活上，肯从事这一方面更详细的写作的，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在最近百年社会思想以及文化史上，要研究这一时代，是没法子把鲁迅先生推开或掩藏起来的，考古者的发掘，我想不尽在坟墓着手。自然想歪曲也不容易，因为时光老人终究会予以暴露的。

(1940年9月16日《宇宙风乙刊》第29期)

鲁迅《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附记

暑间房子搬动了一下，偶然从抽斗里理出一些旧信，什物，笔记簿之类的东西。很意外的，就在簿子里面见到两页鲁迅先生的亲笔稿。其一是已经登载出来的朋友墓志的底稿；另一页就是上面所抄录而没有发表过的。虽然经过好几年的压在书里，还是可以看到它的皱折不堪的遗痕，于是从这遗痕使我回忆起来了：这都是从字纸篓里被我拾藏起来的。那一张墓志稿，因为已经留有底稿而丢弃掉，是很平常的。独有第二页没发表过的这一篇短文，为什么也弃去呢？这使我记忆起那时鲁迅先生刚刚放下了笔，恰好有什么小事向他谈到，他却烦恼起来，就把眼前写过的一张纸团掉了。过些时候，我向他说："你团掉的那张稿子我收起来了，给你重抄一遍，送去发表好吗？"他连忙说："不要不要，"就在他"不要不要"之下压置到如今。然而这也是他的吉光片羽，也许有些人看了会讨厌，但是一定更有些人珍视他的片言只字，不管怎的，发表出来就是了。依着几位朋友的好意，如是。为了原文提到《人间世》，我从书柜里找出创刊至四十二期的全分，那是从民国二十三年四月起至二十四年十二月止，废名先生曾有五期投稿，值得玩味的是第十三期（二十三年，十月）的《知堂先生》末段的关于宣传的也是"吞吞吐吐"的妙文，也许鲁迅先生的短文是对此而发的罢。此外，《人间世》第二十六期，还有一篇也是废名先生的《关于派别》，都多少和《知堂先生》的一篇有关，也许就是那一时期，那一些人的文学观或派别观了。因为文章太长，此地不再抄录。意思只在查出鲁迅先生写这篇短文的时代，大约是在二十三年十月，如此而已。

三十年九月三十日景宋谨记

（1941年11月19日奔流社出版《奔流新集之一·直入》）



鲁迅先生对批评的态度

鲁迅临死前不久还承认他的怨敌非常之多，而且表示了："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粗看起来，似乎他是非常之倔强，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似的。其实，不幸得很，他所遭遇的大半是没有原则，或是原则相反的攻击，绝不是有原则的批评。那么，他所采取的态度，我们不难从这方面去观察。

值得说明一下的，就是攻击鲁迅的人们大多是认识他，却并没有在什么座谈会之类的场所和他聚合在一齐；只不过从他的文字上，可以窥知一些大概就是了。也许他的"怨敌"曾经开过座谈会，交换意见之后，再来对付他的罢？然而，在他这一面，却是孤军抗战，独往独来的。自然，攻击他的都自认抱有充分的理由，他们捧着的招牌，旗子是：批评，绝对没有人肯承认是攻击。所以，这篇短文所说的批评，多少和普通界限分明的有所不同，但为了易于了解起见，也不妨分别说一下。

所遗憾的，就是终鲁迅一生，未尝遇到几个真正的批评者，所以他说："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呐喊·自序》)

这寂寞很长久，直到写《彷徨》时还存在着，所以题《彷徨》的诗有两句："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见《集外集》)

那真是披肝沥胆，把他内心的血剖示给人们的悲怆词句了。

现在我们看看他所遇到的"怨敌"都是什么样的呢？

人身攻击

首先，抵抗倚仗军阀残余的恶势力所凭藉的“正人君子”们，所诬辱的“挑剔风潮”而给予他的为了“籍”和“系”的污蔑。那些“怨敌”所惯常用的手段是“流言”（见《华盖集》）。其次，创造社们所攻击他的是躲在酒坛背后，“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还觉不够，甚至于骂到态度，气量和年纪，更甚而至于牙齿的色泽，仿佛也有关于革命与否似的（见《三闲集》）。从此滥觞下去，以至儿子也要分负罪责，被杨邨人诬他“领到了南京中央党部的文学奖金，大开筵宴，祝孩子的周年。”（见《南腔北调集》）凡这些，给予鲁迅的攻击，据他自己粗粗地写出来是：“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例如我所属的阶级罢，就至今还未判定，忽说小资产阶级，忽说‘布尔乔亚’，有时还升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见《创造》月刊上的《东京通信》）；有一回则骂到牙齿的颜色。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也找不出牙齿色黄，即有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对抗这人身攻击，他是用客观的理智来反驳

在“正人君子”们“流言”所引起的“可惜”，他“先奉还他无端送给我的‘尊敬’。”而且指明这“一个制驭别人的巧法：可压服的将他压服，否则将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一种压服的手段。”明白地说出：“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使我对于自己也要大加侮蔑，如果收得的是吞吞吐吐的不知道算什么，则使我感到将要呕哕似的恶心。然而无论如何，‘流言’总不能吓哑我的嘴……。”（《华盖集·我的“籍”和“系”》）

他为什么敢于这样大胆的呢？因为他知道：“‘在这样的社会里’，

有些'公平话'总还不免是'他或她的酒饭'填出来的。……倘使连酒饭也失了效力,我想,中国也还要光明些。"(《华盖集·并非闲话(二)》)

制驭别人的巧法,除了用"尊敬"和自称是"公平话"之外,还有用"尖酸"的笔调,"显战士身而出现",并且习用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战略,说鲁迅是"正直"的。

> ……所谓《战线》,也仍旧不过是创造社的战线。所以我和西滢长虹战,他虽然看见正直,却一声不响,今和创造社战,便只看见尖酸,忽然显战士身而出现了。其实所断定的先两回的我的"正直",也还是死了已经两千多年了的老头子老聃先师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战略,我并不感服这类的公评。陈西滢也知道这种战法的,他因为要打倒我的短评,便称赞我的小说,以见他之公正。(《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他自己对于被批评(实即攻击)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

先时也发发牢骚,而"呻吟",但马上说明有外在的原因:是社会"病"。

> 虽然有人数我为"无病呻吟"党之一,但我以为自家有病自家知,旁人大概是不很能明白底细的。倘没有病,谁来呻吟?如果竟要呻吟,那就已经有了呻吟病了,无法可医。……所以,"呻吟"。而批评家们曰:"无病"。我实在艳羡他们的健康。(《坟·从胡须说到牙齿》)

其次最重要的,是抵抗"流言"用"真实",即所谓"事实胜于雄辩",无论如何蛮横的论敌,也没法扭转事实的。当民国十四年,北平民众因为主张关税自主,游行示威的时候,遭遇到巡警的断绝交通,至于发生冲突。这时"整顿学风"的章士钊以及其党徒们,是很愿意有机会,自然也认为游行示威的不合法,而把鲁迅硬拉入队伍中;并且确凿有据地在报章喧载:"门牙确落两个",他的回答是:

> ……所以如果打落了两个门牙，借此能给若干人们从旁快意，“痛快”，倒也毫无吝惜之心。而无如门牙，只有这几个，而且早经脱落何？但是将前事拉成今事，却也是不甚愿意的事，因为有此事情，我还要说真实，便只好将别人的“流言”抹杀了，虽然这大抵也以有利于己，至少是无损于己者为限。（同上：《从胡须说到牙齿》）

但真实也并不全用作反攻的利器。当休士先生来到上海，公开招待时，鲁迅并未接到通知，却被人断定他是看不起黑种，而且更引起前时欢迎肖伯纳和梅兰芳在一起的经过，隐示他的势利。而实在呢，在大家公开招待之前，鲁迅早已和休士先生接谈过了，不过当时的环境是未便从实说出的，所以一任人家“虚构事迹，大加奚落”的“诬蔑和侮辱”，而没有正面把“真实”说出来的必要。（《南腔北调集·给〈文学社〉的信》）

另一个反证，《写在〈坟〉后面》，他自己指出：

> 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

那么，全是一片假话么？也并不然，只是在某些状况之下，“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虚伪有时也不算不德，则稍稍把事实不全部说出，更没有什么的了。

对于被批评的时候，如果没有自我检讨，是很会流于偏激自是的。然而倘使一味慑服于批评者的喧吓下的淫威，那就会盲目地灭自己志气，长他人威风，似乎都不大好。这里就要用事实和自我的批判来处理了。譬如《呐喊》里面，大家都推戴《阿Q正传》或《狂人日记》，那是因为那时作者对于封建传统等的袭击，在“五四”时代，可算是大胆的创作。而当时以批评家自命的成仿吾先生，却“以‘庸俗’的罪名，几斧头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这就使鲁迅“不但不能心服，而且还轻视了这位勇士。”因为“‘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于是《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

跛扈了。”(《故事新编·序言》)

藉批评的美名而做肆意攻击的把戏,鲁迅是很清楚的,遇着这一类人,他往往就绝不假以辞色。甚而可恶地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生命,好给憎恶者多不舒服几天,得到呕吐,也高兴的。(《坟·题记》,《写在〈坟〉后面》)

所谓“给憎恶者多不舒服几天”,并非用无赖手段,也还是很严肃地对待的。即如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南腔北调集》)里面就表示着:

……总之,我还是和先前一样,决不肯造谣说谎,特别攻击先生,但从此改变另一种态度,却也不见得,本人的“反感”或“恭敬”,我是毫不打算的。请先生也不要因为我的“将因为生理上的缘故而要停止工作”而原谅我,为幸。

当时中国的批评界是怎样的趋势呢?

……就耳目所及,只觉得各专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国美国尺,有德国尺,有俄国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国尺,或者兼用各种尺。有的说要真正,有的说要斗争,有的说要超时代,有的躲在人背后说几句短短的冷话。还有,是自己摆着文艺批评家的架子,而憎恶别人的鼓吹了创作。倘无创作,将批评什么呢,这是我最所不能懂得他的心肠的。(《三闲集·文艺与革命》)

以如此混杂的批评界,弄得文坛好像有个“集中营”,稍稍有些不同,即有大逆不道的罪戾。自然鲁迅更是众矢之的,因为他不但谈谈文艺,偶而也牵涉到社会问题,这就使人难堪了,说他是“贰臣”,总算还好,仍然能够“苟全生命”,“获得首领”直至病死,那也非战之罪,所以终于能集齐一本《二心集》。在序言里并且明白说:

……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

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其实批评是不可缺少的，不管是自己或别人。社会愈进步，批评的责任就落在大多数人的手里，每于工作之前，大家发表意见，共同就意见而分别驳讨，寻出一个公同认为得当的做去；做了而还有不妥之处呢？也仍然有工作检讨会之类的机构，用来从经验中再行体察得失，所得的结论大家一律奉行。那才真正是“大家一条心”。但中国的一些批评家却不这样，多少带着些私见，随自己的好恶做出一个模型，硬套在别人身上，仿佛稍有不合，即等于大逆不道似的。这种专横任意的姿态，怎能叫鲁迅心服？在他以为批评是应当有的，却应该注意：

批 评 法

一 精神的冒险

他反对满口谩骂的批评，然而也不是不能骂。估定错处，公平地骂是应当的，当然会有回报，这就要有不怕事的胆量了。

不要破口就骂。满口谩骂，不成其为批评，Gentleman 决不如此。至于说批评全不能骂，那也不然。应该估定他的错处，给以相当的骂，像塾师打学生的手心一样，要公平。骂人，自然也许要得到回报的，可是我们也须有这一点不怕事的胆量：批评本来是“精神的冒险”呀！（《华盖集·评心雕龙·寅》）

二 有一本解剖学

鲁迅感觉对于他的攻击虽然多，却觉得废话太多，“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于是着手找能够指示这病理的解剖

学，即有关社会科学的著作，倘使“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像这样的应付批评者们的态度，如果说够得上是批评的话，在中国，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人如此。他绝不自是，一样虚心接受正确的指引。

……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三　批评的批评

有些人以为拿着批评的法宝，就可以乱评一气，“要矫正这风气，是须用批评的批评的，只在批评家这名目上，涂上烂泥，并不是好办法。”倘使遇到这互相批评的时候而吓倒，当作互骂，结果谁也不会得到好处。这风气文坛最厉害，所以特别有如下的指出：

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

已经知道批评是不可缺少的了，那么应该是怎样的人来担负这一个责任才好呢？于是：

我们需要的批评家

批评家的发生，在中国已经好久了。……这些团体，都说是志

在改革，向旧的堡垒取攻势的，然而还在中途，就在旧的堡垒之下纷纷自己扭打起来，……一面各自以为胜利，唱着凯歌。旧保垒上简直无须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这些新的敌人自己所唱的喜剧就够。他无声，但他胜利了。

……所以现在所首先需要的，也还是——

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正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

有了坚实，明白，真懂得社会科学等的批评，才是我们要的，可是现时社会环境的急剧发展，要养成许多这样的批评战士，实不容易，然而也并非不可能，鲁迅自己就是一个榜样，他受了许多批评的恶骂，但他绝不因此主张废去批评，倒是介绍许多好的著作来"煮自己的肉"，并且因此而使批评界的"漆黑一团糟"得以廓清，这一努力是可珍贵的。而且他更指示给我们：

批评家的职务

他自己承认："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这并非过分自负，原因是"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被批评者有益，而不致因为夹杂着有私人的"恩怨嫉恨"在内。在外国，出版家似乎时常也是很优秀的批评家，而且也能的确提拔出新人材出来，这是鲁迅时常称道不止的。可惜中国的出版者，往往从"生意眼"着想，只要销路好，绝不考虑到内容。巴人先生的《窄门集》就因出版商瞧不起而搁下了，在那书的《后记》里，就有这样的沉痛的经过："这册小书原本是××社文艺小丛书之一，但因为出版商很瞧不起这些文章，'若是张恨水的小说，便是十元一千字的稿费也付。'他们说。而这，则不给。"是的，两张(另一个是张资平)的

小说，曾引诱过不少读者。引诱而已，引诱过之后，读者所余的是什么？倘使是毒汁，那无疑地是社会的毒害。我想，在清明的社会之下，他们是有一日会在读者之前像雪的在阳光之下很迅速地消融。此外——

> ……因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毒草，还要灌溉佳花，……但是，或者是文坛上真没有较好的作品之故罢。也许是一做批评家，眼界便极高卓，所以我只见到对于青年作家的迎头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华盖集·并非闲话（三）》）

鲁迅对于自我批评是很严肃的，他承认时常在解剖别人，然而更无情的是解剖自己。即不是错，如果应该更往进步的方向走，他是很勇敢急速地做去的。成仿吾先生们在创造社时代的批判法，并没有攻击到他的致命处，当时是予以批评的批评，这也许是不错的罢。但他和成仿吾先生并没有成为死对头，却是事实。在他去世前一二年，成先生忽然秘密来到了上海，接见之下，已经是一位黑实的个子，像钢铁一样，不但加强了内容，而且仪表也的确两样了。在回来之后，他还一直高兴着这一次的会面，称道不置。可见这里绝没有私人的恩怨在内。因为他们在根本原则上并不是各走各的路的。

关于传闻而来的闲话或讥骂，鲁迅绝不肯拾来作事实而施以攻击的，有时对于爱讲闲话的人，他往往抢先把话题拉到别处去，“嘁嘁喳喳”，是他所痛恨的，因为这绝不能算是批评，反之，客观的，真实的，善意的指示某些地方的不妥，他是接受的。甚至每篇文章的字句之微，在发表前给别人看到而贡献些小意见，如果是对的，他马上拿起笔就去修改。对事情也一样，在和朋友们交谈之后，他还在余暇之间自己提出来批评。对于别人，他没有年齿，学力，识见的高下的成见，时常是“更无情的解剖自己”，就因为谁也不能没有错误，要进步，认错，改过并不是丢脸的事。这就是他对批评的态度。

（1941年11月19日奔流社出版《奔流新集之一：直入》）

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

这是在一九四二年，应苏联友人所提出的逐条问题的答复。虽然隔了几年再在中国的刊物上发表，但对于研究鲁迅先生著作的，或不无可资参考处。只因当时匆匆写就，急于送出，难免遗误，倘有读者予以指正，是非常感荷的。

一　先生所写的稿子用铅印的全张报纸计算，共有几张？

全集字数共计约五百九十万（书信、日记不在内）——六百万字（计每页十三行，每行三十五字，每页共四五五字）。全集每部共一万二千零四页，计每部用纸连放头（白报纸）二百一十张（插图约四十余幅，系道林纸精印，不在内）。

二　先生名著是否有未发表的同文异稿？

没有。

三　是否有未完成的稿子？是那些？

辑录中国唐以前小说逸文的《古小说钩沉》，原意似乎是在每一卷之前（共三十六卷）有一序文，来说明这一卷小说是从那里搜辑得来，别的书本有没有类似的记载，原著者略历，和鲁迅先生自己考证所得的意见等，体裁略似《会稽郡故书杂集》。但是因为屡次想付印都没有成功，同时因别方面的写作也抽不开时间来整理，所以至今印在全集的仅只是小说逸文的部分，这是很值得惋惜的。此外《汉文学史纲要》，虽为在厦门大学及中山大学的讲义稿，但只从中国古代有文字起至汉司马迁而中断了。乃是陆续就授课教材所需而执笔，后来中止教务，就没有继

续写下去，但这志愿总时常在意识上浮起，而时代环境又不允许他丢开眼前急遽的社会现状的指示，因此从这书出发的《中国文学史》，先生预备以一年的时间给以完成的，终于没有继续下去，不过国学方面的参考资料如《四部丛刊》正续编、《二十五史》……等书的购置，在他逝世前后还是不断地送到，就可以见先生始终没有忘记这一件工作。这是因为感觉到以他那现实主义者的眼光，写起中国文学史来，相信可以打破向来迂腐传统的习见，给后来研究文学者以一正确的指导。无如这一愿望终究成为画饼，这是每一个从事文学者知道都引以为憾的。最后，在先生临终前不久（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还在执笔写稿，压置在案头而没有写完的一篇短文是《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现收在《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末编》中。此外，计划过而未完成的稿子当然还有不少，但因未曾动笔或是零碎材料，这就不细说了。

四　是否有未发表的或未完成的译稿？

先生大病后，自以为稍愈而急欲完成的译稿，是《死魂灵》第二部，但译至第三章发表在刊物里，呈于读者之前时，先生已不及披览而先逝去了。更早些时，曾译过西班牙巴罗哈作《山民牧唱》，陆续刊载于《译文》杂志，原计划不久出单行本。倘照日文译本看，还缺一篇未译，不知是未完成的呢，还是有意舍弃。至于未发表的译稿，照目前所知，大约是没有了。不过北京方面是否有旧译稿，因为时局关系，一时还不易去调查。

五　关于未曾保存的原稿，或是在出版所或检查处遗失的稿子，有所知悉否？

出版所对于原稿，大约在出书之后不久总陆续毁弃，除非原著者特别交涉退还，或偶有出版者另抄副本付印，如以前北京未名社对于先生著作是这样做，此外是没法得知原稿的去向的。最可惋惜的是未经发表过的中华民国元年至十四年的一包日记，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随着笔者的被驻上海日本宪兵队拘捕而就在寓所搜去，待到两个半月之后释放，发还两大包书籍时，才晓得民国十一年先生的全年日记失去了。后来曾经辗转托人查询，终于没有结果，这是全部完整日记中失去了中间的一年，在研究鲁迅文学生涯上是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

六　先生的手稿是用什么方法保存的？是私人搜藏的，还是家属保存的？

有些是私人保存的，如通信，许多散存于各收信者的手里。大部分手稿是在上海，由家属保存，北京旧寓也许还有多少存在。

七　那些作品刊出时被检查官删除很多，这些被删作品的原稿是否保存着？

从一九三三年一月给《申报·自由谈》写杂感文起，平均每月写八九篇，到同年五月初，投稿竟接连地不能发表了。据先生自己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这些被删作品的原稿虽然没有保存，幸而已收集在《伪自由书》里。从六月起，先生在《自由谈》的投稿六十多篇，就用种种的笔名应付了。"一面固然为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骂读者们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于是许多作品得以刊出，自然还不免于被删改。这，据作者推想：有些是"改点句子，去些讳忌，文章却还能连接的处所，大约是出于编辑的，而胡乱删削，不管文气的接不接，语言的完不完的，便是钦定的文章。"直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初，对于被删改的文字，多由作者补上去，而且旁加黑点作附记，全都收在《准风月谈》里了。以后仍然继续用许多笔名(世界上文学家用笔名之多，恐怕先生亦是其中之一了，大约共有八十个以上)投稿于各种刊物，颇能掩饰一时，得以登载出去，中间删改过的，都收在《花边文学》里，那时是一九三四年，检查官因为对于某种杂志疏于检查而出了毛病，"官家的书报检查处忽然不知所往"，因此出版界似乎倒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但是好景不常，在同一年里先生的作品(收在《且介亭杂文》里的)仍旧不断被删改，我们只要翻开原著的附记，就很清楚地了解到那时检查官的界限是非常之宽泛，连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语，都被删除，而描写里弄女工生活的小文，更全篇被抽去，这先被删改而后又盖了"抽去"二字印章的一篇《阿金》，经了好几个机关重又回到著作者之手，而成为仅得保存的底稿。因着不断的检查、压迫，先生每发表著作，后来多把副稿寄出，所以对于若干篇的被删除，得以从原稿补入在单行集子里。随后一九三五年写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里，即有不谈国事的作品，只要猜想是先生执笔的。倘一经检查，也无一不被禁止。

八　先生是否有未发表的日记？是什么时期的？

先生的日记，是从民国元年五月五日起至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七日止，连续不断地记下来的。曾经在刊物上发表过的，不过二年多，其余大半是未发表的。

九　先生所收到的信，保存着很多吗？

并不多。每于写了回信之后就烧毁了，原因是怕牵累别人。

十〇　有没有苏联作家的信？

大约有的，不过没有留存，说不清楚了。

一一　其中是否有高尔基给鲁迅的信？

没有。

一二　先生和谁的通信最多？

先生是勤于写回信的，几乎是有来必往。但也难找出最多的是谁。在某个时期里，通信比较多的有数人，如因出版关系，在未名社有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等；在应文学上的问话，与在东京留学时之韩侍桁；或忙于搜求木刻，向在德留学时之徐诗荃，在法留学时之季志仁等；而与李秉中、刘军等通信亦不少。不过谁是通信最多，未必就是始终都和先生意见一致，而与先生极关切的，反而不大通信，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情形。

一三　先生曾用外国文写过文章吗？用那国文字？

曾用外国文写文章，但只限于日文。

一四　先生的手迹是怎样一种性质，很难辨认吗？

是用中国毛笔写在中国纸上，永远是极易辨认，涂改不大多，偶见字、句的修改罢了。

一五　先生是否在自己的手稿里画过图？这种图画的性质怎样？

仅只在《朝华夕拾》里画过插图“活无常”，这是神话、传说里说人将死时阴间派来的勾魂使者。

一六　先生批改青年作家的稿子有什么特点？他对于原稿作怎样的修改？

在初学写作者，奖掖多于修改，比较宽容些，多方设法介绍登载。随后作品多了，一定随时警告他不可疏滥。如果真是不成熟的作品，实在无法修改了，就详细指出内容有怎样值得讨论之处而退回，倘使稍微

可以勉强登载，无不设法的。如果是许多短篇集成的，可抽去的必定劝作者抽掉，其余可用的，总极力尊重作者意见，除了错字、句子欠顺稍加修改之外，大约总不去删削很多的。如果非多加修改不可，比较欢喜的是指出原稿的值得注意点，请作者自己去重新改正。但这并不是说他不肯尽力，他对于每一个青年请他批改稿子，只要答应下来，没有不是逐行逐字，认真地看的。译稿则一定找原著来对照修改。比方是英文译稿，除了英文原本之外，再有其他国家译本可以参考，他更愿意周到些。设或还有怀疑之处，不是自己独力能够了解，他必定请教比他更高明的，总之，决不肯含糊了事。

一七　先生的翻译工作有什么特点？他是严格的直译原文呢？还是译意思？

他绝对反对译意思。他是赞成直译原文的。关于这，他有好多篇文章和那时主张译意思的人辩论过。我们只要翻开他的作品，在这方面发表意见的真不算少（见《准风月谈·为翻译辩护》）。他又赞成多翻译，至少与创作并重，因为普通人多看轻翻译的。他自己著作的全部分量，两者也是平衡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南腔北调集·关于翻译》）翻译的内容，他是"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但也应该注意时间性："我们也不能决定苏联的大学院就'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倘在十年以前，是决定不会的，这不但为物力所限，也为了要保护革命的婴儿，不能将滋养的，无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无区别地乱放在他前面。现在却可以了，婴儿已经长大，而且强壮，聪明起来，即使将鸦片或吗啡给他看，也没有什么大危险，但不消说，一面也必须有先觉者来指示，说吸了就会上瘾，而上瘾之后，就成一个废物，或者还是社会上的害虫。"而他又主张批评不要限制得太严，"青年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地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连用铁栅围起来了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有害的文学的铁栅是什么呢？批评家就是。"（《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上）》）有些批评家专门对译品找

疵，甚至评到不值一顾，先生是请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一救急，不要把有烂疤了的苹果一下子抛掉。因为在中国的出版界以及购买力都很贫弱的，"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他不但赞成严格的直译，甚至别人指斥他的翻译为"硬译"，他也还不惜屡屡给人们以辩难，在《二心集》里有《"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就是对那些公子哥儿们的嫌恶"硬译"理论的反驳，《二心集》里还有《几条"顺"的翻译》，则是对那些狺狺不休以意译为妙而其实有他们的精义是："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直接指斥"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接着还有一篇《风马牛》，一篇《再来一条"顺"的翻译》，那就完全拿他们自以为顺而其实使人迷糊的事实给以有力的打击。而先生自己对翻译的态度，在同书《关于翻译的通信》那回信里说："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倘若永远用着糊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糊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这是先生对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一种极其尖锐进步的"拿来主义"。"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此外对那不满意于间接翻译者的意见是：因"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没

有伊本涅支，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自然，中国未必没有精通丹麦、诺威、西班牙文字的人们，然而他们至今没有译，我们现在的所有，都是从英文重译的。连苏联的作品，也大抵是从英法文重译的。"(《花边文学·论重译》)除了不反对重译之外，先生也还赞成复译："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的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且介亭杂文二集·非有复译不可》)要纠正胡乱动笔的译本，唯一的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像赛跑一样，没有比较是不行的。

一八　在翻译时，先生用什么字典？

日常用的，有以下各种：

Pyccko－Японский Словарь

日外村史郎编《ロシア 语辞典》(铁塔书院版)

《广辞林》(文学博士金泽庄三郎编纂，东京株式会社三省堂发兑)

《藤井新独和辞书》(文学士藤井信吉编，东京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

Sanseido's New Concise 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y

《新コンサイス英和辞典》(三省堂编辑所编纂)

《标准汉译外国人名地名表》(附汉文索引，西文译音总分各表，商务印书馆)

The Concise Universal Encyclopedia. Edited By J. A. Hammerton. Illustrated.

《文艺辞典》(创元社编)

《袖珍英和辞典》

《独和动词辞典》

《世界文艺大辞典》

《模范最新世界年表》(三省堂版)

《最新独和辞典》(有朋堂版)

这是就我所知道的,另外也许还有,因为不是手边常用,一时记不出了。或者临时托人借几本来用,更爱找活字典,那就是说:随时向精于某一国文字的人请教。

一九 例如他在翻译苏联文艺作品时,果戈理的《死魂灵》时,用什么字典?

除了上面所举出的字典外,也许还有别的,可惜一时查不出来,但他仍是不惜向精通俄文的人请教,如曹靖华先生,就是时常帮助他的。

二〇 那些作品是先生生前出版,那些是死后出的?

生前出版的:《坟》、《呐喊》、《野草》、《热风》、《彷徨》、《朝华夕拾》、《故事新编》、《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两地书》、《集外集》、《中国小说史略》。(辑录并考证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

死后出版的:《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书简》、《集外集拾遗》、《汉文学史纲要》。(辑录并考证的:《古小说钩沉》、《嵇康集》。)

二一 先生自己怎样称呼他的笔名"鲁迅",Lu－Sin还是Lu Sün?

大约是Lu Sin,他自己常爱缩写为L.S.。

二二 在现代中国作家中,谁是被认为先生文学遗产及其手稿最优秀的通人?

先生文学造诣深而且广,是多方面的。要向现代中国作家去认,谁是他文学遗产及其手稿最优秀的通人,实在难于回答。在北京以前(一九二六年以前),许寿裳、李霁野、台静农诸先生比较接近;二六年以后,则曹靖华、茅盾等先生更了解他;而自到上海以后(一九二七～三六年)的十年间,以冯雪峰比较可以算是他的通人。

二三 先生有没有他自己不愿发表的未发表的手稿?

并不打算发表的是:日常生活的日记。写了原稿弃掉被家属收存的,有一篇用直入笔名写的《理有固然》,在一九四一年发表于《直人》刊物内。

二四　先生有没有写过诗?

写过语体的白话诗,更有数十首古体诗。

二五　先生对自己的作品手稿有没有什么遗嘱?

没有。

二六　先生所写作的一切,已经搜集到什么程度?搜集先生手稿的困难在那里?

大致搜集在《鲁迅全集》里,或许有私人保存原稿和许多通信。收集到的遗札大约不过全部的小半或更少。原因是收信人愿意自己保藏,又兼战争关系,无法进行收集。还有北京方面,或许有些零星稿件,也因时局关系,无法查检。

(1945 年 10 月 19 日重庆《新华日报》)

鲁迅先生的香烟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

凡是和鲁迅先生见面比较多的人，大约第一个印象就是他手里面总有一枝烟拿着，每每和客人谈笑，必定烟雾弥漫。如果自己不是吸烟的，离开之后，被烟薰着过的衣衫，也还留有一些气味，这就是见过鲁迅先生之后的一个确实证据。

我头一次到他北京寓所访问之后，深刻的印象，也是他对于烟的时刻不停，一枝完了又一枝，不大用着洋火的，那不到半寸的余烟就可以继续引火，那时住屋铺的是砖地，不大怕火，因此满地狼藉着烟灰、烟尾巴，一天过了，察看着地下烟灰、烟尾巴的多少，就可以窥测他上一天在家的时候多呢，还是出外。一直到第二天出外了，然后女工才来打扫，否则除非等他高兴离开那间斗室，或走开到别的房间。

用烟灰缸和烟嘴是离开北京之后了。在广州，住在中山大学的大钟楼上，满是木板的楼面，应当小心火灾的。我们房间里有一只粗磁痰盂，但是鲁迅先生的习惯，除了后来大病咳嗽之外，平时总不大见他随时吐痰的。所以可以说，痰盂和他不生什么关系，因此处理烟灰，除了痰盂之外，唯一便于随身移动的，自然就是烟灰缸了。

鲁迅先生的俭省有时几乎令人看不过去，例如抽香烟，直至烧手或甚至烧口，真正没法拿了，然后丢掉。广州随处都有象牙制品，差不多两寸左右长的一小段烟嘴，套在香烟上，是很便当的，我买到了送给他，从此就一直在吸烟的时候套上象牙烟嘴，到上海之后，也曾经好几次往大公司添换过。在这里可以见到鲁迅先生的习惯，并不是拘执不变的，

在可能的时候可以改变。

他嗜好抽烟，但对于烟的种类并不固定，完全以经济条件做基础。在北京，时常看到他用的是粉红色纸包的一种，名称好像是"红锡包"，因为自己对于这方面并不记得清楚。在广州，吸的是起码的一两角一包的十枝装。那时人们生活真有趣，香烟里面比赛着赠画片，《三国》、《水浒》、《二十四孝》、《百美图》等等应有尽有，有时鲁迅先生也爱浏览一下，寻出新样的集起来，但并不自己收藏，还是随手转赠给集画片的青年。到了上海，烟的色样多了，买香烟的差事是由我去办的，就时常带买些新出品来。日子长久了，我们房间的一角，就常有一堆堆的洋铁小长方香烟盒，后来电木圆听子的也有了，于是洋铁小长方空盒、洋铁圆听之外，又多了一种电木制品了。洋铁小长方香烟盒里，比较满意的是 Standard Tobacco Co. 和蓝地有白色埃及人像和牛及狮身人面的一种：The Flower of Macedonia。那时售价不过五角一听，里面就有五十枝。大约一元买一百枝还似乎觉得不大经济，香烟新出品又争相贬价竞售，而鲁迅先生自己又时常说："我吸香烟是不管好丑都可以的，因为虽然吸得多，却是并不吞到肚子里。"所以一百枝装的小长方听子烟，一元可买两盒的，用得更长久了。话虽如此，红色圆听子有一只黑猫图案的香烟，总算是他最爱好的，因为价钱比较高，大约要一块多钱才买到五十枝，不大上算，只是偶然买些用。但是有一次有人送给他十来听"黑猫牌"，照理该好好地留着自己用了，却是不然，他拿来分送朋友和兄弟。无怪有人说他自己吸廉价的烟，留着好的请客。其实是有什么拿什么出来一同享受，倒并不是同时分开两种待遇的。纸盒的香烟，时常买"品海牌"是真的，因为他不爱用香烟夹，预备了也不用，宁可带两盒"品海"，倒觉便当。所以朋友提起他的吸烟，也注意到这个牌子，其实不过因为从前曾经用过，还好，价钱也低廉，所以比较多用这种了。

回想起来，我实在太简单，相信他"并不吞到肚子里"的说话，因为尽是买些廉价品的香烟供给他，这也许日积月累地已在做慢性杀害他的事业。其他类似的该懊悔的自然也不少，所以如果说许其忏悔，实在也太轻恕了我，其实是经常做那看不见的损害他，倒是真的。我如其没有把经历的一切忘记——实在也怎会忘记呢？——那么在我曾经照料过他的一个时期，确确实实太对不住他了，处处在经济上着想，没有尽

最大的力量周到地招呼他。虽然在北京，为了和段、章辈战斗，他生病了。医生忠告他："如果吸烟，服药是没有效力的。"因此我曾经做过淘气的监督和侦查、禁制工作，后来病总算好起来了，却又亲自给他用劣等香烟来毒害他，这该是我自认无可饶恕的供状。

（1945 年 10 月 23 日上海《文萃》）

鲁迅故居和藏书

位置在北平西北角阜城门内西三条胡同的鲁迅先生的故居，已经颇显出衰颓之象，黑漆的大门早已部分剥落，露出了一块块的黄泥和稻草混合的灰白色彩，宛如疏落的老人发顶，点缀着黄色的秃头。一进大门的顶棚也支离破碎。门里横陈着大小多种的腌菜甏，一望而知住在里面的人口不会太少而收拾地方的余裕却不会过多。满院子的杂乱无章，似曾相识却恍如隔世，这就是二十年前清洁齐整的住着"荷戟独彷徨"的一位供给全中国人精神粮食的所在吗？冥想着一进门我会禁制不住悲哀痛哭的，在上海临动身前，到北平后我就怕有这一个开场。然而非有这一个开场不可，却是太和我所见的二十年前相反了，似梦？却真！推想和实际会两样的，我能够克制！于是极力把脑里的电影剪断，变成漆黑的一片，除了在放映室里把亮光放送的时候之外，我会使自己变成机器人。就这样，每日每日地置身于书橱之中。

同院住着一位乡亲，是鲁迅先生母亲方面的亲属，排起来是要叫作"表兄"辈的阮和森先生，除了他们两位老人家之外，还有读大学的和读高中的儿子和十二岁的一位小女孩，增加了这家宅的热闹。阮老先生作幕多年，而且又深研中医，就在鲁迅故居的大门旁也挂着"阮和森医寓"的铜牌子，却是失业之外还从没有遇到过来应诊的病人。这位老先生人却很通达，很谈得来，并且从他那里还找到一鳞一爪的关于鲁迅先生生平的言行。

鲁迅故居是小小的四合房子，除了北屋和入门东屋浅浅的一间是女工住处兼作厨房的仍然自用，其余南屋大小四间，西屋一间都让给阮

家住了。我就是在南屋,从前鲁迅先生经常接待客人的房子里陪着阮老先生,看他点起旱烟管,歇歇吐出他们表弟的生平的一面。据说他从前时常路过北平,这时无论如何表兄弟总要见见面的,尤其在民国五六年的时候,鲁迅住在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阮先生每年过京(北京)赴山西都会相见。鲁迅总欢喜到广和居请吃饭。“他谈话是绝不会虚假的。鲁迅时常比方说:‘我有铜钿在袋子里,别人家来借,我总不能说没有的吧!’”是的,鲁迅就是这样子的作风,所以对一切人也绝不敷衍。因此阮先生又说:“他见客人来了,总是倒杯茶给你,有点心就摆出来,用不用却听便。和人谈话,谈完了就问:‘还有什么事?’如果答说没有了,他就说:‘对不起,我要办别的事了。’立刻就做别的事,绝不敷衍。”

教育部有一位姓甘的同乡,要给他的母亲请旌节表,照例要同乡官具结的,向鲁迅请求的时候,被他严厉地拒绝了。那位姓甘的不明白是什么道理,照他的意思是一定应该博得所有听到的人都尊崇以为荣耀的吧,所以更迫说一句:“这是我的母亲。”而鲁迅却说:“正为此更不可盖印。”“这就是鲁迅对旧礼教的态度。”阮先生补充地说。

有一次鲁迅对阮先生说:“我在教育部见天学做官。”阮先生奇异地问:“为什么?”意思是不懂他的话,什么叫学作官。而鲁迅这时却说:“我每天签个到,一个字值好些钱呀,除了报到,什么事也不干。”这就是刻画出官僚作风的令人愤慨处。

鲁迅又曾经对阮先生说过:“别人的闲话不要管,你依了他的,另外别个的闲话未必一样,还是有不满意的,爽气管自己好了。”他就是这样的处世法。阮先生说完之后,兴致还是很好,换了烟叶,喝了一口茶,又谈起鲁迅在绍兴时候的情景来了。

他说:“鲁迅在绍兴有四好(四样欢喜的):摩尔登糖(扁圆,像水果糖,那时的新式糖食),茶,双刀牌(强盗牌)香烟,牛肉干。”“他因为欢喜买糖食,而且总是那一两样,长久了,时常一踏入店门,不等开口,老板就已经指挥店伙,叫把店上层搁起来的摩尔登糖拿下来等待出售了。”可见他嗜好的刻板。做事也如此:“当他在教育部办公的时候,每天也是一定准时走过,所以沿路店家,时常看他的车子走过就说:‘可以做饭了。’简直拿他作时钟看待,可见他出入也有定时。”

“硷砂河沿后面坟地，人家都说有鬼，夜里就没有人敢走过。鲁迅不怕，还是出入不顾。”（按：这故事已见鲁迅自己著作）

“辛亥革命之后不久，《越铎》报因为不满意浙江都督王金发而在报上骂他，王金发大怒，甚至仇视这份报纸，目标却是鲁迅，颇有见害的意思。鲁迅偏不管，每天在家吃完夜饭一定要回到学校住宿，而且不肯偷偷夜行，必定两只手各拿一个灯笼，灯笼上红红地照出大大的‘周’字，到天亮从学校回家，又总是说：‘怎么样？又回来了。’”

最后，阮先生结束他的回忆说：“我们就是这样多年相见的很要好的兄弟。可惜最后在上海匆匆一见就走开，以后再没有机会见面了。”

鲁迅先生的藏书，以前大部分原是放在南屋的，大约因为出借给阮先生住了，这才般到北屋靠西的一间屋子里。那里紧对门就是四口书箱成一田字式竖排着，背后也一样，共八只。再靠西墙壁处放着到沪住下了之后寄回去的八只木箱子，里面紧挤着的全是在上海买到的日文书和在广东教学时广雅书局买到的线装古书，是散页，并没有装订好的。此外更有些新文学的书等。还有四只白皮箱，里面装着历年搜集到的碑帖，以及亲手抄写的古碑，和亲自编好的砖考等。此外还有两只书橱，装的书是中文、日文、外国文都有，另外一只书橱一半是书，一半却是从西安带回的以及平时搜集的从坟里出土的泥人泥马之类的东西。再有一只大皮箱，以前原是放在鲁迅先生床头一角的，现在也并入这小屋子里，那里面就只是些杂物了。另外还有两小箱的中文书，一共是大小二十六只箱子和书橱。我从十月二十四至十一月五日差不多两个星期，天天躲在这书箱周围，逐只打开，去尘，包裹，再投些樟脑丸，然后重行封锁，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故，照这样整理过，对于保存上或者比较妥当了。此外放在别地方的杂志，以及在鲁迅先生昔日作工的房间里，还有些《小说月报》、《东方杂志》、《语丝》等期刊，都曾经鲁迅先生手泽，按半年作一包，在书脚处注明书名、期数，可惜不知谁随手取阅，甚至有阅后并不归还，中间缺去数册，书脚的亲笔字亦被撕毁的，也只能把残余的包裹起来，一同请入封锁书籍的西屋里了。

鲁迅先生研究学问的方面很广博，大致对于前辈的从书目入手的方法也并皆采纳，在他消闲的时间，就时常看见他把书目看得津津有味，我却从不爱沾手的。有时鲁迅先生也解释给我听：“这是治学之道，

有人偷偷捧住《书目答问》死啃一下就向人夸耀博学的了，其实不过如此而已。”我想鲁迅先生的披览，未必志在夸耀，而是他确实是藏书无多，有时为了研究史学之类，或某种著作，只得借书目作参考之一罢了。因此他的藏书里随时遇到许多出版年代不同和地域不同的书目。

正式供给思想的丰富的如哲学部门有德国哲学，更多的是辩证法的，以及马克思的认识论之类的一大部分书籍。从这里可以看见他沉浸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用功夫的长久，可以比方作制中药的九蒸九晒，已经纯熟之极了。佛教和美学，作为哲学的另一蹊径，鲁迅先生也并非不关心的，在他的藏书一角也占相当地位就可以知道。

自然科学部，如有机化学、矿物学、生物学、进化论、遗传论、生理学、解剖学、性生理及卫生、西法医学、人类学中之人种学，以及动物学中之《昆虫记》等，这些书都有一个系统，就是鲁迅先生从东京学医以及回国执教多少和这方面有姻缘，而晚年的想译《昆虫记》，是仍然没有把这方面的兴趣消灭的明证。

《世界美术全集》、世界出版美术史、美学、图案画、版画等的藏书，与其说是由于他晚年的爱好，不如说是本来是多年的研究，似更的确。我们从他的批评木刻作品的见地上观察，就可以晓得他的说话，不是冒充内行，确有独到之处。再从他翻译《美术史潮论》，更可看出他的爱美观念了。

各地风俗人情的不同，影响到社会发展，演变到政治趋向，这也是研究文学者所应关心的，鲁迅先生藏书中于民族学、民俗学以及风土记之流也爱浏览。

社会学方面，无产者文化、社会演化、社会心理、家庭、恋爱、阶级斗争、社会运动等以及和这关连的经济学、财产进化论、工厂制、各国政治状况、马克思主义及法理学、历史哲学、近世史、世界史、中国文化史等书也存不少。

各地游记、印象记、杂记、传记也有，自然也是风土的旁支了。

论文学的也不少，文艺批评、诗歌、戏剧、小说、杂著、童话，有关英、德、法、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挪威、匈牙利、捷克、苏联等国的文学研究，都是鲁迅先生时刻亲炙的精神食粮。

国学方面各种类书丛书也占一些地位，但似乎并没有什么难得的

海内孤本,不知是原来没有呢还是偶有一二亦不能保。或则因为鲁迅先生平时对于善本、珍本的购买力未必很多,而他的记忆强和图书馆的徘徊恐怕对于他更易借助。

钞本也有十余种,最著的如碑录、六朝墓名目录等。《沈下贤文集》十二卷,为唐沈亚之撰的鲁迅钞本(另外还有一份别人的钞本,又有一种印本,同一人而如此再三注意的,除《嵇康集》之外就算沈集了)。另两种钞本为谢承《后汉书》及《岭表录异》,前者有补逸,而后者附校勘,都曾经费一番心血的。我们从鲁迅先生这许多钞本看来,他的精力,费在这里实在不少,令见者无不怃然,似乎埋首于故纸堆中,毫无足取似的。或且越钻越深,爬不起来,看不见世界,畏惧到光明的刺目,因而投诸清流,了此一生,真可以与王国维并肩等量了罢!然而我的观点却不如此。鲁迅一开头舍弃医学而弄文学就是面向社会,向人生,在东京想出书,也离不开对现实的反抗,没有丝毫示弱之处。民元以后,在北平身当袁世凯的凶残,暂时沉默一下,钞录古碑是事实,是另一战斗的准备。后来袁氏跋扈有加,不能再忍的时候,鲁迅曾经离平南下,这从他的日记(民国五年)可见一二。后来(民国七年)《新青年》出版,叫喊的人也有了,根据他最初的志向和个性,鲁迅自然不会躲起来的,说是由于钱玄同先生的劝勉,才开始写《狂人日记》,读者想不致于连他自己的谦抑话也板板二十四地计算的吧。自己当然会死,社会却一定进步,绝不会使社会跟着自己走向坟墓里去,这是鲁迅的确信。这一确信,领导鲁迅跨过许多渣滓,超越许多前人,大踏步往前走。就是病了,也绝不肯倒下,用他一口气、一分力,向中国叫喊,向黑暗叫喊,向一切敌人叫喊,为什么要投水呢?这只有王国维;再之前,是屈原,不是鲁迅!

整理完书,看望了一些朋友,稍稍休息了几天,又乘机回到上海了。这之间,记述原可生长得较为详尽的,无如这两天被北平女生遭美军污辱之后的激怒,没有闲情逸致为生活于现实奋斗之外多说几句话,在最愤慨的时候,我写不出。此行观感就此结束。

(1946年12月《文汇报》)

关于鲁迅的作品·故里·逸事

《创世》似乎颇爱研究鲁迅，今年二月一日，三月十六日，五月一日三期里都有关于鲁迅的文章。但奇怪的都是用“史天行”、“天行”的一个笔名，大约同是一个人了罢。

那位“史天行”大谈其《鲁迅的早年作品》、《鲁迅故里访问记》、《鲁迅逸事》，像煞是一位鲁迅的朋友或知己似的。其实史天行不是鲁迅的朋友或知己，因为从他三篇文章里都有错误就知道（并请参看《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鲁迅先生作的《续记》）。而最近的一篇更其谬误得离奇，绝不像是熟朋友。如果说是知己，则上面还应该加“谬托”二字才适当些。因为许多事情，即不是朋友，稍为了解鲁迅些的都晓得的了，而还会有那样的错误。而《创世》的编者也没有注意到再三给发表，真是想不到的事。

在第一篇，《鲁迅的早年作品》（《创世》第九、十期）末段，录鲁迅原诗“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早见于《鲁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拾遗》里。后又在《鲁迅三十年集》里印出。而且《集外集拾遗》还出版过单行本，在这诗的题目是《亥年残秋偶作》，读过的人很多，并不如史天行先生所说：“这诗外间所没有见过。”

第二篇，《鲁迅故里访问记》（《创世》第十二期）第一段“这一次去了绍兴一星期，顺道去访问过鲁迅先生的故里。原来绍兴自从二年前抗战胜利以后，看不出有什么进步，可是当地的士绅们为了炫耀自己起见，呈请县政府改了许多的地名，内有元培、秋瑾、成章等镇，此外，便是把鲁迅的故居团基巷一带划做‘鲁迅镇’，算是纪念这位被称为东方高

尔基的文化巨人。"史天行先生这篇文章末尾记出："一九四八年一月九日写于宁波东马巷。"看来他的"访问"是在今年岁首或是去年岁暮了。然而相隔不久的今年四月初周建人先生和我们亲自回到绍兴，从父老那里得知以前曾经有过成章镇、秋瑾镇、鲁迅镇。却在一年多以前，由上头通知，把这几个镇一律取消，改为"越王镇"。而且向来由保民筹款设立的鲁迅国民学校，也因此改为"越王镇塔子桥国民学校"了。在一切都复古的时代，可见就是"当地的士绅们为了炫耀自己起见"的那么一些企图也不许他们"炫耀"一下。而史天行先生所以为"算是纪念这位被称为东方高尔基的文化巨人"的一句话恰好相反地作为无情的表答。却真如史先生所说："看不出有什么进步"的了。

第二段里："小名樟寿，是据说一个福德寺的和尚替他取的，因为幼年父母很钟爱他，给他拜了一个和尚为师，鲁迅写过一篇文字，以纪念他。"也还是建人先生引导，虽然三十年没有回乡，大致没什么改动，一下子就把我们领到鲁迅先生的第一个师父龙师父住持过的寺里去了，这个寺叫"长庆"，不是"福德"，离周家故居不远，他们从小就时常去玩的，现在是龙师父的第四个亲生儿子阿方师父的后代企祥师父做当家。并且还有一位生病的老太太在晒太阳，据说是龙师父的第二房媳妇，企祥师父的婶姆，靠他养老呢。想来绝不会错的。再查《且介亭杂文末编·我的第一个师父》里，"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可见也的确是"长庆寺"而不是"福德寺"，"和尚替他取的"是"长庚"而不是"樟寿"。如果照鲁迅先生自己所说是对的，建人先生认识企祥师父所访证也不错的，那么，史先生所访问的史实也还是值得存疑的了。

第三篇，《鲁迅逸事》(《创世》第十五、十六期)则似是而非，错误百出，令人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就我所知的，略为指出如下：

一、《缘起》里"而所谓解放区方面，早年延安设有鲁迅艺术学院度(原刊如此，疑有脱误。)胡考曾任院长，近年张家口尝一度设立鲁迅大学，校长乃成仿吾，在苏北办有多所鲁迅小学，公园中更建有铜像，这是许多人都见到过的。""早年延安设有鲁迅艺术学院"我们也曾听到过的。不但如此，还听到以此断定说鲁迅是共产党。否则为什么只有共

产党给他设立学校呢？可见他是共产党无疑了。绍兴也曾经有过鲁迅国民学校，难道绍兴的"士绅"们都是共产党吗？难道官方的取消鲁迅镇改为越王镇也的确怕有同情共产党之嫌吗？又据我们所知，胡考并没有做过鲁迅艺术学院院长，这是一些认识胡考先生的人都可以知道的。至于苏北离上海并不很远，来往的人很多，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有"多所鲁迅小学"。那里战争不断发生，并不安定，所谓"解放区"的物质条件并不丰富，艺术品更不易产生。所谓"公园中更建有铜像，这是许多人都见到过的。"究竟都是些什么人见到过呢？含糊地说一句"许多人都见到过"就行了吗？鲁迅是中国人，在中国各地方有任何纪念，我们都没法阻止或拒绝。相反的，也因为鲁迅是中国人，诚如他所作《孩儿塔》序里所说："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即使无端诬人为投降或转变，国贼或汉奸，社会上也并不以为奇怪。"所以就是有人无中生有地说"所谓解放区"有许多鲁迅大学，小学，艺术学院，铜像……等等，甚至于如《鲁迅逸事》第二《琐事拾零》会"听说共党党魁朱德，其貌颇似鲁迅"，令人也不知其居心何在。且朱德明明没有胡子，这却是许多中外刊物的照片上大家多记得的。史先生却说他"嘴上也有薄薄的一层小胡子，两只眼睛灼灼有神，骤视之，简直分不清楚。"则更使人会以为史先生是疏于审察，或另有见地了。

二、《琐事拾零》里说"鲁迅很喜欢吃落花生的，居住上海时，每出来必买一大包回去。"也不确当。鲁迅居住上海时，我和他一起生活，偶然由我买些花生回去，鲁迅却从来没有更非"每出来必买一大包回去"。

三、同段"听说汪精卫在时最爱读鲁迅文字，曾致函鲁迅表钦佩之意，鲁迅置之不复。"史先生善于"听说"，我却知道鲁迅并未曾收到过汪氏来函，他的日记也没有写下收到过汪来函的记录。史先生随便以"听说"出之是很轻松的，但在史实方面，却不便以"听说"作征信，真是没法的事。至于鲁迅对汪氏的义正词严的指斥，比之为"玩笑旦"(见《伪自由书》)，则早在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八一三"的前四年已经很恰当地给予汪氏定评了。

四、鲁迅母亲爱看旧小说，鲁迅尽先搜寻方面很广，因而后来有写《中国小说史略》的便利，这是不少人晓得的。内容却并非仅限于一二人，他母亲也绝没有只"爱读李涵秋向恺然等作品，却不满鲁迅的所

作。"这未免太附会了。鲁迅作品,他母亲确曾阅读,读后感想是:"这本来乡下有的事,呒啥希奇。"也正如古人写诗,要妇孺皆晓,晓得和"不满"究是两件事也。

五、高长虹著《心的探险》,是鲁迅替他选定,校字,绘制封面图案,以至于收入他所编写的《乌合丛书》之内,那时从没有丝毫"交恶"痕迹的。其后《莽原》周刊出版,高仍投稿,直至鲁迅到了厦门,因未名社对高稿压下,又兼狂飙社事开始攻击,鲁迅始登启事回敬了。事实如此,而史天行先生却歪曲为"鲁迅的一本《野草》原名为《心的探险》,后来这个名称被高长虹抢去了,对高因而交恶。"真可说是向壁虚构。

六、"鲁迅在上海初居闸北横浜路景云里,后迁至施高塔路大陆坊",亦似是而非的。查《鲁迅年谱》,我们初寓景云里,十九年"五月十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至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直至鲁迅逝世。这虽是小事,但如此简便易知的也有错误,则这"逸事","不亦可以已乎"?

七、"鲁迅生前收过一个姓龙的做干儿子",也非事实。"鲁迅生前"就从没有认识"一个姓龙的",更从没有收过任何人"做干儿子"。鲁迅对人,素持平等观念,反对封建传统,那里会把社会上的青年据为私有的心思?至于"其实鲁迅先生所收的干儿子不止一个。据我所知,以写《八月的乡村》一书出名的田军,也喊鲁迅为父,而且在鲁迅家中,住了很多的时候。"则更是笑话。田军以东北青年,逃难来沪,当时和他来往的人很多,现在也还可探听,有谁能够证明他"在鲁迅家中,住了很多的时候"?他从未来住宿一宵,这是我可以作证的。更没有听到"喊鲁迅为父",我也可以作证的。历史不远,以如此近便可稽之事也这样捏造,史先生一面说我们"地址是不公开的,有事接洽均由内山书店转。"一面又说"鲁迅先生所收的干儿子不止一个",而且有"在鲁迅家中,住了很多的时候"。既"不公开",则何从而"住",史先生何从而"据我所知"?颠颠倒倒,互相矛盾,用意何在,请读者体味吧!

八、《鲁迅全集》中所举笔名,是根据鲁迅先生的每篇文章签名才始收入的,我们宁缺毋滥,不敢像史先生大刀阔斧地"调查所得",硬把现在还活着的朋友"何丹仁","周扬",以及并非鲁迅用过的笔名"许广平"……都一古脑儿算入死人名下。因为这是很对不起人的鲁莽灭裂的行

径。

九、说到我自己，“据我所知”，总比史先生“所知”确当些吧，我现居沪上林森路霞飞坊，不是“霞飞路和合坊”。以前我也从没有住过“和合坊”。至于说“鲁迅受聘广州中山大学，她也跟到广州，始则做鲁迅的私人书记，因外间流言纷多，就实行同居，其事实经过，详细载在鲁迅和许景宋的情书集《两地书》中。”那么好，我就从《两地书》说罢。在这书里，明明记载着我是民国十五年九月由上海动身回广州到女子师范学校里任职，而这时鲁迅是到厦门去。直至十六年一月鲁迅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时他才到广州，我早已在那里了，并非“跟到广州”的。鲁迅未到广州前，早由孙伏园先生介绍，我入中山大学任的是文学系助教，并非“做鲁迅的私人书记”，广州开化甚早，社交公开，我们在广州一直没有听到过什么“外间流言纷多”，自然史先生要“据我所知”的自说自话是可以的。鲁迅和许寿裳先生因住在学校里经常接见客人，没得休息，“后来搬出学校，租了白云楼一组，我和鲁迅，景宋三人合居。”（见《亡友鲁迅印象记》）所谓一组，是共有六七间房子，除了许先生和鲁迅及我自己，还有一位女工友。《两地书》印行已久，鲁迅著作也并非绝版，区区史实，也如此错误，不知著者是否愿意以讹传讹，或以为“逸”即不妨“讹”他一通欤？

十、鲁迅原先有一位夫人朱氏，据许寿裳先生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说：“朱夫人是旧式的女子，结婚系出于太夫人的主张，因而‘瑟琴异趣’，鲁迅曾对我说过：‘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从旁观察，许先生的话一点也不错。她不识字，取汇款用的图章刻的是周朱氏或周太太三字，因此时常于汇兑时发生麻烦，此刻向建人先生问来，她名“安”，她的母家长辈叫她“安姑”，可见史先生给她的“名叫瑞英”是不对的。史先生又说西三条二十一号“平屋有三间”也不对。那是北平普通的小四合屋，四周都是房子，共十多间。“前年胜利后，这位夫人穷得更是不堪，把所有的东西都卖空吃空，几乎要自尽了。”也不确当。也是“前年胜利后”，我曾特意回平察看，西三条屋内“所有的东西”大致无恙。末了非常抱歉，史先生登高一呼，说“听说这位朱夫人近年仍很贫穷，希望有人去帮助她。”（见三十七年五月一日出版《创世》）这回却是把死人算在活人户口了，“朱夫人”早

已在去年上半年逝世，而且已经早安葬，除非拿死魂灵当作活招牌，才可借此募化一通。这却怪不得史先生的，许多浅显易见有书可查的都错误得离奇怪诞，这小消息虽然报上曾揭载过，但是忽略了也就更不希奇的了。

十一、史先生不但有许多"鲁迅逸事"可写，还有"趣闻"在后呢，他奚落"青年拜服在'灰长衫'下"，还对鲁迅"和蔼的微笑，亲热的态度，好比女人的媚眼和俏笑，具有强的吸引力。"又自认是"闲言"，真够挥洒自如了。看他"书归正传"是怎么说的？把集美学校闹风潮时候，校长请鲁迅去演说的情形随意制造一番。然而实际情形并不如此，当时鲁迅先生给李小峰先生的信里有的提起，究竟鲁迅自己怎样说的，可作为史先生的"朋友俞君告知我他在厦门的一桩事情"的旁证，如果说迷信，好像未卜先知，鲁迅早已正面给自己作了答。详见《华盖集续编》给李小峰先生的《海上通信》，因其言颇长，读者如欲知道，请自己去看吧。

十二、史先生指出鲁迅文章"有很多地方是错误的，我举出一个例子如下，他在《白莽遗传》序中，说白莽的哥哥徐培根，和他成了殊途同归的兄弟，实则白莽确已死了，而他的哥哥徐培根，在做航空署长时，曾有谣传，而现在正荣任着陆军大学教务长，最近还当选国大代表哩！"照这样说，徐先生确还健在的了。不过史先生也承认"曾有谣传"，自难怪他人误信是真实，鲁迅先生伏居在野，与要人不相往来，偶有言词，自然及不上史先生的有"朋友"，有"听说"，有"趣闻"可引证了。

（1948年6月12、19日《展望》第2卷第7、8期）

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

鲁迅先生是最富于同情心的，如果有谁能够真挚地引起了他的共鸣，那时他赴汤蹈火都可以。甚而至于为了同情心，换句话说，就是利用了这，特意给他许多不适合的工作。他也能够勉强地做去。不过对于《自由谈》的投稿，却是真心真意的。一九三三年七月写在《伪自由书》的《前记》，说：

> ……不久，听到了一个传闻，说《自由谈》的编辑者为了忙于事务，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送至医院里，她独自死掉了。几天之后，我偶然在《自由谈》里看见一篇文章，其中说的是每日使婴儿看看遗照，给他知道曾有这样一个孕育了他的母亲。我立刻省悟了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笔，想做一篇反对的文章，……但是也没有竟做，改为给《自由谈》的投稿了，这就是这本书里的第一篇《崇实》；又因为我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通用，便改题了"何家干"，有时也用"干"或"丁萌"。

从《前记》可知先生给《自由谈》投稿的动机了。但"又因为我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通用，便改题了何家干，有时也用干或丁萌。"这不能通用的原因：是一九三〇年三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之后，先生一切向社会表见的机会都暗中受了压迫。不准学校请他讲演，他的书无端受邮局扣留，有的地方甚至连《呐喊》是红色封面而也禁止了。这种不可理诉的待遇，只得改题笔名，以免编者受累。用得最多的是"何家

干"三字。取这名时,无非因为姓何的最普通,家字排也甚多见,如家栋、家驹,若何字作谁字解,就是"谁家做"的,更有意思了。又略变为家干、干、何干等。大致仍给读者以一贯的认识。可是:

> 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象,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都是做着关于作者本身的文章,或则牵连而至于左翼文学者。

这是他第一次改姓埋名仍受到告发和压迫的经过。

《自由谈》的文章,当每天剪下来辑成《伪自由书》付印的时候,把每篇的笔名都删去了。所以此刻记不清确用过什么另外名字。不过先生"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仍然继续投稿。"但到五月初,竟接连的不能发表了,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

随《伪自由书》之后,就在一九三三年的下半年,先生仍旧执笔,换了更多的笔名。而且除了《自由谈》之外,又在《十字街头》、《文学月报》、《北斗》、《现代》、《涛声》、《论语》、《申报月刊》、《文学》等处投稿,这就是收在《南腔北调集》中的大部分文章。所谓更多的笔名,如阿二、华圉、佩苇、白舌、明瑟、隼、它音、楮冠、宴之敖、隋洛文、许遐等。阿二,是上海叫黄包车夫常用的。华圉,是出自《孟子》,"始舍之圉圉焉",所谓圉圉,"注: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意盖困于中华也。隼,"笺:隼,急疾之鸟也,飞乃至天,喻士卒劲勇,能深攻入敌也。"旅隼,和鲁迅音相似,或者从同音蜕变。隼性急疾,则又为先生自喻之意。它音,它,"《玉篇》,古文佗字,佗,蛇也。"先生肖蛇,故名。楮冠,楮,纸也,俗楮墨常相连用。"《说文》:谷也,陆玑《诗疏》,江南人绩其皮以为布,又捣以为纸。"一九二六年有所谓"狂飙运动",而狂飙社中人赐先生以"纸糊的假冠"(见《华盖集续编·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故名。宴之敖三字很

奇特,查先生年谱,民国八年——一九一九——载:“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产成,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移入。”民国十二年,“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可见他是把八道湾屋买来修缮好,同他的兄弟移入,后来才“迁居”了的,这是大家所周知的事实。究竟为什么“迁居”的呢?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敫,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至于西三条的房子,是买来安慰母亲的,绍兴老房子卖去了,买了八道湾的房子,她一向是住惯自己的屋子,如果忽然租房子住,她要很不舒服。这时是齐寿山(名宗颐,教育部同事,共同翻译《小约翰》,先生被章士钊免职时,他和许寿裳先生俱主持公道,愤而辞职)和许季茀(即寿裳先生)两个人各借四百元给我的。”隋洛文不用说,是为了一九三〇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而起的了。许遐这名字,是因为我的小名与遐字同音而取的。有时翻译上避免同一名字出现太多,就拿来借用,如《译文》第一卷第一期的《鼻子》,第二期的《饥馑》都是。

仍是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谈》的编者刊出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以后,先生投稿所用的笔名就更有二十个之多。在《准风月谈》的《前记》里有这样的文字:

> 从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种种的笔名了,一面固然为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骂读者们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然而这么一来,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而他们的嗅觉又没有和全体一同进化,至于看见一个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对我呜呜不已,有时简直连读者都被他们闹得莫名其妙了。现在就将当时所用的笔名,仍旧留在每篇之下,算是负着应负的责任。

在《准风月谈》里用游光的名字写文章的,多半是关于夜的东西。如《夜颂》、《谈蝙蝠》、《秋夜纪游》、《文床秋梦》。丰之余是批评社会的文字居多,有时或作封余,是对那些说他是“封建余孽”而起的名字。他每于一篇文字写好之后,就想名字,有时用旧的,有时被“嗅”出来了,就立

刻重起。孺牛，无疑地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缩写。谈到浙江的“堕民”，他就叫做越客。写到《双十怀古》，他就叫做史癖。桃椎，“《典术》：桃，五木之精，仙木也；《左传》昭四年，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后汉书·礼仪志》为桃印施门户以止恶气。”大约含有除敌之意。符灵，意略同。罗怃，则取“罗无心”义，乃张若谷先生《婆汉迷》说部中称之者。敬一尊，回敬一杯之意，亦即“回骂”也。但也有些笔名似乎意在通俗，以祈掩过检官之目的，如虞明、荀继、余铭、子明等。

不过仍不免于压迫，从文章和这些笔名上就表示出他的反抗性了。尤刚、苇索、白在宣等，似乎都是。终于弄到“停笔”为止，所以《后记》里说：

> 这六十多篇杂文，是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陆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灵感”的“文学家”吹嘘，有无法隐瞒之势，虽然他们的根据嗅觉的判断，有时也并不和事实相符。但不善于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闪不到那里去，于是不及半年，就得着更厉害的压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笔，证明了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带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当时除了压迫作者以外，对于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

继黎烈文先生而编《自由谈》的是张梓生先生，听说《申报》自从黎先生编《自由谈》之后，销路突加，同时读者的“嗅觉”也很高的。《申报》到手，先看副刊；副刊打开，先找“花边”。这时先生的笔名更多，而读者也无须细查了，他们会尝文章的味道，好似易牙调味，而较宽容，所以宁滥勿缺，稍微像先生笔调的，就先剪下藏好，慢慢揣摩。甚至连别人的文章也当是他的也会有。但是不要紧，数人相遇，竞先报告，所以当时

买旧东西货担上的《申报》几乎十有八九是剪过的。这情形，恰好为办报者所满意，他们志在推销顺利，买者欢迎，于是张梓生先生屡屡来索稿，且特许随便改名字，只要有文章。这一来论敌无可奈何了，他们还想不到这位老头子原来是先生的故交，以为一定不会把先生拉来的呢。文化的力量，有时会被人讨厌排斥，用尽千方百计压迫，但结果仍然归于无效。

《花边文学》的笔名，和以前的稍稍不同。如张禄如变为张承禄，越客有时用作越侨，旅隼变为翁隼，白在宣易为白道，家干变为公汗，史癖改作史贲，而赵令仪、黄凯音、张沛之名，盖取其通俗，以掩耳目。常庚则为先生幼小时，第一个师父所取的法号长庚之衍变。康伯度则因先生写了《倒提》一篇文字之后，被林默先生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一篇《论花边文学》，暗暗骂他为"买办"，因而想出的名字。还有，隋洛文有时简称洛文，又同音变为乐雯。这乐雯名字，有时也借给别人共用，如《萧伯纳在上海》，是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萧来上海的时候，正是瞿秋白避难到我们家里住。先生见过萧回来，谈起经过，说到各方对萧的形形色色，以为有辑集起来，给人一面镜子似的对照一下的必要。而且要赶快编校出版，否则中国人脾气，三两天过时了，会没有人过问的。——后来这书的销路似乎不大好。——首先是找材料，我也兴奋地担任下来了，跑了几次书摊，收集几天内的中外报纸和杂志之类一大堆。编排、格式、封面之类，自然先生也出些意见，而实际的工作如剪贴、翻译等，则多是瞿先生偏劳。他很有才气，办事敏捷，可惜时常生病。但只要每天用一时半点的功夫，就立刻脱稿一篇。很迅速的，不过一个月之间书就出来了。既然大部分的精力是瞿先生花的，自应作为他出的书，可是他那时所有译作也多用别名，因此这本书就用乐雯的名字和读者相见。

此外的笔名，或者还有许多可资研究的。我们要了解某一时代的思潮，某一时代的文学背景，和产生这文学的关系，研究这特殊的，作者幻化许多名字，冀图表达其意见的苦衷，对于将来从事文学的人们，或者不无裨益罢。可惜此刻只记得这个大略。据杨霁云先生看来，丁萌大约是天明之意。邓当世，江、浙一带口音，第一字读作动词，亦很近理。实在他每一个笔名，都经过细细的时间在想。每每在写完短评之

后，靠在藤躺椅休息的时候，就在那里考量。想妥了，自己觉得有点满意，就会对就近的人谈一下，普通一些，写出也就算了。杨霁云先生于二十六年四月九日惠函指教，关于先生的笔名有很好的见解，原函云：

豫才先生所取笔名，皆有"深意"。《笔名表》中似应每个注出，否则将来的读者益当不易明了。大概他早年的笔名，含希望、鼓励、奋飞等意义；晚年则含深刻的讽刺意义为多。如早年唐俟之为"空待"义。晚年隋洛文之为"堕落文人"义，丰之余之为"封建余孽"义，上二者乃浙江省党部所赐之谥。罗怃则取"罗无心"义，乃张若谷在《婆汉迷》说部中称豫才者。大部笔名的用义，我想先生大概总知道，不如点明以惠读者以存史料。

很惭愧的，我未能达到杨先生所责望的厚意，只能说到上面的一个大概。另外还有一个笔名，为杨先生所知道而未发表过的，还是这一天的通信里云：

豫才先生尚有一笔名为董季荷，署用于《倒提》一篇文章上——此篇即《花边文学》所因之取名的一篇——，原稿现藏我处。盖当时我拟编一刊物而豫才寄来者，当时因先生适患小恙，时文章又需检查，无人抄录，他托我代抄的。后因刊物计划取消，我即归还，而再用公汗的笔名刊于《自由谈》上。当时如发表在我编的刊物中，则不会有《花边文学》一番的事情了。此一笔名的用意，我猜想是因彼时检查处威严赫赫，他特用一风月式的笔名以掩人耳目也。

杨先生这一段通信很重要，从《倒提》登载在《自由谈》之后，而引起林默先生的大文，因此有康伯度名字的产生，而且又产生了一个似乎是兄弟的名字仲度，而且这一年的短评集的很好的书名《花边文学》也产生了。谥之为《花边文学》，反而使这一本书的内容丰富了，也许是执笔者所梦想不及的罢。这缘故就因为骂他的"扑空"了，使先生也不免"悲愤"，就引他《准风月谈·后记》的话作结罢：

……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杂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够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但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了。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

末了，还要说明一句，先生最后用的笔名，载在《中流》上的是晓角二字，他最后还不忘唤醒国人，希望我们大家永远记取这一位文坛战士的热望。

（1948年10月19日上海《申报·自由谈》）

鲁迅与翻译

鲁讯从事文学翻译是从《域外小说集》开始的，他着重于东欧和北欧文学的介绍，尤其是弱小民族的作品；因为那些作品富于挣扎、反抗、怒吼的精神，翻译过来，不但能借此转移性情，更可改造社会。后来翻译了不少文艺理论书，自比为“偷外来的火，烧自己的肉”，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意义那就更大了。他又酷爱俄罗斯文艺，帮助别人并自己动手翻译不少作品；到他临终之前，仍不忘记对《死魂灵》第二部的翻译；待到译文出书时，他已不及亲眼看到，但其忠实于翻译工作，由此亦可见一斑了。鲁迅一生的著述，创作与翻译各占半数，从这里也可看到他的翻译工作绝不是偶然为之的了。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因此鲁迅特别努力于外国作品的介绍。他说：“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作品的比较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因为取法于外国，所以他对翻译就有一些看法，现在简单说一些。

一　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

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

存洋气呢？日本文的译者上田进君，是主张用前一法的。他以为讽刺作品的翻译，第一当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广大。所以他的译文，有时就化一句为数句，很近于解释。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主张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方面必须力求其明白易解，另一方面要求保存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

二　反对顺而不信

既然名为译书，自然要忠于原著，一字不能任意加减，所以以信为主，以顺为辅，是没有不对的。但有人提出“宁顺而不信”，以为只要文字通顺，读得懂就行，而译文合于原著与否，却不去问。结果把“天河”译作“牛奶路”了。这是否合于原著呢？是否能令人懂得呢？不，乃是“风马牛”不相干的，鲁迅说他真是“乱译万岁”！

鲁迅则提倡“宁信而不顺”的译法。他的所谓“不顺”是什么意思呢？即装进异样的句法——输入新的表现方法。在《关于翻译的通信》里说到：

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

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点力气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

三 赞成“硬译”

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里，说明中国文法不完备，历来就很有些生造和引起变迁的情形。如：

……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

“硬译”出来的词句，也不是全行接收，还有待于自我批评，所以鲁迅又指出：“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它剩落在过去里。”所以“硬译”就有两种：有新造的句法使人一时感觉异样而后来可以据为己有的所谓“硬译”，亦有的确可舍弃的生硬句法的“硬译”。毫无疑问，鲁迅所赞成的“硬译”，只是前一种。

四 关于重译与复译问题

翻译自然以直接译为更妥，重译隔了一重手，在概念上和文章风格上自难与原作百分之百地吻合。但当鲁迅生时因读书界有不少鄙弃重译的，鲁迅认为必须放宽翻译的路，所以他在《花边文学》里说：“中国人

所懂得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没有伊本涅支，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自然，中国未必没有精通丹麦、诺威、西班牙文字的人们，然而他们至今没有译，我们现在的所有，都是从英文重译的。连苏联的作品，也大抵是从英、法重译的。"鲁迅自己的翻译，因他对日文比较精通，其次是德文，所以他的译本，也多取日文重译，或参照德文。据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里说："鲁迅所译安特莱夫的《默》和《谩》，迦尔洵的《四日》，我曾将德文译本对照读过，觉得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实为译界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使我非常兴奋。"

为了补救重译的缺点，鲁迅又提倡复译，并且主张须先打破不能容纳一种原本有几种译本的成见。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非有复译不可》里说得很清楚：

> 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

鲁迅之所以主张复译，是为了提高翻译的质量，与目前翻译界的某些抢译、乱译的现象是完全不同的。因此，绝不可以把这些话拿来与目前翻译事业计划化的政策对立起来看待。

五　鲁迅对翻译工作的态度

鲁迅对翻译工作的态度是十分谨慎，十分严肃的。从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的几段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例如：

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着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严又陵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躇”，是他的经验之谈，的的确确的。

《世界文库》的编者要我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没有细想，一口答应了。这书我不过曾经草草的看过一遍，觉得写法平直，没有现代作品的希奇古怪，那时的人们还在蜡烛光下跳舞，可见也不会有甚么摩登名词，为中国所未有，非译者来闭门生造不可的。我最怕新花样的名词，譬如电灯，其实也不算新花样了，一个电灯的零件，我叫得出六样：花线、灯泡、灯罩、沙袋、扑落、开关。但这是上海话，那后三个，在别处怕就行不通。《一天的工作》里有一篇短篇，讲到铁厂，后来有一位在北方铁厂里的读者给我一封信，说其中的机件名目，没有一个能够使他知道实物是甚么的。呜呼，——这里只好呜呼了——其实这些名目，大半乃是十九世纪末我在江南学习挖矿时，得之老师的传授。不知是古今异时，还是南北异地之故呢，隔膜了。

可恨我还太自大，竟又小觑了《死魂灵》，以为这倒不算什么，担当回来，真的又要翻译了，于是“苦”字上头。仔细一读，不错，写法的确不过平铺直叙，但到处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却隐藏，要感得到；虽然重译，也得竭力保存它的锋头。里面确没有电灯和汽车，然而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菜单，赌具，服装，也都是陌生家伙。这就势必至于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语学程度的不够格。

再如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里也说：

鲁迅译《小约翰》也是一部力作。……那时我和他同住，目睹其在骄阳满室的壁下，伏案工作，手不停挥，真是矻矻孜孜，夜以继日，单是动植物的译名，就使他觉到不少的困难，遍问朋友，花去很多的精力和时间。

> 至于鲁迅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更是一件艰苦的奇功,不朽的绝笔。……当鲁迅卧病的时候,我去访问,谈到这部译本,他告诉我:"这番真弄得头昏眼花,筋疲力尽了。我一向以为译书比创作容易,至少可以无须构想,那里知道是难关重重!……"说着还在面孔上现出苦味。

我也从鲁迅翻译《死魂灵》时看到他艰苦而认真地工作的情况:每月留出一定时间,专诚地、沉湛于中地、一心致志地在全桌面铺满了字典、词典,并有好几种译本在参考着翻译。有时因为原本字汇的丰美,在中国的方块字里找不出适当的字句来时,常常执笔三思,深佩俄文词汇的丰富与作者文字的精细和刻划的深入、细致。有的自己解决不了,甚或驰书请教别人,总以不失原意才算满足。鲁迅自己对待他的翻译工作,也承认不是那么容易随便处理,而是逐字逐句、一丝不苟地,做一个把别地的异卉奇花移植到中土的辛勤的劳动者。我们从别人的介绍和他自己的叙述可以看出他对翻译工作的严肃态度,可以看出他对中外文化交流是如何努力运用其所有的力量,以及从最初从事文学翻译起直至逝世为止,不松懈地、执着地工作,可以说:与翻译为终始,毕生以之的了。

(1955年3月2日《俄文教学》第3期)

鲁迅的日常生活

鲁迅的日常生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朴素的战士的生活。关于他在北京时期的生活情况，孙伏园先生有一段文章，描写得很如实，很恰当。他说："鲁迅先生的房中总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什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远在奋斗的途中，从来不梦想什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是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以上这一段，见孙著《哭鲁迅先生》）在上海的时期，鲁迅内心中虽然不像在北京时期的那样孤单和寂寞，但日常生活方面却仍然和从前没有多大的差别。

先说饮食服装。鲁迅吃东西很朴素，每次吃饭，都不过两三样菜，和偶然的半杯薄酒而已。燕窝、银耳甚至牛奶之类的东西，他是并不如一般人那样看重的。他爱吃一些新鲜的菜蔬，如清脆的黄瓜和一些带着泥土气味的农民食物。他不大喜欢吃鱼，认为它骨头很细、很多，吃起来太麻烦，太费时间。在正常情况下如此，如果因为有事耽误，他的吃饭就更简单了。有时随便吃一点蛋炒饭，有时就买几个"蟹壳黄"的烧饼来吃，非常简单。他吃菜喜欢用点辣子，这一点说起来也有一段很辛酸的历史。大家知道，鲁迅从家里出来到南京上学去的时候，母亲只给他筹到八块钱的路费。到南京以后，这些钱就用光了，伙食费虽然由学校供给，但是穿衣服的钱很不宽裕。鲁迅在过冬的时候，因为没有棉衣，所以只好借吃辣子来发热保暖。结果，使他长期害了胃病。胃病发起来的时候，非常厉害，如果来不及治疗，鲁迅就痛得把心口紧紧地顶

在桌子上，神色非常不好。这一点，鲁迅没有对很多人讲过，所以知道的人大概也不太多。说到服装，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常穿一身黑衣服，一件衣服破了也不肯换，打几个补丁照样穿在身上，长发直竖，给人的印象是一团漆黑。在上海的时期，鲁迅比从前讲究了一些，头发也不那末长了，衣服也不打补丁了。但是，还是非常朴素，只穿布制衣服，不穿丝织品和其他较讲究的。这除了他对物质享受方面很不在意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感到穿布制的衣服，可以随便些，可以和一般人民生活水平更接近，更一致些。大家知道，鲁迅对书籍是非常爱护的，有时候，书籍被弄脏了，他看到就马上要赶紧揩拭，如果近旁找不到揩布时，也会用衣袖去揩书的。倘若穿了比较好的衣服，他就要感到很不方便，因此有穿着随便一些的习惯。到上海以后，也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为了穿着的随便，当时还出过这样一些事情：有一次，他到一个医院给朋友当翻译，医院里的人就当他是吃翻译饭的，于是就大敲病人的竹杠。又有一次他到一个外国公寓去拜访外国朋友，电梯司机因为见他衣服穿得很破旧，不准他乘电梯，要他一步步地跑到九层楼。至于到印刷所接洽印件，到制版公司去制锌版，被人家当做商店里的跑街或伙计的事情，更是不少的。但是鲁迅对这些也不恼怒，有时却把它作谈笑的资料。

再说鲁迅的工作。如我们上面所说：鲁迅对自己的饮食、服装都不太注意的最大原因，就是一心一意、时时刻刻地在从事艰苦的文学革命工作。在北京的时期，大概每天夜里总要到十——十二时左右，来的客人才陆续散去。客人走了以后，如果没有什么急待完成的工作，看看书，早晨两点左右才睡觉。但是有了工作，在夜里他就更不以睡眠为主，而以工作为主。太疲倦了，他就倒在床上睡两三小时，衣裳不脱，甚至连被都不盖。就这样，像战士伏在战壕里一样，打一个盹，醒了以后，抽一枝烟，起来泡一杯浓茶，有糖果点心，多少吃一些，于是又开始工作了。我们现在读的《野草》，大部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在上海的时期，因为不教书，不做机关工作，他的时间由于习惯，大部分还在晚上，白天如果不跑书店，或来客人，就也日夜不停地工作。在写比较长的文章的时候，就连我在旁边，他也感到有些打扰，于是劝我先睡，等我睡了以后，他就开始工作，几万字的长文章，如《伪自由书》，《准

风月谈》等文集的《后记》,几乎都是头也不回地连夜编写完成。自然在工作得到一个段落,可以稍稍休息一下时,他也会去看看电影的,这是在上海的时候如此,可见有些文娱活动,他也不是全然反对。刚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天,差不多是深秋天气,天快黑了,他还在那里一个劲地往下写,我偶然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打算劝他休息一下,那里晓得笔是放下了,但是脸上却表现得很不高兴,当时,使我感到气也透不过来地难过。后来,他向我解释说:"写东西的时候,什么旁的事情都顾不到的,这时最好不理他,甚至吃饭也是多余的。"有时候写作兴趣正浓厚,放不下笔,就一口气写下来,这情景大概凡是作者或热爱工作者都有这体会的。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写的一篇小说《伤逝》(收在《彷徨》中),就是这样一口气写成的。他曾经说:"写小说是不能够休息的,过了一夜,那个创造的人脾气也许会两样,写出来就不像预料的一样,甚至全成为相反的了。"又说:"写文章的人,生活是无法调整的,我真佩服外国作家的定出时间来,到时候了,立刻停笔做别的事,我却没有这本事。"到了早晨六时左右,经过了一夜写作完成以后,有时他会要我给他泡茶,或吃点蛋炒饭。在喝茶的时候,他就很高兴地叫我看他的文章,作为征求读者意见的开始,偶然供献些修改的字句和意见,他也绝不孤行己意,很愿意把文章修改得更妥贴,更符合读者的要求。现在我们看到的许多文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由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由于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鲁迅在最后几年中不但没有放松自己的工作,反而怀着"赶着做"的心情,做了许多事情。就以一九三六年一月到十月来说,在这十个月中间,他曾经害过两次大病,占去的时间,合起来就有八个月左右,但是鲁迅在这期间竟然参加或主持了这样多的工作:出版了《故事新编》、《死魂灵百图》、珂勒惠支的《版画选集》和《苏联版画集》,编校成书的有《海上述林》上下卷,编好的有《苏联作家七人集》,还有两本《且介亭杂文》的稿子也收集好了。此外零星文章还有很多。这种工作毅力实在是很惊人的。鲁迅的著作,不但数量很惊人,而且质量也很高。小说创作不要说了,那真是一字一句不肯苟且,像提炼过似的,从来没有什么多余的字句在内,就说翻译和杂文吧,那也是很认真的。在翻译过程中往往因为一个名词或一个句子,要查很多的书籍,自己觉得需要求教别人时,就请求或不惜远道写信请教朋友。至于杂文,

很多人大概以为鲁迅是摊纸就写的,其实不然,他的写作杂文,也如创作小说一样,要搜集材料,创造典型的,如果他感到这个人或这件事情还不够典型,那末他就先不写。比如在《南腔北调集》最后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五讲三嘘集》,就是因为感到有些人物还不值得作为典型,所以没有写成。但是其余的杂文,因为人和事情足够做典型,再通过鲁迅深刻的艰苦的劳动,所以文章一登出来,效果就很大了,真是"一文刊露,群丑敛迹"。鲁迅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曾经诚诚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了一辈子,从来不计较个人利害,从来也不偷懒,一直工作到停止了自己的呼吸,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吃的是草,挤的是牛奶,血。"他在临死的前三天,还在为曹靖华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作序,临死的前一天,还访问了日本作家鹿地亘,临死的前几十个钟头,还写了最后一天的日记,最后的一篇文章《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因为实在体力不支,所以成了未成篇的绝笔。就这样工作,他还感到不够,在《鲁迅书简》第四五四页,他曾写信给别人这样说:"近年以来,眼亦花,连书也不能看,此于专用眼睛如我辈者,实为大害,真令人有退步而至于无用之惧,昔日之日夜校译的事,思之如梦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是多么珍惜时间,酷爱工作地劳动啊!

最后说鲁迅的学习和休息。鲁迅因为条件的限制和工作的需要,学习和娱乐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比如一九二九年编《奔流》的时候,为了使刊物内容更加丰富和生动,他曾经加了很多插图。因为要搜集插图,于是他就经常注意木刻,并且托了许多朋友,从国外给他带来了很多木刻和版画。其中特别使他感到满意的是德国珂勒惠支女士的连环版画,因为它的内容富有反抗性。还有许多苏联的木刻,也使他感到非常兴奋。从这些木刻里面,使他看到了新社会的水闸,工厂,以及其他许多伟大的建筑。一九三四年,苏联版画展览会展出,当时,鲁迅过着半地下式的生活,苏联大使馆知道鲁迅爱好苏联版画,曾经特地托人来关照他,说他如果不便公开去看,可以另找时间来招待,但是鲁迅还是在公开展览期间一个上午去看了。这一天,他非常兴奋,看了一遍之后,就在食堂吃饭,饭毕,又和司徒乔先生去看了一遍,并且自己定购了八幅版画,待到展览结束之后,苏联特意赠送给鲁迅,等到那八幅版画到手,就如小孩焦念着买来的玩具一样地爱护。史沫特莱先生亲自代

送来了那八幅版画时，我们看到这一天鲁迅的无比高兴，实难以言语形容。鲁迅休息的方法，除了看许多木刻、版画、各种艺术史图画以外，有时也去看电影，特别是苏联电影，凡是有了新片，他总是不放过的。因为他看苏联电影，除了算作休息以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从它里面了解苏联，学习苏联，学习各种实际有用的知识。内容很荒诞的片子，他是不去看的。在广州看过一次《诗人挖目记》，鲁迅没有看完就半途走开了。

鲁迅住在北京的时候，经常闹欠薪问题，当时，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有时过一两年以后，才能收到二三十元。得到一点收入以后，又要维持家庭，又要帮助贫困的青年学生和支持新创办的刊物，这样，鲁迅每月平均只有十多块钱用来买书。一九二三年十月，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序言上说："自编辑写印以来，四五友人，或假以书籍，或助为校勘，三年如一"，末了一句说："呜呼于此谢之！"这"呜呼"两字，含着有无限的感慨！即使是这样困难条件，毕竟鲁迅也做了些工作。到上海以后，鲁迅虽然出版了很多书，但是资本家有时也要对我们"将"一军的：不给你按时支付版税。加上那时候鲁迅还要帮助一些人，所以生活还是不算宽裕。我记得他为了编《中国文学史》需要买《四部丛刊》之类的书籍来参考，但是一听说需要花几百块钱的时候，鲁迅就曾经踌躇过很久，后来还是我劝他说：我们在其他方面可以节省一些，参考书籍还是去买吧！他才发了狠心买了下来。鲁迅当时的条件实在和我们今天不能相比。一九三三年六月，鲁迅曾经写信给别人说："居今之世，纵使在决堤灌水，飞机掷弹之外，也难得数年粮食，一屋图书。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长编入手，但即此长编，已成难事，剪取欤，无此许多书，赴图书馆抄录欤，上海就没有图书馆，即有之，一人无此精力与时光，请书记又有欠薪之惧，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空谈。"（《鲁迅书简》第四五〇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活着的时候，国内动荡不安，大家生活都不能稳定，知识分子想作一点工作，没有很好的条件，参考书私人买不起，公家又不买！请秘书到图书馆抄，又拿不起钱，这种工作条件，对鲁迅来说，实在是太坏了。

如大家所知，鲁迅活着的时候，从北洋军阀时代起，一直都受着敌人的压迫和包围。大部分时间都过着地下或半地下式的生活，仅就最

大的避难来说，就有下列几次：（一）一九二六年前后，因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曾先后避入日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二）一九三一年一月，因柔石等人被捕而避入上海花园庄。后来还有几次，离寓避难。但是敌人的压迫，并没有使鲁迅屈服，即使在避难的时候，鲁迅还是一直在工作。比如一九二六年在德国医院避难时，夜间在洋灰地板上睡觉，白天用面包和罐头充饥，但是鲁迅还是照样写作，《朝花夕拾》中的几篇文章，就是在这时写出来的。柔石等人被捕以后，鲁迅非常悲愤，因为没有地方写字，就写了一首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那一首诗。一九三三年在杨杏佛被杀以后，鲁迅一定要去送殓，很多人劝他不要去，恐怕有危险，但是鲁迅坚决要去，并且把钥匙都交给我，表示如果遇害，他就不回来了。在那时的社会里，鲁迅的确太危险，敌人时时在谋害他，鲁迅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不怕，每次和我一块出门时，总不让我和他走在一条人行道上，要我到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去走，以为如果敌人来杀害了，不要两个人在一块遇难，但是我那里又肯放心呢？所以还是和他走在一块，以致有时还会引起他对我的不满。当时的作家，不要说下乡下厂，就连看几本苏联小说的权利，也被反动统治阶级剥夺了，出版苏联书刊的店铺经常有特务查问，那里像我们今天这样能够自由地和工农兵结合呢？至于学习马列主义，那更是犯禁的事了。那里能像我们今天这样自由地学习，深入钻研，集体讨论，那是不可能的。鲁迅当时除了物质方面许多限制以外，最大的困难，就是敌人在政治上的压迫。而鲁迅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克服困难，不顾一切，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多供献，这也就是我们应该纪念他和学习他的地方。

（1956年10月9日《文汇报》）

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

鲁迅对祖国的文化遗产是非常重视的。他曾经说过:“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不但认识到任何民族在历史上都有两种文化,即压迫者的文化和被压迫者的文化,而且也认识到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对于本民族固有的优秀文化遗产必须加以继承。

但是鲁迅认为这种继承不应兼容并蓄,生吞活剥。以绘画为例,他就曾经指出:“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采取什么呢?我想,……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宋的院画,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米点山水,则毫无用处。后来的写意画(文人画)有无用处,我此刻不敢确说,恐怕也许还有可用之点的罢。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由此可见,他对祖国文化遗产的态度,也是非常科学的。

近几年来,我曾经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他们认为鲁迅对京剧、对中医中药都有过一些议论,而在今天看来,这些议论似乎都发生一些疑问,因此,要求我加以说明和解释。我因为工作比较杂乱,没有时间很好的考虑,因此只能就自己的理解,表示一点粗浅的看法,如有不妥之处,还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教。

一 关于京剧

鲁迅对京剧的态度，我曾经在一九五五年第九、十期《文艺报》上表示过一些意见，但听说现在还有一些青年，看到鲁迅对京剧曾经发过一些议论，于是就怀疑到他对祖国文化遗产的态度。这些人观察问题不看本质，只看现象。他们好像以为从前的反动统治阶级"欣赏"京剧和"改编"京剧剧本，与我们现在提倡"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中间没有区别。他们非常缺乏历史主义观点，机械地认为今天党和政府有意识地领导提倡加以整理后发展的京剧和鲁迅当时对反动统治阶级下所吹捧的京剧没有两样，因而发生以为中间大概有"矛盾"吧，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态度大概"有问题"的疑问来了。

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努力，其实是很容易清楚明了的。以文学方面来说，就曾写过《中国小说史略》，辑过《小说旧闻钞》、《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会稽郡故书杂记》，校过《嵇康集》，并想亲手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但因当时忙于别的战斗任务，所以未能如愿。以艺术方面来说，他不但自己收藏和辑录过汉画像，汉碑帖，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而且还大力扶持和培养木刻美术，关心连环图画，搜集中国旧书上的绣像和画本。除书面文字上的东西而外，他还注意搜集和研究过人民群众各种口头创作。所有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是祖国文化遗产的忠实继承者和发扬者吗？为什么只见他根据当时社会历史情况对京剧发了一些必要的议论，就怀疑到他对祖国文化遗产的态度呢？

鲁迅曾经说过："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而已集·魏晋风度及其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又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对这两个原则的应用，鲁迅自己曾在上述二篇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文章中，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典范。但是现在有些人，他们看鲁迅的作品，既不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只是拿党和政府今天的政策，和鲁迅在反动压迫下所写的作品硬套；又不顾及作者全人，只看鲁迅对京剧的议论，不看鲁迅对祖国其他文化遗产的论述；也不顾及著

作全貌，因而只见鲁迅有《论照相之类》的一面，没有见他还有《论"旧形式的采用"》的另一面。在同一本《花边文学》中，只见鲁迅写过《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下）》，没有见鲁迅还写过《谁在没落》。即使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下）》两篇文章中，他们也只是看见鲁迅对京剧有些批判，但是并没有看见鲁迅批判了什么。抱着这种非常片面的观点来观察问题如何使他们不把自己引向错误的地步上去呢？

鲁迅非常反对这种片面征引，孤立论断的方法。他曾在上述《"题未定"草（七）》中这样指出："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的迷离惝恍。"胡风之流为了达到他反革命的目的，就曾经用这种"摘取"、"吹嘘"和"附会"的方法，对鲁迅进行过恶意的歪曲，说鲁迅不重视祖国文化遗产。但是有些人还没有接受这个教训，往往在谈论鲁迅的时候，不是全面、深入地了解鲁迅的著作，只是片面、肤浅地引鲁迅的个别言论（有时甚至不求甚解，只看文章的标题），为自己的无知辩护，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现象，应当加以纠正的。

二　关于中医中药

有的读者来信问我：鲁迅对中医中药为什么采取"否定"的态度，现在在党和政府大力提倡中医中药的时候，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甚至有人认为：中医中药过去不被人所重视，鲁迅"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作如下的看法：

鲁迅对中医中药是否完全"否定"了呢？并不尽然。他在《南腔北调集》的《经验》一文中这样说：

> 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
>
> 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我们一向喜

欢恭维古圣人，以为药物是由一个神农皇帝独自尝出来的，他曾经一天遇到过七十二毒，但都有解法，没有毒死。这样传说，现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

从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认为在中医中药中虽然有"捕风捉影"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中医中药是历来许多无名氏经验的积累，它和建筑，烹饪，渔猎，耕种一样，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为我们服务，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它是什么"封建医学"，因此，我们怎能把鲁迅对中医中药的态度和某些人的错误观点连系起来，混为一谈呢？

鲁迅不但理论上这样认识，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这样相信。记得他在上海活着的时候，常常和周建人先生相见，兄弟俩在茶余饭后，总有谈话。谈话内容，其中就会从植物学谈到《本草纲目》或其他中医如以生草药治急病见效等的。鲁迅非常称赞《验方新编》上的一些药方，曾经亲自介绍一位朋友用它治疗孩子的疝病。他自己曾经生过"抱腰龙"的病，在乡间也用一种简单的药物治疗好了。每逢忆述，就很可惜因当时年青没有记下药名来。当用白凤丸治妇科病有效的事实给他亲眼看到以后，他就很热心地向熟识的朋友介绍，并且有时还把中医中药治病有效的点滴经验，向医学刊物写出介绍。他常常向周围的人称谈过一种叫"草头郎中"的医生，以为他们用几样简单的生草药治病，往往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这些医药，因为没有得到重视，所以不能更大地发挥作用，或者因为年久失传因而湮没无闻，对这一点他曾深表惋惜，以为没有人来对它加以整理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此，如果说他"否定"了祖国医学遗产，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他正是希望有人加以科学整理，来好好继承应用，像今天所做的，也是他所拥护期望的。

但是，鲁迅对中医中药是否没有一点意见呢？勿庸讳言，那是有的。就我所记得的，这一点除了《呐喊·自序》中曾提到几句以外，还有《朝花夕拾》中的《父亲的病》和《三闲集》中的《皇汉医学》。《皇汉医学》内容并非着重谈中医本身，因此我不多谈，现就《父亲的病》和《呐喊·自序》中的有关几句，说说个人的意见。

鲁迅为了说明问题，有时在自己的文章中往往对事情的某一方面特别强调得厉害。《父亲的病》是集中批评从前中医方面的某些缺点的文章。比如有些人虽然大门上挂着“是乃仁术”的牌匾，但当别人，尤其是劳动人民请他看病的时候，却要“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而且出门必须坐轿，进门必须烟酒相待，必恭必敬，深有“请医如拜相”的味道；有些人医疗作风极不严肃，医疗道德极其不好，给人看病，看到病人十分危急，便推荐一个生手代替自己，以便推卸责任；所用的药物，有些也缺乏科学根据，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结子的平地木，打破的旧鼓皮，这些对水肿病究竟能起多大作用？蟋蟀用来当作药物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原配”呢？原配与治病有什么关系？而且更甚的还有什么“医者，意也”的附会，和“医能医病，不能医命”的迷信观念，这在后来学过医学的鲁迅回忆起来，能不给他一种批评吗？

大家知道，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处处为人民设想的革命者，他因为父亲的病被错误和不负责任的医疗耽搁了，因而后来起了一种“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到日本去学医。“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当时他对中医某些不好的方面给以批评，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即使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他因为父亲的病“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手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不但自己被弄得狼狈不堪，而且家庭也由“小康”而坠入“困顿”。这些惨痛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在幼年鲁迅的心里，曾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所以后来对中医中药不合理的地方才有过一些批评。这难道是违反科学没有一些根据的吗？这怎么能说人们对中医不重视，鲁迅“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呢？

当然，这里有一点，我也要加以说明的。有一位读者写信问我：为什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对待中医中药的态度和《南腔北调集·经验》一文中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我认为这一点也是由于鲁迅思想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呐喊·自序》写于一九二二年，这是鲁迅思想的前期阶段，那时鲁迅还只是一个民主革命者，而《经验》一文，写于一九三三年，

这是鲁迅思想的后期阶段,到那时候,鲁迅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看问题已经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了。所以得出来的结论也就比以前更深刻,更全面了。

(1956 年 10 月《新港》)



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

一　鲁迅先生怎样读报，怎样在写作中运用报纸上的材料

在我的印象中，鲁迅先生读报是不费很多时间的，每天报来，看得很快。但是他的记忆力很好，有些他认为是有用的材料，记得很牢。要用的时候，一翻报纸，就能找到。有一次他要我替他找一个报上的材料，我翻遍了报纸都没找到，后来他告诉我到某报的某月某日第几版的角落处去找，果然就找到了。我看报的时间比他多，他不以为然，认为不需要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因为旧社会的报纸，大多是无聊的黄色新闻，或者是国民党的官方消息，不值得花太多的时间。

他在写作中大量运用报上的材料。他也做剪报工作。上海的鲁迅博物馆里，保存着一本剪报集，剪贴得很整齐，每页上还有他亲笔所写报纸名称和日期，这些资料是他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期间从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及《大晚报》等文艺副刊上剪下来的，内容大都是国民党反动派摧残进步文化界的消息报道和攻击鲁迅的反动文章。他当时打算运用这些资料写一篇东西的，后来没有写成。

他运用报上材料写东西的本领很大，他常常利用反动报纸的材料作为反面教材。翻翻鲁迅的杂文就很容易发现这一点。比如《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两书的“后记”大部分材料都是报上的，经他一引用，加

上三言两语，就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他订的报纸不多，有些报纸是朋友和学生们寄给他的。

二 鲁迅先生怎样做编辑工作

鲁迅参加过编辑工作的刊物，我看到的有《奔流》、《语丝》、《北新》半月刊等，以后又编辑过《译文》。在这些刊物中，编辑《奔流》是他最感到吃力的了。他尊重读者来稿，不但亲自编，有时还给作者抄写稿件，不但他自己抄，而且还要我帮着抄。他取舍稿件完全从稿件的政治意义出发，该登的让它登出，不怕自己受累。《语丝》常常对时局发点"牢骚"，稿件都是按鲁迅的意见选择的。有一次，复旦大学的一个学生向《语丝》投了一篇稿件，批评复旦大学内部的黑暗。照当时一般编辑的处理，这篇稿就会给压下来，鲁迅却不，因为作者敢于揭发时弊，鲁迅就支持他，把它登出来了。这件事得罪了一些人，后来遭到报复，但鲁迅不怕。

鲁迅为了工作是不计报酬、不计劳累的。《奔流》一个月出一期，虽然是约了两个朋友合编的，但是，实际上担子都落到鲁迅一个人身上。尽管他本身的工作很忙，他仍旧负责到底，勤勤恳恳地编稿。

在编辑工作中，他随时收到稿件随时看，从不积压。翻译的稿件还要尽可能地按原文逐字逐句对照一遍。因为他的英、法文比较差，英文方面的稿件就找周建人，或者是找懂英文的青年学生帮忙看。他在这方面是花过很大的精力的。许多今天有名的翻译家的文章，当时都是经他亲笔改过的，在这方面，他也培养了不少的青年作家。

有些稿件适合登在别的刊物上，他也认真负责地介绍给别的刊物。

鲁迅很尊重作者的劳动，对别人的文章，从不乱加删改。有一次他给曹靖华的信中说："这篇文章我改了几个字，不知道你的意见怎样？"稿件如要作更多修改，他通常是提出意见，请作者自己去改。随便大笔一挥，甚至改变了作者原来的意思，这是鲁迅最为反对的。

在编辑工作中，鲁迅是谦逊的，反对哗众取宠。有这样一件小事：当时，《作家》月刊曾经在目录上刊登过世界文学家的照片，其中也有鲁迅的照片。鲁迅对这一点很不满意。他认为，一个人的工作、生活都应该是朴实的，刊物也应该如此，这样做是不必要的。

他不但认真地做编辑工作，也关心出版工作，随时对出版商提出有关出版方面的意见。出版商不一定听他的话，小节则让步，事关重大，就要积极地交涉了。当时的《奔流》、《语丝》、《北新》半月刊都是由出版商承印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对这些刊物不满意，因为这些刊物提倡新文化。鲁迅为了使这几个刊物能够保持下来，尽过不少的力量。

三　鲁迅先生在写文章以前，通常要作那些准备工作

鲁迅在写一篇稿件以前，常常有一个很长的酝酿时期。有时候遇见朋友，他就会谈起来，说他看到了什么材料，想写个什么东西；有时候也不讲，静静地读书，默默地思索，或者暗自打腹稿。有时候，看起来鲁迅写得很快，但这是日常不断地、多方面地学习、积累的结果，是勤学苦练的结果。他从来不浪费一点一滴的时间，有机会就读书。他几乎是时刻准备着拿起笔来战斗。他常说"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进去了"，这就是指学习。

他不但读书，也愿意多增加一些感性知识。鲁迅在上海的时候，常常去看电影，在北京他常常到现在的北京剧场去看电影，但是看的次数比在上海的时候要少些。鲁迅对看电影不是单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增加感性认识，这也是一种学习。看过电影，鲁迅有时候也利用电影的材料写东西。记得当时，他对反映非洲情况的影片很感兴趣，他很关心非洲人民在比利时、法国等殖民者统治下的苦难生活，了解非洲的丰富的天然资源。他说："非洲我们是不会去的了，能在电影中了解了解也是好的。"此外，鲁迅也很重视从实际中获得知识，如像参观展览会，研究有关动植物的书籍等，尽可能地多去观察和了解。总之，他所汲取的知识是多方面的。

因为有这样的经常积累，再加上记忆力好，脑子里总是储备丰富，无论古今中外，大小题目，他都能应付自如。这是他刻苦地、勤勤恳恳地工作的结果。他所积累的各种材料，都是经过自己的一番熔化的。

鲁迅在写作前不写提纲，甚至写一些较长的文章也不写提纲；当他

拿起笔来的时候，文章已有几分成熟了。他从不临时找材料，有时候也在写作前翻翻书，那是为了证实自己记忆的确切程度。至于材料、构思，那是在下笔以前就已经想好了的。

四 鲁迅先生怎样修改自己的稿件

鲁迅怎样修改自己的稿件，从鲁迅留下的手稿中可以看到一些迹象。从手稿中可以看出，鲁迅的修改多半是个别的字、句子，整段整页的删改是没有的。

他的写作态度很认真，随随便便一挥而就的文章，在他是从来没有过的。他曾说过："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见《答北斗杂志社问》）。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前面已经提到，他在写文章以前，总是经过深思熟虑，腹稿打好了，就提起笔来，一气呵成，所以初稿往往就是定稿。

鲁迅的手稿一般都写得很整洁，改动得很少，但有时改动一字一句，都经过细心推敲，比如《为了忘却的记念》这篇文章中有一首诗：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诗中首句"惯于长夜过春时"，原来"夜"字后面是"度"字，后来自觉不妥，就改成"过"字了，这一字的推敲是经过相当考虑的，后面"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两句，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日记上是写的"眼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边觅小诗"，写《为了忘却的记念》的时候，"眼看"改成了"忍看"，"刀边"改为"刀丛"，虽然两字之差，但是更深刻地表达了鲁迅当时的愤怒心情和对敌人的刻骨仇恨。

又如在《死》这篇文章里，有一句原来是这样写的："大约我们看待生死都有些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的认真了。"后来改成："大约我们的

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重轻，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前者容易被人当作一句平常的话，而后者却明确地表现出它的战斗性和它的深刻的社会意义了。这样的例子，在《鲁迅全集》中是很多的。

五　鲁迅先生怎样对待校勘、校对工作

鲁迅的校勘工作是继承了清代的校勘工作的优良传统的，也就是所谓考证校勘。我们现在到鲁迅博物馆去看，还能够看到鲁迅是怎样整理文学遗产的。尤其是《嵇康集》的校勘工作，他一共抄写了三遍，字写得工工整整。这三次是根据三种不同的版本校勘的，每当发现某个版本的说法不同的时候，他马上写一个小纸条夹在里边(顺便说说，鲁迅是很注意节约的，一张稿纸只剩下一点边边头头，他都裁下来积存起来，放在桌边，以备随时作夹条用)，或者在上面注上眉批。就这样，《嵇康集》反复校勘了好多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整理文学遗产的严肃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他对读书又是多么的认真了。

对编排工作，鲁迅也是很认真看的。他很注意装璜和美化版面。他编《译文》的时候提倡多登木刻，原因之一是可以美化版面。他希望书里边也最好能有配合人物或情节的插图。另一点是他主张书和杂志不要编排得很挤，字号要大一些，一片密密麻麻的小字，会使读者看了透不过气来。他主张一般的文章开头空五六行的位置，有时在文章的空处加上一点小的图案花样，美化刊物。

鲁迅常常亲自做校对工作。校对中，遇到一行的顶头有标点，他都认真地划到每行的末尾；一张校样，正面看看，还要倒过来看看，这样，字排得正不正，排行是不是歪斜，就很容易发现了。他要求天地头要排得整整齐齐，那个地方空得多，那个地方比较挤，那个地方错落不齐，他都在样子上做出记号，有时用尺划一条直线，以引起排字工友的注意。鲁迅最讨厌的就是把字给排错了，因为一字之差，常常把整个意思弄错了。鲁迅先生去世以后，我曾经替他整理发表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文章里有一句原文是"令人神旺"，不知是排错了，还是编辑搞错了，印出来成了"令人神往"。"令人神旺"和"令人神往"两者的意思是

不同的，这不是鲁迅的原话。鲁讯对这种错误是不满的。

他在编辑工作中，只要有可能，编排校的工作总是自己亲自来做的，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读者。他总认为，一期刊物、一本书出的错误少一点，就对读者的帮助更大一点，自己能做多少，就努力做多少。

六 鲁迅先生怎样对待读者来信和青年作家写给他的稿件

鲁迅日常收到的读者来信是很多的，他几乎是每信必复（少数无聊的信例外），并且尽快地答复，从不积压。他通常是利用茶余饭后的休息时间来写回信，不占工作时间。

对青年作家的稿件他是很认真看的。那时候，一般的人对青年作家是不够关心的。鲁迅不这样，他在这方面是不计时间和精力的。编刊物的时候，遇有不能采用的稿件，他总是及时退给作者；能用的稿件，他就认真地修改。他收到的稿件是各种各样的，有的稿纸很薄，是那种双层软纸，字又写得不清楚，看时很费力，他就垫一张纸在双层稿纸中间，衬着看。有的稿件写得很马虎，并且还附了一句类似这样的话：“我这个稿件写得很乱，写了懒得再看一遍，现在寄给你看看吧！”鲁迅为难地笑了笑，但他还是认真地看下去了。

鲁迅对青年作家的稿件是很尊重的，如果对稿件有些意见，他就注明：有几点意见提供你参考。《勇敢的约翰》的译者孙用，当时是邮政局的一个邮务员，他将《勇敢的约翰》译稿送给鲁迅之后，鲁迅就千方百计地给他介绍出版，跑遍了许多书店，看了人家的许多冷面孔。但是，只要能够帮助青年作家出版一本书，他也就在欣喜中忘掉了辛苦，甚至把自己的工作都丢开了。

七 鲁迅先生有那些良好的写作习惯

鲁迅经常是在晚上写作。那时候，我是不赞成这样做的，但到现在，当我自己也写东西的时候，才觉得晚上写作确实要比白天好。夜里

很清静，思路不会打乱。在上海，晚上他要写东西的时候，他总催我先去睡觉，我知道他要写东西，也就走开了。他晚上睡得很晚，有时吃一点点心又继续工作了。写作的时候他很注意端正姿势，坐得很直，眼睛和桌子保持一定的距离，十年如一日，所以他没有弯腰驼背的现象。写作中，有时候需要想想再写，他就停笔坐到桌旁的一张躺椅上，抽支烟静思一番，然后再继续写下去。他抽烟很多，写作时右手拿笔，左手拿烟，但常常是忘记抽它，多数是自己烧掉的。

最后，我感到鲁迅习惯于写短文章，这是值得学习的。目前有些文章长了些，我看可以写得短一些。

（1961 年 3 月 27 日－29 日《人民日报》）

鲁迅的讲演与讲课

鲁迅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走到大街上，绝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论面貌、身段、衣冠等，都不会吸引人的。

但在讲台上，在群众中，在青年们的眼里所照出来的真相却不一样。有一位作家郑伯奇同志在一篇题为《鲁迅先生的演讲》里，描写得很生动：

> ……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成立。就在这时候，为了将新的文学主张扩大宣传起见，鲁迅先生和笔者便被派到沪西大夏大学去演讲。
>
> ………………
>
> 那时候，鲁迅先生是住在宝山路景云里。他一个人在书房里，脸色很坏，他告诉我们，他病了几天，夜里睡不着，牙齿都落掉了。他表示不能演讲，还把落掉了的一颗大牙齿给我们看。
>
> 代表很为难。他说，同学都在等待着鲁迅先生去，若第一次就使同学失望，以后什么怕都不好进行了。我是知道自己不会演讲，唱独脚戏准得失败的，故也极盼先生出马。看见这样情形，鲁迅先生终于答应我们，带病同去了。
>
> 大夏大学的礼堂兼雨操场是挤满了人。当时左联固然也有点号召力，但，毫无疑义，大部分的学生是为瞻仰鲁迅先生的言论丰采才集合来的。
>
> 由我来唱了开锣戏。演讲的内容不外乎是当时开始受人注意

的文艺与阶级关系的问题。

现在想起来还要汗颜，笔者讲了不到一刻钟，听众是一个去了又去一个。偌大一座讲堂只剩下寥寥不到百十个人了。我心里有点发慌：

（头一炮就打不响，鲁迅先生又有病，这却怎么办好？）

心里越急，口上越乱。什么“意德沃罗辑”呀，什么“印贴利更地亚”呀，什么“狄亚列克特”呀，这一类生硬的术语，只在口边乱撞。可怜那百十个听众又渐渐散开，变成乌合的散兵线了。

看光景还是趁早退场好，于是赶紧做了个结束了事。

耳边懵懵懂懂听见一阵热烈的鼓掌声，是鲁迅先生登坛了。

怕是有病的关系吧，鲁迅先生的声音并不高，但却很沉着，口调是徐缓的，像是跟自己人谈家常一样的亲切。

他先从他的家乡说起。他说，他是浙东一个产酒名区的人，但他并不爱喝酒。这样，他对于曾经说他“醉眼蒙胧”的同志轻轻地回敬了一下。

以后，他便谈起他家乡的风俗。语词记不清楚了，大意是他的家乡那里，讨媳妇的时候，并不要什么杏脸柳腰的美人，要的是腰臂圆壮、脸色红润的健康妇女。由这类的例子，他归结到农民和绅士对于美观的不同。然后，他用实例揭破了“美是绝对的”这种观念论的错误。而给“美的阶级性”这种思想，找出了铁一般的根据。

在朴实的语句中，时时露出讽刺的光芒。而每一个讽刺的利箭投射到大众中间，便引起热烈的鼓掌和哄堂的笑声。

不知什么时候，屋子里添进了那么多的人。偌大的一座讲堂是挤得水泄不通了。连窗子上面都爬着挟书本的学生。

演讲是在热烈的空气中宣告了成功。在散会以后，大夏大学马上成立了一个新的文学组织。

这当然是鲁迅先生抱病演讲的功绩。

………………　（《忆鲁迅》）

从这个具体的例子看来，理论性的说话，还是需要技巧的，主要是讲群众所要听的，所能了解接受的。鲁迅在演讲和上课堂的时候，一样

地捉住听众所需要的，朴素地用语言传达出来，随时加以分析，而又能驳掉别人的谬误见解。自己的例证，又是浅显易懂，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已知的，绝不用深奥的大道理迷惑人。每每在几分钟之内，就掌握了群众的思想，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而工作也借此开展了起来。如大夏大学的文学组织的宣告成立，就因鲁迅能够体会党的政策，把高度的思想性、政治性用浅显通俗的语言说出来，因而直接发生了良好影响。当时上海进步力量的不断发展和左翼团体的纷纷成立，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分别起着教育群众，联系群众的作用的。在困难的情况下，点滴收获是不易的。开个会、成立个团体也是不易，因此更珍惜这个会的能够开成，鲁迅就是能体会这样的精神而去的。

我以听讲者的体会，证实了郑伯奇同志所遇到的情况。鲁迅以朴素的、质直的、不加文饰的说话，款款而又低沉的声音，投向群众，投向四周的空中，使人们亲切地听到、看到他的声音笑貌，先得我心。说出了人们普遍懂得的事物的真理，说出了人们心坎里所正要说出而未能说出的语言。朴素而率直地换得了人们的信任。也像他所写的文章一样，雄辩地驳斥了异端邪说，摈弃了弥漫世间的乌烟瘴气，使听众如饮醇醪，如服清凉散，这种说话，听一百遍也不会厌。

但是谁使他没有发言的机会呢？是黑暗的政治压迫！

他曾经考虑过教书（说话的一种方式）和写作的矛盾，“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见《两地书》：第六十六）鲁迅到上海之后，果然辞去教书，专心一致地做编写的工作了，成就是比较大的。看他末期十年的写作，是较之头二十年合起来还多到不止一倍，就可以证明。然而毕竟使我们感觉到减少了讲话，是多么可惜！听过他讲话的人们不会忘记，无论在北京，在厦门，或在广州，他的讲课都是那么吸引人，以致别科别系的学生，或校外的学生，都一致地津津乐道听过他的课，而且在每个地方都一样地得到热烈拥护，其中必定有道理存在着。

他干脆、守时刻，走到讲台上就打开包袱。那黑地红色线条的布包，为他所热爱的代表钢铁与热血的两种色彩的包裹，无异把他坚定如铁、热情如火的整个人生展示给大众。他一点也不浮夸，他的包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些儿虚假。不太多也不太少地用秤称出来；货真价实，

童叟无欺地讲出来了。脸上的两只亮晶晶的仁慈而坚定的眼珠子，就好像洞察一切地扫射出来。他又何必点名呢？（以前学校上课一开始是点名报到的）横竖一个也不会少，连生病的人都不愿缺席，除非起不来了才会告假。他到过的学校都是这般情景！

他是严峻的，严峻到使人肃然起敬。但转瞬即融化了，如同冰见了太阳一样，那是他见了可爱而有希望的青年们。讲到精彩的时候大家都笑了。有时他并不发笑，这样很快就讲下去了。到真个令人压抑不住了从心底内引起共鸣的时候，他也会破颜一笑，那是青年们的欢笑使他忘却了人世的许多哀愁。

他那爽朗松脆的笑声，常常是发自肺腑中，在无拘束地披诚相见的时候；更加是在遇到可以与言，或知己的时候；痛快地，对自己的命运、世界的前途都感到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完全了解了自己也相信了对面的人的时候。这种情况不多遇而也确乎遇见过，像他和瞿秋白同志见面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炽烈而明快，灵魂的深处有着不可制服的力量的样子的，释然于怀的欢笑爆发出来。多难得的遇合、相逢呀！在那个时候。

在讲课中，比较为众所知的是讲《中国小说史略》，听过的人比较多，也许讲的内容大略相同而未必全然一致。但总之，听者都满意了。我是听过两次的。一次是做学生时候在课堂上听的；另一次是旁听：他用日语讲给增田涉先生听的，我算是学习日语之助的旁听生。那是在一九三一年的时候，我们生活上永不会忘记的刚刚经过柔石等人被害之后，我们才从避难的旅舍回家不过住下了一个多月，也就是四月十一日，从增田涉跟着内山夫妇来到我家里吃晚饭认识起，从此增田君每日下午都来。有时讲课之余，鲁迅往同文书院讲一小时的《流氓与文学》是同他去的；也曾带来另一位日本朋友，这时就会谈至晚上才行分散；或者一同往电影院，展览会；有一回还看不终曲而去的歌舞团演出。又或兴之所至，晚饭后我们忽然跑去跳舞场的池子旁坐着看一阵子的跳舞。从多样性的、并不枯燥无味的生活中，朋友般地这样度过了几个月，在鲁迅生活上是难得的。到七月十七日的下午，日记只那么简单的几个字："为增田君讲《中国小说史略》毕"。而在鲁迅却是为一个不认识的青年，就每天用去大半天的时间，为他做讲解工作，详尽地、无私地

给予文学上的帮助。这时藤野先生的印象活跃在他的脑海：为文化交流，中日人民的友谊而服务是值得的。这里看到鲁迅帮助青年的热诚，有似园艺匠人为中国的佳种获得新的移植而愉快欣慰的心情，是无可以言语形容的。增田君是从日本盐谷温先生那里学过《中国小说史略》的，从他更加了解，盐谷的教材取自鲁迅，而不是如陈西滢恶意污蔑所说，是鲁迅"盗取盐谷"的了。

当我自己在课堂上听着讲《中国小说史略》时，也许我们听讲时的程度低，仅止体会到以下一些也难说。鲁迅对我们讲《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在早期，那时的书还刚刚在北大第一院的新潮社出版，我们就人手一册地拿这分装成上下册的《中国小说史略》做课本了。讲前三篇的时候，因为课本还没有印出，就用中国的油光纸临时印的，现在手边没有了。但那上下册的两个课本，还在身旁，就从这引起我的一二回忆，以告没有听讲过的读者。但也只是一鳞一爪，未必完整的。如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他明确地指出："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大旨不离乎言神仙的东方朔与班固，前者属于写神仙而后者则写历史，但统属于文人所写的一派。《神异经》亦文人作品。而道士的作品之不同处则带有恐吓性。有时一面讲一面又从科学的见地力斥古人的无稽，讲到《南荒经》的蛔虫，至今传说仍存小儿胃中，鲁迅就以医学头脑指出此说属谬，随时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在《西南荒经》上说出讹兽，食其肉，则其人言不诚。鲁迅又从问路说起，说有人走到三岔路口，去问上海人（旧时代），则三个方向的人所说的都不同。那时问路之难，是人所共知的。鲁迅就幽默地说："大约他们都食过讹兽罢！"众大笑。《中荒经》载西王母每岁登翼上会东王公。鲁迅说："西王母是地名，后人因母字而附会为人名，因西有王母，更假设为东有王公，而谬说起来了，犹之牵牛织女星的假设为人，乌鹊填桥成天河，即与此说相仿，为六朝文人所作，游戏而无恶意。"他随即在黑板上绘出中央一柱状为"翼"、东王公西王母相遇于中央的状况，更形象地使人们破除了流传西王母故事的疑团。谈到《十州记》，亦题东方朔撰，但中有恐吓的话，故鲁迅疑为道士所作。其中宫室有金芝玉草，服食有龙肝凤肺，居住有仙宫，都是道士特意写的，与常人不同。又如武帝时，西胡月支献香四两，烧于城内能起死回

生，于是信知其神，“乃更秘录余香，后一旦又失之。”已经是故神其说，从空想的香的不是凡品，又人到事实上以坚人信：如果厚待月支使者，则“帝崩之时，何缘不得灵香”，是道士怕人不相信，故为此语。这都是他随讲解而分析的。关于“金屋藏娇”，原出于《汉武帝故事》，他四岁时，人问欲得妇否？答以欲得，指左右百余人，皆云不用，末指阿娇好不？乃笑对曰：“好，若得阿娇，当作金屋贮之也。”后人移用于纳妓，说是“金屋藏娇”，实乃大误。

鲁迅讲书，不是逐段逐句的，只是在某处有疑难的地方才加以解释。如说到《汉武帝内传》时，他首先讲出：故事是文人所作，内传则为道士所作。道士是反对佛教的，而《汉武帝内传》于王母降临的描写则多用佛语，字句繁丽，而语则似懂非懂，以迷惑人，属于神秘派之类。其中之句如“容眸流盼”的容是指颜面，颜面如何能流盼呢，不是不通就是多余的字了。大约古人作文之法有秘诀：一为省去“之乎者也”等字，一为换成难解之字，也就是以似懂非懂的字句来迷惑人。又多用赘语，如“真美人也”、“真灵人也”，灵与美究有何分别？用了许多不可测之字和语，如骂人曰牛曰马，人易了解其骂我为牛为马，因明白易懂。如果换了猹、喳来骂人，则比较难于认识，至多体会为加犬旁则大抵以兽类骂我，但口旁的喳字，则究竟指的什么东西呢？恐怕连字典也没有这个字，无从索解，使被骂的人，也觉得因不懂而心中不安。古文难测，其弊多在此。神秘派之秘也在此。

又，古时席地而坐，西王母如何坐？武帝跪拜又是什么样的？现在恐怕很多人不大了解了，鲁迅深通字体变迁的历史，他用很简单的方法写出来，就让人一目了然了。如跪＝[illegible]，拜＝[illegible]，坐＝[illegible]，这就是古代人日常席地坐起的方式。

杂载人间琐事的《西京杂记》，是与历史有关而正史没有记载的，如吕后之杀赵王事（如卷一）；有似考据语，令阅者恍以为真，实作者故作神妙的（如卷三）；又齐人弹琴而能作单鹄寡凫之弄；武帝以象牙为簟，都在有无不可知之列，是足以令人疑信参半，是作古小说的人写下“空中楼阁”的妙手秘诀。

照这样讲解了字句，当时文章流派，内容的荒诞与否，可信程度如何？都在书本之外，逐一指出，使人不会因读书而迷信古人，是很重要

的。

"巫风"到汉末而大畅。鲁迅在讲到第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时说,拜鬼属于迷信,人们划出阴阳二界,以为阳界属人,而阴界属鬼,写人以"传",写鬼以"志",既信有鬼则烧纸物等,成为纯消耗性的,于国民经济有关的,影响实是不浅。

又如《太平御览》载:"武昌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鲁迅为之分析:是属于拜物教的以无生物为有生物,附会生说的。又或人与动物不分,二者常交互变易,都是妄说。这就教人读古书而应加以区别看待。

释典,天竺故事之流传世间,在印度讲出世,是说作人诸多苦恼,不好。但佛教经典也无非说说而已,即在印度本土,亦不能尽人实践,这是揭开佛说连印度也不能普遍遵行的情况。

《唐之传奇文》中谈到元稹的《莺莺传》,其后来的各自分飞,张生解释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因而舍弃莺莺,社会上(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云。鲁迅于讲解时,不以为然,他同意有人说《会真记》是写的元稹自己的事,目的在辩护自己。是属于"辩解文"一类,不是为做小说而做的。

从《会真记》鲁迅又谈到中国人的矛盾性。他说:"中国人(指旧文人——作者)矛盾性很大,一方面讲道德礼义;一方面言行又绝不相关。又喜欢不负责任,如《聊斋》的女性,不是狐就是鬼,不要给她穿衣吃饭,不会发生社会督责,都是对人不需要负担责任。中国男子,一方面骂《会真记》、《聊斋》;一方面又喜欢读这些书,都是矛盾性存在之故。"

李公佐《古岳渎经》所写无支祁的形状:"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闻视不可久。"鲁迅认为它是孙悟空的雏型。在第九篇《唐之传奇文(下)》中,鲁迅说:"明吴承恩演《西游记》,又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于是禹伏无支祁故事遂以堙昧也。"追源无支祁说成立之故,据鲁迅说,有山下而面临水之处,适山下有大铁链,则文人为之附会其说,谓大铁链后必有被锁的东西,这东西又必是怪物才被锁,而能伏怪物的必是了不起的人物。这人物是谁?则首推大禹,因禹治水故,层层推想附会而成故事。

关于传奇,鲁迅批评宋不如唐,其理由有二:(一)多含封建说教语,

则不是好的小说，因为文艺作了封建说教的奴隶了；(二)宋传奇又多言古代事，文情不活泼，失于平板，对时事又不敢言，因忌讳太多，不如唐之传奇多谈时事。这一分析，对我们学习很有帮助，所以听讲的时候，觉得对书本以外的实益获教不浅的。

到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讲到宋江故事时，鲁迅说，小说乃是写的人生，非真的人生。故看小说第一不应把自己跑入小说里面。又说看小说犹之看铁槛中的狮虎，有槛才可以细细地看，由细看推知其在山中生活情况。故文艺者，乃借小说——槛——以理会人生也。槛中的狮虎，非其全部状貌，但乃狮虎状貌之一片段。小说中的人生，亦一片段，故看小说看人生都应站立在槛外地位，切不可钻入，一钻入就要生病了。他这种对待古典文学的态度，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正确的。

这个观点，在当时各种庸俗、荒诞小说麻醉青年灵魂的时候，尤有着非常清醒头脑的作用。这里鲁迅教导我们，不但看小说，就是对一些世事也应如看槛中的狮虎一般，应从这里推知全部状貌，不要为片段状况所蒙蔽，亦犹之马列主义教人全面看问题一样道理。所以虽说是讲《中国小说史略》，实在是对一切事物都含有教育道理，无怪学生们对这门功课，对这样的讲解都拥护不尽，实觉受益无穷。大家试想想：有谁从讲解中能广博到这样，把一个大道理，从文艺、狮虎、槛的比方，来了解一切事物的真理呢？鲁迅的讲学，他的说话，和演说时的讲话风格虽不同，精神则是一致的。

(《鲁迅回忆录·三》)

所谓兄弟

说到周作人，使我回忆起许多情况，鲁迅在休息或与人闲谈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我的小说中所写的人物，不是老大就是老四。因为我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横竖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绝不能提一句，以免别人误会。"从这里也可见鲁迅下笔时的字斟句酌，设想是多么周到了。有时茶余饭后，鲁迅曾经感叹过自己的遭遇。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妇，日本人，名叫信子)，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据鲁迅说，那时周作人他们一有钱就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不管是否急需，食的、用的、玩的，从腌萝卜到玩具都买一大批，所以过不几天钱就花光了。花光之后，就来诉说没有钱用了，这又得鲁迅去借债。这种剥削鲁迅的方法，犹如帝国主义者剥削中国劳动人民一样，永无止境。他们的心向着日本，要照顾日商的生意，所以无论什么东西，都由日本商店向他们"包销"。起先，每月收入较丰，因此尚可勉强供其挥霍。但是后来欠薪太厉害，情愿到半夜饿腹步行的辛苦，一家人中只有鲁迅尝到。有时竟只收到很少几块钱，要供他们这种奢侈的用度，怎么能过得去呢？没有法子，只得由鲁迅四处向朋友借债(参看《鲁迅日记》)，而周作人在这种情况下，从来都不闻不问的。那时八道湾用

着一个总管叫徐坤的。这个人很机灵,很能讨得周作人夫妇的欢喜,连周作人买双布底鞋子,做一件大衣,都是由徐坤从外边叫人来试样子,这就可见徐是事无巨细都一手包办的了。不但如此 ,徐坤的家眷,就住在比邻,那时鲁迅就看见徐坤把食用的物品从墙头送出。大家知道,鲁迅是乐于帮助别人的,但是他看不惯这种偷偷摸摸的寄生者。因为看得太多,实在觉着不顺眼了,有一次就向管家的信子说出这件事情。信子把徐坤叫来,狠狠地责骂了一顿,但是她不是责骂徐坤的偷窃行为,而是说这件事情"你为什么给他(指鲁迅)看见"! 可见,徐坤的行为是得到他们默许的。

又有一回,小孩在纸糊的窗下玩火,几乎烧起来,被鲁迅发觉了,认为应该加以训诫。但这话他们听了却很不舒服,也说"为什么偏给他看见"! 仿佛玩火也不要紧,只要不被鲁迅看见就好了。就一般人来说,也没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以禁戒的! 他们别有脏腑的行动,鲁迅哪里料想得到。也许这些日常琐事,正好为进谗的资料。而周作人视而不见(院子西边有一棵大杏树,开了花的时候,鲁迅说,周作人路过多少天也不知道已经开过花了。鲁迅因此说他"视而不见"的),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鲁迅从日本回国以后,自己教书供给周作人在日本学习,那时周作人夫妇已经结婚,光凭一点公费,无论如何是不够用的,所以鲁迅在《自叙传略》上说:"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里"几个别的人"就是指周作人夫妇而言。周作人回国以后,鲁迅除了负担全家生活的绝大部分费用之外,连周作人老婆的全家,都要鲁迅接济。从日记上看到,鲁迅在每月发薪以后,就按月向东京羽太家寄款。这还不算,羽太儿子重久的不时需索和他的三次来到中国,鲁迅都有专款资助,甚至羽太第三个女儿福子的学费,也都是由鲁迅每月另行汇去的。后来鲁迅回忆起来说:"周作人的这样做,是经过考虑的,他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在搬出八道湾以后,鲁迅曾经这样说:"我幸亏被八道湾

赶出来了,生活才能够有点预算,比较不那么发愁了。"对照以往生活紧张的情况,在搬出八道湾以后,则可以量入为出,并且能够接济一些青年人的急迫要求,这真可以说是不幸中之大幸吧!

周作人的人生哲学,和鲁迅却绝然相反。据说当他知道徐坤的劣迹以后,曾经这样表示:如果换掉徐坤,要他自己去办理一些身边琐事(如自做衣服之类),太觉得麻烦了;要减少许多看书时间,而且自己也办不到,划不来,所以也就随他去了。这是十足的道地的封建少爷脾气: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四体不勤,好逸恶劳。这样说是不是冤枉了他呢?一点也不冤枉。有事实为证:人们只要翻开《鲁迅日记》,就可以看到鲁迅在一九一九年为了全家移居北京,就到处奔走另找房子,在多次看屋以后,最后才找到了八道湾罗姓的。紧接着便是修理房屋,办理手续。鲁迅又兼监修,又得向警署接洽,议价、收契,家具的购置、水管装置等等事务,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房价不足,又四处奔走告贷,甚至向银行纳短期高利借款(大约除了卖绍兴祖屋所得千余元之外,全部费用约四千元之谱)。那末,这一时期,周作人干什么去了呢?原来他在这年三月间就从北京大学请假,和老婆孩子们全家到日本游玩去了,中间曾经一个人回来过一次北京,但过不几天又返回日本了。甚至新屋成交之前,鲁迅先另行租了几间房子(因为新屋修理尚未竣工),新居粉刷好了,周作人带着他的家属和其妻舅重久一批人才浩浩荡荡地回到了北京。若说周作人对新屋落成没有费一点神思,那也冤枉了他,他在这方面确曾做过两件事情,一件是他在新屋修理将近完工的时候,曾经和他的家属、妻舅乘马车同游农事试验场后,像地主老爷似的顺道看了一次他的庄园——八道湾;另一件是他去了警局一趟,领回了房契一张。这就是周作人对八道湾新居数得出来的两件大功!

说到房契,这里还有一段故事。鲁迅不自私,原来立房契的时候,不写自己的名字,而准备写周作人的户主名,倒是经过教育部一位同事的劝说,才用了周树人的名字。在卖掉绍兴祖屋的时候,周作人原来就想把这笔款分开来浪用,但被鲁迅坚持不肯,才又用来在北京买屋,以便他们家小至少有地方好住。这是鲁迅为他们设想的苦衷,却被见钱就花不作长远打算的周作人所反对。等到鲁迅被赶出八道湾以后,这时周作人又故态复萌,要把八道湾的房子再卖出去了。风声传到鲁迅

耳里,鲁迅为了阻止周作人这个行动,利用他爱财独占的弱点,曾经表示:“卖掉是可以的,不过也得要分我一份。”就因为这个缘故,八道湾的房屋才没有被卖出去。这时鲁迅想起了教育部那一位同事的意见,用了周树人的名字就不是那么容易被卖掉的了。因此这事才被搁置了二十多年。待鲁迅逝世,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北京以后,周作人做了汉奸,烜赫一时,他就私自把房契换成他自己的名字,算是他的,以便为所欲为。

在这里,我要提一提周作人的老婆信子其人。这是一个典型的由奴才爬上去的奴隶主。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初期每月工资不欠。不够时,就由他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个得力的人手,这时,当然是要得的。后来,由于欠薪,加以干涉到人事方面,那就妨碍了这个奴隶主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于是便开始排挤鲁迅。她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呐喊》中《鸭的喜剧》里不是谈到爱罗先珂先生对鸭的喜欢吗?从母亲那里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爱罗先珂来中国以后,就住在八道湾家里,和他们家人也熟识了以后,他又懂得日语,谈话没有什么不便,于是有时也就谈起妇女应该搞些家务劳动,“也屡次对仲密(周作人笔名——作者)夫人劝告,劝伊养蜂,养鸡,养猪,养牛,养骆驼。”也就类似现在所说的搞副业吧。“有一天的上午,那乡下人竟意外的带了小鸭来了,咻咻的叫着;”“于是又不能不买了,一共买了四个,每个八十文。”这就养起鸭来了。喂小鸭的光荣任务,首先要找饲料,南方是容易得到的,田边上的小虫,鸭自己就会去寻食。至于在北京家内的水池,什么也不易得到,那就要烦劳徐坤去找。那徐坤却不费事,用高价买来了泥鳅喂鸭(在北京泥鳅较少,故价昂贵),算起来,买泥鳅的钱比买小鸭的钱还要多,这个副业也就可观了。在爱罗先珂先生,或者以为忠言可以入耳,又一次谈家常中谈些妇女应该如何过生活,话尚未完,信子已经怒不可遏,听不入耳,溜之大吉了。而言者因为看不见,还在那里继续不断地说下去。她对朋友尚如此地不礼貌,对家中人自然更要凶悍得多了。据鲁迅说,她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住在绍兴,那里没有领事馆,她还处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撒起泼来,顶多只是装死晕倒,没有别的花招。但有一回,这一花招却被她兄弟重久在旁看见了,就说不要理她,她自己会起来的。这才把家里人长久以来被她吓

得束手无策的戏法拆穿了。但到北京以后,她却不同了,因为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气焰嚣张的时候,北京又有日本使馆,她便倚势凌人,越发厉害,俨然以一个侵略者的面目出现了。事事请教日本人,常和日本使馆有着联系。鲁迅被赶走后,一有什么风声鹤唳,她就在门前扯起日本旗,改周宅为羽太寓,这也是周作人的奴性十足的表示,信子们唯恐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侵略中国,日本人来了,对他们很有好处。从这情节看来,鲁迅的痛恨卖国与周作人后来的甘心投日,即其本人的日常接触上,亦各自分野,截然不同的了。

唐弢同志编的《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中,从周作人的日记里抄录了一九〇一年二月鲁迅题为《别诸弟》的三首旧诗,充分表达了青年时期的鲁迅对兄弟的友爱,其中有这样一首:

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棹烟波夜驶船。
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影过长天!

在诗的后面并有跋言云:"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印证以后来鲁迅初到北京期间,和周作人通讯的频繁(据《鲁迅日记》,来往书信都有编号,前后各有三百封左右),邮寄书刊的不间断,人间友爱,兄弟之情,怡怡然异乎寻常。鲁迅曾经这样说:"让别人过得舒服些,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看到别人得到幸福生活也是舒服的!"真是做到了"象忧亦忧,象喜亦喜"的地步。

然而风雨终于来临了。据《鲁迅日记》记载:一九二三年七月三日,还"与二弟至东安市场"等处,但到七月十四日,却是"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紧接着七月十九日,就是"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周作人亲自送来的信,是什么样子呢?在信封外面写着"鲁迅先生",在里面斩钉截铁地要鲁迅"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兄弟的友情终于中断了,家庭终于决裂了。就这样,鲁迅在横逆忽来的情况之下,带着疾病,到八月二日,便搬到砖塔胡同去暂住。这期间,鲁迅又带病到处看屋,另找住处,这样到九月二十四日,鲁迅大病起来了。当天日记记载:"咳嗽,似中寒",第二天日记,又是"夜服药三粒取汗",到十月一日,则是"大发热,以阿思匹林取汗,又泻四次",十月

四日,"晚始食米汁、鱼汤",这样一直到十一月八日,才"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

就是生着这样的重病,鲁迅并没有放弃工作。因为砖塔胡同房子是租赁的,老母亲初时只来看望鲁迅,后来病倒在八道湾,也不给医治,跑回砖塔胡同来找鲁迅同去看医生,病好才回去。周作人家有厨子,大批工人,但母亲的饭要自己烧。母亲于是哭回鲁迅住处,鲁迅为着老人家要有自己的房子好安排生活,在非常不安之下,于是又在病中到处看屋,在朋友援助下,终于在一九二三年十月三十日另行买了西三条胡同的房子。翻修以后,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移住新居。到六月十一日,也就是离开八道湾将近一年之后,鲁迅回去搬自己的未搬走的书籍什物。八道湾的老爷和太太们,对于鲁迅本来是要像挤牛乳似地来榨取的,但他们没有想到鲁迅不向他们屈服,不但远离了他们,并且又安置了新居,于是就悔恨交集,多方刁难。当天的《鲁迅日记》这样记载: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詈骂殴打,又以电话召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后来鲁迅也曾经告诉我,说那次他们气势汹汹,把妻舅重久和他们的朋友找来,目的是要给他们帮凶。但是鲁迅说,这是我们周家的事情,别人不要管,张徐二人就此走开。信子捏造鲁迅的"罪状",连周作人自己都要"救正",可见是经不起一驳的。当天搬书时,鲁迅向周作人说,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的时候,我因为你们每月只靠留学的一些费用不够开支,便回国作事来帮助你们,及以后的生活,这总算不错了吧?但是周作人当时把手一挥说(鲁迅学做手势):"以前的事不算!"这一次,虽然"终于取书器而出",但是不能全部拿走是可以想见的。据许寿裳先生的《亡友鲁迅印象记》第十七章所记:

在取书的翌日,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回答:"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

没收了。”

此书鲁迅博物馆现在尚未收集到手，可见，还有许多鲁迅的书都被周作人“没收”了。这一件事情，鲁迅还对我说得比较简单，后来朋友告诉我：周作人当天因为“理屈词穷”，竟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这才不致打中。至今想起，多么令人气愤。北京沦陷以后，周作人当了汉奸，大权在握，那时鲁迅已经逝世，他便指使当时北京图书馆的几个职员，到西三条去把鲁迅的藏书编成中文、外文、日文书目三本，印出交人带到南京、上海各地的汉奸组织处待价而沽。大汉奸陈群已允全部包下。当时周作人给上海刊物写文章，说他不能南下，因鲁迅在北京的母亲等要他养活。后来当了汉奸，却自食其言，要卖鲁迅藏书度日了。难道做伪督办时，每天家内开几桌饭都说不出的他，就连老人也养不起？明白了这些，就证实他卖鲁迅书的不怀好意了。书目由商人手又到上海，开明书店得知有这一份目录，顾均正先生把这一消息告诉我，我立即抢救，但不敢直说我买，便辗转托人留下全部书籍。但当来薰阁向周作人报告上海已有人要这批书之后，周作人又从中扣起一部分有价值的书籍，仍要照全书原价售卖。这件事情，据说连书商都大不以为然，认为周作人的“道德”堕落到连一个商人都不如了：人家已经整批买下了，你为什么又毫不讲信用地扣起一部分?! 周作人的目的显然是借售书之名，行窃取精华之实，并要鲁迅在人民的心目中灭迹。后来信子等人秉承周作人灭绝鲁迅之心意，在这方面也是丝毫不遗余力的。一九四七年北京西三条封存起来的房子，他们还集合了大小男女和一大批伪宪兵等人到那里去破门而入，搬移用具，接收房屋，气势之凶，连警察也不敢阻挡，幸而被朋友与之理论，经过斗争，才理屈词穷，悻悻而退。

鲁迅活着的时候，敌人猛烈地攻击他，企图打倒他，但是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一文里说，他“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后来鲁迅死了，他的遗物遭到周作人等蓄意破坏，但我们知道人民是要纪念和学习他的决不屈服的硬骨头气概的。所以千方百计要使鲁迅在人民心目中存在，让那些破坏者们的阴谋不能得逞，让他们得

不到舒服。

周作人原是资产阶级本质的一个十足的软骨头，不能和鲁迅相比。在北京女师大风潮期间，起先他也曾在鲁迅起草的女师大风潮宣言上同几位教员一同签过名，追随过正义行动。但是等到一九二六年九月，女师大被改名为女子文理学院师范部，教育总长任可澄和校长林素园率领警察厅保安队及军警督察处兵士四十人左右，驰赴女师大武装接收，到校硬指徐某为共产党并要当场捕人的时候，周作人便经不起考验，为着保全个人利益，本质毕露，从此就不敢斗争下去了。《语丝》第九十六期那篇《女师大的命运》中，岂明（即周作人）说："经过一次解散而去的师生有福了"，其意即指留下来的人是不幸的，不幸而要幸，流亡生活又不舒服，则惟有顺着当权者的旨意行事，充当统治者的走卒了。鲁迅和周作人走着两条绝然不同的道路，鲁迅奔向光明，而周作人则依附黑暗。在周作人未当汉奸前，在北大投靠胡适肮脏一气时，鲁迅就知道这个人已不可救药。鲁迅曾经说过，他自己跑到南方，接触了革命，看到和学到了许多有意义的东西，受到了很多的教育，如果仍留在北京，那是忍受不了的。但是请听周作人的论调！当时他对人说："我不到南方去，怕鲁迅的党羽（指左翼作家——作者）攻击我。"黑暗的土拨鼠，是见不得光明的，就在这样自己瞎说！过着苟安生活，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以榨取别人，贪图享受为能事的周作人，对他来谈吃苦和革命，诚如夏虫之不足以语冰，软虫之不足以语硬骨气！他甚至公开替秦桧翻案和作辩护，暗骂左派统一思想，说什么"我很反对思想奴隶统一化。这统一化有时由于一时政治的作用……最为可怕"。为要替自己的投降日寇作张本，最后发出谬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这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写的（见周作人著《瓜豆集》：《再谈油炸鬼》）。其时已在明显地为大汉奸汪精卫和自己叛国开辟道路，和汪贼的主和论一鼻孔出气了。因此当日本帝国主义者铁蹄践踏中国土地，"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了一张平静的书桌"（见《一二九学生运动宣言》）的时候，周作人就把民族利益抛弃不顾，无耻地做起日伪的高官，拿起血腥卑污的厚俸，变成国家民族的罪人，落得了一个汉奸的末局。

许多读者来信问我："鲁迅为什么被八道湾'赶走'？""鲁迅为什么和周作人决裂？"这都是一般人所不易了解的。我每接到这样的来信，

就要分别写回信，答复读者。其实，如前所说，鲁迅的从八道湾搬走，和周作人的彻底决裂，完全是不足奇怪的。

鲁迅从少小到壮年，无微不至地照顾周作人。据我所知，鲁迅对自己所接触的人，都是希望他对祖国有所贡献。鲁迅对周作人前期，亦期望他对新文化事业有所努力，但周作人是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在《语丝》时期，尚能随大流地反对封建，女师大风潮的初期，尚能在革命群众的队伍中混迹（后来即倒向敌人）。鲁迅一本国事为重的态度，看到周作人的尚有若干因素使新文化事业可以利用，因而把兄弟不和放在次要地位。但是后来鲁迅与郑振铎合印《北平笺谱》遭到周作人的嘲讽；刘半农死了，鲁迅对死者说了几句论定的话（见《忆刘半农君》），也招来周作人的不满。正当鲁迅大病时，周作人在一篇题为《老人的胡闹》的反动文章中，竟把鲁迅与当时投靠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日本老朽相提并论，暗骂鲁迅"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见《瓜豆集》二百七十八页）。为什么周作人这样说呢，正因为这时鲁迅已公开表明他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而周作人却认为鲁迅接受党的领导，是重在"投机趋时"，是"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不仅态度蛮横已极，而且充分表明了两个人在政治上的分野。这里我所举出的许多关于周作人的事实，其意无非使读者明了其大概。而鲁迅，则着重于从政治问题上、思想问题上去看人的。统观他们兄弟间的悬殊，有如下几点：周作人在利害关键上，以个人为中心；鲁迅则不计较自己得失，完全为了大众。周作人对黑暗势力不敢反抗，最后连自己也倒向黑暗；而鲁迅则是决不屈服，反抗到底。周作人认为日本工业发达，中国战不过日本，最后只有投降；而鲁迅则坚决主张抗日，相信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周作人是软骨头，丧尽民族气节；鲁迅则骨头最硬，不甘屈服。周作人四体不勤，养尊处优；鲁迅则自砸煤块，以普通劳动者自居。凡此种种的重大分歧。在鲁迅生前，从性格上说已经截然两样，到头来终会分开的。加以周作人老婆完全以一个日本征服者的面目出现，抱着侵略者的态度，凌驾一切，奴役一切。鲁迅何人，对这种恶势力焉能退让？因此，毅然决裂，在人生的长途中，走完了自己光荣的一段，今天看来，这岂是偶然的吗？

在鲁迅活着的时候，周作人是公开表示和鲁迅绝交过的。鲁迅刚刚逝世以后，他又中伤鲁迅，对反动的上海《大晚报》驻北平（当时称）记者发表谈话，说鲁迅先生“以前的思想是偏于消极的，现在变为‘虚无主义’者，癖性又多疑，别人的一举一动都疑惑是骂他”。鲁迅死了二十多年之后，我们却看到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书。这使我忽然又记起鲁迅写过的《忆韦素园君》一文最后的几句话：

>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我写这段回忆，无非为了经常被读者问起，现在把这件事情如实地写出来作总的回答（虽然只是一个梗概）。因为这是千千万万研究鲁迅的人们所关心的事情，我有责任把知道的说出来。

（《鲁迅回忆录·五》）

我又一次当学生

我又一次当学生。而且是专人教授，单独一个人学。教师是精通日文而又尽心诚意、不遗余力地罄其所知以教的鲁迅先生。做为一个有幸在他旁边学习的学生，我共学了一年零五个月的日文。

起因是在一九二六年的十二月二日《厦门通信》谈到的：

……你大约世故没有我这么深，所以思想虽较简单，却也较为明快，研究一种东西，不会困难的，不过那粗心要纠正。还有一个吃亏之处是不能看别国书，我想较为便利的是来学日本文，从明年起我当勒令学习，反抗就打手心。(《两地书》：第八十五)

从厦门到广州，鲁迅无日不忙于学校的业务，没有机会履行他给我教日文的许约，到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国民党进行"清党"，叛变革命以后，虽则是大家都辞职了，该可以学习了吧，然而，川流不息的"客人"来侦察，心胸中塞满了一肚子的愤懑，静不下来，我也没有心思要求鲁迅实现他的宿愿。

到了一九二七年的十月里，我们到了上海，经过两个月的人事往来，生活也稍稍安定了，从十二月起，我就开始读书。先是教单字，但并不是照日文教学所排列的字母教起，而是鲁迅自己编出讲义来教的。教书时逐步深入，而又灵活地每天按时地学习。一共自编自教了二十七课。大约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学了一个月，就换了课本。每天都是晚上授课，非常严肃认真地教着，除非晚上有人邀请，回来太迟了，才在

这一晚上停学。到一九二八年一一十月，改换了课本《ニール河の草》(即《尼罗河之草》)的一本浅明谈论艺术的书，内容从原始社会讲起，包括埃及的人首狮身，罗马的维纳斯，中世纪的十字军及文艺复兴，以至新时代的小方块石砌像以及偶像破坏时代；后来的美术又包括雕刻与绘画；至十五世纪油绘的发明，十六世纪礼拜堂的建筑；到近代欧洲各国的艺术，及宗教改革时代等的艺术与近世法国革命后的艺术以及现代艺术等；凡有关欧洲文化的一些基本知识，都尽量设法给与一个从事文学工作者以初步认识。这和他一向叫人在文学之外多得些普通知识，或各方面知识的主张是相符合的。

尤其重要的，是他认为每个人必不可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以及这思想对工作的重要性。自从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信了这个真理以后，就不但用它来"煮自己的肉"，而且也执着地以之教育他周围的人，使真理之火从自己的身边燃起。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之后，白色恐怖极其严重，但鲁迅一经认定马列主义是真理，就不但要自己学习，而且还要宣传，教育别人。所以我的第二个课本，就是日文本的《马克思读本》(神永文三著)。除序文而外，内容共分十讲：一、马克思的生涯及事业；二、唯物论辩证法；三、唯物史观；四、阶级斗争说；五、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六、劳动价值说；七、剩余价值说；八、资本积蓄说；九、利润说；十、资本崩溃说。教时，从序文讲解起，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晚开始，至一九二九年四月七日止，费时共五个多月。马克思的著作，本来是比较艰深的，再经过日文的转译，其术语和整个句子对我说就更加难懂，自是不难料想的了，但是鲁迅能够深入浅出地说明这些道理，有时把整个句子拆除开来向我讲解，并且随时改正课本上所有的错字，使我听来就明白易懂得多了。本来这是为学习日文而采用的一本课本，但是现在打开这个课本，直如严师在前，不但要我通晓日文，还须了解内里理论的奥妙，那课程的大概内容，它所包含的真理的光芒，以及鲁迅对我讲解这些革命真理时的声态，我还觉得像昨日上课一样地深印脑中。

那时，鲁迅正在主编《奔流》，后来又编《语丝》，此外，又与朝花社中人商量出《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艺苑朝华》，又为青年校定译稿，答复青年来信，再加上自己写稿，所以每天都很繁忙的，但只要对青年有利，对人民有利，他就不顾一切地埋首做去。时间不够，则夜以继日，努

力以赴，对个人与集体都本此精神。即如教我日文，亦何尝不是从这宏心发出，黾勉从事？后来教到《小彼得》，在批阅我试译的稿件之后，更示范地亲自译出一遍，这就是现在收入《鲁迅译文集》里的译本了。

学了《小彼得》之后，我因一面料理家务，一面协助他作出版工作，同时不久有了孩子的牵累，就很可惜地停止了学习。更其重要的原因，是我看到鲁迅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连睡眠也顾不上，在一九二九年三月五日的日记里就写着"通夜校《奔流》稿"。似这等情况，我何忍加重他的负担！我整天在他身旁，忙于琐碎事务，连看一些书报有时也顾不到，学日文势必也受到影响的。初到上海的时候，我也曾希望有工作，并请许寿裳先生设法在教育界找事。已经有眉目了，鲁迅知道后，就很为难地说："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中去了。"这话很打动了我，所以立即决定，不出去工作了，间接地对他尽一臂之力，忘了自己，如同我后来写给《上海妇女》的文章中所说的，要做无名人物的心愿，就这样充塞了我的胸怀。虽然我实际没有给予鲁迅以什么帮助，只是有心无力地直至他逝世还是如此。这是客观因素，然而存在我内心当中一直没有告诉过鲁迅的，还有一个主观因素，就是我对鲁迅的下面这样一段话，一直没有很好地理解，所以才荒废了这种学习。鲁迅在有一次闲谈中曾经这样对我说，希望我精通一两种外国文，以后，就可以看他所有的书，租个亭子间住着，无需去求助他人。今天想来，他这段话的意思也许是有鉴于当时社会的黑暗，怕我缺乏斗争经验，易犯冒失猛进，所以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我，代我设想，要我一方面对当时污浊的社会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严正的立场；另一方面，多读一些书籍，以便对新文化事业多做一些贡献，这正是和他在遗嘱中所说的"万不可去作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的精神是一致的。但我却对这段话，在感情上有着一种难以明状的抵触，以为：在他生前，我协助他，照顾他，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至于在他死后，自不待说，我要继续坚持他的严正立场，对旧中国的一切反动、落后势力绝不妥协，对革命事业和新文化运动，将贡献自己所有的一切。但是这些都是后话，而且"死"这个字眼是一般人很忌讳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就这样过早地来想到它呢？因此，在学习当时，我就未能体会其心情，没有好好地学习日文。这是我向鲁迅唯一不坦白的地方，他是不知情的，反而只是

诚诚恳恳地教书。这不中用的学生，真可怜见，我辜负了他，没有在日文上好好钻研，继续。由于自己的偏见，妄自决定借口家务而废除努力温习，鲁迅口虽不言，必定以我的疏懒为孺子不可教而心情为之难受的。这就是我未学完这一课程的不了了之的可恶态度。

自一九二七年底到上海，鲁迅从日文书中阅读了很多马列主义方面的著作。从他教我学习《马克思读本》时能够通俗易懂地进行讲解，并能校正课本中的错字来看，要不是他在这方面下过功夫，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鲁迅一贯具备实事求是的谦虚态度，如果不是十分掌握这门科学，他就绝不冒充内行，以不知为知之。比如关于木刻艺术，鲁迅曾屡次提到他在这一方面不是“内行”，但是当你阅读他和木刻家的通信时，就会感到那些见解绝不是一个“外行”人所能说出来的话。一九三二年四月，鲁迅在《三闲集》的序言中曾经这样写道：

>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在这里，鲁迅自己谦虚地承认：他的所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由于当时一些先进的朋友们的帮助。这的确是鲁迅应该感谢的，因为没有严肃的思想斗争，人们的思想意识是很难不断前进的。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鲁迅自己的努力。他曾经说过，他“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并且说他翻译的著作“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痛”（见《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既是“煮自己的肉”，又是“忍痛”，可见鲁迅在改变自己的世界观的时候，是经过一番努力的。但是由于朋友们的帮助，再加上他自己的努力，他终于最后达到了目的，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鲁迅回忆录·七》）

同情妇女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妇女除了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束缚以外，还要受夫权的束缚。所以在解放区，各级党和政府，一切工作做得好的，都是和男女一齐发动的政策分不开的。但在资产阶级的社会，沿着封建遗习，压迫妇女，使她们为少数人服务。所以在东北刚刚解放的时候，我听到一支极好的歌曲，歌颂共产党的功绩，我极爱它，歌词的头两句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时国歌还没有定出来，每于大会开始，就唱着这个从人民心里倾泄出来的词句。在东北召开的解放后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要我讲话的时候，我也通过自己的体会，首先唱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妇女解放的歌来。事实上，今天人民公社的存在，更是彻底解放全民，连妇女在内的雄辩的证明。

鲁迅一开始执笔，就执着地唤醒人民，尤其为被压迫最甚的农民、妇女、儿童的不合理待遇鸣不平。现在仅举鲁迅对妇女方面的一些著作谈谈他的看法。从一九一八年的《热风》时代起，几乎每本著作都有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粗粗翻阅一下，我们就看到有：

《热风》：(一九一八～一九二四)

　　《随感录四十》

《呐喊》：(一九一八～一九二二)

　　《明天》里面的单四嫂子

《坟》：(一九〇七～一九二五)

《我之节烈观》

《娜拉走后怎样》

《论雷峰塔的倒掉》

《坚壁清野主义》(反对禁止妇女出游,要走解放的路)

《寡妇主义》

《华盖集》:(一九二五)

《公理的把戏》(写女师大问题)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同上)

《华盖集续编》:(一九二六)

《纪念刘和珍君》

《彷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

《祝福》里的祥林嫂

《伤逝》里的子君

《离婚》里的爱姑

《而已集》:(一九二七)

《忧“天乳”》

《三闲集》:(一九二七～一九二九)

《铲共大观》(叙述反动统治者对革命者砍头示众“暴露女尸”借以威吓群众)

《朝花夕拾》:(一九二六)

《阿长与山海经》(写一个女工的故事)

《故事新编》:(一九二二～一九三五)

《补天》(女娲的故事)

《奔月》(嫦娥的故事)

《二心集》:(一九三〇～一九三一)

《新的“女将”》(反对专以女人作点缀品)

《集外集》:(一九三二)

《〈淑姿的信〉序》

《南腔北调集》:(一九三二～一九三三)

《关于女人》(反对把一切社会罪恶都加在女人头上)

《关于妇女解放》(为解放思想、经济、社会等而奋斗)

《上海的少女》(反对早熟风气)

《准风月谈》:(一九三三)

《男人的进化》

《花边文学》:(一九三四)

《女人未必多说谎》(指出杨贵妃、妲己、褒姒替男人伏罪)

《论秦理斋夫人事》(论妇女自杀)

《且介亭杂文》:(一九三四)

《阿金》

《且介亭杂文二集》:(一九三五)

《论人言可畏》

《且介亭杂文末编》:(一九三六)

《女吊》

以上所录各篇,集合起来,鲁迅关心妇女、为妇女解放事业提供的具体意见,是很完备的,内容有婚姻、家庭、生活、寡妇、新女性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这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来理解他对妇女问题的态度。

在反对封建高压的《热风》时代,鲁迅在《随感录四十》里写道:

>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
>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
> …………
>
> 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们所有的是单是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儿媳之夫,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
>
> 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
>
>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

…………

……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

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这一段话写在一九一八年，即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在黑暗的封建社会当中，人民被压制得麻木不堪的时候，鲁迅叫出了几千年封建婚姻下无数男女的悲哀的呼声；但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由于黑暗势力的过于浓厚，人民尚未觉醒，所以用他自己的处方来说：“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然而，他清楚地知道“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他不安于人民忍受这种压迫，那又怎么办呢？于是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在五四运动时期，婚姻自主、民主自由的呼声响彻云霄，鲁迅无疑地是赞助这一运动的，但是做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要更为深刻得多的，他不同于那些单纯的女权主义者浅薄的认为似乎妇女只要有了参政权等等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经济权的问题；他也不同于那些具有小资产阶级狂热病的人，感到婚姻不自由就简单地一跑了之，认为必须要有自己的生活，不能坠在男人的衣角后面终其一生。所以在《伤逝》里指出：子君最后的结局，也只有回到她父亲的家里，并且落得悲惨地死去。我们青年当中，今天有一些人因为不了解那个时候（虽然仅仅相隔四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旧的社会制度是什么样子，所以对鲁迅的著作看不懂，这也难怪其然。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这种遭遇，所以对这些作品觉得有些隔膜，不易理解。其实，稍有一些年岁的人，在旧社会中稍微生活过几天的人，只要读一读《祝福》和《离婚》，祥林嫂和爱姑的形象，就会使他感到多么熟悉，她们的遭遇，使他感到多么沉重，并且寄予莫大的同情。

鲁迅对妇女问题的看法，到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比以前更为成熟了。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东北以后，国难严重。当时有一种论调，凡是和女性有关的事情，比如奢侈浪费等等，都

成了女人的罪状。鲁迅曾经严正地指出:

> 其实那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

他一针见血地分析说:

> ……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

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就是——

> ……西汉末年,女人的"堕马髻","愁眉啼妆",也说是亡国之兆。……

又认为:

> ……其实亡汉的何尝是女人!不过,只要看有人出来唉声叹气的不满意女人的妆束,我们就知道当时统治阶级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

——以上引文均见《南腔北调集》:《关于女人》
(此文为鲁迅与瞿秋白同志商量,由秋白同志执笔写成的)

以这样的思想为根据,鲁迅就大胆地站起来替妇女说话,甚至替杨贵妃、妲己、褒姒翻案,指出:几千年来一些史学家为了替专制王朝辩护,说他们的江山,是被几个女人毁掉了的,其实不过是一派谰言。(参看《花边文学》:《女人未必多说谎》)

关于《集外集》里《〈淑姿的信〉序》,有人疑是鲁迅给他的小姨作的,其实不确。乃是一不相识之人名程鼎兴的托费慎祥把淑姿的信送来求

作序出版，以表示他怀念之情。从表面看来，是一番好意，但从淑姿的信里细看，他却是一个薄幸郎君，使淑姿赍恨以殁的。鲁迅深为淑姿抱不平。照此线索，复案序文，则全文便迎刃而解了。因是男方要求，鲁迅不便直斥，故隐约其词：以花之失荫而遭寒比，又以女方颇欲振奋，而终于陨颠于实有，来诉说其悲痛。后又述说淑姿抱着美好的梦步向人生，然而来日大难，衔哀不答。忽而得病了，最后以至于死。到“中国少年，乐生依旧”句则简直痛责程鼎兴了。“则有生人，付之活字”。以生人对活字，不但骈文之工整，臻于上乘，而且运用新文词于古文中，实亦难得。更其具有深意的是印书者的程某，不过一生人耳，实可说与淑姿毫无关系，是种分析，意含双关，透木不止三分了。末二句：“分追悼于有情，散余悲于无著”的“分”字、“散”字与“有情”是出书的人可以自慰自地以为无憾，其实是“无著”了也。鲁迅写此文煞费苦心，因费君之请，有不便推却之势，要是别人，也许璧还算了。但既要他写，也还是有分寸的，不能随便让女性受委屈，这是鲁迅万不得已而出此的。写完这篇序文，鲁迅自己亦十分欣赏，说可以交卷了。稍稍了解鲁迅旧文学根底的，都晓得他对于六朝文的研究颇深，这回是因为要痛责程生，以文言文中骈文出之，全篇文字也铿锵人调。我们两人曾一同朗读，所以至今还留有深刻印象。

鲁迅随时随地维护妇女权益，对妇女问题可谓关切备至了。但是否凡属妇女，都博得他的同情呢？这却未必。你看他之斥责杨荫榆是多么不容情，他之批驳寡妇主义是多么痛彻透辟！凡这些，无非一个目的，是本着党的精神，对被压迫者都给以援助，对压迫者都给以揭露和打击。《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是无情揭露刽子手们的凶残，极力鼓舞继起者的战斗。尤其是刚刚抬起头来的青年妇女，他总是极力称赞，是具有奖掖的深意的。文章末尾，有这样含有教育意义和感人至深的话句：

>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

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华盖集续编》）

果然，继“三一八”之后的许多青年运动；前仆后继，风起云涌地席卷而起，他们用不屈不挠的意志，机警沉着的行动，更加奋勇的气概，答复了鲁迅的期望。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青年男女更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为新中国、新社会的成长贡献了他（她）们的力量，放出了他（她）们青春的万丈红光。

鲁迅凡有表现于文字的，从行动中往往也得到实践，他的言论和实践是统一的。他反对婚姻压迫，我们试读一下《离婚》这篇小说，爱姑是个多么聪明伶俐、能干巧辩的青年妇女，但是一碰到“七大人”这一般老爷们，就有理也说不清了。像这类女人的命运，是多么可怜，可怜到任人宰割的程度却想不出对付方法。这沉重的恶势力如果不彻底推翻，中国妇女将个个沉入深渊底下，见不到天日！

鲁迅也曾用他微弱的力量，拯救过一个女人。《鲁迅日记》有这样两句记载：

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夜律师冯步青来，为女佣王阿花事。

一九三〇年一月九日：……夜代女工王阿花付赎身钱百五十元，……。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那时我们有了孩子，希望有一个得力的保姆照顾他，以便我们可以专心去做工作。经同乡介绍，说有一个妇女，正合适。她名叫阿花，我们聘请下来了，工作十分满意。做起事来，又快又好，并且一面唱山歌，哼哼哈哈的，一面又干活，把孩子哄得蛮适意，我们也更重视她的能干。在闲谈家常中，才晓得她被丈夫虐待，毒打，才逃出来工作的。这不就是活生生的妇女受到压迫的典型实例吗？像这样能干的妇女，劳动力又好，而丈夫还不知爱惜，人间不平事，哪有像这样的。那时候，听到忽然有人敲门，或前后门有什么风吹草动，就

看见阿花丧魂失魄,好像着了鬼迷一般地不知如何是好,甚至直往楼上窜,如此状态,对小孩是不利的,而且越演越频繁起来了,读者还记得在电影里看到祥林嫂在河边淘米时见了癞痢卫二的那副惊骇不可名状的一幕吧,实大有过之无不及,我们算在眼前重见这真人真事。究竟是一个什么可怕阴影,竟这样惊破了这个女人的胆,就像兔子被猎人追赶下的战战兢兢情况,那楚楚可怜之状,实为同情者所不忍卒视。这风波不止一次地演出来,自然难免被我们知道。上海房子是前门正对别人后门的,有一天,从我们家里看到对面后门厨房里人影绰绰,似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样子,我们抱着自扫门前雪的态度,没有理会。但敏感的阿花,面色发白,急匆匆跑到跟前,像大祸临头似地上气不接下气说:"不好了,那死鬼(指她丈夫)就在对门,要是被抢去怎么办?"鲁迅这才留心细看,对门厨房里确有不少人。原来那家也是用的同乡人,阿花的丈夫就有那么长的手脚,从乡下来到上海,想劫回阿花。这创纪录的一幕,演出时必然轰动邻里。而我们的一家,就在这批人指指点点,喊喊喳喳下闹了一大半天。后来还是鲁迅向他们说:有事大家商谈,不要动手动脚的。经这么一说,他们也觉得上海不比乡下,知难而退了。不记得是对方,还是鲁迅方面,找到在她乡间的一位士绅,来调解这一事情,原来一见面之后,才知道那位士绅就是以前在北京大学读书、和鲁迅时常来往的。熟人相见,自然无话不可谈,而况他又知道鲁迅之为人的。但他却说:"阿花的丈夫,原本是想抢人回去的,但既然东家要留下她(据他意思是指鲁迅欢喜要收下她),就听从贴补些银钱,好另行娶一房媳妇便是了。"鲁迅听了大笑,原来有这等误会。但问阿花,一口咬定不愿跟丈夫回去,情愿离婚。因此,就又在乡绅的调解下,言明由鲁迅替她付出了一百五十元的赎身费,以后陆续用工资扣还,这件事就此结束。过不两月,阿花另有所爱,离开我们而去。以后情况就不了解了,总而言之,她是脱离了樊笼,远走高飞,也许不致于再挨打受骂了吧?那时候的社会,有几个人有机会才遇到鲁迅为之解围!而千千万万妇女,因为得不到解放常常以泪洗面。春雷暴响,巨光闪耀,人民的救星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人民,解放了全中国,真正彻底解救了妇女,使她们从几千年沉沉欲睡的社会奋起。如果说,中国人民感激党和毛主席,中国妇女更其加倍地感激党和毛主席,因为她们真正得到翻身了。

就拿我个人来说，旧社会的黑暗，就像魔掌一样时刻笼罩在头上。一生下来，就被母亲厌恶，要把我送给本家，甚至自贴抚养费也在所不惜。因据迷信说，我要克父母的缘故。父亲因此想着不要我了。生下刚三天就许给人家。那家的父亲是孔教会中人，就这一点，其思想之反动、腐败与顽固可知。我从小随着三个哥哥在私塾读书，就模糊地晓得有“所遇非人”的辞句而对婚姻不满。到十二三岁时，就向家人表示过反抗。那家的人来了，我就冲出去，表白了我自己的不愿意，当着父亲严厉的斥责“出去”声，终于把自己的意思说完才走了出来，那是受了当时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提倡者所办的《平民报》的影响而发作的。平日里每一想到终身大事，就不禁悲从中来。孑然独处，就想好好读书，先把自己底子打好了，明白了事理，就什么事都会应付了。就这样，我从家内，一直跑到外面，凡旧社会给予一个孤女儿的冷遇，都像尝五味子一样无不品尝到了。对于鲁迅，我同情他“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而拼命写作，于寂寞中度过一生的境遇；而又自觉我比他年纪轻些，有幸运解除婚约的痛苦。因我之幸运，更觉他的遭遇不幸而同情起来。这也许是我们根本思想——反抗旧社会——一致的缘故，所以才能结合起来。几十年来，经过无数革命前驱者（包括鲁迅在内）和广大人民的英勇斗争，黑暗的旧社会被彻底推翻了，每一个妇女和中国人民一道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这使我们久受压抑、备尝艰辛的老一代人们，其心情之快慰，实难形之笔墨。我要把我的一点一滴，都贡献给亲爱的祖国，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在内，都无保留地献给党，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这是我唯一的心愿。

（《鲁迅回忆录·九》）

瞿秋白与鲁迅

时间一久就忘记了月日，不记得是春末还是夏初光景，真算得是气候宜人，人们游兴正浓的某一天，那是一九三二年了，通过介绍：说有一位为了革命过着地下生活的人，想乘此大好时光，出来游散一下，见见太阳。但苦于没有适当地方。问起来，才知道是“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秋白同志，就约定于某日来我家盘桓一整天。

这一天天气特别和煦，似乎天也不负好心人似的。阳光斜射到东窗上的大清早，介绍人就陪同稀有的初次到来的客人莅临了我们的住处。除了秋白同志之外还有杨之华同志。

我们虽则住在北四川路底的电车终点站附近的一个公寓里，离开不远正是虹口公园；但在三楼上，四周都是外国人住着，比较寂静的，正适宜于我们迎接这样一位过着地下生活的革命者。

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白区对党内的人都认是亲人看待）骨肉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的样子。总之，有谁看到过从外面携回几尾鱼儿，忽然放在水池中见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状的吗？那情形就仿佛相似。他们本来就欢喜新生一代的，又兼看到在旁才学会走路不久的婴儿，更加一时满室皆春，生气活泼，平添了会见时的斗趣场面。

我是依稀如见故人般，对秋白同志似曾相识的。回忆起来，时间也许太久了。那还是在女师大做学生的时候，大约那时秋白同志刚刚从苏联回来，女师大请他来讲演的。那时我初到学校不久，讲话的内容全不记得了，总之是对于新社会苏联的报导方面的吧！为什么说似曾相

识呢？就是从前见到的是留长头发，长面孔，讲演起来头发掉下来了就往上一扬的神气还深深记得。那时是一位英气勃勃的青年宣传鼓动员的模样，而一九三二年见到的却是剃光了头，圆面孔，沉着稳重，表示出深思熟虑、炉火纯青了的一位百炼成钢的战士，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

那天谈得很畅快。鲁迅和秋白同志从日常生活，战争带来的不安定(经过"一·二八"上海战争之后不久)，彼此的遭遇，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无话不谈，生怕时光过去得太快了似的；又像小海婴见到杨妈妈，立即把自己的玩具献出似的；但鲁迅献出的却是他的著作、思想。两两不同，心情却是一样的。

为了庆贺这一次的会见，虽然秋白同志身体欠佳，也破例小饮些酒，下午彼此也放弃了午睡。还有许多说不完的话要倾心交谈哩，但是夜幕催人，没奈何只得分别了。

从此他们两人除各自工作外，更是两地一线牵(共同的革命意志和情感)，真个是海内存知己，神交胜比邻了。在革命战线上相互支援，在文化工作中共同切磋，使他们进一步建立了革命友谊，如关于大众语问题的讨论和关于翻译问题的讨论以及对文化战线上各种反动势力的斗争等等，特别是鲁迅，由于得到秋白同志之助，得到党给与的力量，精神益加奋发，斗志更加昂扬地勇往直前了。

秋白同志精俄、英文，对中国旧文学也素有根底，加以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能够深刻地观察与分析问题，所以思想透辟，为当时不可多得的杰出人物。鲁迅平夙就尊敬有才能的人，何况是党的领导人。这回相见，又岂能轻易放过。双方各有怀抱，都感觉到初次见面还有什么未尽之言似地希望再一次的会见。那时双方都过着不自由的地下生活，要会见一次，真是颇不容易。但终于打破了重重障碍，克服了许多困难，在同年九月一日那天的早晨，我们带着孩子去拜访了他们，地点就是紫霞路原六十八号三楼的一个房间。这是第二次的见面了，秋白同志坐在他的书桌旁边，看到我们来时，就无限喜悦地站起来表示欢迎。他的书桌，是一张特制的西式木桌，里面有书架可以放文件，下面抽斗也一样，只要把书桌上面的软木板拖下来，就可以像盒子一样，连抽斗也给锁起。据他说，这样一走开，写不完的文件只要一拉下木板就不会被别人乱翻了。做革命工作的人，这种桌子是比较方便的，后来他

去苏区时，就把这张桌子搬到我们的住处大陆新村来，至今还保存在那里。当时，他就从桌子里拿出他研究中国语言文字问题的原稿，提出里面有关语文改革和文字发音问题来同客人讨论，并因我是广东人，他又找出几个字来特意令我发音以资对证。他就是这样随时随地关心人民事业，寻找活的资料，丰富自己的知识，订正自己的看法，不倦地、谦虚地进行工作，从任何一个人身上，也不放过机会。就这样，这天上午谈话主题就放在他所写的文字方案的改革上了。后来，又几经改动，誊抄完整，到离开上海时，就成为他比较完妥的著作了。这些著作，他临行前交给鲁迅一份，鲁迅妥慎保存于离寓所不远的旧狄思威路专藏存书的颇为秘密的一个书箱内。里面还存放着一些鲁迅的书籍和柔石等同志的遗著。到鲁迅逝世后，这些存书全部搬到淮海中路淮海坊内。日军占领上海，侵入我家搜查时，感谢一位女工，她勇敢地以身挡住三楼藏书室的门口对日伪军说："三楼租给别人了！"这才使敌人没有去搜查，这些东西才幸免浩劫地得以保存下来，使它们多时埋藏，直到解放以后才如释重负地交到人民手中，成为革命烈士留给我们的珍贵遗物。现在那位女工已经远离开我了，但我每想到横遭惨祸的那一幕情景时，就不由地要想到这位聪明机智、沉着勇敢的女工同志。

秋白同志在鲁迅寓内度过三次避难生活，两次在北四川路底的公寓里，末次是我们住在大陆新村的时候。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十一月，日期记不清了，只记得鲁迅这时正因母亲生病回到北京去，是由我接待他们的。我还记得：他和杨大姐晚间到来的时候，我因鲁迅不在家，就把我们睡的双人床让出，请他们在鲁迅写作兼卧室的一间朝北大房间里住下。查《鲁迅日记》，他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动身往北京，同月三十日回到上海的。那时，秋白同志来了几天才见到鲁迅回归，则大约是在十一月下旬了。在这期间，他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简单的家庭平添了一股振奋人心的革命鼓舞力量，是非常之幸运的。加以秋白同志的博学、广游，谈助之资实在不少。这时，看到他们两人谈不完的话语，就像电影胶卷似地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实在融洽之极。更加以鲁迅对党的关怀，对马列主义的从理论到实际的体会，平时从书本上看到的，现时可以尽量倾泻于秋白同志之前而无须保留了。这是极其难得的机会。一旦给予鲁迅以满足的心情，其感动快慰可知！对文

化界的复杂斗争形势，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对帝国主义的横暴和“九一八”东北沦亡的哀愁，这时也都在朝夕相见中相互交谈，精心策划。两个同是从旧社会士大夫阶级中背叛过来的“逆子贰臣”，在尖锐的对敌斗争中，完全成了为党尽其忠诚、同甘苦共患难的知己了。杨大姐也以革命干部共有的风格，和我们平易相亲，和女工、小孩打成一片，使我们丝毫没有接待生客之感，亲如一家地朝夕相处，使我也学到了许多说不尽的道理。

秋白同志是担任领导工作的，一刻也不能耽误，一到环境许可，他就离开我们而去了。在这次离去之前，曾经有这些东西留着痕迹给我们：

一，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七日曾经给鲁迅写过：

>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他在诗后说明是青年时代带有颓唐气息的旧体诗。以他后来的积极进行革命工作，无疑是否定了前期思想的不正确成分的。但我们若从“雪意凄其”之句来看，不仍是对此时此地遭遇压迫的写照吗？而末句说“犹折梅花”，则是梅开十月，已属小阳春节气，也即“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意思。

二，在同年十二月九日，曾以高价托人向某大公司买了一合玩具，送给我们的孩子。在《鲁迅日记》里是这样写的：

> 十二月九日，……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赠海婴积铁成像玩具一合。

当时，他们并不宽裕，鲁迅收下深致不安。但体会到他们爱护儿童，给儿童培植科学建筑知识的好意，就又在这不安中接受了这件礼物。秋白同志在合盖上写明某个零件有几件，共几种等等，都很详尽。又料到自己随时会有不测，说：“留个纪念，让小孩大起来也知道有个何先生（何先生是他来我家时的称呼——作者）！”可惜几经变乱、搬动，这

合盖已经遗失。零件还有若干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作为秋白同志预想到革命胜利后必有大规模的建设，因而对下一代必须从小给以技术知识教育的深意的纪念物品来珍贵保存，以便我们的青年一代，从革命先驱者的这一殷切期望中获得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力量。

这次避难，到年末之前他们就离去了。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没有留他们度岁的记忆。这期间，曾经有过几次有人来向秋白同志接洽，但总是让他们自己见面，在一个房间里。我们从不打听来过的是什么人。只记得曾来过一个牧师身分的人，并托鲁迅代买字典，以作自修外国语之用，鲁迅当即照办了。解放后，我见到一些负责同志，他们都说曾到过我们家里，是为找秋白同志去的。但那时为了革命利益，我们自觉地遵守纪律，从不问来人姓名和住址，知道问是不妥的。因此，至今对有些人到过我家总是记不那么清楚了。

第二次避难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这次有两件事情可记。

一，二月十日，《鲁迅日记》有如下记录：

> 上午复靖华信，附文它笺

这说明鲁迅写回信给靖华同志时，秋白同志适在旁边，得有方便附笺寄出。

二，二月十七日，亦从《鲁迅日记》中看到：

> 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肖伯纳、伊[?]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傍晚归。

归来已傍晚，但刚好秋白夫妇住在这里，难免不把当时情况复述一番。从谈话中鲁迅和秋白同志就觉得：萧到中国来，别的人一概谢绝，见到的人不多，仅这几个人。他们痛感中国报刊报导太慢，萧又离去太快，可能转瞬即把这伟大讽刺作家来华情况从报刊上消失，为此，最好有人收集当天报刊的捧与骂，冷与热，把各方态度的文章剪辑下来，出成一书，以见同是一人，因立场不同则好坏随之而异地写照一番，对出

版事业也可以刺激一下。说到这里,兴趣也起来了,当时就说:我们何不亲手来搞一下?于是由我跑到北四川路一带,各大小报摊都细细搜罗一番当天的报纸,果然,各式各样的论调不一而足。于是由鲁迅和秋白同志交换了意见,把需要的材料当即圈定;由杨大姐和我共同剪贴下来,再由他们安排妥贴,连夜编辑,鲁迅写序,用乐雯署名,就在二月里交野草书屋出版,即市面所见《萧伯纳在上海》是也。这书从编、排、校对,以至成书,都可以说一个"快"字,也代表了革命先驱者们的战斗精神,更开辟了由众人合作来编辑一种书籍的优良先例。秋白同志和鲁迅那种说干就干,亲自动手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

这回住了不久,二月底就又走了。但敌人追踪甚紧,秋白同志担任的工作又相当重要,为敌所忌,搜捕甚急。因此,在短短期间,似乎就搬移了好几个地方。那时情况紧张,每一搬家,就大都什么也不能带走,鲁迅送给秋白同志的许多书都散失了,记得连我送给杨大姐的一件棉旗袍也在一次仓卒搬家时丢掉了。但秋白同志和杨之华大姐,并没有被恶劣的环境所困倒,革命意志和战斗精神却更加旺盛了。在鲁迅方面,常常替他们焦急,往往为之寝食不安。总想对他们加以帮助,使其得到比较适合生活的环境。一九三三年在他三月一日的日记中记着:"同内山夫人往东照里看屋",三月三日又记着:"午后往东照里看屋。"这"屋"(其实只是一个亭子间)似乎是日本人租住的,所以要内山夫人陪去看,由他分出余屋租给中国人,而这人就是秋白同志他们。这比夹住在中国人堆里问长问短,査职业,看家底好得多了。鲁迅也为此稍稍放心,因此满意地租了下来。到三月六日的日记中,鲁迅写着:"下午访维宁,以堇花壹盆赠其夫人。"是含有祝贺新居之意的,这堇花是三月三日内山夫人送来,鲁迅以之"借花敬佛"的。

意气相投的人,见面总不嫌多,路远也觉得近了,真可谓"天涯若比邻"。这回秋白夫妇搬到同属北四川路底的东照里,相隔不远,许多日常生活之需,也就由我代劳,而鲁迅也早晚过从甚密。他们房里布置得俨然家庭模样,鲁迅写的用洛文署名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一副对秋白亦即对党的倾注心情,用两句"何瓦琴语"道出其胸怀的对联也挂起来了。到四月十一日,我们的家搬到大陆新村之后,就过往更其频繁,有时晚间,秋白同志也来倾谈一番。老实说,我们

感觉少不了这样的朋友。这样具有正义感、具有真理的光芒照射着人们的人,我们时刻也不愿离开!有时晚间附近面包店烤好热烘烘的面包时,我们往往趁热送去,借此亲炙一番,看到他们平安无事了,这一天也就睡得更香甜安稳了。

从三月五日写《王道诗话》起,秋白同志因有一时的比较安定的生活,所以在短短时期以内,就写作了许多精美的杂文,计有:

三月七日 《伸冤》
三月九日 《曲的解放》
三月十四日 《迎头经》
三月二十二日 《出卖灵魂的秘诀》
三月三十日 《最艺术的国家》
四月十一日 《关于女人》
四月十一日 《真假堂·吉诃德》
四月十一日 《内外》
四月十一日 《透底》
四月二十四日 《大观园的人才》

以上是用鲁迅名义发表的秋白同志所写的文章,从日期看(文末的日期,都是在写完后秋白同志自己签出的),如果没有丰富的生活知识、深厚的文学修养和高度的理论水平,哪能在短短的时期以内,有如是丰富而精美的文字见之于世?特别是《关于女人》等几篇文章,能在同一天里写作出来,真使人感到秋白同志的革命才华,足令我们人民感到骄傲,令敌人为之丧胆。他为革命文学的威力增加了不少分量。

这些文章,大抵是秋白同志这样创作的: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他下笔很迅速,住在我们家里时,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好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来看。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无伦。而他所写的这些文章,又是那么义正辞严地揭露了敌人

的卑鄙无耻行径,足使敌人为之胆寒。这只要一看他在一九三三年骂那些卖国贼、汉奸、帝国主义的奴才如蒋介石、汪精卫、胡适等辈的文章,是多么一针见血,击中敌人的要害,就知道秋白同志对这一撮国家民族的败类,是洞察得多么仔细,揭露得多么深刻,掊击得多么沉重!

第三次秋白夫妇来我家避难,是在搬出东照里之后的一九三三年七月下半月。那次因为机关被敌人发觉,约在深夜二时左右,我们连鲁迅在内都睡下了。忽然听到前面大门(向来出入走后门)不平常的声音敲打得急而且响,必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鲁迅要去开门,我拦住了他以后自己去开,以为如果是敌人来逮捕的话,我先可以抵挡一阵。后来从门内听出声音是秋白同志,这才开门,见他夹着一个小衣包,仓卒走来。他刚刚来了不久,敲后门的声音又迅速而急迫地送到我们耳里,我们想:这次糟了,莫非是敌人跟踪而来?还是由我先下楼去探听动静,这回却是杨大姐不期而遇地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别的同志的小姑娘一同进来,原来是一场虚惊。但东邻住着的日本人和西邻住着的白俄巡捕都开窗探望这不寻常的事件,我们代秋白夫妇担心也不是偶然的了。

革命者为了人民的利益贡献一切,连自己的生命在内。而当时白色恐怖弥漫空际,革命组织被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日有数起。敌人的网撒得越宽、越密,我们钻网的法子也就越多、越精。新生的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最后胜利必属于革命人民方面,这是肯定不移的。然而,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有些牺牲也是在所难免的,不然怎么叫做革命!秋白同志对这个道理是比谁都清楚的,当其住在东照里亭子间,过着艰苦的生活,并且扶着病体坚持工作时,就连不需钱买的太阳光也照不到,这对有着肺病的瞿秋白同志是很不利的。杨大姐由于对革命、对同志的关怀,不由己地常常希望他能有机会见到阳光。我们当然欢迎他们多来。但秋白同志却很泰然地自慰道:只要想一想革命者随时有入狱的可能,那时什么也不能做,更不用说见到阳光!住在外面无论如何总比里面(入狱)强到百倍不止。这是多么伟大的革命胸怀,多么崇高的革命品格。

一九三四年一月初,秋白同志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临行前曾到鲁迅寓所叙别。这一次,鲁迅特别表示惜别之情,自动向我提出要让床铺给秋白同志安睡,自己宁可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

觉得这样才能使自己稍尽无限友情于万一。走后常常挂念秋白同志是否已经到达苏区，常常挂念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胜利。后来突然接到一封从福建的来信，是秋白同志不幸被敌所俘了，起先他冒为医生，还能遮瞒一阵子，他写信来要求接济。但终于被敌人认出来了，他就毫不掩饰，在刑场上高呼"为革命而牺牲，是人生最大的光荣"，慷慨就义，英勇捐躯。

当初鲁迅收到信以后，就极力设法，从各方面筹资营救。一九三五年七月三十日曾致函当时的《译文》编者："Pavlenko 作的《关于莱芒托夫的小说》，急于换几个钱，不知可入三卷一期否？此篇约三万字，插图四幅。"八月九日又驰书《译文》编者："莱芒小说，目的是在速得一点稿费，所以最好是编入三卷一期，至于出单行本与否，倒不要紧。"秋白同志在罗汉岭前就义是六月十八日，由于消息的阻塞，鲁迅一时得不到信息，所以在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九日还在设法筹资，但后来得到了确信，知道秋白同志已经为党捐躯，为人民革命事业流尽了他最后的一滴血，所以在九月八日带着无限沉痛的心情写信给《译文》编者说："陈节译的各种，如页数已够，我看不必排进去了，因为已经并不急于要钱"。信内提到的译稿，都是存在鲁迅手中的秋白同志的译作，但因为《译文》三卷一期的要目广告中，已经把《关于莱芒托夫的小说》一文登出来了。鲁迅又考虑还是不要使刊物受到影响，因此九月十六日，又致函《译文》编者云："如来得及，则第十三篇，关于 L 的小说可以登在最后，因为此稿已经可以无须稿费"(以上均见《鲁迅书简》:《致黄源信》)。秋白同志被俘及逝世以后，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甚至连执笔写字也振作不起来了，他感到这是自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地未能完成为亲密战友服务的心愿。他在致曹靖华同志的信中曾经提到："它事(秋白被俘——作者)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见《鲁迅全集》:卷十，七十九页)。直到一九三六年他自己临终的前几天，这种悲痛还在袭击他的心灵，十月十五日，在和别人的通信中他还这样提到："'现实'中的论文，……原是属于'难懂'这一类的。但译这类文章，能如史铁儿(秋白同志的笔名——作者)之清楚者，中国尚无第二人，单是为此，就觉得他死得可惜"(见《鲁迅全集》:卷十，三百〇四页)。秋白与鲁迅之间，其友情真可谓深厚无与伦比了。

人们因为鲁迅怀念秋白同志惨遭敌人毒害，曾扶病编辑秋白同志译文，托内山先生寄到日本印成了两卷精美的《海上述林》，因而对鲁迅忠于朋友，忠于革命这一品格，给予崇高估价，这当然是对的。但其实，这不止鲁迅一人之力。秋白同志被俘之后，进步的朋友们已有这个愿望。噩耗传来不久，几个秋白同志的友好就暗地集合在郑振铎先生家里，哀悼这位杰出的、不屈的英勇战士的惨遭牺牲。当时就商议给他出书、传布，以教育人民，扩大革命影响。于是几个朋友商议集款，动手工作。关于从排字到打制纸版，归某几个人出资托开明书店办理，其余从编辑、校对、设计封面、装帧、题签、拟定广告及购买纸张、印刷、装订等项工作，则都由鲁迅经办，以便使书籍更臻于完美。出书后照捐款多少作比例赠书一或二部作纪念，人名我已经说不清了。好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存有一张第一卷《海上述林》的送书名单，是鲁迅亲手写下照送的。下卷出书，鲁迅已看不到了，我是依照上卷分送出去的。

所以鲁迅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和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写给曹靖华的信中说："它兄文稿，很有几个人要把它集起来，但我们尚未商量。""它嫂（指杨之华同志——作者）已有信来，到了那边了。我们正在为它兄印一译述文字的集子。"（以上两引见《鲁迅全集》：卷十，八十页及八十三页）

这里先说是"文稿"，为什么后来却说只"印一译述文字的集子"呢？原来"商量"的结果，认为创作方面含有思想性、政治性的文字，一时恐怕难得齐全，尽管存在鲁迅手头有较多的文稿，主要是须尊重党的意见，要党来作最后决定，所以就暂定只出翻译以为纪念。鲁迅在他临逝世的前几天，曾在写给别人信中清楚地说道：

> 《述林》是纪念的意义居多，所以竭力保存原样，译名不加统一，原文也不注了，有些错处，我也并不改正——让将来中国的公谟学院来办吧。
>
> ——《鲁迅全集》：卷十，三〇五页

当时，为了向敌人示威，表示"人给你杀掉了，但作品是杀不掉的"，秋白同志的友好便赶印烈士的译述文字，这是十分迫切需要的，但这时

鲁迅坚决主张暂时不印烈士关于创作方面的文字，留待党作决定(自己慎密地保存着秋白较多的底稿)。而且就在译述文字中间稍微"有些错处"，自己也不加以"改正"，表示要留给"将来中国的公谟(康谟尼斯，即共产主义——作者)学院来办"，即到革命胜利以后，由党所领导的文化机关去审定烈士的文集。现在，鲁迅的这一愿望终于得到了实现。革命胜利了，友人们"像捏着一团火"似地保存下来的瞿氏著作，已经全由国家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就不但满足了读者的要求，扩大了革命影响，而且也可以告慰秋白和鲁迅于九泉之下：秋白同志的文稿，已经妥善地交给党和人民，并且早已获得广泛的流传了。

鲁迅不敢私自决定先印创作的态度，充分显示出他对党的尊重，对革命的尊重，对为革命而牺牲者的尊重：一切由"将来中国的公谟学院来办"。就是先印翻译也不加改变，把决定的"权"归给党，哪怕是小小的改动也不例外。写到这里，充分觉得鲁迅服从党的精神，绝对相信党，肯定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必然在不远的将来获得胜利！一切交给党，听命于党，这就是非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鲁迅给后人留下的一个必须遵照的范例。

(《鲁迅回忆录·十一》)

鲁迅手迹和藏书的经过

鲁迅藏书目录，现在由鲁迅博物馆整理出来了。其中绝大部分为鲁迅自己收藏的：有北京存的约一小半，上海存的约一大部分。其所以合而为一于北京的原因是：北方天气比较干燥，易于保存，而且有些日文书如《书道全集》或其他全集的书，前半部已在北京，后半部陆续在上海购得，以合并更为完整。但上海亦留有少许亲笔稿如《毁灭》，鲁迅自己编好的苏联木刻版画等及零星残缺书本，则是整理北运时留下的。亦有特意留在上海的，如《广辞林》、《标准汉译外国人名地名表》、《新独和辞典》、《实用英汉汉英辞典》、《三省堂标准英日辞典》、《袖珍英日辞典》等，则因陈列案头，经常为鲁迅日夕摩挲必不可缺的参考书，故仍留原处。就我个人所知，现在略为介绍其他情况，从此亦可见鲁迅藏书经过的梗概了。

鲁迅生平酷爱书籍，甚于一切身外之物，偶有尘污，必加揩拭净尽而后快。如手边没有擦布，随即拿衣袖清除亦所不惜。珍藏之书，则必力求没有损坏。每当期刊书籍出版，必先选出二份保存。若是向市购书，亦必挑选善本珍藏，偶或有所污损，则宁可作临时披览，另行置备储存，即属赠阅的书，如早期《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莽原》等期刊，或后期出版的《奔流》、《萌芽》、《译文》等，都是集几册为一包，亲自包扎好了，写出书名、册数妥为保存。凡经他亲手包扎的，必整齐如一，扎书的线，也必选择胶质，以其形扁不占面积，线结必在边头，以免在书中日久压成结痕，有损书的原状，这是我长期看到，毫不例外的。我之所以这样叙述经过，是为了对照后来情况，俾使了解真相而已。

说到藏书，据我所知，有如下几方面：

（一）手迹方面：除现在搜集存得之外，有些零星稿件，如整理《古小说钩沉》的片段抄录等，是周作人交出的，但是据了解，早期鲁迅未搬出八道湾前，必有不少手迹留在彼处，除由他随手送人外，不知是否业已清理完了一齐交出。

（二）藏书方面：据鲁迅说，有些线装明版或更早的版本，原是从绍兴老家带出来的。一九二四年六月从八道湾搬到西三条胡同定居的时候，鲁迅曾回去搬书，虽经周作人“殴打”拦阻，终取书器而去（见一九二四年日记）。鲁迅死后，周作人借口家人生活困难，把鲁迅所藏中、外文书籍整理出三册书目，交由来薰阁向南方兜售。书目到南京，被敌伪某汉奸看到，说全部都要，后来我在上海得知此事，托人借来书目一观，大惊失色，觉为有意毁灭藏书，因急忙辗转托人买下全部书籍。待上海买去全部藏书的消息传到周作人处，据说他又把书目列出的书，扣起一部分，仍照全书原价售卖，其自私之心，灼然可见。此藏书几乎未流入敌人之手致大量损失，亦云幸矣！

一九四六年日伪投降后，我曾来京一月，日日在西三条整理鲁迅藏书，一一重新包装好才去。这其间，据看守的人说，因屋漏雨湿了书，曾经把漏湿的线装书拿到西四地摊上卖出。问是什么书，书有若干，也说不出。另外，在鲁迅住的老虎尾巴寝室，鲁迅不在京时，也被人借住过，他们随便拿鲁迅包藏好的《小说月报》等书观看。我整理书时，就看到原包已拆开，短了几册，不是鲁迅生前完整无缺的了。就此情况，深恐鲁迅亲笔文件难保，因将手抄的书及整理的汉魏六朝碑文墓志稿和被鼠咬坏的画纸带回上海（现都存博物馆）。计藏书经雨漏和借住的人丢弃，又短失了一部分。

后来，北京家中人先后逝世，国民党反动统治日益加厉，我不便回京料理，曾托刘清扬、吴昱恒等将鲁迅住过的北屋连同书籍贴了封条及加锁起来，不料住在南屋的阮和森竟从后门破开封条居住进去。待解放后在京检查存书时，发现一九三一年鲁迅从上海寄回之八箱书，有一箱半已失去了原书，另以赵㧑叔的《悲庵剩墨》线装书的空木箱填入，又把线装书盗去。失去的一箱半书中有不易觅得之期刊如《奔流》、《萌芽》等，亦因此不完整了。我为了觅回不易找寻之书，曾经去信给阮家，

一直未得到答复，这藏书又短少了一部分。

以上所说，是历来鲁迅藏书经过，几经波折，复遭人为的损毁。回想鲁迅生前视书如命的宝爱情况，能不令人深为叹息？文人的书，就如同武士的宝剑，时刻不能舍弃，因为借它画出敌人的奸邪，借它量度敌人的作恶程度。而且鲁迅藏书点滴得来不易，有为朋友馈赠可作纪念的，有为几十年的精力亲自陆续搜求的。他没有阔人延聘南北专人坐镇罗致善本的威力，仅凭个人足迹所及，即节衣缩食买来，如到厦门、广州、杭州，便即往书肆找寻，往往坊间绝迹之书，如广雅书局出版的杂著，亦必托人买来。未出北京前，每有日文图书，亦由书店挑选送到。在上海，月必大量添购书籍。在上海时谭隐庐之书和中国书店之目录，固然以之仔细寻找其爱读物，即《嘉业堂丛书》不在上海出售，亦必辗转托人购置。其或属线装书因孤本难得，或因经济所限，一时未能购齐，则不惜亲自手抄或加意装订，都费去不少精力，阅之较坊间所出更觉精美，亦可见其珍爱藏书之一斑了。此外，法国出版的木刻版画，收到时发现有不全的，亦必再三托人向旧书肆高价搜求寄来。但国外过时的书，是不易觅得的，鲁迅藏书中居然能完整无缺地集成一套，确属不易，第二次大战后，闻法国亦无存此成套木刻书的了。又《城与年》插画本，曹靖华后来亦遍向苏联找寻不到，鲁迅藏书中却幸存一册，为中苏人民的友谊增一佳话。

所可惜的是：《鲁迅日记》第十一本（一九二二年）在日军占领上海时丢失了，当时日本宪兵队作为我犯罪的证件和我一同带去了一批《鲁迅日记》（原存保险箱内，因取出拟陆续抄出副本所致），待释放时一检查，即发现失去这十一年全年的一份日记，托人去寻，亦渺无音讯。文运遭劫，可为浩叹。还幸日军入我室时，三楼藏书被女工伪称该楼已租给别人了而未遭搜劫净尽。鲁迅在沪藏存的一大部分书籍得以留存下来，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解放后，在党领导下，文化部及鲁迅博物馆不遗余力，多方面向各界呼吁搜罗。热心这一事业的人士，多献出其珍藏有关鲁迅的手迹、书信、文稿。如书已流入私人之手，像赵万里存的一大批，亦经博物馆议价收回。

感谢党，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化私为公，各献所藏，才能使博物

馆保存下丰富的文化遗产，公之于众。我相信，随着人民的社会主义思想逐步提高，流散在私人之手的鲁迅手稿、书信、图书必能逐渐集中起来，日臻完整，日益美善。今后在党的亲切关怀领导下，鲁迅的手迹和藏书一定会妥善地珍藏在鲁迅博物馆中，作为宝贵的革命文化遗产，垂之永久！

（1961年12月20日《图书馆》第4期）

景云深处是吾家

回忆实是苦恼的事，因为事隔多年，脑海的印象自然就会模糊起来，免不得要做一番研究工作。

我于九月十七日收到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一封信，询问鲁迅在景云里曾住过几处房间，搬过几次场等。纪念馆同人一向积极负责，留心各项有关纪念事迹，严肃细致地考核历史事实，不遗余力。这次既承垂问，不敢潦草塞责。于是一面向各方亲友邻居仔细探听，有无一些唤起记忆、可资参考的材料；更其重要的是向周建人夫妇请教，因为一切经手事项都是烦劳他们的。凑巧九月底我随人大代表团去越南，直至十月中旬才回到北京。当时就看到周建人夫妇在九月三十日从杭州发来的一封信，答复和我的记忆是一致的。这才去掉了一切怀疑。

周建人夫妇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你们第一次住在景云里石库门的朝南房子第二排的最后一幢，与大兴坊接连，是二十三号；第二次住在同一排的第二幢，是十八号；第三次住在同一排的第一幢，是十七号，可是出入在十八号。"

住在景云里的时候，是有一些小小情节可资记忆的。但因事非重要，写回忆录时就略去了。如今既然有人关心，不妨写些出来，聊供研究之助。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和我初到上海，住在共和旅店内，建人先生天天来陪伴。旅店不是长久居住之处，乃与建人先生商议，拟觅一暂时栖身之所。恰巧建人先生因在商务印书馆作编辑工作，住在宝山路附近的景云里内，那里还有余房可赁。而当时文化人住在此地的如茅盾、

叶绍钧(当时一般用此名),还有许多人等,都云集在这里,颇不寂寞。于是我们就在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八日,从共和旅店迁入景云里第二弄的最末一家二十三号居住了(后来让给柔石等人居住)。

鲁迅在广东遭遇一九二七年的"清党"之后,惊魂甫定,来到了上海,心里是走着瞧,原没有定居下来的念头的,因自厦门到广州,他如处于惊涛骇浪中,原不敢设想久居的。所以购置家具,每人仅止一床、一桌、二椅等便算足备了。没有用工人,吃饭也和建人先生以及他的同事们在一起。

景云里的二十三号前门,紧对着茅盾先生的后门,但我们搬进去时,他已经因国民党的压迫到日本去了。留在他家中的,还有他的母亲和夫人及子女等人,好在叶绍钧先生住在近旁可以照应。再稍远处,还有建人先生等一批长久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在这许多熟人环绕之中,我们就暂作安身之所了。

不料有一天,忽然砰砰枪声接连不断。我们只好蛰居斗室,听候究竟。事后了解,才晓得有一"肉票",被关在弄内,后为警察发觉,绑匪企图抵抗,就窜到汽车房的平台上,作居高临下的伏击。在射击时,流弹还打穿二十三号的一扇玻璃窗,圆圆的一个小洞,煞是厉害。结果自然警察得胜,绑匪陈尸阳台,可见当时景云里是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的。鲁迅也未能安居,住在景云里二弄末尾二十三号时,隔邻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竟夜行人,有唱京戏的,有吵架的,声喧嘈闹,颇以为苦。加之隔邻住户,平时搓麻将的声音,每每于兴发时,把牌重重敲在红木桌面上。静夜深思,被这意外的惊堂木式的敲击声和高声狂笑所纷扰,辄使鲁迅掷笔长叹,无可奈何,尤其可厌的是在夏天,这些高邻要乘凉,而牌兴又大发,于是径直把桌子搬到石库门内,迫使鲁迅竟夜听他们的拍拍之声,真是苦不堪言的了。

自从我们搬到二十三号之后不久,鲁迅又向建人先生建议,两家合伙烧饭,以免和同事们一起诸多不便,一切柴、米、油、盐等杂务,托王蕴如同志的一位亲戚兼管,就在二十三号楼下煮食。我们的后门,紧对着一位鼎鼎大名的奚亚夫,挂有大律师的招牌。他家中有十四五岁的顽童,我们通常走前门,哪里招惹着他们呢?但因早晚在厨房煮饭,并带领建人先生的小孩,因此被顽童无事生非地乘煮食时丢进石头、沙泥,

影响到小孩的安全和食物的清洁。鲁迅几经忍耐,才不得已地向之婉言。不料律师家的气焰更甚,顽童在二十三号后门上做那时上海流氓最可鄙的行为:画白粉笔的大乌龟,并向我们的后门撒尿。理论既不生效,控告岂是律师之敌,这时,刚好弄内十八号有空屋,于是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移居到十八号内,并约建人先生全家从一弄原来的住处搬在一起。计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在二十三号共住十一个月。古人云择邻相处,但当时的上海,无论如何择法,也很难达到自己的愿望。这是一段惨痛的回忆。

在十八号,鲁迅和建人先生怡怡相处了五个多月,深感建人先生相助之忱。蕴如同志在上海久居,一切事无大小,俱获她竭诚相助。鲁迅在这个时期,算是和兄弟怡怡相聚、朝夕相处的最快活的日子了。

忽然,听说隔邻十七号又空起来了,鲁迅欢喜它朝南又兼朝东,因为它两面见到太阳,是在弄内的第一家,于是商议结果,又租了下来。当时正在粉刷,并拟在十七——十八号之间,打通一木门,为图两家往来方便,就从十八号出入,正在计划之下,十七号因还没人搬进去,被偷儿乘隙破门守候了一夜,准备来到我家行窃,我们却毫无所知。鲁迅因夜眠甚迟,有时开亮后楼的灯,去烧水煮茶;有时开亭子间的灯,去如厕;这样竟夜之间,陆续不断,四处通明。到了三时以后,鲁迅正在临睡前漱口,偷儿却以为是人起床了,动手不得,大忿之下,撒满楼梯的粪便,失意离去,而我们却安然无恙。事后,鲁迅笑着说:"他对我一点也没有办法,只好撤退了。"

一九二九年二月,鲁迅参加了"自由大同盟",这时我们虽然搬到十七号内,但是风声紧迫,对鲁迅不利。我们在这里虽生育抚养了孩子,然而当孩子半岁,鲁迅的全部牙齿肿痛,陆续拔掉的时候,却避居到内山书店去了。当我们搬到十七号住的时候,厨房是空着不用的,出入活动,一切集中在十八号内。十七号厨房刚好就存放了一大堆木柴,等待干燥时好用。那律师家的顽童,眼见这情景,乘我们的疏忽,没有关上窗户,夜里却偷偷丢进满是煤油浸透的引火纸头,意想引起火灾。次早一看,却幸而熄灭在地,大律师的威焰,可算给我们吃尽苦头了。

因为政治上的压迫,屡次避居,内山先生也为之不安起来。到一九三〇年五月,才由内山先生介绍,又搬到北四川路楼寓里去。到了"一·

二八”，日本军国主义者蹂躏了上海，景云里陷入火线中，周建人先生住的房子，他楼上的眠床，直穿炮弹。幸而他躲在楼下，才免于危险。但日本军队如狼似虎地到处捉人，看见了他，就加以拘留，经过鲁迅托内山先生去查询才得放出来和家人相见。可是景云里还拘着不少的人，有一家还有人被打死，有一家灶被毁坏，扔了不少脏东西。景云里当时遭到这样浩劫，是因为在宝山路附近，正是战火绵延的地段，所以现在若去查考旧迹，是否一切如故呢？我是不敢确定了。

至于鲁迅日记所载的门牌号数，可能有笔误。因为我记忆的门的样子和周建人先生他们说的完全一致，和王士菁编的《鲁迅传》也一点不差。想来旧痕还在，不致错误的了。

(1962年11月21日《文汇报》)

回忆鲁迅在广州的时候

鲁迅经过五卅、三一八惨案之后，对于黑暗统治着的北洋军阀下的生活，感觉厌恶，对于蓬勃发展，朝气怡人的南方，感到吸引。那时，厦门大学既非官方统治，总算接近一步革命了，所以欣然南下。但是厦门大学的乌烟瘴气，怀着美丽的憧憬的鲁迅，触到现实而粉碎了。于是原想由二年教课而缩短到不及半年即离去了。

从厦门来的时候，有好几个学生随鲁迅同来，除了那位廖立峨之外，还有一位姓谢的，似乎名郁生①，湖南人，同来后不久回去了。鲁迅一直怀念他，因为从此不知音讯，鲁迅想可能为革命牺牲了，不然总会有消息的。因为以他的不妥协的性格，以他的大无畏精神，以他的湖南人的品格，是会走向那一条道路的。怀念是令人忧抑的，而况是生死不明，而况是在这大时代里，革命的人才难得！就这样，痛尝怀念之果使鲁迅每一回忆起来就加深一层惆怅！

鲁迅初到广州时，曾有一位不相识的基督徒来中大再三邀请到香港去讲演，就是讲那《无声的中国》的一次，原先是邀去作一次讲演的，因为听的人多，后来又要求在第二天再做一次讲演，地点都是青年会。在轮船去香港的时候，同船一位陌生的中山县姓何似经商的人②，很替鲁迅担心，因此谆谆劝阻了许多时候，说人地生疏，一言不善，怕有什么风险，最后表示，倘有不妥，即找他设法，并留下地址而别。这种出于善意的爱护，是很难得的，于此，布置会场在青年会是看来比较妥当的了。

---

① 应为谢玉生。

② 按鲁迅在《略谈香港》一文中说是船员。

黄埔军校，那个曾一度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领导着学生前进的学校，鲁迅也曾寄予希望，他认为孙中山革命的屡屡失败是因为自己不掌握军队（见《两地书》），看到黄埔军校由革命的共产党在掌握，体现"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精神，是多么鼓舞着他，所以鲁迅也曾亲自到该校作报告。可是在他回来的时候，却遇到孔祥熙，硬自邀请到他家内吃饭，并且吹嘘说：这炊事员是给中山先生做过菜的。想不到中山先生用过的炊事员，这时也名贵起来，要拿他做招牌来为孔家店招徕生意，来给那位仅仅连中山皮毛也学不上的人做遮羞品。

鲁迅到广州是一九二六年底①，那时的中大是五人小组负责管理，但正当统师北上，大军进到武汉的时候，许多人都北上去了，留下那位反动的朱家骅在单独负责。鲁迅是在这种情景下到了中大。

我带领诸君往左走，是刚到中大的大会上听到一位负责人讲的话。学生们向左转的仿佛也真有些人。而且刚来就有人推测鲁迅的态度，《鲁迅先生往那里躲》的文章也见到了，川流不息的来访者中不但有左，而且有中、右分子，而且来访者的不客气也使鲁迅生气，检查到鲁迅在做什么工作，检查到鲁迅的来往通讯，这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而鲁迅还是那么忠厚，以为搬开中大，日间只来教书，即可避免许多干扰。

那时候鲁迅是中大教务主任②，文科院长是傅斯年③，以教务主任身份，免不了有时与朱家骅接触，但却奇怪，每一次到朱处都见文科院长傅斯年先在，不知为掩饰他的诡秘行动，抑为掩饰他的吹拍技术，他在这样的多次遭遇之后向鲁迅先生解释地说："他那里（指朱）的茶好，我常常去饮茶的。"鲁迅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遇着这些卑鄙龌龊之辈，也唯有远远躲开才好，因此公事接触也怕跑到朱的面前了。

鲁迅到广州（一九二六年底）④ 的时候，正是国共还在合作，负责人又表示带领着学生往左走，总以为这里的气候（政治）比厦门大学好一

① 应为1927年初。

② 鲁迅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

③ 傅斯年任中大文科主任。

④ 鲁迅到广州是1927年1月18日。

些，光明一些，甚至还希望厦门大学的一些人转移到广州来。而事实是：广东中山大学里面就一党专政，并且这个“党”又远非本着中山先生的精神和实质的，一转眼间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抛在九霄云外的了。在四月十五日的清晨，看到在白云楼的对岸，土屋的店楼上似乎是工会的住所被查抄了，接着看到文件和人被带走了，这不平常的遭遇正在抖动着每一个正义的心。忽然，一个消息接着从我家老工人口里投送过来，说中大贴满墙上的标语，都是骂共产党，对周也不利，他叫老周（指鲁迅）赶快躲起来。鲁迅并没有听这善良人的警告，倒立刻起身跑到中大去。这时学生已有许多被捕了，在会议上鲁迅首先主张营救学生，那时朱家骅吐出嗜杀者的凶焰，说中大是“党校”，在“党校”的教职员应当服从“党”，不能有二志。这几句话把在场的人弄得哑口无言。鲁迅在这场合，看看不能扭转局势，即表示辞职，以表明抗议这种横蛮无理态度。

许寿裳，那位可尊敬的文科教授，在政治上始终与鲁迅合作，反对北洋军阀压迫学生时代，曾经一度表示与鲁迅一个态度，在鲁迅被伪教育部长章士钊免去佥事时曾一同辞职的。这回认为鲁迅所作所为也是合乎中国人民的要求的，看到鲁迅辞职了，他也一起辞去，表示抗议。

一样的辞职，反动的朱家骅采取两种不同的处理，对许立刻批准，对鲁迅则挽留。在他看来，许的地位不高，群众声望不及鲁迅，也要辞职表示抗议？就先向他不客气了。对鲁迅的挽留也不是真意，无非多留鲁迅几天在广州，不时有些侦探样的学生来访问罢了，另外还要造谣，说鲁迅逃跑了，不在广州了。这样搞得鲁迅去留两不是的时候，鲁迅一直呆在广州，到同年十月才离开去上海①。

在广州，从四月到十月这半年期间，鲁迅一直没担任教课，中大已辞职，许寿裳先生又早已回去（五、六月间）②，鲁迅除了写些北新通信，编些文集和给未名社写些稿，应付些不速之客，就这样地潜伏着，直到十月。因为来访的人很多，有慕名而来的，有聊闲天而来的，有借同乡关系而来的，有为求助而来的，总之不一，所以虽则潜伏，其实也未能做

① 应为9月底。

② 应为6月初。

到"潜"字，如果真有什么不客气的对待，那是很容易的。

但就在这期间，给了鲁迅的益处不小，他常常对就近的人说："我幸而离开北京。"这里面包含两种意思，一是脱离开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另一是离开北京，看到伟大的中国人民，还有中国共产党的真诚为国，眼界大了，希望也大了。同时在这伟大的无穷希望下，也还看到真有人吃人的境况，而这吃人者有的还是青年，他呼号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开始不相信进化论了，从广州开始救正他，既然不是青年人胜过老年人，那么，真理在那里？他开始探究，求索，知识分子的他，不是一下地彻悟过来的，由于血的事实所教训，在广州所遭遇的一切，不是亲身经历，耳闻目见，是很难深有体会的，所以他说"幸而离开了北京"是抱着得到宝贵的教训的意义的。

鲁迅在中大，除了担任教务主任外，还担任了些功课，《汉文学史纲要》这个课目是在厦门大学开始讲授的，这个课目为新编的，独具风格的，但可惜的是厦门只教过开头的几段就停止了，而中大也只不过教过那么短的时间，也就是限于厦门的一部分就遇到四月十五日拘捕学生，致学业不能继续，从此也没机会再教这门功课，因着别的工作关系，也未继续写完《汉文学史纲要》，作为他的创作的一部分未完稿是可惜的。

因为暂时无须编讲义，所以有空的时间就用在别的方面了。例如接见学生和青年，接触共产党方面的人物，他都很好地留出时间，但绝不向别人宣传，所以现时要查考他见过哪些人，是很不容易的，但从他的实生活上可以断定这一时期的他，是受了什么方面的鼓舞，得到了多少革命力量的启发，是难以计量的。

双门底的旧书店和广雅书局的线装本固然吸引过鲁迅，然而更加具有吸引力的却是丁卜书店的新作品，带有理论性的读物给予他以新的力量，从而辨明了是非邪正所在。

作为文艺性的读物，广州青年这方面却大感缺乏，鲁迅为填补这一缺憾，经过一位青年朋友的帮助，在芳草街的一个楼上借租下来，在当时还流通不到南方的鲁迅作品以及未名社的一些作品，陆续寄到这里出售，大约经过三四个月的时间，即随着鲁迅在中大的辞职而停止营业

了[1]。

这一时期的最可惜的一件事，就是他到广州时郭沫若先生已去武汉了，二人未能相见，“在广州见到郭先生，结成统一战线”的心愿终未实现，造成许多兴风作浪的人们幻想的鲁迅与郭沫若之争的文坛消息家的无谓呻吟，“是亦不可以已乎”！假使郭未北上，二人终能相见，则必佳话连篇，给战斗增多少力量，给文化界添无限美景了。

（《鲁迅回忆录》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

① 北新书屋3月开张，8月停业，为期五个月。

鲁迅先生生平事迹创作准备会

——许广平答画家问座谈会记录

日期: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地址:上海美协

陈烟桥:许先生最近来上海,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创作上可得到很多帮助。今日特地请许先生来参加这次会议,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可先提出来,然后请许先生答复。

许广平:随问随答呢,还是总的答复?总的答复恐怕我记性不好,还是随问随答比较好些。

丁　浩:我画的是民权保障同盟会上的一幅,不知当时许先生有否参加?地点在何处?具体的活动情况怎样?杨杏佛被刺后鲁迅先生参加丧殓时的具体思想情况有什么反映?

许广平:这次民保同盟会我没有参加,所以不知道详细情况,金仲华先生参加的,向他去问问就可明白了。

丁　浩:鲁迅先生平时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拿不拿手杖?穿什么鞋子?身材高低怎样?

许广平:平时常穿深灰和黑色的,夏天穿白的,从来不拿手杖,常穿胶鞋。这是在厦门以后才这样,因喜爱它轻便。在家时则穿拖鞋。身材比陈烟桥同志矮些。

张充仁:在欧洲描写历史人物不一定把人物的高度如实地画出来,我们画时不妨魁梧些。

许广平:家里人说他小时长得又矮又胖,很结实。广东石湾窑的像是右手拿书,其实他平时是左手拿书的。抬着头走路的姿势也不对。他走路姿势不算美,直板板的,还有坐着或写作时都一样。头正背直,总的说来是方方正正,稳重有力。书本之类是包起来的,从来不散开地拿。

张充仁:鲁迅先生在回家时是不是常买些东西?

许广平:平时不买的,自有了小孩之后,才买些东西带回来。

陈秋草:石湾的像高度太长些,头显得很小,不知神气和形象如何?

许广平:平时没有这样神气,形象也不像本人。

张充仁:平时坐的时候有何种习惯?

许广平:是方方正正的,从来不交叉叠起双腿。

钱大昕:平时谈话或演讲的时候的形态怎样?

许广平:在给我们上课讲话的时候很活跃,喜欢走动,不是呆板的。有时也在黑板上写些字,但不多。当他讲的生动时引得学生们都笑了,但他不笑。平时和朋友谈得投机时他也笑的,笑得很响亮、开朗,三间屋子都听到。

张隆基:关于自由大同盟的情况如何?

许广平:我不知道,他和杨杏佛等谈事情常在外面,如在家里谈时,也把我支开的。

张隆基:鲁迅先生平时戴什么帽子?

许广平:平时出去戴呢帽,夏天则戴草帽,在家时不戴。

钱大昕:准备出去演讲是带稿纸?

许广平:演讲从来不带稿子,都是腹稿。

邵克萍:鲁迅先生小的时候喜戴帽子否?

许广平:不知道。

陈秋草:在"花园庄"避难的情况如何,多少日子?

许广平:"花园庄"是一个旅馆,在北四川路底,日本海陆军官日里常在里面办公,我们住在后院洗澡室的旁边一间,大约有一个多月,院子里很杂乱,平时是开门的。

陈秋草:那时常来看望鲁迅先生的是哪几位朋友?

许广平:仅内山、周建人等很少几个,一般朋友都不知道。

张充仁：吕班路五十庆寿会时许先生去否？到的有多少人？

许广平：到的只有二、三十人，因为大家经济困难，要凑钱的。田汉带来的一批人听说要付钱就走了。到的有冯雪峰、潘有声、董秋斯等，都记不清了。

钱大昕：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著的《关于鲁迅》里，这事有描写的。

哈琼文：陈赓将军来先生家并吃过饭，不知当时情况怎样？

许广平：陈赓与鲁迅那时谈了一下午，谈些什么我不知道。那时海婴恰巧病着，我要照顾他，有的东西不能吃，所以我们请陈吃晚饭时把厨房门关起来，一边烧，一边吃，吃了晚饭后就走的。

钱大昕：请许先生多介绍些关于鲁迅先生平时的举动、习惯爱好等情况。

许广平：平常一般人两眼之间的宽度等于一只眼的宽度，鲁迅的照片上看起来也差不多，有的塑像超出了这个宽度就不像了。鼻子很直，鼻孔很大，生病时拍的照片瘦了些，不十分像。以前我见到一个鲁迅遗容的浮雕，雕得很像。他的耳朵大，是一直大到下面，下面不是尖的。有的画因强调胡须，往往易把嘴搞得过大，像漫画。眼睛稍小些，不过很有精神，眉毛一字形，并不向下弯。各位画时参考平时的照片较好，病时的不好。像烟桥同志搞的一张木刻脸上的皱纹太多了，像农村中的劳动人民。鲁迅的皱纹不太多，是中年人的形象。他平时常接近青年人，反对老气横秋，高兴时就笑，不高兴时则一声不响坐着。他的头发很硬，朝上竖起来，病后稀些了。嘴内装有假牙。后面最下的一段头发向上倒生，看起来很厚，方形的。

胡若思：我和烟桥同志搞一幅鲁迅和瞿秋白，不知瞿秋白平时住在何处，与鲁迅先生常在何处谈话？

许广平：瞿秋白住在四川北路底的一个公寓里面，房间中间有一只写字台，他们常对面坐着谈。鲁迅多数是到他那里去谈话，有时也到我家里来谈。

陈秋草："花园庄"在什么路、几号门牌、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许广平："花园庄"是一个旅馆，路和号也忘了。

陈烟桥：左联开成立会时，许先生在不在？

许广平：不在。

赵延年：鲁迅先生平时走路的姿态和穿的是什么裤？帽子戴得高低如何？

许广平：他走路时两脚是八字形的，脚背很厚，并不因人瘦而薄。夏天穿中式单裤，冬天里面穿卫生裤，外面罩一条西装裤。外面长衫比裤稍短。四十五岁以前在北京时裤腿扎起来的。回家后总是把长裤脱掉。帽子戴得较低，袜子多数是穿灰色的。西装裤常是灰色的。他对穿着不太讲究。

陈烟桥：请先生介绍些鲁迅先生的工作情况。

许广平：一般十一、二点钟醒来，习惯在床上抽几根烟。在北京时就这样一边抽烟一边看报。在上海时因有帐子，就把帐子撩起来坐着想。起床后，一般不吃早饭，不一定洗脸就工作了，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吃些，不给他也不要吃，这样一直工作到晚上，往往吃一小杯酒才吃饭，深夜再吃些零食之类。平时吃了午饭常到内山书店，大约三、四小时回来。吃饭后和小孩玩，孩子睡后仍是写作，写得累了就靠在藤椅上休息一会儿，有时也谈话，谈得高兴时就不写了。这样一直写到二、三点，有时到天亮，那时我已起来，就给他弄些吃的（一般是鸡蛋之类），之后才睡。

有时也看电影，喜看各地风俗习惯的影片。对一部描写五十年后新时代的影片感到讨厌。

他对写作是有计划的，何时创作，何时翻译。多余的时间就写散文。有时来了客人，影响写作，他也感到着急。有时早晨也写作，会朋友一般是到内山书店去。

我们住的房子是由内山书店出面租下作为职员宿舍，我们房租付给内山书店，再由内山书店付给房东，所以在上海户口找不到鲁迅的名字，直到死后才知道。

对报刊不细看，就这样翻翻，需要的稍看看。记忆力很强，有一次要我找一个材料，我找来找去找不到，后来他说在那里一本，第几页，这样就找到。

写文章先想好腹稿才动笔，所以稿纸很干净。全靠记忆力，不随便拿笔就写，总是先躺在椅上抽烟，眼朝远望，这样我

知道他打腹稿,不去打搅他。

对于骂他的文章也不大看,并不把它放在心上,等到骂他的文章太多了,才总结一下,但并不以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曾对我说:不要把人变得小。意思即要有修养。

休息时喜欢研究美术作品,直到临死仍如此。大病时对木刻之类看得很有味,罗丹的一本雕刻看得很久,也研究身体的线条,这些美术品现在都在北京纪念馆。他以研究美术作为陶养性情的。他批评木刻家的作品是经过一番思考的。现在我国木刻进步很大,那时是启蒙时期,他的批评是有一定帮助的。

中国文字是从画改进而成的,整理中国文字连带也研究画。他研究工作是多方面的,连环画、年画也收集的,如《老鼠出嫁》等。西洋的十六、十八世纪图案、浮雕也研究,以丰富他对美术的修养。

平时习惯用毛笔,不用钢笔。

瞿秋白大陆新村很少来,他是住在四川北路底的一间房子,我家二楼的一间也给他住过。鲁迅的心情是让作客的革命家过得安静些,所以自己宁愿睡地板,把床让给秋白睡。我们没有沙发,与秋白谈话时,二人对面坐着,中间放着一张台子,没有写字台就在二个书箱上面放一块板。写字台上放的不过是砚台和书,其它没有什么摆设,此外就是老式的台灯。没有台布。秋白也抽烟的,鲁迅吃茶很浓。

今天早上我看见陈市长,还谈起鲁迅并不去记个人的私仇。如成仿吾曾骂过他,那一年成仿吾重来上海,他遇见了很高兴,还说成仿吾长得黑黑的,意思即很结实。

对青年无论认识与不认识的,有信都回答,回信时都很注重,随时抓紧零星的时间来写信,如早晨起身时和晚饭前等。

陈烟桥:《阿Q正传》外国翻译的也有插图,不知鲁迅先生生前对这有何意见?

许广平:他生前翻译的不多。他还收集了不少插图材料,贴成一本一本的预备出版。

钱大昕:鲁迅先生平时看书时姿势怎样的?

许广平：他看书时放得较远，对身体很当心，看书和写作常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花园庄”避难的时候，环境愈不好，就愈苦闷，易发脾气。有一次吃饭时和我谈得不满意，一会儿就找不到他人了。我到内山书店去找，没有。到老房子去找，也没有。那时在老房子又不能开灯，只好暗中摸索，因外面知道这里已无人住，突然开起灯来岂不误事。那时真把我急煞。直到深夜他才回来，内山他们也不放心，也来探问。待过了一、二天气平后问他，他说那天一个人到日升楼去喝茶，这是很危险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情。

陈烟桥：鲁迅先生写文章追悼死难的朋友时的心情怎样的？

许广平：他追悼死难的烈士，从来不哭或者唉声叹气，有时索性喝一杯酒，真正气闷时则写不出东西，很感到烦恼。

陈烟桥：鲁迅先生在左联成立之前对苏联的革命书籍阅读情况怎样？左联成立之后思想发展情况怎样？希望许先生谈些具体事例。

许广平：从苏联的书中看到在大革命之前沙皇的残暴的情形感到很气愤。一九二六年前就注意这方面的书，有了这个基础后来到广东就找郭沫若接洽联合战线，他这时已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但创造社对他误会，使他吃了一个冤枉。他一方面检查自己，批判自己，一方面到上海时更虚心地不断地学习，对马列主义的书籍连续看了三、四年，不断地要求进步，才打下了往后工作的基础，与毛主席起了个共鸣。

对于鲁迅思想的理解，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有两个问题使我很难答复。一个是鲁迅是否反对中医？那时中医的所谓“名医”是盲目捧的。“名医”所开的药方的药名都是些不可能找到的东西，像原对的蟋蟀等等。试问蟋蟀是否能找到原对的？马列主义是不能离开时间、空间的，今天政府提倡中医、中药的政策是正确的，因中医和中药自有它的科学根据的。鲁迅对中药也有赞成的地方，他说山中有好多草药对医治某些疾病有很好的效果，可惜大都已失传了，应该研究。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反对梅兰芳。那时对旦角的捧是别有

作用的，鲁迅就抓住这黑暗的一面加以批评，所谓捧其实就是玩弄。北京的考试场是在前门外，做戏的也在前门外。来京考试的人一般都不带家眷，闲了就来瞎捧旦角，以玩弄女性的态度来玩弄男性。譬如吃酒筵时旦角不但不能坐在一桌吃，而且也要站在背面为他们敬酒。再有后台的戏箱，任何人都可以坐在这上面，但旦角是绝对不能坐的（这一点梅兰芳本人回忆起来也很辛酸）。鲁迅反对京戏就是在这方面，反对这样的一些家伙。那时不是如今毛主席号召的百花齐放，京戏也有大的提高，何况当时没有人敢批评，这种恶劣情况，鲁迅就来批评。

鲁迅曾说过，他的文章希望随着时代而消失。他对原稿不珍惜，用过的原稿都拿来当便纸。后来我暗地为他收拾起来，他知道后也就笑笑算了。他希望死后不要纪念他。我们今天这样来纪念他是不是符合他的心思？（笑）

在三反五反的时候，有人写信问我鲁迅在看社戏后偷罗汉豆的行为对不对？要我答复。我回答他那时农村的小孩心里认为“偷”字并不作偷窃解释的。如当时有一个孩子说我家的豆最大，偷我家的吧。拿自己家的东西，怎么能算偷呢？

今天写鲁迅传，如以周作人的作品做参考，我觉得是很危险的，周作人的文字有无虚假我认为值得研究。他现在虽说对鲁迅很好，但是真实很难肯定。因他现在靠鲁迅吃饭。

张充仁：我收了六、七年鲁迅先生的材料，到今天还未动手创作是因材料未收全。今天听了许先生的介绍给我的帮助很大。我今后准备开始搞一个鲁迅先生的立像。鲁迅先生在上海时间还有什么具体的生活情况可介绍？

许广平：北京纪念馆有像可参考。在北京时不多看电影，在很烦躁时看看美术作品，到上海后较多看电影。

赵延年：鲁迅先生在写作的中间有无站起来走走看看的习惯？

许广平：有时听到有什么声音之类也起来看看。如果累了也在椅上靠靠或吃些零食等。香烟不问好坏，只要有抽，较喜欢抽的是黑猫牌，但都是托写字的人送的。

陈秋草：“花园庄”时鲁迅先生穿什么衣服？出门时是否习惯拿伞？

许广平:在"花园庄"时是穿长袍的,出去拿伞是恐怕下雨,并不拿来当手杖。

赵延年:我希望在我们稿子画好后请许先生来指正一下,这对我们有很大帮助。

许广平:我对美术也不懂,假如各位需要我来,请事先通知我以便安排时间,我在六月十日前还在上海。

注:原记录的题目是《鲁迅先生生平事迹创作准备会》,原件注明未经许广平先生审阅。

(1984 年《新美术》第 1 期)

十年携手共艰危(代后记)

一

今年是鲁迅的夫人许广平诞辰一百周年,年初出版了她的三卷文集,并且召开了纪念会。正巧一些地方电视台在播放描写许家几代兴衰荣辱史的电视剧《千秋家园梦》,其中许广平占了不小篇幅,她与鲁迅的相识、相恋和结合是重头戏。但看了这段故事,许多熟悉史料的人很倒胃口。最令人震惊的是剧中的许广平女扮男妆与鲁迅交往,后者却长时间蒙在鼓里,称其为"广平兄",两个人还因下班太晚被反锁在《新青年》编辑部。

这个类似梁祝故事的情节,是编剧者想像力的产物。许广平和鲁迅结识,是在女子师范大学的课堂上。当然文学作品可以对素材做艺术化处理,高于生活。揣摩编者的意图,似乎也有些因由。鲁迅与许广平通信,用了"广平兄"这个称呼,对方提出疑问,鲁迅在第二封信中特地写了一段关于"兄"字的讲义。另外许广平的性格也可能是编者做这样处理的依据。许广平,广东番禺人,出身仕宦家庭,叔祖许应骙官至礼部尚书。族兄许崇智是国民革命干将,追随孙中山先生,立下赫赫战功,曾任粤军总司令。孙中山逝世后,他一度掌握广东军政大权,后因厌恶各派势力倾轧,将权力让给结拜兄弟蒋介石,回家隐居。

生为大家族的女子,许广平虽然也受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但她性格刚强好胜,有反抗精神。父亲准许她跟哥哥们读书,只是想让她认几个字,能记账、会写信就行了,所以嘱咐塾师用粤语给她上课。她的反抗

办法是,假装只听得懂官话,终于争得跟哥哥们一起读书的权力。

许广平和鲁迅一样,也有包办婚姻的痛苦经历,所不同的是,许广平反抗成功,鲁迅则未能逃脱。许广平十几岁时在哥哥的帮助下退婚,跑到北方求学,先是在天津,后到北京。在大学里,是学运领袖,被当局称为“害群之马”(鲁迅日常简称之为“害马”)。鲁迅很喜欢她这种敢做敢为的性格,她呢,由于崇拜、特别是由于同情鲁迅而对鲁迅产生爱恋之心。用她本人的话说,她和鲁迅是“由同情的互相怜悯而亲近起来”的。

鲁迅和许广平很早就有“缘份”。那是鲁迅在南京上学时,因为喜欢读康、梁办的杂志,一位在学校任职的本家觉得很危险,有一天就拿来一张报纸,指着上面的一篇文章,让他好好诵习。那是反变法的许应骙参劾康有为的奏折,把康说成祸乱中国的元凶。鲁迅后来开玩笑地对许广平说,我年轻时还吃过你们许家的苦头呢,指的就是这件事。

二

许广平和鲁迅由通信开始恋爱是在一九二四年,两年以后一起离京南下,一个到广州,一个到厦门,不久在广州会合,一九二七年到上海定居。其间的信件后来集为《两地书》出版。许广平的第一封信向鲁迅提出如何对待社会复杂现象和人生的意义等问题,鲁迅对这些问题做了真诚的回答,同时表达了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迷惘和无奈。

这位著名的小说家并非在无病呻吟,他正受着巨大的创痛,疾病缠身却仍烟酒无度,拒不就医,差不多是在自暴自弃地慢性自杀。其时《新青年》已经解体,他在教育部上班又无聊,家庭生活方面除了负担着青年时就戴上的包办婚姻的枷锁外,还刚刚与从小就很亲密的二弟周作人反目成仇。没有了战友和兄弟,没有了能够倾听和理解自己的谈话对手,鲁迅陷入绝望的深渊。许广平的出现给他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从许广平这一面来说,她爱慕鲁迅,自然不可否认有鲁迅是文坛名人的因素。至于同情鲁迅的处境,则是在更多地了解了老师的境况以后。在《两地书》中,因为两人多谈社会和学校的事,恋情的发展历程并不明显。这时候,许广平写过一些抒情性短文,表达了她在处理感情问

题时的一些思绪。例如《风子是我的爱》中说："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鲁迅比她年长得多，简直是两代人。这倒不算大问题。最大的障碍是鲁迅有妻室，而且不可能离婚。如果他将不识字的小脚夫人送回老家，无异于毁灭她。所以鲁迅说妻子是母亲送给自己的礼物，只有好好保存。时代虽然有些进步了，但在旧观念中，许广平与鲁迅结合，好像是去作"妾"。所以，许广平为了爱情，要冲破"名份"的束缚，需要极大的勇气。

社会上的议论很多。他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离开北京。两人相约分头到大学教书，挣一些钱做成家之资。

别人的议论暂且不提，鲁迅二弟周作人置鲁迅长期婚姻生活的痛苦于不顾，对长兄这个举动多次不提名地影射攻击。如说某名人撇下老母和发妻，带着"宠妾"到洋场上享受，是"思想界权威"神话的破产。当他见到报纸上《两地书》出版广告后，不禁愤愤然说，鲁迅已经"丧失理性"了。可能后来见到该书，并不那种卿卿我我、满纸唇吻和眼泪的东西，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两地书》对了解鲁迅思想很有价值。因为爱情的感召和对理解的渴望，鲁迅倾诉了自己的内心真实。这里面有许广平的大功。

三

许广平冲破社会和家庭的束缚，与鲁迅走到一起，使鲁迅获得了新生，并且产生了新的创作灵感。至于恋爱过程中感情的起伏变幻，外人很难揣度，只能从一些作品中推断。一开始鲁迅对这份感情不无疑虑，总觉得差异太大，会辱没了对方。他平时经常说自己已经是中年人，思想上又很悲观，怕单纯热烈的青年人受到影响甚至毒害，所以每听见人家说他是思想界权威，是青年人的导师，就惶恐甚至生气。但是他一面害怕这种差异很大的恋爱会产生不良后果，一面却又渴望爱和温情，因为他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不久，后一种思想渐渐占了上风。学生对他的倾慕和关爱使他感激。正是在许广平等人的竭力劝解下，他开始戒酒并且积极到医院治疗。

在《腊叶》这篇小文中，他把自己比作一片有蛀孔的“病叶”，在深秋飘零。但偏偏有人怜惜而保存他。这个保存者就是许广平，这篇文章正是为她而作。然而鲁迅也发了疑问，保存者这样对待病叶，是珍爱呢，还是一时冲动，时过境迁就会忘掉？

另外还有两篇作品与婚恋有关。一篇是小说《伤逝》，写一对青年男女背叛家庭，自由恋爱同居，但因社会习俗和经济方面的压力过大，又因为婚后生活缺乏光彩和激情，渐生裂痕，终于离散，男子愧悔交加，女子抑郁而亡。鲁迅一贯认为搞革命也好，搞妇女解放也好，一定先要有经济基础。在与许广平结合前，先想到分头教书挣钱。在这篇小说中，鲁迅对穷困的年轻夫妻日常生活描写相当细腻。最能表现经济是生活基础这个思想的是以古代神话传说为素材的小说《奔月》，写曾经射下九个太阳、现在打猎为生的羿，英雄末路，到了不能养家糊口的地步，妻子嫦娥美丽的脸庞日渐黄瘦，终于耐不住贫困，偷吃了仙药飞到月亮上去了。鲁迅是不是对以后的生活没有把握？对爱还没有足够的信心？

鲁迅最后下了决心，说自己“可以爱！”他和许广平有足够的能力支撑起一个家庭。鲁迅选择了作自由职业者，到上海卖文为生。许广平可以做家庭妇女，不必出去工作——看来他的顾虑已经彻底消除了。

四

许广平和鲁迅定居上海后，从日常生活方面讲，比以前安逸一些。鲁迅靠版税收入和给报刊杂志写稿养家，辛苦还是辛苦的，但至少没有遇到鲁迅在小说中写的那种吃饭问题。两年以后，他们有了孩子。

从一个活跃的知识女性、学运领袖、大学教师，一下子变成家庭妇女，许广平一开始很不适应，思想上难免苦恼。看到和自己一样受过新式教育的姐妹们在社会上忙碌，她曾经向鲁迅提出，想出去找份工作，并已经在着手请熟人代为介绍。鲁迅得知后，面有难色，说，我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你出去工作，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中去了。许广平知道了鲁迅是不同意她外出工作的，就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决心“忘了自己”，帮助鲁迅的工作。这是许广平为

鲁迅、为家庭做出的牺牲。在两人结合之前,她还写一些文章,至少写写信,走到一起后,却连信也不必写了。长期不提笔,即使在文学家身旁有耳濡目染的好处,但对学问文章的进步终究有相当影响。从此她的日常工作就是做家务,照顾鲁迅的起居。有一次,一家妇女杂志来向许广平约稿,许广平苦笑着说,我是写不出来了。鲁迅在一旁说:她是能写的,可能是我们父子俩影响了她。鲁迅对许广平很感激,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

鲁迅有了这样好的家庭生活环境,的确可以做很多事,时间充裕,他可以做一些大计划,编辑、翻译、自印书籍等等。在上海的十年,他的作品从字数上说,是以前的两倍。许广平在某些方面也能给他以帮助,最常见的是抄稿子,搜集资料。鲁迅自然也想到了让许广平继续学习。因为他精通日语,有教读的便利,就为许广平制订了学习日语的计划,而且一边学习,一边实践,找来一本日文书翻译。后来译成《小彼得》,鲁迅加以校订,出版时署名"许遐"(后编入《鲁迅全集》和《鲁迅译文集》)。鲁迅用日文写的文章《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也由许广平译成中文发表。

许广平认识到鲁迅的价值,除了在生活细心照料外,还很注意收集鲁迅的手稿,有时候把手稿从字纸篓中捡出,加以妥善保存。后来,她将这些手稿和其他鲁迅遗物都无偿捐献给国家。

五

当然,鲁迅和许广平因为年龄悬殊,阅历各有不同,思想上的差距在所难免。鲁迅对人对己要求都很严格,凡事十分认真,平时对那些办事潦草的人们很不以为然。因为他名气大,经常有文学青年寄稿子来要他看,单是因为字迹不清这一点就使他很觉得劳累。他事必躬亲,轻易不找替手。像校稿这类工作,本不是一种复杂劳动,只要认真就能胜任,他可以交给许广平去做。但鲁迅担心她因为其他事务分心,将来书印出来错误太多,所以便是躺在病床上,不得已让妻子代替,自己也还要复校。甚至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也能看出来鲁迅这种性格。有时候给人寄书,许广平把书包好后,鲁迅看了不满意,就要拆开来,重新包

过。许广平后来感叹说，看到鲁迅做事那么细致，自己常常自愧。

可见跟大人物生活在一起，固然会对自己有所促进，但因为不是总能跟得上步调，有时也会感到吃力的。

他们也有闹矛盾的时候。鲁迅经常受围剿、打笔战，有时候心情不快，难免迁怒。他的特点是生气后，闷在心里，很长时间不说话。他自己说像一匹受伤的野兽，躲进草丛中，独自舔好了伤口，走出来继续前进。别人的关爱和抚慰他不敢接受也接受不了。这种脾气许广平在做学生时就见识过的，那时她曾百般劝解。但现在是两个人闹矛盾，劝解也没有用。有一次，鲁迅跟她生气，竟然一个人跑到阳台上睡下，表示抗议。直到孩子跑过来，觉得好玩似地躺在他身边，他才起来。一般地，他事后会表示歉意地解释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许广平曾批评他说，因为你是我的老师，如果年龄相仿，我不会这样(迁就你)。鲁迅马上说："这我知道。"

鲁迅的工作十分辛苦，除了睡觉和吃饭，简直是一刻不停，他写作之余的休息，就是坐在书桌旁的藤椅上浏览书报。过度劳累，加上常常处于愤怒的情绪中，又加上以往留下的病根未除，终于并发多种疾病，于一九三六年秋天逝世，只活了五十六岁。其时，许广平三十八岁。

鲁迅遗嘱里对许广平说："忘记我，管自己生活。"他们的朋友宋庆龄曾同她谈起以后的生活安排。说她本人鉴于孙先生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打算改嫁，她劝许广平安排好以后的生活。

许广平怀着对鲁迅的眷恋和爱，决心将未来的日子用于对鲁迅著作的整理和宣传。

他们的生活总的来说是和谐的。鲁迅为了表达对许广平的感激和爱，经常赠书给她。有一本画册上题诗一首道："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更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六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为保护鲁迅遗物尽了极大努力。最大的工程是编辑《鲁迅全集》。她征集鲁迅佚文和书信，编辑、校对，废寝忘食，在编辑委员会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印成全集二十卷。

她还将鲁迅日记手稿拿出来,亲自抄写整理,准备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对上海进步文化人士进行迫害,许广平也成为受害者。一天,日本宪兵闯进家里,将她带走,同时抄走一部分文稿。许广平被宪兵队囚禁了两个多月,受尽折磨,始终没有说出她所知道的文化人士的下落。据她后来写的《遭难前后》回忆,她挨过毒打,受过电刑。刚放出来时,朋友们见她步履蹒跚,头发花白,牙齿脱落。她说她时时记着鲁迅说过的话,受刑时,忍过去或者昏过去就好了。她为此获得广大文化界人士的尊敬和爱戴。

可惜的是,宪兵带走的一本鲁迅日记没有归还,这就使现今出版的鲁迅日记缺少了一九二二年一年,那恰是鲁迅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晚年鲁迅的生活,许广平是最熟悉的。鲁迅逝世后,报刊上发表很多回忆文字,每逢祭日,都会有大型的纪念活动。许广平的回忆录是独特的,特别是有关鲁迅日常生活情况的介绍,为读者描述一个活生生的鲁迅,成为研究鲁迅的极重要的资料。

许多细节最起码对画家和演员们有参考价值。许广平成为这些艺术工作者请教的活词典。例如她曾对画家们说,鲁迅读书时总是左手持书,在外行走时携带物品和书籍,一定要包起来。如果没有她的指点,肖像画家们是很容易犯错误的。至于在神态上许多作品都把鲁迅画成横眉冷对,忽略了鲁迅平日和蔼的一面,显然是受了时代风气的影响,她也无可如何。鲁迅去世不久就有电影演员跃跃欲试,要将他的形象搬上银幕,其中赵丹在“文革”前甚至已经造了型,还请许广平看过,据说许广平看了不很满意,可能是因为赵比鲁迅丰满,不够清峻。

许广平的回忆录主要记述鲁迅晚年生活和思想,其重要性早有定论。但也不是没有遗憾,我们看《两地书》中鲁迅经常表达对周围人事的看法,鲁迅晚年日常闲谈中对当时文坛和社会上的斗争也不会缄默不语,许广平后来意识到鲁迅的意见的重要性,开始记录鲁迅的谈话,但只记了几天,就因为鲁迅病重而中断了。十七世纪英国作家鲍斯威尔,极崇拜约翰逊博士,多年随侍左右,记其言行,写成巨著《约翰逊博士传》。许广平有此条件,却没有写得更详细,现代的读者在不满足的同时,当然也应该体谅她的难处。

•

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确认，许广平也受到尊敬和重用，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担任了国务院副秘书长这样高的行政职务。

在历次思想路线斗争中，许广平都得以平安度过，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鲁迅的历史功绩做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三家五最”的定论不可动摇。因此尽管鲁迅生前的共产党员朋友瞿秋白、冯雪峰、胡风等或遭揪斗，或被下狱，或被鞭尸，却没有谁敢来动鲁迅一根毫毛。在“文化大革命”这个集大成的毁灭文明的运动中，鲁迅也一样巍然屹立。那原因是，“革命”前夕，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讲述自己在党内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时，突然笔锋一转，说鲁迅和自己一样，自己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封信流传全国，更提高了鲁迅的威望。他甚至享受了同毛泽东一样印行红皮本语录的待遇。

风云变幻中，许广平多次陷入精神苦闷，但大势所趋，她不得不随声附和，把鲁迅生前好友说成反革命分子——这些人当时到他们家借住，与鲁迅畅谈，这些她是最了解的。

同时，她根据形势需要，写了一些回忆录。这类应景文字后来引起鲁迅研究者的不满。看似颂扬鲁迅，实则恰恰贬低了鲁迅。但在是非颠倒的时代，她不这样说就可能自身难保。例如她写鲁迅是党和毛主席麾下的一个小兵。毛泽东说过鲁迅是主将和旗手，他们两个的心是相通的，既然相通，就应当以朋友看待。再说两人从未见过面，鲁迅也几乎没有读过毛泽东的文字，根本谈不上崇拜和服从。倒是毛泽东十分喜爱读鲁迅的文章。后来有人对许广平“文革”期间写的回忆文字进行了考证和批评，是很必要的工作。但考虑到那是在一个可怕的时代，她这样做实在是不得已，应该给以同情和谅解。

不幸的是，她本人最终也未能逃脱那场劫难。“文革”爆发后不久，她捐献给国家的鲁迅遗物中书信部分突然丢失。那是花费她许多精力搜集来的，尚未整理出版，她的焦急可想而知。她赶紧会同有关单位写信给中央，要求追查。据最近发表的当时负责追查的老将军回忆，最后

在江青住处发现了那几个麻袋。但许广平却因为受惊,突发心脏病身亡。

据说江青是想看看鲁迅对当时人物的评价,因为她本人是那时上海滩上一个二、三流的演员。其实,鲁迅根本不会注意到她,就是对她那一类人中更出色的人物,鲁迅的评价也不高。从他们后来穷折腾的行为看,鲁迅真是有先见之明。

许广平的一生,是与鲁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要中国人民仍然看重鲁迅,许广平就有其价值在。

黄乔生

一九九八年五月于北京

(这篇文章为纪念许广平百年诞辰而作,原拟在报纸上发表,后因报纸改版而未刊出,现移作本书后记。本书所收文章,多记述鲁迅先生日常生活。为便于读者参照阅读,特将周海婴《重回上海忆童年》编为附录。——编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
作者＝许广平著　　孙郁　　黄乔生主编
页数＝２５３
ＳＳ号＝１０８６３１９４
出版日期＝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第１版